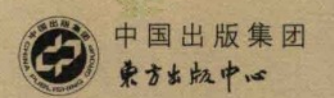


利比亚史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 著　韩志斌 译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ISBN 978-7-5473-0287-3
9 787547 30287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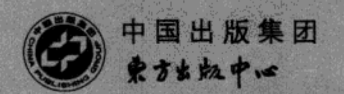
定价：30.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利比亚史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 著　韩志斌 译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0-38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比亚史/圣约翰著；韩志斌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1
(世界历史文库)
书名原文：Libya: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ISBN 978-7-5473-0287-3

Ⅰ. ①利… Ⅱ. ①圣…②韩… Ⅲ. ①利比亚—历史
Ⅳ. ①K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2263号

责任编辑：王卫东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30千
印 次：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本书预设的读者对象是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众国(一般称之为利比亚)的普通大众、休闲旅行人士、企业主管和大学生。本书的初衷是使利比亚的历史更易让人理解,使读者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甚至可偶发激动与兴奋的情感。本书试图在可涉及的空间内,对利比亚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与政治史有一个全面、综合的解读。

利比亚的历史变迁具有底蕴深厚、类型多样的特点,其历史脉络并不是单线型延伸,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特点表现得尤为如此。恰如其分地说,我已经强调了利比亚历史变迁的特殊形态,但我还要指出的是,利比亚的历史演进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有着相似的特征,预期有相同的模式。我们期待从中可以探究由诸多偶发事件构成利比亚的特殊历史图景。

由于针对特定读者,再加上跨越 3 000 年历史的时空限制,因此本书主要集中于分析重大、必要的历史事件,提供大量的细节让利比亚历史浅显易懂。在此过程中,我毫不吝惜地使用了自己 40 年来研究利比亚的相关成果。不过,我更参阅了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把他们的观点与看法介绍给普通读者,而这些精妙的研究成果以前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享用。因为这种写作套路,利比亚学生会发现一些很熟悉的东西。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我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重复

或进一步详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xii　本书末尾提供了利比亚国内相关课题的参考书目录，对补充阅读书目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将大有裨益。我估计，由于本书引用的文献大多数是英文书(除个别情况外)，读者对此可能不满意。每章的开头都列有参考文献目录，文中引证的那些书也含有大量的参考文献目录，这些著作除了英语外，还包括其他语言，为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士进行深入阅读提供了一条捷径。对于利比亚历史的其他细节，读者可以参阅我的《利比亚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ibya*, 2006)的最新版本。该书囊括了所有利比亚书目，书中的列表提供了所需书目的藏书地点，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在我写作本书的几年间，利比亚国内外的相关人士都给我提供了大量帮助与鼓励，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那会占据太多的篇幅。然而，我真心真意想对他们的慷慨相助与无私支持表示致谢。我也要感谢我的儿子内森·贝利·圣约翰(Nathan Bailey St. John)为本书图片作出的贡献。他所提供的图片与地图对我理解利比亚历史深有助益。我也感谢我的妻子卡罗尔(Carol)为本书以及对我的长期鼓励与支持所付出的辛劳。



关于字译、音译问题的说明

人们普遍认为,阿拉伯语的人名与地名译成英语读起来拗口,不能精确表达其本来意义。更为困难的是,本书的原始资料横跨 3 000 多年历史,主要利用欧洲与非欧洲语言。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利比亚人物与地点的拉丁文拼写并没有标准化。而早期的探险家、旅行家、外交家与其他官员大都不能通晓数国语言,经常用拉丁字母拼写、校译阿拉伯人名与地名。结果,许多拉丁语混合了大量改写后的英语、意大利语与法语。

历史名称是翻译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之一。现代读者会对一个地方的古地名困惑迷惘。这些历史名称可能已经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仅有此领域的少数专家对之略知一二。从历史角度来说,使用历史名称可能更准确地表达原始场景,但过度的使用却会使普通读者大惑不解。因此,我在本书中按照通用的国际标准用法,尽可能地采用约定俗成的拼写模式。在难以处理的地方,我会清晰地阐释古代地名与现代地名的历史联系。

本书按照国际惯例来标注地名,这种方法具有清晰明确的优点。我不赞成一些人认为有必要随意改变地名的做法,也就是说,利比亚学生如果参考国际地图,会很容易找到本书提及的地名。

利比亚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21 世纪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盆地活动
大约公元前 2700—前 2200 年	利比亚历史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
公元前 632 年	北非地区修建了第一个希腊城市昔兰尼
公元前 500 年—公元 500 年	加拉曼特人控制利比亚南部
公元前 264—前 241 年	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 218—前 202 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
115—117 年	昔兰尼加地区发生犹太人起义
300 年	上利比亚省与下利比亚省成立
429 年	汪达尔人进入北非
644—646 年	阿拉伯人占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
661—750 年	伍麦叶王朝
750—1258 年	阿拔斯王朝
910—1171 年	法蒂玛王朝
11 世纪	希拉利亚人入侵
1073—1147 年	穆拉比德王朝
1147—1267 年	穆瓦希德王朝
1228—1574 年	哈夫西德(Hafsid)王朝
1517 年	奥斯曼人占领昔兰尼加

x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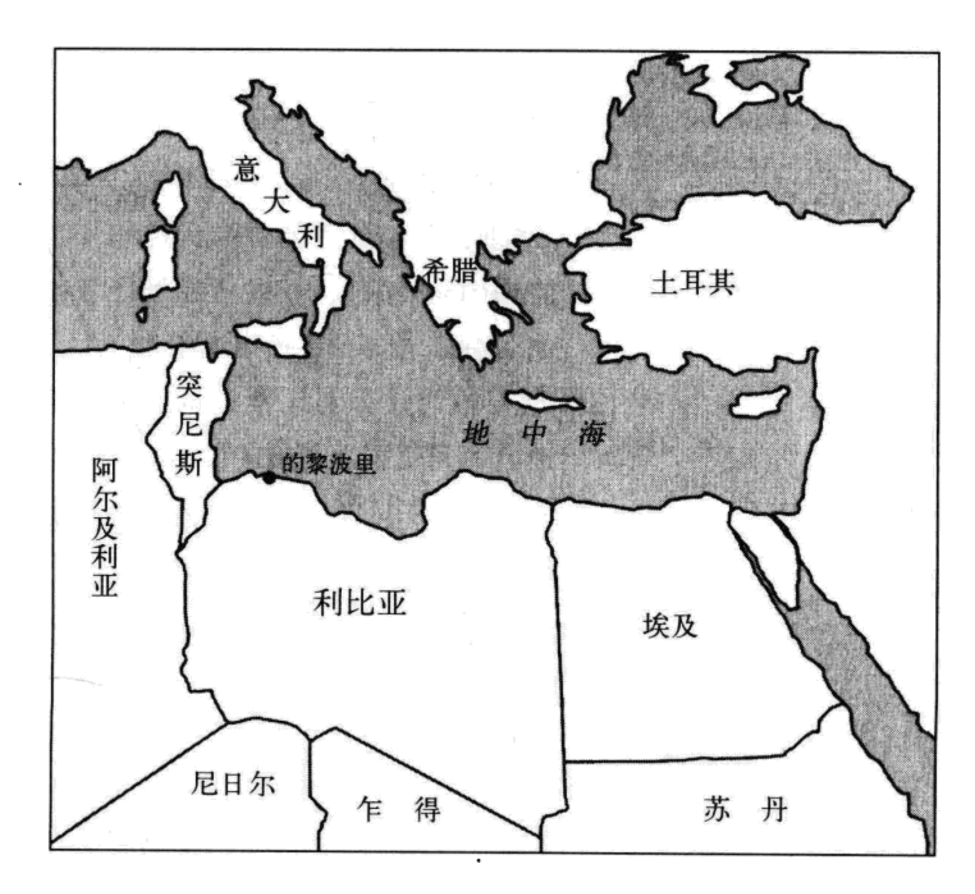
1551 年	奥斯曼人占领的黎波里
1711—1835 年	卡拉曼利王朝
1835 年	奥斯曼帝国的第二次占领
1842 年	赛努西教团在昔兰尼加成立扎维亚
1908 年	青年土耳其党人起义
1911—1943 年	意大利占领
1912 年	阿齐齐亚大会
1918 年 11 月	的黎波里共和国成立
1919 年 10 月	颁布《基本法》
1929 年	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与费赞地区合并成利比亚
1931 年 9 月	奥马尔·穆赫塔尔遭处决，利比亚抵抗运动结束
1938 年	意大利发起了大规模的农业定居运动
1943 年	英国军队管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军队管理费赞
1949 年 11 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利比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主权的国家
1951 年 12 月	以伊德里斯·赛努西为国王的利比亚联合王国宣告成立
1953 年 2 月	利比亚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
1953 年 7 月	利比亚与英国签署军事协议
1954 年 9 月	利比亚与美国签署军事协议
1955 年	利比亚《石油法》付诸实施
1961 年 10 月	石油开始出口
1962 年	利比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
1963 年 4 月	利比亚放弃联邦制政府，成立集权制政府
1969 年 9 月	九月革命推翻君主制

时间	事件	
1969 年 12 月	公布宪法	
1970 年 6 月	美国军队从惠勒斯空军基地撤退	xvii
1971 年 6 月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1973 年 4 月	宣布第三世界理论,标志着民众革命的开始	
1974 年 4 月	卡扎非放弃革命民族主义活动	
1975 年 9 月	被迫接受美国的第一次反利比亚经济制裁	
1976 年 9 月	《绿皮书》第一部出版	
1977 年 3 月	宣布成立民众权威政府	
1977 年 11 月	《绿皮书》第二部出版	
1979 年 6 月	《绿皮书》第三部出版	
1979 年 12 月	民众袭击的黎波里的美国大使馆	
1980 年 1 月	民众烧毁的黎波里的法国大使馆	
1980 年 2 月	美国关闭驻利比亚大使馆	
1981 年 5 月	美国命令利比亚关闭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机构	
1984 年 4 月	伦敦警察包围了利比亚大使馆,一警官被使馆内打出的子弹射杀	
1986 年 8 月	摩洛哥从与利比亚的联合行动中撤出	
1988 年 10 月	美国第一次指责利比亚建造生化武器工厂	
1988 年 12 月	泛美航空公司 103 号航班在苏格兰的洛克比上空爆炸	
1989 年 2 月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与突尼斯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xviii
1989 年 3 月	利比亚指责穆斯林兄弟会似的伊斯兰组织利用宗教谋求政治权力	
1989 年 9 月	法国联合航空公司的 772 航班在尼日尔	

	沙漠上空爆炸
1991年8月	利比亚表示开始修建大人工河
1992年4月	联合国对利比亚进行制裁
1992年11月	利比亚要求意大利对该国23年的占领支付补偿
1994年11月	利比亚在货币贬值一周后为第纳尔设定多层次汇率体系
1995年9月	伊斯兰激进力量与政府军在班加西发生冲突
1996年4月	卡扎菲宣布利比亚将停止与西方公司做生意
1997年3月	梵蒂冈与利比亚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1998年10月	南非授予卡扎菲“好望角秩序”的称号，以表彰他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对南非的支持
1999年4月	联合国安理会暂停对利比亚的制裁
2000年3月	利比亚取消了中央政府的诸多行政执行功能，这些功能分别由23个市镇委员会(包括总人民大会)承担
2000年9月	据报道，利比亚国内发生种族暴乱
2001年1月	洛克比法院裁决两名利比亚被告之一无罪
2001年10月	利比亚被选举为联合国社会与经济委员会成员
2003年3月	伦敦举行秘密会谈，目标是解除对利比亚非常规武器项目制裁
2003年9月	联合国安理会解除对利比亚制裁
2003年12月	利比亚放弃非常规武器计划
2004年3月	总人民大会讨论利比亚经济自由化的措施
2004年6月	美国与利比亚恢复外交关系

2004 年 9 月	美国取消对利比亚的贸易禁运政策
2004 年 10 月	欧盟解除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
2005 年 1 月	利比亚废除人民法院
2005 年 5 月	美国计划恢复与利比亚的军事合作
2005 年 6 月	利比亚反政府组织在伦敦集会，谋划将卡扎菲赶下台
2006 年 3 月	总人民委员会成立人权办公室
2006 年 5 月	美国将利比亚排除出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
2006 年 6 月	柯罗尼资本投资公司购买控制了泰姆公司(Tamoil)股份，后者在利比亚出售的国有公司中占有最大的份额
2006 年 7 月	世界银行认为利比亚是世界上产油国经济多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
2006 年 10 月	利比亚宣布 120 万学生将拥有计算机，这是“每个孩子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一部分
2006 年 12 月	利比亚法院判决 5 个匈牙利护士和 1 个巴勒斯坦医生死刑，指控理由是他们在班加西医院故意将 HIV 病毒注射到 426 个孩子的体内
2007 年 3 月	利比亚拒绝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阿拉伯峰会
2007 年 5 月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访问利比亚，这是他非洲告别之行的一部分
2007 年 6 月	卡扎菲批评美国部署的非洲司令部计划，这是美国人在非洲新设立的一个军事指挥机构
2007 年 7 月	利比亚释放了 6 名被指控在班加西医院故意向儿童注射 HIV 病毒的外国医生

xx



地图 1　利比亚

目录 Contents

地图与插图

第一章　早期历史

西北非洲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外国人的历史，其原住民身上固化的文明资源主要来自于外部，通常是外来力量征服的结果。然而，他们却以顽强的气度与异常的魄力忍受着。

苏珊·拉文(Susan Raven)：《罗马人在非洲》(*Rome in Africa*)，1993年。

在利比亚，你随时随地都能意识到历史遗存，即消逝文化(receding culture)的残留遗痕。

安东尼·斯维特(Anthony Thwaite)：《赫斯珀里德斯[①]的沙漠》(*The Desert of Hesperides*)，1969年。

利比亚处于阿拉伯半岛、非洲与地中海三大世界的边缘区域，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其核心领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位于利比亚地中海海岸线中心的苏尔特湾也叫锡德拉湾，是一个深入海中不规

---

① 赫斯珀里德斯是希腊神话中一群美丽的仙女，在警戒龙的帮助下看守金苹果园；果园越过阿特拉斯山脉，坐落在环绕世界巨川的西岸，赫拉克勒斯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摘取金苹果。——译者注

则的突出海角。荒无人烟的苏尔特盆地是一处以锡尔提加(Sirtica)闻名的、遥远的沙漠地带,将这个国家分成两个部分。

不可征服的海洋与陆地天然屏障,再加上东南与西南部广阔的沙漠,利比亚早期的地理范围包括三个区域,东部的昔兰尼加、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西南部的费赞。从历史脉络演变来看,昔兰尼加倾向于同马什里克(Mashriq)或伊斯兰世界东部看齐,而的黎波里塔尼亚则认同马格里布与伊斯兰世界西部。由于利比亚南部延伸到撒哈拉沙漠深处,与非洲邻国享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费赞自然就同南面的非洲中西部国家交往甚密。

"利比亚"这一名称源于古代埃及人知晓的一个柏柏尔人部落,然而这是对真实情况的误解。希腊人认为,如果将柏柏尔居民命名为"利比亚",那么这一名称将适用于北非的大多数地区。1911 年,作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意大利把前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省份占领,并定名为"利比亚",以便与古老的罗马帝国联系起来,证明殖民主义的历史合法性。随后,1951 年联合国将这一名称用于新成立的利比亚联合王国。然而在 20 世纪前,欧洲人、奥斯曼人或当地政府都没有使用过"利比亚"这一术语。直到 1929 年后,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地区处于意大利殖民统治时,"利比亚"才开始正式使用。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之统称为利比亚历史,但一个很重要且应该牢记的事实是,作为一个行政、经济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利比亚,其历史还不到 60 年。

历史背景

利比亚的史前史充满了诸多神秘莫测的东西,可获得的考古证据既复杂又充满争议。应该承认,我们现在仅能通过希腊-拉丁(Greco-Latin)文献探悉利比亚早期历史的肇始。该地区的早期居民从柏柏尔人到汪达尔人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都是通过希腊官员、罗马官员、地理学家以及其他旅行家等亲眼看到并加以描述的情况,与古代居民本身没有关系。

3

至少从公元前 7000 年开始,利比亚沿海平原文化已经显示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这些居民擅长耕作农作物,驯养牲口,这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利比亚的南部,也就是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地区,游牧民与狩猎者在水源充足的草地到处游逛,在游玩嬉戏中就能得到丰厚的收获。热带草原地带的人们兴旺发达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2000 年,当时气候恶化使该地区极为干燥。人们逃离了这个逐渐沙漠化的地方,或者移民到苏丹,或者融入本地的柏柏尔人地区。

我们对柏柏尔人的起源知之甚少。埃及旧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700 —前 2200 年)的埃及铭文第一次记载了柏柏尔人的迁徙情况,这也是利比亚历史的最早文本记录。至少在此事件以前,柏柏尔人部落,也就是埃及人所知晓的莱布或利比亚人向东扫荡,最远到达尼罗河三角洲。埃及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2200 —前 1700 年),埃及人在利比亚东部的柏柏尔人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他们索取贡品。据说,约公元前 950 年,一个柏柏尔人控制了埃及,以西斯霍克一世法老的名义进行统治。他的继承者,所谓的利比亚王朝,人们认为是柏柏尔人的王朝。

人们还不清楚柏柏尔人什么时候来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利比亚地域,但是将"利比亚"名字使用到他们身上的古希腊与古罗马作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极为熟悉。公元前 450 年,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访问北非,描述了柏柏尔人社会组织和政治体系的一些细节。罗马历史学家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萨卢斯特,在他的书中也详细记录了柏柏尔人在 1 世纪时期的生活。他们的族群特征一直准确地保留到今天。总的来说,现在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属于少数族群,特别在利比亚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活动区域很广阔,这也证实其原始群体规模宏大。锡瓦(Siwa)、埃及西部的沙漠、利比亚南部的费赞都发现了一小部分此类人群。从利比亚西北部的奈富塞山(Jebel Nefousa)出发,一条说柏柏尔语的广阔地段一直向西南延伸进入阿尔及利亚南部、马里东部以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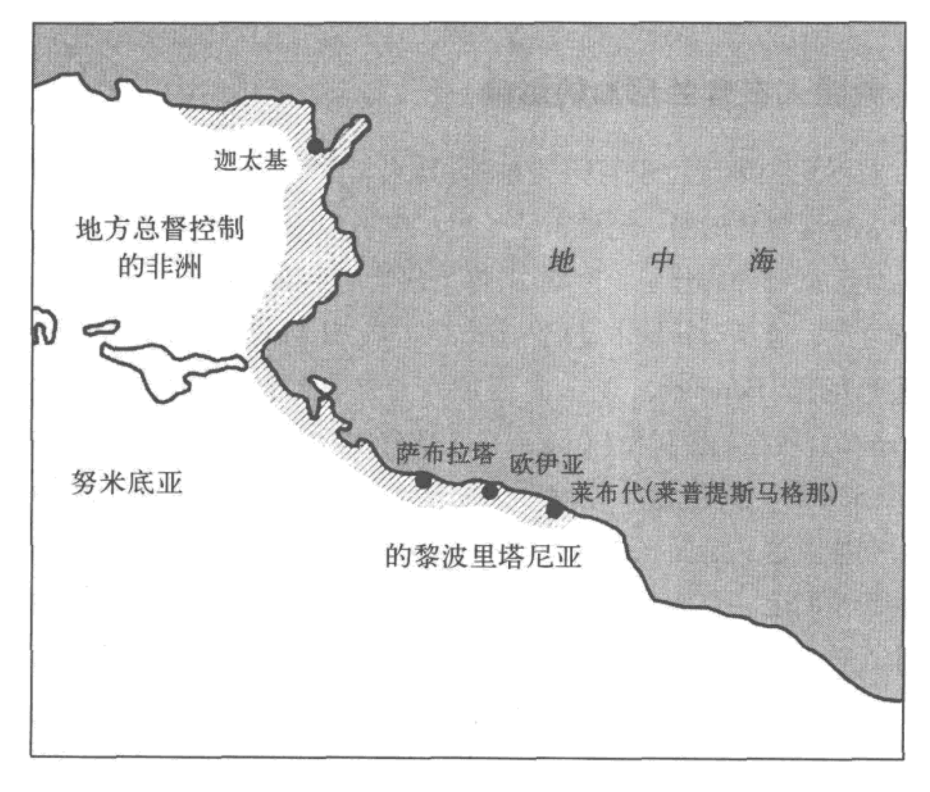
及尼日尔西部。阿尔及利亚北部以及整个摩洛哥也遍布着无数说柏柏尔语的人群。

加拉曼特人是居住在现在称之为"费赞"地区的部落联盟。对于他们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包括他们如何称呼自己。"加拉曼特人"是一个希腊名字,是后来罗马人使用的称呼。加拉曼特人的地方政权开始于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500 年结束,希罗多德的《历史》介绍了相关情况,这也是关于该政权的最早文本记录。加拉曼特人的政治权力仅限于在阿加尔(Ajal)涸谷,这里用铁链圈占了一个大约 250 英里长的绿洲。然而,加拉曼特人控制的绿洲处于从地中海到非洲中部的直达路线,即所谓的"加拉曼特人捷径",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他们控制了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即从左达米斯(Ghadames)向南到尼日尔河,向东到埃及,向西到毛里塔尼亚的经商捷径。费赞南部山谷是一个蕴藏丰富历史遗产的考古场所,加尔曼特人的首都加尔马(也叫加拉马)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掘的文物遗存。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腓尼基人定居点

腓尼基人或者叫布匿人,是地中海东部的人群,生活的家园包括现代叙利亚、黎巴嫩与以色列北部的沿海地区。作为技术高超的航海家、聪颖善交的商人,腓尼基人的身影在公元前 12 世纪活跃于整个地中海盆地。他们在积极进取的海上贸易文化的激励下,建立了诸多极富潜力的商业据点。迦太基就是在公元前 9 世纪时由布匿人沿着地中海岸,现在称之为突尼斯的地方建立的最成功的城市。

的黎波里塔尼亚是腓尼基人为将迦太基的影响力扩展到北非海岸而拓殖出去的一部分。布匿人在这里建立了永久定居点,修建了三个大的沿海城市,即欧伊亚(的黎波里)、莱布代[后来的莱普提斯·马格那(Leptis Magna)]以及萨布拉塔,这三个城市被统称为的黎波里斯(也叫三城)。到公元前 15 世纪,布匿人海外最大的定居点迦太基的霸权已经扩展到北非的大部分地区。



地图 2 利比亚的古迦太基人定居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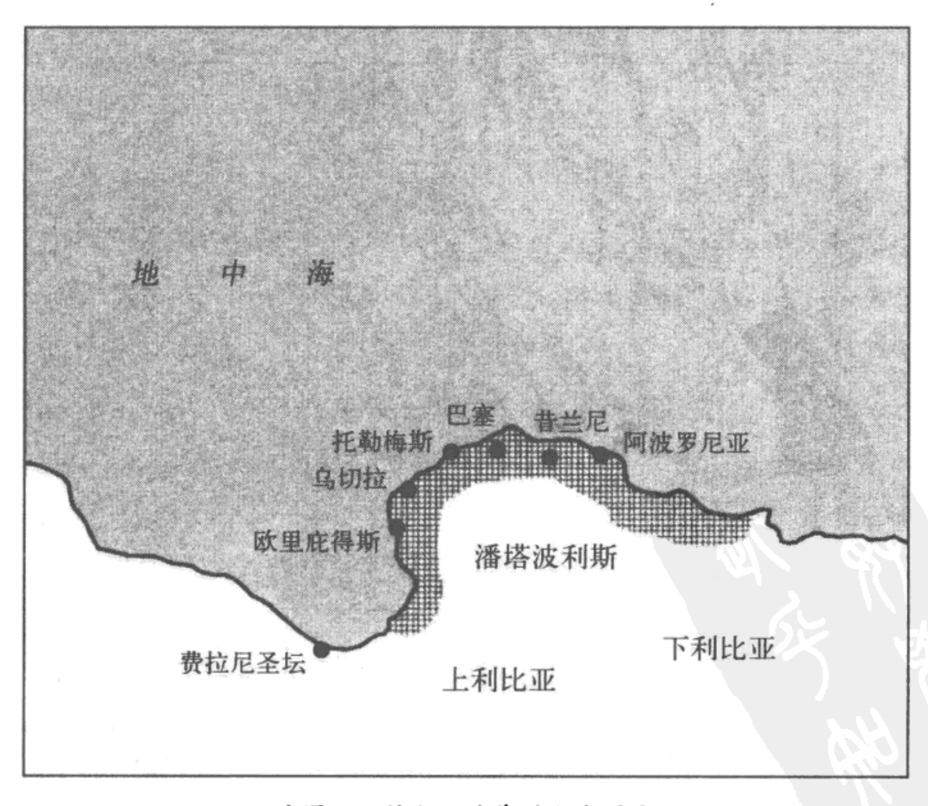
从沿海居民点向东北走几英里就是现在的突尼斯,迦太基对周遭的柏柏尔人群的影响即深刻又强烈。从本质上说,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布匿人是一种海上力量,与昔兰尼加的希腊人不一样。布匿人与柏柏尔人培养并建立关系,与他们做生意,互相学习。结果,柏柏尔人在语言与习俗方面变得有点布匿化。不过,布匿人对柏柏尔人的影响程度达到何种地步还是历史学家一直争论的主题。显而易见的是,后来迦太基在与的黎波里斯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 一前 241 年)和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 一前 202 年)期间得到柏柏尔部落的大力支持。

早期布匿战争的结果是罗马人洗劫了该城,这注定要为迦太基前期的辉煌画上句号。不过,迦太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149 一前 146 年)结束后又迎来了复兴。布匿文明对北非地区的影响仍很强大,柏柏尔人在文化融合上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他们轻而易举地将布匿崇拜仪式融入了他们的民间宗教。到罗马统治后期,的黎波里塔尼

亚城里以及沿海乡村地区的柏柏尔农民仍然说布匿语言。

希腊人在昔兰尼加的影响

昔兰尼加地区位于利比亚东部，其名字来自公元前632年希腊人在北非地区修建的第一座城市昔兰尼。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北非沿海地区就已经修建了4座城市，整个昔兰尼加沿海地区都在希腊人的影响之下。这4个新城市是巴尔切(迈尔季，Al Marj)、欧里庇得斯[后来的贝仑尼塞(Berenice)，现在的班加西]、乌切拉[后来的阿尔西诺伊(Arsinoe)，现在的图克拉(Tukrah)]以及阿波罗尼亚[后来昔兰尼的港口苏萨(Susa)]。总之，这5座城市最后都成为共和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制度。这5座闻名的城市结成了城市联盟，它们共同贸易，采纳相同的货币制度。但他们发现，在激烈的贸易争夺战中，甚至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也难以达成有效的合作，更遑论和平时的合作了。



地图3 利比亚的希腊人定居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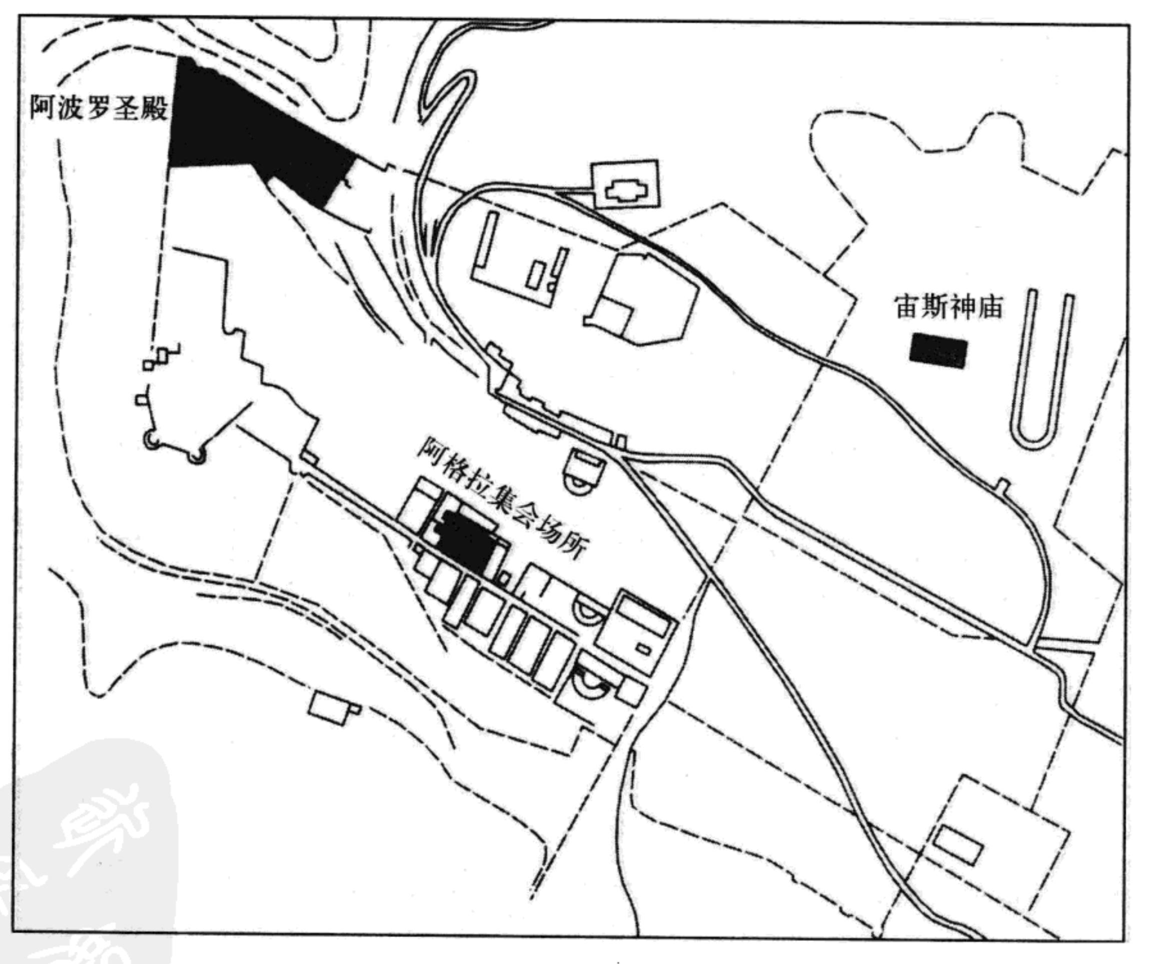


插图 1　昔兰尼的希腊人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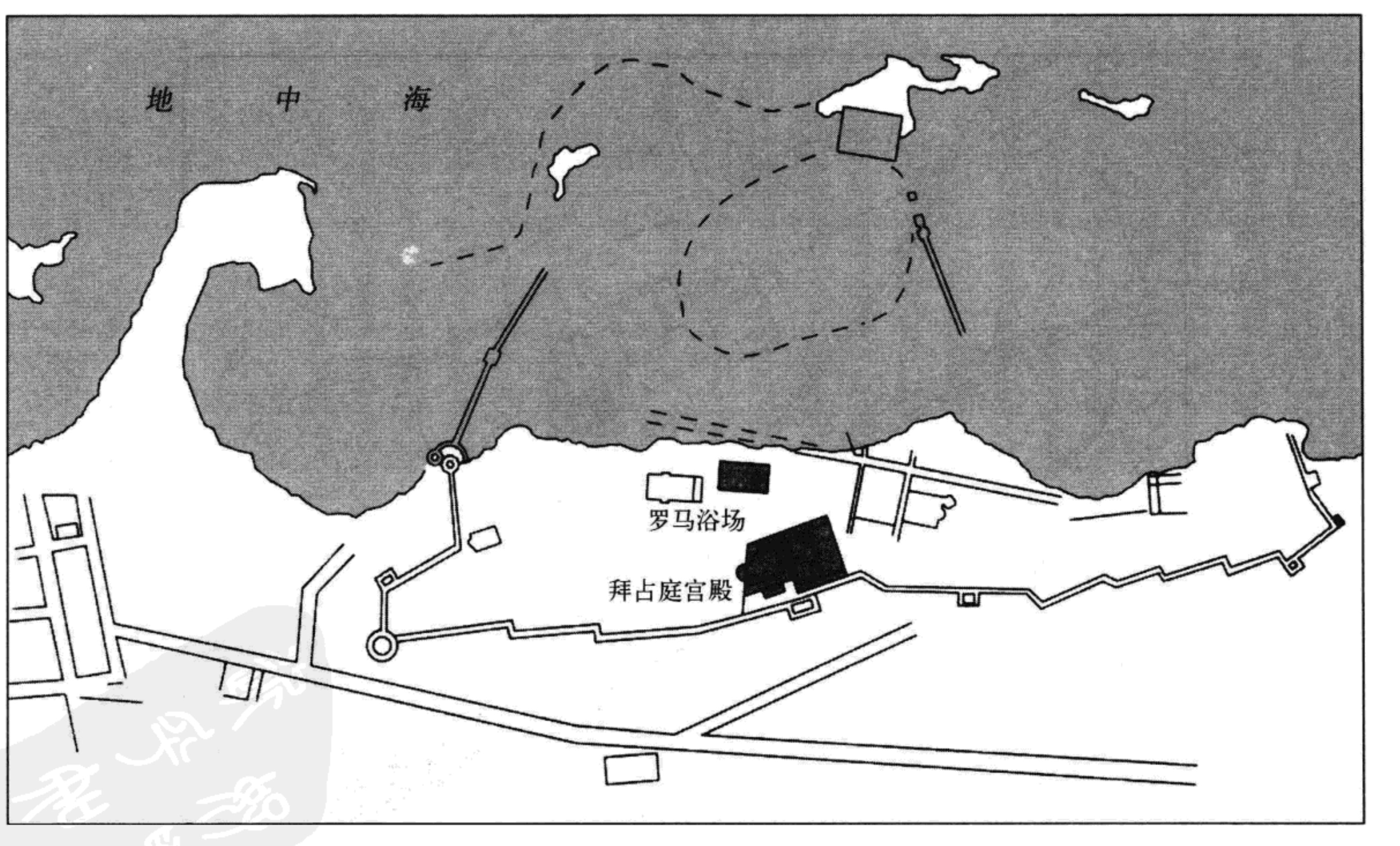


插图 2　阿波罗尼亚的希腊人遗址

昔兰尼城的早期范围仅是从海边往陆地延伸 9 英里的区域，人口最多时达到 3 万。早期历史流传着各种传奇故事。据说，昔兰尼的第一批居民来自锡拉[现在的圣托里尼岛(Santorini)]，可能是因为小岛有限的经济资源难以容纳庞大的人口，人们被迫移居于此。不论这些居民出身何处，其结果是该城市繁荣起来了。到公元前 15 世纪，昔兰尼成为非洲地区最大的城市。即使是在今天，昔兰尼仍然是重要的考古地点，仅次于莱普提斯·马格那。这里保存了 5 座古老城市的辉煌历史遗存，考古发现，这些城市初始修建样式模仿了希腊古城特尔斐(Delphi)的结构。希腊时代的考古重点包括阿格拉(Agora)集会场所、太阳神阿波罗的圣殿、宙斯神庙。除了遗址本身外，昔兰尼古城的地点也因位于悬崖上而引人注目，从这里可以俯瞰地中海。昔兰尼古城的面积很大，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

7

阿波罗尼亚旧城与昔兰尼同时修建，其名称是以该城市最重要神的名字命名的。修建的目的是给昔兰尼提供一个港口。刚开始时阿波罗尼亚是昔兰尼的附庸，随着母城昔兰尼的衰败，在公元 2、3 世纪时，阿波罗尼亚的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上利比亚的首都。除昔兰尼外，阿波罗尼亚很可能是昔兰尼加地区最有价值的考古地点。它位于沿海地区，面海背山，有许多重要的名胜古迹，包括罗马浴场与拜占庭豪华皇宫的综合建筑。古城也是 5 个拜占庭教堂遗迹的主人。

10

巴尔切修建于公元前 560 年，在 5 个重要城市中排行第三。到公元前 6 世纪末，巴尔切失去了独立地位，受昔兰尼控制。这成为人们争议的核心议题。巴尔切的原始地点位于内陆，也就是现在的迈尔季(Al Marj)，但前者已经荡然无存。在意大利占领利比亚期间(1911－1943)，迈尔季地区接纳了大量欧洲移民。1963 年这里发生地震，整个城市受到严重毁坏。

乌切拉在 5 个重要城市中名列第四。修建于公元前 510 年，是昔兰尼居民定居的第一个港口。后来这里又以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女儿，也就是后来比较有名气

的克利奥帕特里斯(Cleopatris)的名字命名为阿尔西诺伊(Arsinoe),后者是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的妻子。乌切拉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修建了体育馆、洗浴中心、神庙和私人别墅。由于位于松软的岩沙地层,乌切拉城难以抵抗未来几个世纪里昔兰尼加频繁的地震以及其他天灾人祸的毁坏。这座城市的其他东西都已荡然无存,仅保留下来的遗迹有:经不同阶段的修补而留存下来的一些希腊、罗马的圆柱,罗马墓穴的残留物切割而成的一个石头墙,以及罗马与意大利时代修建的一个城堡。

欧里庇得斯位于现代班加西的边缘地带,但历史文献鲜有提及该城的文字。公元前 515 年,波斯人描写巴尔切叛乱的文字中第一次提到了这座城市。埃及出发的一支惩罚叛乱的远征军向西一直打到欧里庇得斯。在随后的 3 个世纪,这里的居民面临着利比亚部落的零星袭击。大约公元前 405 年,来自希腊城邦诺帕图斯(Naupactus)的新居民来到这里,改变了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口稀少的悲惨景象。外来居民最早占据的地区是这个城市的北部,这里地势略高,但并没有达到公元前 6 世纪以前的高度。公元前 375 年至前 350 年之间,欧里庇得斯到处都是低矮的城墙。公元前 350 年至前 325 年,这里有了较多的建筑。约公元前 275 年前后,欧里庇得斯攻城略地的数量明显下降。4 世纪,欧里庇得斯支持由赫比鲁(Thibron)领导的一批斯巴达激进分子组成的大规模起义。起义后被昔兰尼人与柏柏尔人的联盟击败。许多考古人员在欧里庇得斯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以牛津大学的阿什莫里安(Ashmolean)博物馆的规模最为宏大。

11

昔兰尼加的首府所在地班加西城是希腊人向西迁徙过程中修建的,现在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城的一部分在欧里庇得斯城之上修建而成的,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对其早期历史知之甚少。与北非其他大多数城市一样,班加西在汪达尔人控制时受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在经过拜占庭时期短暂的修复后,又陷入默默无闻的境地。公元 15 世纪,班加西被的黎波里塔尼亚商人重新发现,并让其恢复了繁荣。

迦太基与昔兰尼居民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二者的分界线的划定是由各自派出一名善跑者竞跑，相遇地点即是边界线。当代表迦太基的费拉尼兄弟与来自昔兰尼的跑步者在苏尔特湾南岸相遇时，希腊人拒绝承认迦太基跑步者确认的边界，认为比赛有违公平的原则。为了向昔兰尼表示迦太基的诚意，费拉尼兄弟自愿被当场活埋。希腊人在费拉尼祭坛为两兄弟修建了坟墓，这里成为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自古至今的传统边界。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后来在此地设立了雕有塑像的4根大理石柱作为双方的界线标志，高的一对柱石是为纪念奥古斯都(Augusti)设立的，矮的一对是为纪念恺撒设立的。意大利占领利比亚期间，在此地竖立了一座庄严的纪念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士兵开玩笑地称之为“大理石拱门”，后来被拆除。

5座城市的居民组成了潘塔波利斯城邦，曾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抵御了来自东西方咄咄逼人的入侵者。然而，由于城市内部各种名目的激烈竞争，人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不能构筑成一个共同御敌阵线。这一弱点导致他们在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三世刚刚占领埃及的军队所征服。潘塔波利斯城邦在未来两个世纪成为波斯帝国最西部的省份，但在公元前331年，它又被马其顿帝国所控制。8年后，该地区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并入埃及，接受托勒密一世的统治。亚历山大最信任的军队统帅成为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285年)的第一任国王。

12

昔兰尼加长期处于希腊人的统治之下，其国王来自托勒密王室，直到公元前96年，最后一任国王托勒密·阿丕安(Apion)将王位赠送给罗马人。罗马人统治昔兰尼早期阶段(公元前96—公元115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在公元前74年成立了昔兰尼加省。公元前67年，昔兰尼加与克里特省合并成罗马的一个省。然而作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昔兰尼在公元115至117年的犹太人起义中被严重毁坏。这次起义被图拉真(Trajan)皇帝(98—117年在位)残酷镇压，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皇帝即位后重修被毁坏的部分。但不

幸的是，公元 262 年、365 年发生的两次大地震把这座城市再次大面积摧毁。公元 300 年，戴克里先皇帝重组帝国行省，将克里特从昔兰尼加分离出来，组成上利比亚省(Upper Libya)与下利比亚省(Lower Libya)，这也标志着利比亚作为行政区名称的第一次正式使用。公元 303 年，戴克里先将昔兰尼加的首都迁移到托勒梅斯(Ptolemais)。公元 324 年，罗马帝国发生了最终的分裂，的黎波里塔尼亚附属于西罗马帝国，而利比亚东部地区的控制权归属拜占庭帝国。

希腊人控制下的潘塔波利斯(Pentapolis)的社会、经济生活受昔兰尼加政治漩涡的影响比预期的要小。该地区十分富有，一是盛产谷物、葡萄酒、羊毛；二是畜牧业繁荣；三是盛产串叶松香草(silphium)，这是一种仅能在昔兰尼加生长的香草，人们普遍认为该作物具有激发性欲的功效。昔兰尼城是希腊世界最大的教育与文化中心之一，这里以医药学校、学术中心以及建筑学而闻名于世。这里也是思想家的摇篮，昔兰尼加的思想家阐述了道德愉悦的学说，将幸福界定为人类快乐的总和。在其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有三位在北非地区名声显赫的昔兰尼加名士，他们是亚历山大的诗人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公元前 305 —前 240 年)、科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以及雅典的哲学家卡涅阿德斯(Carneades，公元前 214 —前 129 年)。

13

罗马对利比亚的影响

公元前 3 世纪，罗马与迦太基为控制地中海而进行激烈地角逐，斗争的结果是罗马人在公元前 146 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打败了竞争对手。当时，罗马人在非洲的省份与迦太基昔日控制的版图大致相当。公元前 46 年，凯撒大帝(公元前 100 —前 44 年)将北非的土地授予一名士兵，该士兵在内战中击败了与托勒密结盟的努米底亚(Numidian)国王朱巴(Juba)。内战使得恺撒毫无争议地成为罗马世界的主人。到公元前 27 年，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拓展到包括现代突尼斯在内的北非沿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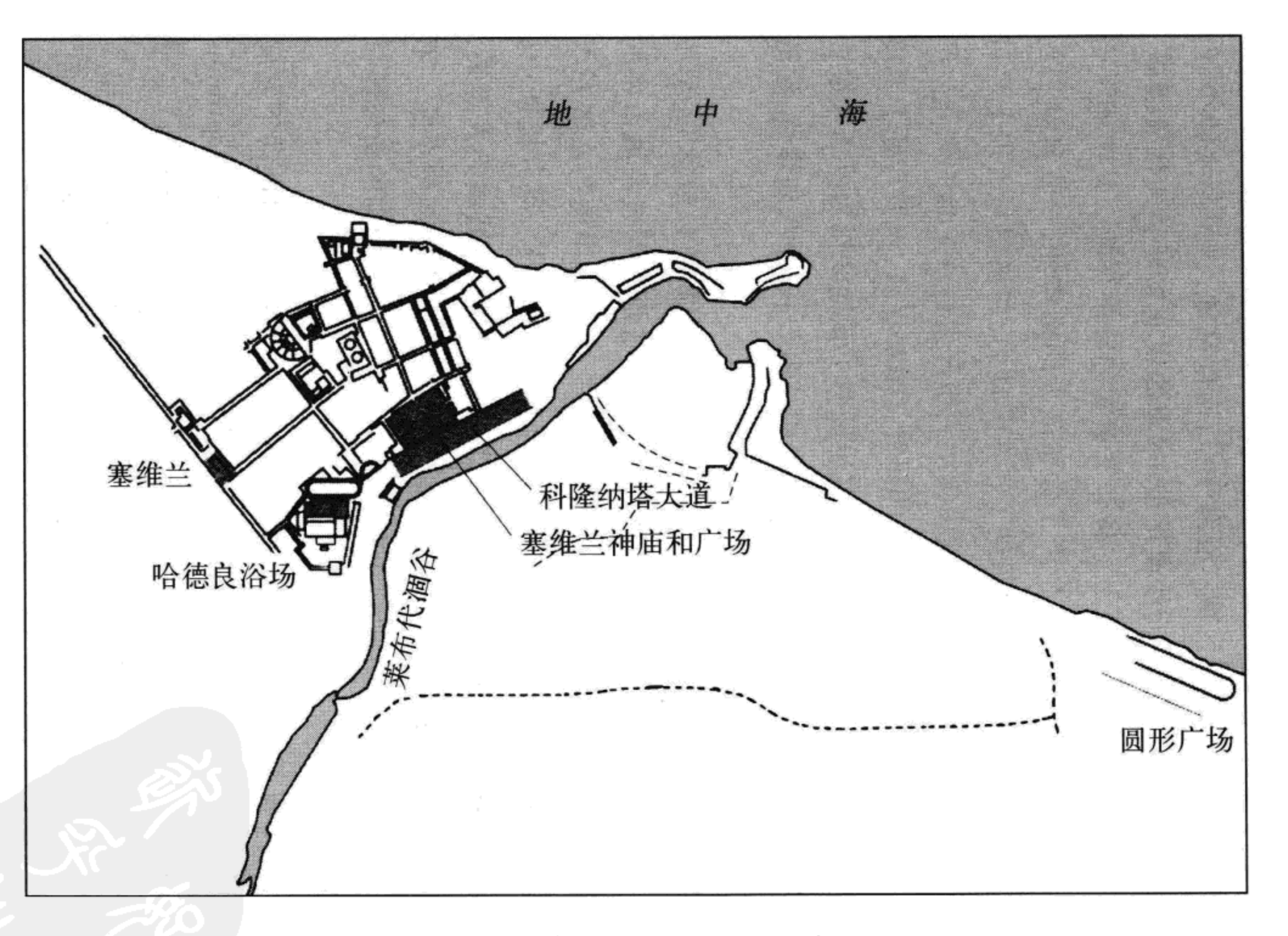


插图 3　莱普提斯马格那的罗马人遗址

罗马刚开始在北非殖民地投入的力量很随意,也没有周密的计划,主要是建成了许多大农业基地和庄园。直到一个世纪以后,罗马对北非的殖民化才开始成体系。罗马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统治时的定居点被十分整齐地划分为三个区域:沿海平原;南部高地,这里雨水较少,但可以进行耕作;东南部靠近沙漠地带,这里的农业发展必须依靠灌溉。在沿海平原,橄榄油发展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从凯撒大帝时代起,的黎波里塔尼亚就生产了数量庞大的橄榄油,一直延续到约363年。从此向南,大庄园里吸纳了许多劳动力,在梯田与大坝上尽可能地期待获取雨水。由于当地居民集中力量开发这块土地的农业生产潜力,北非成为罗马的粮仓。众多的研究文献都提及,当罗马处于困境时,大多来自北非的粮食供应中断,这也证明了该地区作为罗马人粮食来源的重要性。罗马人还雇用他们的军团从事公共工程,如修路、建港口、挖水渠与开浴场。

15

莱普提斯马格那是腓尼基人修建的三大沿海城市(以统称"的黎波里斯"而闻名)之一,后来发展成为罗马在非洲统治时期遗留城市中的完美典范。莱普提斯马格那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地中海与水资源丰富并提供灌溉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内陆之间的联系工具。莱普提斯·马格那被莱布代涸谷出口的隆起物所遮盖。在熟悉罗马城镇的人看来,这是以一个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直线型外扩的城市群的典型个案。不久,在与其姊妹港口欧伊亚与萨布拉塔的竞争中,莱普提斯的重要性日益下降。

公元1世纪,莱普提斯马格那城在富有的普通民众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公元2世纪,一个土族皇帝谢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卡瑞卡拉(Caracalla)皇帝(211－217年在位)对莱普提斯马格那城市的建筑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统治时期是莱普提斯马格那的繁盛期。随着海上贸易的衰落,以及3世纪末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再加上遭受了柏柏尔人的袭击,莱普提斯马格那遭受了重创。特别是胆大冷酷的奥斯图里亚尼(Austuriani)从公元363至365年开始袭击这里,断断续

续进行了40年;随后汪达尔人入侵,莱普提斯马格那商业活动停息,港口由于淤泥充塞而被舍弃,成为一片废墟。

人们普遍认为,莱普提斯马格那是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最好属地。很明显,这里也是利比亚最著名的考古地点,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塞维兰拱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遗迹,据说是为了纪念谢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于203年访问该地而修建的。拱门上部经过装饰性的精雕细刻,不过这些装饰在拱门顶部的大理石雕带目前放置在一个博物馆内。哈德良浴场建筑群是罗马在本土外最大的场所,是在公元126年修建的,后来进行了扩建。建筑群的中心是一个用大理石镶嵌的“冰箱”或者叫冷室,屋顶用八个大柱子支撑着。其他重要的建筑包括柱廊大道、塞维兰会场、圆形广场与露天剧场。

16

欧伊亚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第二大城市的黎波里斯被埋没在现代城市的黎波里的下面。利比亚首都,即今的黎波里,就是在破坏了的曾经辉煌的著名古城欧伊亚上面建造的。古迹中唯一幸存的文物就是默尔库斯·奥雷柳斯(Marcus Aurelius)皇帝(161－180年在位)与卢修斯·维鲁斯皇帝(161－169年在位)时期修建的壮丽辉煌的四通式拱门。拱门靠近港口,东北部面对着的黎波里海港。欧伊亚有一个凯旋门,而莱普提斯马格那有5个,萨布拉塔则一个也没有。这也表明欧伊亚在黎波里斯的地位可能非常重要。

与莱普提斯马格那、欧伊亚的形成方式一样,也许早在公元前8世纪,萨布拉塔初始为腓尼基人的贸易场所,公元前4世纪时处于迦太基人的控制之下。大约1至2世纪,罗马城的核心部分修建起来,周围都是集会场所;这些遗址保存完整,但这里出土的文物并没有莱普提斯马格那的文物更具吸引力。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从这里可以饱览浩瀚的大海。4世纪末期,奥斯图里亚尼洗劫了萨布拉塔。5世纪,汪达尔人又将它彻底破坏。阿拉伯人占领此地后进行了修复。奥斯曼帝国统治莱普提斯马格那时期忽视了对这里的管理。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对之进行发掘并局部重建。

萨布拉塔城的西部是修建最早的部分,与布匿城的最早修建时间

差不多。剧场是萨布拉塔的荣耀之所,被许多人认为是罗马在北非地区的名胜古迹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修建于 2 世纪末,修复时背景巧妙地用了 108 根柯林斯石柱加以装饰,显得与众不同。生长于莱普提斯马格那的罗马皇帝谢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按照这种设计风格在罗马修建了一个复制品。顺便提及,在约旦的皮特拉(Petra)还有一个类似的辉煌遗迹。萨布拉塔城有价值的其他历史遗迹包括 4 世纪被修复的规模宏大的集会场所。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长方形廊柱大厅一开始被用做法院,大约 440 年后一直充当教堂。

17 公元 238 年,在罗马帝国的苛政重赋下,北非地区大城市的民众爆发起义。虽然混乱的社会秩序最终得以恢复,但血腥镇压破坏了马格里布地区许多重要的城镇。由于起义的破坏性后果,本地区经济重心一度转移到内地的小城镇。帝国统治范围延伸到内陆,导致罗马人与本土柏柏尔人之间的对抗。公元 294 至 305 年间,戴克里先做皇帝时曾授予本地区自治地位。4 世纪初期,的黎波里塔尼亚有时还接受罗马的统治,成为其一个行省。

公元 1 至 2 世纪,基督教传到非洲内地,已经接近崩溃的政局更加复杂化。基督教被当做一种宣泄不满的方式,许多柏柏尔人皈依这种信仰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的坚信,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是对罗马统治的挑战。4 世纪初,基督教的多纳图分裂派(Donatist Schism)在北非地区较为流行,该派赞同罗马天主教派的教阶制度。多纳图教徒并不是异教徒,他们大体认同天主教所主张的观点,也同意他们的组织与崇拜仪式。该派之所以与基督教分裂是因为多纳图派重要人物多纳图斯(Donatus)的做法不符合基督教的观点,前者主张在维护基督教纯洁与神圣方面不惜采取严厉的措施。大约在一个世纪里,席卷柏柏尔人地区的起义都是在多纳图教派的旗帜下进行的。

因为北非地区是重要的粮仓,罗马帝国对多纳图教派的政策取向深受其农业政策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罗马为确保非洲地区的粮食供应而允许居民宗教信仰自由。直到公元 377 年,罗马才通过了

取缔多纳图教派的第一个法令；此法延续了40多年，直至多纳图教派对抗罗马取得胜利才废除。与此同时，一直进行的宗教冲突削弱了罗马在北非的权威，致使汪达尔人在5世纪迅速控制了该地区。

18

汪达尔人属于日耳曼部落，他们在公元429年从西班牙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地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马的北非城市仅有迦太基、西坡(Hippo)与瑟塔(Cirta)没有遭受汪达尔人的蹂躏。公元435年初，汪达尔人首领盖塞利克(Gaiseric)与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425－455年在位)签订条约，罗马人保留迦太基及其行省，放弃其他行省给汪达尔人。4年后，盖塞利克进攻迦太基。公元439年占领此城。公元442年，瓦伦丁尼安三世与汪达尔人再次签订和约，将北非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到努米底亚东部在内的北非地区割让给汪达尔人。14个世纪后，意大利才在1911至1912年击败土耳其人占领利比亚。公元455年，汪达尔人过地中海到了意大利，洗劫了罗马城。

汪达尔人占据北非长达一个世纪，定居者遍及海岸与内陆腹地。公元527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公元527－565年在位)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王位。公元533年他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雄威，任命贝里萨留斯(Belisarius)率领一支军队到北非地区恢复罗马的统治。公元534年，贝里萨留斯的军队打败汪达尔人，结束了汪达尔王国。然而，拜占庭统治北非再也没有达到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这些城市周围筑有大量防御工事，至今仍然有大量遗存，这表明拜占庭权威的虚弱。他们被迫在占领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以保护自己免受本地人的袭扰。

阿拉伯人的入侵

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军队以传播伊斯兰教为理由，从阿拉伯半岛北部向东进入现代伊朗，向西进入北非地区。拜占庭的行省埃及、叙利亚与波斯是阿拉伯人想得到的丰厚战果，而遥远的北非地区则只不过是顺手牵羊的附带品。公元643、644年，亚历山大、

19

昔兰尼加被占领。两年后,阿拉伯人进入的黎波里塔尼亚,沿海地区孤立无援的拜占庭卫戍部队被摧毁,阿拉伯军队控制了这些地区,并巩固了地位。公元 663 年,乌克巴·本·纳菲入侵费赞,迫使加拉曼特人的都城热尔马(Germa)自动开城投降。

柏柏尔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内陆的抵抗活动延缓了阿拉伯人向西的推进速度。然而,当阿拉伯人意识到马格里布地区可作为对抗拜占庭帝国舞台的潜在意义后,阿拉伯军队在公元 670 年浪潮般地涌入现在的突尼斯地区。柏柏尔人发动两次顽强抵抗迫使阿拉伯人撤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但在少数柏柏尔部落民的秘密援助下,阿拉伯帝国每次都可以派大军回到北非。公元 682 年,乌克巴·本·纳菲到达大西洋沿岸,据说他要骑马入海,并高呼:“啊!真主!如果大海不能阻挡我,我将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永远勇往直前。维护您的信仰,向所有不信仰真主者开战。”[1]尽管这件事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但也表明了作为自称为真主选民的阿拉伯人扩展伊斯兰教统治地位的决心。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自然而不是人类的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征服世界的步伐。到公元 715 年,阿拉伯帝国扩张到比利牛斯山。但阿拉伯人在北非的征服活动也遇到了昔日罗马帝国一样的困难。

阿拉伯人的到来给利比亚地区带来了阿拉伯语、伊斯兰教与一种新型生活方式,它对现代利比亚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历史上最为持久。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马格里布与穆斯林控制下的西班牙,都处于大马士革伍麦叶哈里发的控制之下。从公元 661 年至 750 年,伍麦叶家族成员,也是前伊斯兰时代麦加杰出的商人承担了哈里发职位,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或代理人,担任宗教与世俗的领袖。伍麦叶王朝成功地将其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延伸到北非、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然而,他们行使阿拉伯人的统治权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的“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摩洛哥历史学家阿卜杜拉·拉洛伊(Abdallah Laroui)指出:“阿拉伯化需要经历了几个世纪,伊斯兰化是柏柏尔人自己完成的。即使他们承认阿拉伯人的统治,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地方首领的权威更能得到认同。”[2]

20

阿拉伯帝国在北非地区的统治要求建立由法律制度所规范的宗教与政治的统一实体。法律由宗教法官管理，他可以处理包括部落忠诚归属在内的所有事情。这些法律依据可以从《沙里亚》或伊斯兰传统法典中找到，它们的基础有三：一是先知穆罕默德从真主那里接受的《古兰经》启示，二是由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习惯与言说构成的《圣训》，三是传统的阿拉伯部落与市场法。

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城市宗教，因此阿拉伯人的统治可以较容易地强加在北非沿海地区的城镇地区与农耕区。城市居民意识到安全的重要价值，他们可以在和平时期进行商业贸易，而布匿农民向阿拉伯人求助以保护他们的土地。另一方面，柏柏尔人的部落习俗频繁地与阿拉伯人影响下的拜占庭政府发生冲突。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文化差异，阿拉伯人认为柏柏尔人是野蛮人，而柏柏尔人则认为阿拉伯人傲慢自大，残忍的士兵只会消费税收。许多柏柏尔人逃进漫漫荒漠，以躲避阿拉伯占领军。结果，伊斯兰教最初的传播地区仅限于北非沿海地区。

随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阿拔斯王朝（公元 750 — 1258 年）推翻了伍麦叶王朝，首都又迁移到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声称自己是阿拔斯·伊本·阿卜杜·穆塔利布（Abbas ibn Abd al-Muttalib，566 — 652 年）的后裔，后者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年轻的叔父。阿拔斯王朝声称其合法性基于先知家族的成员身份，但什叶派却认为他们来自一个声誉不好的谱系，突出了伊斯兰历史上永久的冲突。从谱系上来说，先知的后裔长期以来一直被证明拥有强有力的合法性与号召力。但这从来不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可以肯定的因素是，不同的组织在不同的时期都要求哈里发必须坚持公平与正义。阿拔斯王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巴格达统治广大北非区域鞭长莫及的现实，因此即使他们有自治倾向也很少进行遏制，前提是地方总督与军队官员必须将哈里发当做自己的精神领袖，或者每年支付一定的贡赋。阿拔斯王朝的“碎片化”的政治结构最终削弱了哈里发的力量，弱化了其政治权威，仅在其统治地区成为一种精神权威。

21

根据任命自治总督的惯例,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公元786－809年在位)在公元800年任命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卜(Ibrahim ibn Aghlab)为今天的马格里布部分地区的埃米尔,也就是统治者。阿格拉比德斯家族在突尼斯东北部圣城凯鲁万建立世袭王朝,以此为基础统治的黎波里塔尼亚与现在的突尼斯。他们表面上宣誓效忠巴格达,将逊尼派作为伊斯兰教的正统,但实际上是一个自治国家。他们通过修复灌溉系统等措施,成功地实现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恢复了城镇的活力。阿格拉比德家族后来向拜占庭控制的地中海发起挑战,征服了西西里岛,在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博弈中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

法蒂玛人(910－1171)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内部由于哈里发地位的竞争而发生严重冲突,最终伊斯兰教分裂成两派:即什叶派与逊尼派。什叶派支持第四任哈里发、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直系后裔为统治者,他们认为哈里发的职位仅限于由阿里的后裔担任。逊尼派则赞同阿里的竞争对手,先知所在部落另一分支领袖的主张,采取舒拉(Shurfa)原则,从先知及其女儿法蒂玛的后裔中选举最适合的领袖。什叶派在非阿拉伯穆斯林人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在今天的伊朗与伊拉克南部有大量的信仰人群,但沙漠中的阿拉伯贵族则对他们不屑一顾。

9世纪末,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传教士到阿尔及利亚传教,卡比里(Kabylie)地区库塔马(Kutama)的柏柏尔人接受伊斯兰教的激进派别,对抗逊尼派的阿格拉比德家族。公元909年,凯鲁万陷落,法蒂玛人统治了包括的黎波里塔尼亚在内的整个北非。在伊斯兰教史上,法蒂玛人是唯一信仰什叶派的哈里发,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伍麦叶人也意识到他们潜在的危险,但阿拔斯人是他们劲敌。由宗教热情与柏柏尔部落民众构建的法蒂玛国家支持的基础是北非沿海地区商人。欧洲缓慢但平稳的经济复兴激起了西方对东方商品的巨大需求,北非的港口,如的黎波里成为攫取商品的理想场所。

当三个哈里发将伊斯兰世界三分天下时,马格里布地区成为各种地方势力角逐的战场。法蒂玛人曾一度向西扩张,威胁摩洛哥,然后他们折头东进,于 969 年征服埃及。法蒂玛人随后迁都开罗,建立什叶派哈里发国家同巴格达的逊尼派哈里发国家相抗衡。法蒂玛人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马格里布,将该地区交给一个柏柏尔王朝,即他们的附庸兹里德人管理。从 10 世纪末至 12 世纪中期,其管理范围相当于今天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北部。兹里德人的统治范围仅限于北非沿海,但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不顾沿海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现实,改变了本地的贸易模式,使曾经繁荣的沿海商业一片萧条,这里弥散着一股压抑的情绪。为了表示对城市阿拉伯人的忠诚,1049 年兹里德埃米尔放弃什叶派信仰,与法蒂玛王朝断绝关系,开始回归到逊尼派正统学说的轨道。

希拉利亚人的入侵

23

为了有效对付叛乱的兹里德人,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邀请希拉尔部落与萨利姆部落移民马格里布。他们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贝都因部落,被统称为“希拉利亚人”。希拉利亚人入侵北非的主要原因除了时代、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以及宗教考量外,据现代学者研究,经济也是重要因素。当时上埃及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迫使这些饥肠辘辘的部落入侵马格里布。入侵昔兰尼加及的黎波里塔尼亚后,希拉利亚人将伊斯兰信仰与游牧生活方式强加给当地人。

从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层面来看,希拉利亚人入侵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极为恶劣。的黎波里地区遭到劫掠,昔日生活在伟大的希腊、罗马城市的鲜活生命被杀戮殆尽。阿拉伯人处理柏柏尔人的方式是:要么接纳,要么将之迁移到别处,这破坏了他们定居农业的古老生活方式,将农场改为牧场,游牧方式成为社会组织结构的主导取向,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希拉利亚人向北非移民是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他因素,如中央集权式政治权力结构的弱化、游牧式的迁徙、长期气候变迁也致使定居农业逐渐衰

败，具有田园牧歌情趣的游牧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

官方在阿拉伯人第一、第二次向北非移民的具体数字上有不同的观点，但总数可能没有超过 70 万人，或者比这更少。如果这些数字正确的话，那么到 12 世纪末，阿拉伯人口占北非地区人口的比率不会超过 10%。尽管阿拉伯人后来又融入了西班牙人的血统，但在北非地区，柏柏尔人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在数量上超过阿拉伯人。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到达利比亚比到达北非其他地区的时间都早，因为利比亚从地理位置上靠近中东。其后果毫无疑问就是，利比亚柏柏尔人比马格里布其他地区阿拉伯化的速度更快。

24

阿拉伯部落占领利比亚的时间至少是在 9 世纪，那么阿拉伯人是在 11 世纪希拉利亚人移民时才到来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的黎波里塔尼亚有 3 个部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拉尔部落，有 5 个部落的出身与萨利姆部落有关。昔兰尼加与费赞主要由萨利姆部落所主导。除了萨阿迪(*Saadi*)是主导部落外，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两个部落，昔兰尼加的 6 个部落的起源都是不同部落混合交往的产物，被称为“马拉布廷”(Marabtin)。除了托付重任的属下外，马拉布廷还包括阿拉伯帝国征服利比亚前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马拉布廷经济上依赖居于主导地位的萨迪，这决定了二者的主从关系。马拉布廷须经萨迪允许才能使用当地的牧场与水源，前者向后者支付贡品以换取使用动物与土地的特权，保护他们的畜群与水井，或者在与其他部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投入战斗。

在希拉利亚人移民之初，部落生活在较长时间里是利比亚人的生存模式。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家园、土地、牧场与水源。这些地区没有疆界或明确的边界，所有部落都关心水源问题。利比亚的大多数部落都是半游牧部落，他们联合放牧、集体耕作谷物，以每年迁徙一次的传统循环方式进行运转。城市与绿洲地区的民众拥有私有财产，内陆地区的土地与水源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权仅限于动产，如动物与固定设施。

部落内部可细分成两个或更多的主分支，然后再细分为更小的分

支。其基本特点是：每一个主分支与次分支都源于同一个部落谱系，集中在某一地区。部落的主支与分支有责任捍卫自己的领土，以防止另一主支与分支的入侵，就像一个部落防止另一个部落入侵一样。部落间发生战争与冲突的最普遍根源是争夺土地与水源的所有权。

希拉利亚人入侵以后，兹里德人统治仅限于突尼斯沿海的一小片领土。当意大利南部诺尔曼统治者来到北非后，兹里德人几乎没做任何抵抗，于 1150 年接受了西西里岛诺尔曼国王罗格尔二世(Roger II, 1095 — 1154 年)的统治。罗格尔二世占领了马耳他后于 12 世纪侵入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其目的是构建一个非洲帝国；刚开始取得了一些成功，后来被穆拉比德人(Almoravids)逐出非洲。

25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穆拉比德人、穆瓦希德人与哈夫西德人

11、12 世纪，穆拉比德人(Almoravids)和穆瓦希德人(Almohads)建立的两个柏柏尔人王朝在摩洛哥崛起。这两个王朝的奠基者都是宗教改革人士，他们共同统治马格里布与穆斯林的西班牙地区长达 200 年。穆拉比德人的首都是马拉喀什，拥有双重的统治基础：一方面，他们依靠逊尼派伊斯兰教马利基(Maliki)学校培养的激进分子，从字面上解释《古兰经》；另一方面，他们从阿特拉斯中部与撒哈拉沙漠西部地区的桑哈扎族(Sanhaja)柏柏尔人中招募士兵与行政管理精英。传播伊斯兰教的马利基学校允许穆拉比德人捍卫伊斯兰教，用极大的热情宣传自己的信仰作为严格执行伊斯兰法的表现。随着穆拉比德国家势力的强大，统治范围从摩洛哥南部向东延伸到阿尔及利亚，向北深入到西班牙。

穆瓦希德王朝的精神与政治领袖是艾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图马尔特(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Tumart，约 1080 — 1130 年)，他给穆瓦希德人构建了一个神权政治色彩十分浓厚、既令人尊重又超越了古代部落结构的中央政府。穆瓦希德王朝的军事领袖，也就是新王朝的建立者阿卜杜·穆明·本·阿里·库米(Abd al-Mu'min bin

Ali al-Kumi,1130－1163年在位)在1147年夺取非斯(Fez)和马拉喀什,这标志着穆拉比德王朝的结束。到1160年,他迫使诺尔曼人撤出易弗里基叶(Ifriquiya)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战略要塞。穆瓦希德人还在西班牙许多城市建立伊斯兰统治,反对穆拉比德人的政治统治。1146年,他们解救了处于危难中的科尔多瓦;1157年,他们重新夺回阿尔梅利亚。穆瓦希德王朝最强大时,势力范围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到摩洛哥的铁马拉尔(Tinmallal),从伊斯兰教影响下的西班牙到萨赫勒(Sahel)西部。

26

虽然穆瓦希德军队勇猛善战,但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王国与意大利城市国家的不间断进攻下也疲于应付。不过最终穆瓦希德军队取得胜利,但反攻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通过经济与军事的联合,西班牙与意大利等国联手,最终在1492年将伊斯兰教势力逐出西班牙,随后在北非地区成立了规模较小的、信仰基督教的、具有政治意义与贸易交往的小国。与此同时,穆瓦希德王朝权力中心出现真空,边缘地区逐渐分化,最后形成三个相互竞争的王朝:马里尼德王朝(Marinids,1244－1420年),主要统治摩洛哥;扎伊尼德王朝(Zayinids,1236－1318年),统治阿尔及利亚;哈夫西德(Hafsids,1228－1574)王朝,成了突尼斯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主人。

随着穆瓦希德王朝的结束,东部自治省的总督穆罕默德·本·艾布·哈夫斯(Muhammad ben Abu Hafs,1207－1221年在位)按例成为继承人,他是伊本·图马尔特的后裔。哈夫西德人牢记伊本·图马尔特的雄宏伟业,一直想以突尼斯为首都实现马格里布地区的统一。他们采纳了哈里发和苏丹的头衔,认为自己是穆瓦希德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哈夫西德人的经济力量与政治支持主要根植于像的黎波里那样的沿海城镇,放弃了内地那些名义上服从苏丹的本土部落。哈夫西德王朝持续了300年,但是成为部族国家、神权政治,以及由沿海小国联合起来的政治实体反抗苏丹的权威。例子之一就是早在1460年,的黎波里的商业寡头宣布的黎波里是一个独立国家。

1510年,西班牙军队夺取的黎波里。1524年,查理五世(1500－

27

1558 年)委托西班牙军队防御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1551 年,土耳其军队将骑士团逐出的黎波里。第二年,奥斯曼帝国苏丹任命土耳其海盗首领德拉古特(Draughut)帕夏[1]在的黎波里沿海城镇恢复社会秩序,并在内地平定阿拉伯游牧部落的叛乱。到 16 世纪末,北非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省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与突尼斯。的黎波里是新统治者的首都,刚开始的范围是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后来包括费赞。

中世纪的昔兰尼加与费赞

从 12 世纪至 16 世纪,昔兰尼加并不在的黎波里的马格里布王朝的控制之下。在东方,埃及的一系列马木鲁克王朝声称对昔兰尼加具有统治权,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控制。昔兰尼加的贝都因部落不乐意接受除部落首领以外的任何权威。15 世纪,的黎波里的商人恢复了本地区的市场。昔兰尼加的贝都因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往来于埃及与马格里布之间的商旅和朝圣者交付的保护费。

在费赞,哈塔布(Khattab)部落首领以宰维莱(Zawilah)为首都统治着该地区。与加拉曼特人(Garamantes)一样,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控制从苏丹到地中海的贸易路径。摩洛哥的穆罕默德·法斯(Muhammad al-Fasi)在 1550 年取代了哈塔布部落的最后一任首领,在迈尔祖格(Murzuq)找到一个支持他的家族,在承认奥斯曼帝国主权的基础上继续成为该地区无可置疑的统治者。16 世纪 80 年代,费赞统治者作出忠诚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保证,但是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行政管理的明智之处在于,并不急于行使权力。只是后来费赞市场的富足促使奥斯曼帝国官员派军队到费赞地区收取税赋。即使在 17 世纪末期,驻扎在班加西的贝伊与军队指挥官充任管理的黎波里的政府代理人,但奥斯曼帝国在这里的统治情况与昔兰尼加地区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威。

---

① 帕夏,土耳其语"paşa",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译者注

28

长期影响

自从有记录的历史到一系列帝国构建浪潮以来，现代利比亚就在非洲大陆占据了重要位置。亚非欧统治者一再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国家或帝国的省份。外来统治者的影响力仅限于地中海沿海地区，长期处于独立状态的柏柏尔部落深居利比亚的内陆，他们仅承认本族领袖的权威。从接受外国统治到1951年独立以来，利比亚人长期容忍遭受镇压与外来力量主导本国历史的严酷现实。这种外国人长期统治的积极结果是：这个国家充满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奥斯曼人、意大利人占领留下的历史遗迹。

尽管利比亚的早期历史使这个国家充满过已逝帝国的残留遗迹，但阿拉伯人的持续进攻给利比亚民众的影响最持久。开始于7世纪的阿拉伯人入侵，再加上11世纪的希拉利亚人的移民，伊斯兰教渗透到北非，特别是利比亚地区，从而使利比亚社会表现出独具一格且影响恒久的阿拉伯—伊斯兰特征。



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的占领（1551－1911）

29

相对于叙利亚、埃及等奥斯曼帝国行省来说，利比亚显得既贫穷，又边缘化，因此奥斯曼帝国对利比亚的统治是一种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摄政统治。摄政统治主要由许多与的黎波里中央政府相竞争的社群共同体完成。从16世纪起，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组织的部落联盟，就一直与的黎波里这个弱势国家相竞争。

阿里·阿卜杜·拉提夫·艾哈米达（Ali Abdullatif Ahmida）：《被遗忘的声音》（*Forgotten Voices*），2005年。

土耳其对的黎波里塔尼亚与昔兰尼加的宗主权已经获得了欧洲强国的承认，其努力方向不仅是建立或者逐步改革地方政府的制度，而且还改善两个殖民地的经济状况。

安东尼·卡蒂亚（Anthony J. Cathia），《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下的利比亚》（*Libya under the Second Ottoman Occupation*），1945年。

大约1300年左右，奥斯曼帝国出现在小亚细亚的西部，与伊斯坦

布尔的位置相距不远。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该地区先属于罗马帝国,后落入拜占庭帝国及其东地中海世界的继承人之手。在不同寻常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东扩西张,征服了拜占庭、塞尔维亚、匈牙利王国、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游牧公国,以及埃及的马木鲁克苏丹国家。到17世纪中期,奥斯曼人已经统治了亚洲西部、非洲北部以及欧洲南部的广大地区。

30

1529年、1683年,奥斯曼军队两次试图征服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维也纳。在第二次征服尝试中,奥斯曼帝国军队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甚至永久地逆转了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关系。1683年,奥斯曼人被彻底击败,即使他们占领东南欧已经长达200年,也再也没有威胁欧洲中部的能力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与非洲行省的持续时间更长。现代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主体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占领(1551－1711)

16世纪,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摩洛哥东部诸省,最高波尔特将该地区分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的黎波里三个统治区域。17世纪,地方军官控制了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利比亚,成为奥斯曼帝国与众不同的附属国。奥斯曼帝国的外交目标是名义上管理这些附属国,居间调停附属国之间或者附属国与邻国,如摩洛哥的非斯苏丹的争斗。从某种形式上来说,1551至1911年的大多数时间,现代利比亚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的黎波里控制的区域与今天利比亚北部的面积相当,沿着海岸线延伸了1 600公里(1 000英里),从西部的突尼斯一直到东部的图卜鲁格(Tobruk)。1565年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任命一位帕夏治理利比亚。帕夏主要依赖耶尼舍里(Janissaries)[①]这一军队特权阶

31

① 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禁卫军。——译者注

层维持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的统治。效率高的精锐军队一般都驻扎在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到18世纪,禁卫军逐渐演化成一种自治的军事行会,服从军队内部制定的规则,受到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迪万的保护。

奥斯曼帝国边远地区的士兵经常发生哗变,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耶尼舍里的忠诚对象一般都是给他们支付军饷最多的人。1611年,地方首领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迫使帕夏任命苏莱曼·萨法尔为地方领导人。此后,萨法尔及其继承者保留了“总督”或地方首领的头衔。有时候,总督也任命帕夏。摄政首领可以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虽然权力继承经常伴随着阴谋与暴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苏丹新招募的耶尼舍里军团的支持程度。除了推选帕夏人选的权利外,苏丹也允许迪万在税收与外交政策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耶尼舍里主要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税收,信仰伊斯兰教的柏柏尔海盗通过海上劫持与掳获商船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这一行为被错误地描述为私家海盗或恐怖主义。柏柏尔海盗是在当地政府的命令下从事海上抢劫行为的,他们有一套正式的行动规则,可接受的打击对象先是欧洲国家,后是美国,打击这些国家是一种荣耀。海盗们很注重行事方式的效率,对战利品与赎金最感兴趣,不参与由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谋杀、暗杀活动。正如理查德·帕克在其名著《柏柏尔地区的山姆大叔》中写道:“柏柏尔海盗似乎没有其欧洲同行的行径恶劣,在某些个案中可能还有一些人情味。”[1]

柏柏尔海盗代表了奥斯曼帝国海洋战略在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延伸,它们定期向奥斯曼帝国舰队提供船只与士兵。英国、德国或法国舰队偶尔也轰炸的黎波里,以报复其船只被劫掠或毁坏;但欧洲国家也发现,柏柏尔海盗遏制了其商业对手意大利的海上竞争力量。英国在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初期还发现,这些海盗在遏制美国处于雏形期的商业活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32

这里没有真实可信的统计数字。但法国在17世纪末估计,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的黎波里地区人口有4万。其主体居民是阿拉伯人,大约有35 000人,还有大约3 500人是奥斯曼人,主要包括土耳其人以及

奥斯曼帝国士兵与阿拉伯妇女通婚的后裔,称之为霍鲁古利斯(Khouloughlis),他们传统上担任高官显职。霍鲁古利斯担任西帕希近卫骑兵的高级官员,地方骑兵的增加使耶尼舍里的规模扩大。霍鲁古利斯居住在城外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堡里,承认地方政府,一般受到阿拉伯人的尊重。犹太人的社区规模较大,他们是手工艺人与商人。一小撮欧洲商人聚集在外国大使馆门前张贴布告,向的黎波里控告,要求柏柏尔海盗释放抓获的人质。数量巨大的黑人奴隶经由非洲移送到的黎波里东部市场。以上这些是 17 世纪的黎波里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

有关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统治史的文献资料相对丰富,但关于 16 至 19世纪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资料较少。沿海城市或者内地部落地区的知识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人们对当时普通老百姓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城市、乡村与绿洲地区民众的经济生活资料也不完整。此外,现在可获得的利比亚早期社会经济历史资料大都来自欧洲外交官、商人与旅行家的日记。1677 至 1685 年在的黎波里做英国领事的托马斯·贝克(Thomas Baker)的日记就是这种情况的特例[2]。这些数量极少的珍贵资料主要关心商业与贸易事务,经常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启示。但是他们提供的资料并不能完全阐述某一情况,一般局限在某一点上,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还不时带有西方学者的偏见。

33

在城市,商业与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卡达斯德(Qadasd)的控制,行政区由凯马克姆(Qaimmaqam)监督,向军事总督桑贾克(Sanjaks)负责,行政单位由桑贾克总督治理。卡达一桑贾克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的基本单位,这种治理结构在整个帝国十分普遍。经贸交往的规则包括零售商业与进口商品的固定价格、度量衡的检查、公共秤的监督。为了保证这些规定得到执行,奥斯曼帝国官员在城市市场进行定期检查。

事实上,的黎波里摄政区包括两个平行发展但又相对分离的社会体系。数量较少、大多数是外国人的统治精英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市、乡村与沿海地区。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取向是依靠贸易与海盗

抢劫的财富,而不是向本土居民征收的税赋,这成为17、18世纪地方政府生存的基础。结果,奥斯曼帝国官员关心的范围与交往的对象是地中海世界与欧洲。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利比亚的本土民众则主要关心内陆地区,诸如商业、贸易与游牧生活等相关问题。

1661年后,奥斯曼帝国势力衰落,迪万经常成为耶尼舍里与当地海盗竞相控制的对象。帕夏成为象征国家礼仪的首领,其实是奥斯曼帝国宗主权的傀儡,实际权力被军队所控制。事情发展的最后结局是,耶尼舍里代表了胜利的一方,被任命为总督。在1672年到1711年,约24个总督想控制利比亚混乱的政治局势。由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对这里的管理松散无力,的黎波里陷入政变频繁的军事混乱时期,任职超过一年的总督寥寥可数。

卡拉曼利王朝(1711－1835)

34

艾哈迈德·卡拉曼利(Ahmad Karamanli)是霍鲁古利斯的骑兵军官,他在1711年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委派的帕夏,建立了卡拉曼利王朝,统治利比亚长达124年。一旦成为统治者后,卡拉曼利立即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宣誓效忠,以换取最高波尔特确认他为帕夏,免除政变期间谋杀奥斯曼帝国官员的过错。他名义上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地位,并以政府名义成立了一个半独立的、生机勃勃的军队,士兵组成大都是阿拉伯人。艾哈迈德宣布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为军队首领及王位继承人。

艾哈迈德帕夏在1711至1745年间采取一种积极、偶尔还挺开明的内外政策。随着与欧洲国家商业与外交关系的扩大,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的黎波里的势力与威望也与日俱增。艾哈迈德将自己的政治权威延伸到昔兰尼加和费赞,通过大规模镇压内地阿拉伯部落与柏柏尔部落的叛乱将这个国家统一起来。到1745年,费赞成为的黎波里的附属国。该国的其他地区也归于平静,的黎波里成为穿越撒哈拉沙漠地区贸易的主要路径。在18、19世纪的4条商贸线路中,其中有3条要穿越利比亚,第四条在摩洛哥境内。两条线路是:的黎波里－费赞－卡瓦尔(Kawar)－博尔努(Bornu)和的黎波里－古达米斯－加

特(Ghat)—艾利(Air)—卡诺(Kano),要经过利比亚西部。第三条:班加西—库夫拉(Kufrah)—瓦迪(Wadi),横穿利比亚西部。商路贸易长期以来是的黎波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艾哈迈德还鼓励土耳其人向的黎波里移民。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利比亚国内的消费与出口规模逐渐扩大,推动了经济的整体发展。

艾哈迈德为促进利比亚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做了很多事情。但不幸的是,他的成就持续的时间并不比他的生命长多久。尽管直到1835年奥斯曼帝国还承认利比亚的独立地位,但卡拉曼利王朝在1745年艾哈迈德死后便很快衰败下去。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开始一直到1754年,这些继承者都是志大才疏、不勤于政事之辈。此外,的黎波里的政治生活一直被王位继承问题所困扰,统治家族不断地角逐于内部的权力。意识到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利比亚内陆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与的黎波里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并在18世纪后半期发动叛乱,并宣布独立。1745年后,利比亚经济恶化,特别是在18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这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如1778至1780年,的黎波里地区发生了饥馑,货币贬值,经济停滞。1784至1786年,这里又发生了饥馑,随后瘟疫流行。据估计,死于这次瘟疫的人数占总人数的23%。很明显,人口大规模的缩减意味着农业与商业产值的实质性下降。

阿里一世(Ali I,1754 — 1793)统治时期,政府腐败盛行,办事效率低下,导致政治瘫痪,于陷入令人困惑的内战。1793年,一位叛变的土耳其军官阿里·本吉乌尔[Ali Benghul,也叫阿里·贾扎伊里(Ali al-Jazairly)]利用政治混乱推翻了卡拉曼利王朝,暂时使利比亚回归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该地区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再一次受到摧毁。1795年,阿里一世的三个儿子之一优素福·卡拉曼利自任帕夏。优素福恢复了艾哈迈德的统治风格,驯服内地的部落,公然反抗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海军力量,支持1798至1799年间拿破仑·波拿巴在埃及的活动。

拿破仑在前往埃及的进军路上解放了利比亚,释放了囚禁在马耳他岛上的犯人。优素福为了报答拿破仑的慷慨大度,允许其在英国封

锁埃及海岸的情况下将利比亚作为埃及与法国之间的联系中转站。优素福在以下两种威胁下结束了对法国远征军的支持：一是奥斯曼帝国苏丹从埃及出发由西面进攻利比亚，以及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从东面进攻的双重压力；二是英国军队直接威胁的黎波里。优素福帕夏支持法国，是卡拉曼利王朝在奥斯曼帝国内实施独立外交政策的特殊情况。拿破仑在这里与英国的冲突，也标志着欧洲国家对位于北非沿岸的利比亚战略地位的初步承认。

36

卡拉曼利王朝像其先辈一样，不指望从乡村地区榨取收入，而是通过从长途贸易、穿越撒哈拉的经商队伍、控制东地中海的通道所收取的各种费用维持自己的统治。优素福帕夏在1795年夺取政权，主要任务是巩固利比亚在地中海的地位，采取的海上政策使人想起昔日奥斯曼帝国优先发展海军的扩张政策。1798年至1800年，利比亚海军舰队不超过11艘航船，然而到1805年，已经增加到24艘全副武装的战斗舰，另外还有许多小艇。

随着利比亚海上力量的增长，优素福帕夏要求欧洲各国通过他们在的黎波里的常驻领事与之建立适当的、有条约规范的关系，包括领事派驻的相关规定。对此，西班牙第一个作出回应，不久，包括法国和威尼斯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同意上述做法。但有一些欧洲国家拒绝上述要求，如丹麦、荷兰和瑞典，理由是利比亚的要求太过分。不久，他们在地中海的商船就遭受海盗的袭击。由于总体花费相对较低，利比亚的新海军在1795至1805年的冒险活动中获益颇丰，给帕夏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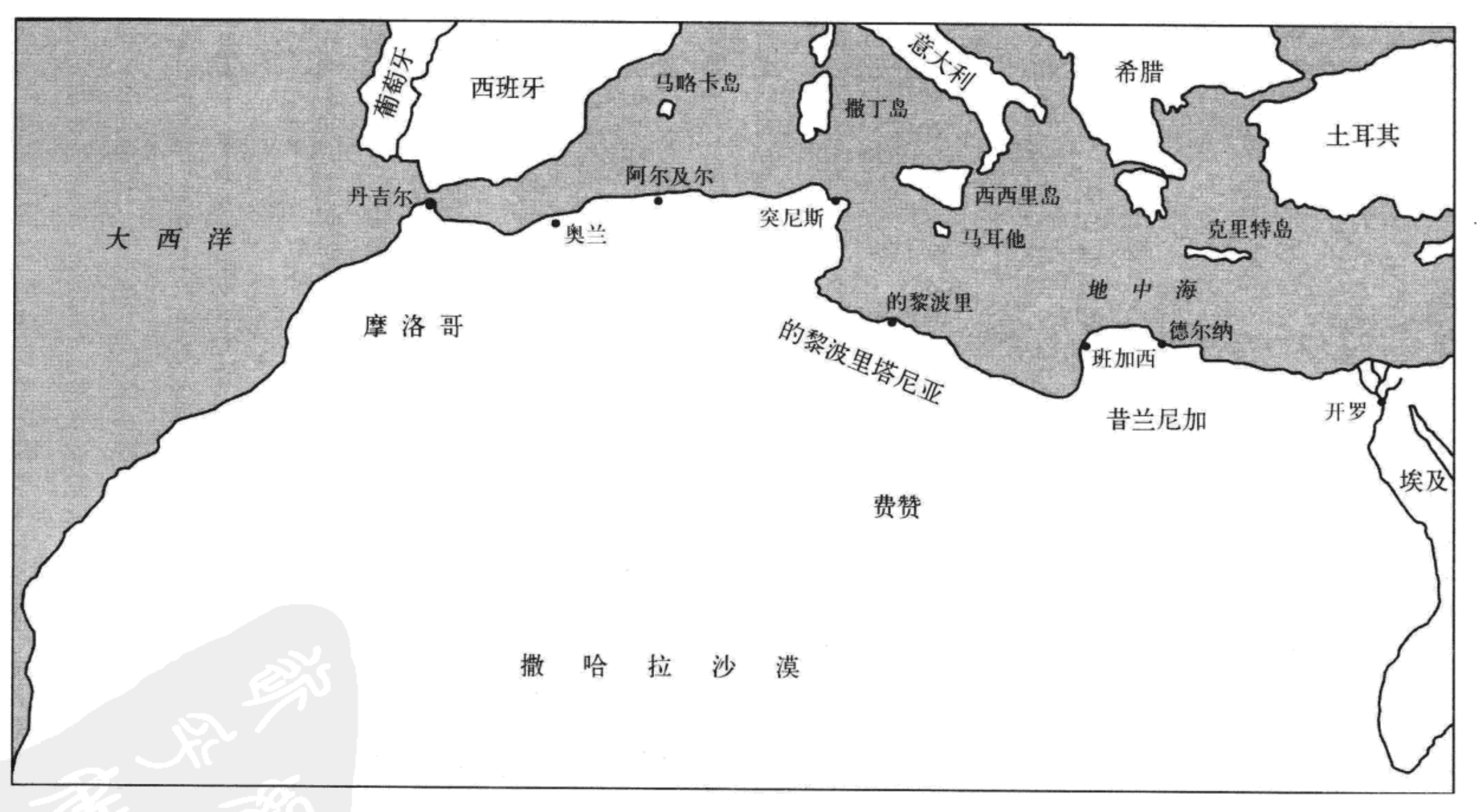
卡拉曼利王朝在统治行将结束的最后几年遇到了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叠加累积、深层的政治不稳定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1807至1817年，优素福帕夏为实现国家政治上的统一而采取了如下措施：如稳定昔兰尼加、古达米斯与费赞地区的社会秩序，建立以的黎波里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到1818年，他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但还是不能解决利比亚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3]

拿破仑战争的后果是，欧洲国家结束了柏柏尔人的海盗活动。海

37 盗系统崩溃是对利比亚经济与卡拉曼利王朝的致命一击。为了弥补失去的收入,优素福帕夏开始实施提兹克拉(Tizkera)制度,抵押了本国未来的农产品。提兹克拉制度许诺用未来的收入,特别是农业收入解决本国的债务问题。这种制度不久成为投机商的目标,的黎波里的马耳他社区的投机商控制了国家。投机行为的典型事例是:帕夏在绝望的情况下让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货币贬值,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债务,以换取英国不再反对他的统治。优素福帕夏还想到撒哈拉以南地区从事奴隶贸易,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能力对内地实施军事占领与政治控制。1817 至 1824 年,的黎波里政府想把费赞纳入利比亚的势力范围,但在博尔努地区遭遇失败,主要原因是的黎波里缺乏从事这种冒险事业的经济资源。不管怎样,的黎波里政府总算冒着与西方国家发生不快的风险参与了奴隶贸易。欧洲国家的禁止奴隶贸易的呼声与行动越来越强烈,驻的黎波里的欧洲领事的抵触情绪也日益高涨,并开始直接干预利比亚的内部事务。

1825 年以后,优素福帕夏再次试图重振的黎波里海上强国的辉煌,希望重现 1795 至 1805 年间的丰功伟业。到 1832 年,该政策尽管也取得了部分成就,但总的来说已经显现出失败的迹象。的黎波里政府被剥夺了收缴贡赋的权力,奴隶贸易也不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丧失了支付基本进口或外债的能力。随着关税的提高,对奢侈品和消费品强征的额外税收的增加,国内民众的反对之声也越来越高,最后演化成内战。

内战持续了将近 10 年。第一次发生在 1831 年夏,是由利比亚南部费赞地区的柏柏尔人发起的,主要反对卡拉曼利王朝的经济政策。内战迅速蔓延到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南部和东部,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此同时,的黎波里摄政国的外债累积到 75 万法郎或者 50 万美元的规模,优素福帕夏无法抵偿英法债权国的旧债。欧洲的债权国由于没能得到满意答复,遂督促驻的黎波里的本国领事向利比亚索要 38 债务。优素福帕夏使用各种手段减缓财政负担,增加财政收入,包括向霍鲁古利斯(Khouloughlis)强加紧急税。霍鲁古利斯军队享有免税的传统,当意识到征税是对他们特权地位的巨大触动时,开始掀起卡拉曼利王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叛乱。



地图 4　1800 年的柏柏尔人国家：阿尔及尔、摩洛哥、的黎波里和突尼斯

就在霍鲁古利斯人发动叛乱并进攻的黎波里时，优素福帕夏意识到自己的王位已经岌岌可危，便让位于儿子阿里二世，后者统治时间是1832至1835年。在这关键时刻，奥斯曼帝国政府应阿里的救援要求向利比亚派兵，镇压了叛乱。1835年5月，一支有22艘战舰组成的奥斯曼帝国舰队乘风破浪驶向的黎波里海港。就在阿里二世登上旗舰热烈迎接苏丹代表穆斯塔法·纳吉布时，他被扣押起来。刚刚上岸的纳吉布向的黎波里民众宣布，他正在为迎接穆罕默德·拉伊夫帕夏的到来做准备，后者是奥斯曼帝国苏丹任命的利比亚总督。纳吉布军队恢复了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统治，阿里二世后来被流放到异地。奥斯曼帝国在卡拉曼利王朝统治134年后恢复了在的黎波里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国在1830年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应对之举。最高波尔特担心的黎波里内战会导致欧洲的入侵。英国看到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已经威胁到自己在地中海的利益，遂支持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行动。

柏柏尔人起义

当美国是英国殖民地帝国体系的一分子时，美国船只在地中海进行贸易可以免遭海盗的袭击。因为英国政府通过向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黎波里与突尼斯的统治者缴纳保护费而获得此优惠待遇。然而美国宣布独立之后，这种优惠待遇立即被撤销。

40

海盗抢夺"叛乱"美国的财富，破坏其商业活动对英国有利。美国在赢得独立后，仍面临着地中海海盗带来的不确定打击。海盗带来的威胁很严重，以至于一些英国人认为，新生美国雏形经济会毁在柏柏尔人国家对其商业所带来的挑战。

1776年，美国大陆会议决定向法国靠拢，并提议签署一项协定，条款之一明确表示向柏柏尔人国家寻求保护。1778年，两国签署协定，法国仅同意在海盗抢劫问题上居中调停。第二年，大陆会议任命三人委员会准备直接与柏柏尔人国家谈判。1783年，大陆会议决心派部长级全权代表到北非地区签署友好与商业协定，以确保美国商船通过地

中海时的安全。1784 年 5 月,由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组成的代表团,与欧洲和地中海的重要国家以及柏柏尔人国家协商签署友好与商业协定的相关事务。1785 年,美国两艘双桅纵帆船“玛利亚号”(Maria)和“多芬号”(Dauphin)被阿尔及利亚摄政国扣押,美国援引 1778 年与法国签署的协定条款,要求法国进行斡旋,但最后失败了。与此同时,1786 年 2 月,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与的黎波里驻伦敦大使西迪·哈吉·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德加展开非正式的零星谈判。在亚当斯与阿德加会谈的开幕式上,亚当斯很惊奇地得知,的黎波里塔尼亚正考虑与美国开战。这些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利比亚特使要求美国给予足够的经济补偿。美国与的黎波里的直接会谈尽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历史意义重大,这标志着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第一次面对面的外交往来。大约与此同时,华盛顿开始向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派遣部长级全权代表。派往摩洛哥的外交代表团任务执行的较成功,双方在 1786 年签署和平与友好协定。

41

在英国的支持下,阿尔及尔的摄政国对美国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1795 年 9 月,双方才签署一个和平与友好协定。通过协定,美国支付大量的赎金换取被海盗俘获的人员,并同意以陆海军军事储备的方式每年向阿尔及尔交付一些礼物。华盛顿还同意送给阿尔及尔一艘装备 36 支枪炮的驱逐舰,并恰当地命名为“克里森特号”(Cresent)。在此过程中,美国官员第一次公开提出美国是否可向交战国提供军事装备问题。

与阿尔及尔摄政国的冲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在 1794 年初的大陆会议后成立了美国海军,并批准建造 6 艘驱逐舰。在反对党的坚决要求下,大陆会议通过了限制性条款,即一旦与阿尔及尔的摄政国实现和平,驱逐舰建造工作立刻停止。随后,1796 年 4 月美国大陆会议的妥协法案将 6 艘驱逐舰改为 3 艘。包括剩余 3 艘驱逐舰在内,美国的舰只总数达到 45 艘。这些战舰参加了 1798 至 1801 年法国对英国的不宣而战。从此,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支海军强国的新生力量,开启了 19 世纪的大门。美国在反对柏柏尔海盗方面不再是无防御

能力的国家。

1796年11月4日,在阿尔及尔总督的保证下,的黎波里政府与美国签署和平友好协定,规定两国海军舰队自由通过地中海时受到保护,并且制定保障制度,以确保保护措施的顺利执行。按照规定,签约国给的黎波里总督支付金钱与礼品,但并没有规定定期缴纳贡品,将来的支付款项可以给阿尔及尔政府与的黎波里政府任何一方。该协定也包含一些容易引发签约国之间误解的因素,使阿尔及尔与的黎波里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化,以至于双方于1801年爆发战争。1796年后,美国官员认为的黎波里政府依赖于阿尔及尔政府,而优素福帕夏一再强调美国应该将的黎波里看做是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美国人在研究了战争起源后强调,这一切都是利比亚海盗抢劫造成的,但利比亚人则更认为是美国不能够正确评价阿尔及尔与的黎波里二者关系的结果。

42

1801年,优素福帕夏要求与美国签订条约,条件要比1796年与的黎波里政府签订的条件更优惠。在遭到美国拒绝后,他命令将美国驻的黎波里领事馆前的美国国旗旗杆砍掉,由此宣布断绝两国关系。当时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日益高涨的美国民族主义和一艘新型战舰的支持下决定采取一种更具挑衅性的政策。的黎波里一直享有“海盗巢穴”的称号,然而这里却从来不是一个海盗的港口。相反,现代研究成果表明,的黎波里港口的地位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与海盗占据的其他港口相比,的黎波里港口地位较低,这也是杰弗逊政府将这里作为美国对海盗采取新政策的原因。

1801年,经过大规模的扩充,美国海军出现在北非地区。美国派遣了一个包括三艘驱逐舰和一艘纵帆船海军中队驶向地中海。当海军中队到达的黎波里港口前,美国宣布战争开始,并封锁了港口。封锁行动仅取得了少许胜利,但更大的失败随之而来。1803年10月,的黎波里政府夺取了美国最大的战舰“费城号”(Philadelphia),该战舰有船员307人。随后1804年2月中旬,“费城号”战舰被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以及“无畏号”(Intrepid)船员拖进的黎波里海港

摧毁。

1804 年 5 月,华盛顿任命前美国驻突尼斯领事威廉姆·伊顿(William Eton)为海军首领,为许多柏柏尔统治者提供援助。美国政府支持伊顿的海外冒险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推翻的黎波里政府,罢黜优素福帕夏,用一个亲美的人士来替换他。后备人选是 1795 年曾经被优素福罢免的艾哈迈德,后者是前者的兄长。这也是美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支持解除一国元首所采取的行动。1805 年 2 月,伊顿与艾哈迈德签署协定,后者保证建立一个让美国在的黎波里拥有最高权威与影响力的国家,以报答美国人帮助他重新担任的黎波里主人的大恩。1805 年春,伊顿指挥一小股军队离开埃及,在 4 月末占领了的黎波里以东 800 英里的德尔纳(Darnah)港口。美国海军在德尔纳地区的英勇行为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的黎波里海岸”对美国海军的赞美诗一直流传到现在。

43

就在伊顿军队缓慢地向的黎波里行进途中,优素福帕夏伸出了希望和平的橄榄枝。不久,美国接受了这一请求。1805 年 6 月 3 日,双方结束战争状态。此外,美国军队从德尔纳地区撤军,最后的解决方式是双方释放所有战俘。由于的黎波里俘获的美国战俘要比美国俘获的的黎波里战俘要多,美国给的黎波里政府赔付了 6 万美元。二者明确规定,美国军人与的黎波里政府士兵在未来的冲突中成为俘虏将以战犯对待,而不得沦为奴隶。协议的条款对美国并不是不利,但在国内引起一片批评之声,因为这将意味着放弃对卡拉曼利王朝的艾哈迈德的支持,也表明伊顿计划的破产。艾哈迈德被投入监狱,优素福又执政了 27 年。最高波尔特并不参与的黎波里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双方签署的协议也没有提及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因此,以上双边关系再一次表明,卡拉曼利王朝时期利比亚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的真实状况。

奥斯曼帝国的第二次占领(1835－1911)

1835 年,最高波尔特推翻了卡拉曼利王朝,重新确立对的黎波里

自治省的直接控制。奥斯曼帝国恢复对这里的统治,标志着卡拉曼利
44
王朝时期分权政治格局的结束,也是利比亚历史的转折点。在穆罕默德·拉伊夫帕夏及其继承者的治理下,利比亚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更为密切。奥斯曼帝国期望调度各种资源维护中央集权,加强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利比亚当局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新政策。

就在奥斯曼帝国着手重新占领利比亚的时候,他们发现利比亚是一个遭受多年战争洗礼而忽视建设、千疮百孔的国家。为了躲避内战,大约1.2万的黎波里居民逃往乡村地区。奥斯曼人在重新占领昔兰尼加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班加西附近发生了小规模起义,但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不久,战略地位稍逊于昔兰尼加的德尔纳也遭占领。利比亚西部地区反对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力量相当强大。奥斯曼帝国官员花费了15年时间,通过贿赂或软硬两手想让地方政权提供合作。奥斯曼帝国政府直到1842年才控制了费赞,总督的官邸在穆尔祖格(Murzuq)。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一直持续到1858年,也就是在马哈米德派(Mahamid clan)的领导人胡马被捕杀后才结束,他是利比亚抵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位战士。

奥斯曼帝国巩固了在利比亚的统治地位后,长期影响这里的力量或被改变或被破坏,地方人口与统治者之间的新型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奥斯曼帝国对利比亚根深蒂固的部落力量进行打击,他们坚信昔日依靠地方精英进行行省治理的分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过时的国家治理方式。奥斯曼帝国改革者对利比亚的构想是,面对欧洲的扩张创造出一套更有效的行政制度,以复活奥斯曼帝国对利比亚的统治权。可以理解,卡拉曼利王朝之所以能够直接有效地统治利比亚,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故意疏远那些即拥有自治地位,又享受特殊待遇的部落领导人。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的统治再三被颠覆的历史至少反映了三种情况:一是行省部落热衷叛乱的天性;二是利比亚经济地位对最高波尔特来
45
说并不重要;三是奥斯曼帝国集权政治的取向更为复杂化。仅在1835至1911年间,奥斯曼帝国就派遣了32名官员统治这里,其中阿里·里达曾两次任总督。

19 世纪 50 年代,利比亚成为奥斯曼帝国改革,或者叫“坦齐马特”(tanzimat,意思是重组)的沃土。在随后的 23 年里,当利比亚农业逐渐取代日渐萧条的商业贸易时,奥斯曼人在这里进行了行政改革、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4]。19 世纪 60 年代,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即土地改革与行政重组。这也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决策者坚信民众长期定居是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重振帝国的必要手段。随着 1858 年奥斯曼《土地法》的颁布,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定居点与昔兰尼加的城市引进了私有权与登记注册的制度。部落土地被分给个人,后者只需交纳少许的登记费就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利比亚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说还算成功,大多数重新分配的土地都到了农民的手中。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利比亚农业是一个颇具风险的行业。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里的部落谢赫并不能够聚敛大量财产。但难以承受的税收政策削弱了地方政府推进农业的努力。土地改革与发展农业,鼓励定居与疏离血缘联系等措施,客观上削弱了具有游牧式田园风格的部落组织的凝聚力量。

推进农业改革导致商业贸易的衰败,后者成为前者的牺牲品。1853 年,的黎波里正式废除奴隶贸易,但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某些省份仍在秘密进行这种交易。法国先后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成功地镇压了奴隶贸易后,穿越利比亚的撒哈拉商业活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复兴,1872 至 1881 年是利比亚财政收入顶峰的 10 年。随后商业活动陷入了衰落,其原因是乍得湖地区的王朝冲突;法国占领卡恩姆(Kanem)、瓦代(Wadai)与廷巴克图(Timbuktu);英国开放了卡诺-拉格斯(Kano-Lagos)铁路,货物可以从卡诺通过船只运送到英格兰。

46

19 世纪 60 年代初,奥斯曼帝国行政官员开始在利比亚实施一系列政治与行政变革。新的制度构建包括成立行政与村民委员会,以及自治市与法院系统;第一次将行政人员与法官的职责隔离开来,并引进了税收评估与收缴的新方法,重新组织邮政系统。1861 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开放了的黎波里与马耳他之间的电报线路。为了鼓励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商业贸易,的黎波里在 1865 年新开了一个城门。到 19 世纪

末,由于定居与城市化趋势,使得市政府的建立越来越成为可能。利比亚当局改革重点是调整行政系统,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变得更为集权,利比亚被高度整合在最高波尔特的权威体系之下。

在1835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利比亚期间,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地理边界还没有明确划定。其边界划分成为最高波尔特与欧洲国家在未来世纪里产生争议的根源。伊斯坦布尔政府长期关注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在法国的活动,以及英国在埃及的利益。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奥斯曼帝国意识到意大利是其非洲领土的最大威胁。早在1883年,意大利政府与新闻媒体就鼓噪占领的黎波里,但罗马新政府担心危及政府财政,削弱国家的稳定,拒绝发动这种冒险。此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政策诉求倾向于抚慰英法两国,以便在意大利图谋利比亚时得到英法的支持。

1881年,三名法国传教士在古达米斯遭暗杀,奥斯曼政府以此为由禁止欧洲人进入利比亚内地,除非有奥斯曼政府的签证。其目的是减少与英法冲突的可能性,但却使利比亚逐渐孤立于欧洲旅行者的视野之外,欧洲人对利比亚的情况知之甚少。奥斯曼帝国将利比亚隔离于世外的政策为意大利帝国主义玩弄花招打下伏笔,后者经常宣传利比亚多么富有,殖民前景广阔等,往往都是夸大其词。奥斯曼帝国绥靖政策的局限性在19、20世纪之交显现出来。当时欧洲大国之间签署许多协议,将非洲划分为不同的利益范围,很少考虑或者说几乎不顾奥斯曼人的呼吁。如法国与意大利在1902年12月签署协议,承认法国在摩洛哥,意大利在利比亚的"特殊利益"。

47

赛努西教团

在奥斯曼帝国承认的所有自治团体中,最大的一个组织是赛努西亚宗教社团。赛义德·穆罕默德·本·阿里·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Bin Ali al-Sanusi,1787 — 1859年)是一位阿尔及利亚的学者。1842年,他在昔兰尼加成立赛努西教团。赛努西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穆斯塔格哈里姆(Mustaghanim)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具有谢里夫的显赫家族

背景。大赛努西先后在穆斯塔格哈里姆(Mustaghanim)、马祖(Mazun)接受教育,最后到摩洛哥非斯(fez)地区的一个著名清真寺学校学习。他当时学习的科目有宗教理论体系、法理学以及《古兰经》注解,但在提贾尼亚达瓦斯(Tijaniya Darwashes)的摩洛哥社团(Morocco order)的影响下,对神秘主义颇感兴趣。大赛努西在13岁时离开摩洛哥,足迹遍布整个北非与中东,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在昔兰尼加驻足。1842年,他在班加西与德尔纳之间靠近地中海沿岸的贝达(al-Beida),成立了赛努西教团的第一个活动据点扎维亚(Zawiya);1856年,他又把扎维亚转移到班加西东南400公里的杰格布卜(Jaghbub)。

赛努西主张将伊斯兰正统理论与苏菲主义结合起来,这是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后来证明非常适合昔兰尼加的贝都因人。他禁止那种刺激兴奋点的宗教狂热主义,强调通过苦修谋生。为了扩大赛努西学说的影响,大赛努西带领其追随者沿着贸易线路和清真寺修建休憩客栈,最终这些地点不仅仅是旅行者停歇居所,还发挥着宗教中心、学校以及社会与商业中心的功能。赛努西教团相信苏菲社团的正统观点,认为它是一个伊斯兰复兴运动而不是一个改革者的运动,致力于将宗教文明传播到伊斯兰教没有被严格遵守的地区。赛努西教团的主要影响地区不是地中海与北非的政治中心,而是撒哈拉沙漠与苏丹境内外界难以深入的地区。1859年,大赛努西死于杰格布卜。

48

赛义德·穆罕默德·马赫迪·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al-Mahdi al-Sanusi)是赛义德·穆罕默德·本·阿里·赛努西的长子,1859年继承了大赛努西的职位。他具有坚强的个性,是一位有极强组织能力的天才,将赛努西教团的影响发挥到巅峰。在他担任领导的40年里,社团里以伊赫万(Ikhwan)著称的兄弟会将赛努西学说传播到伊斯兰与非洲异教徒生存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在整个非洲地区建立了大约146个扎维亚。更重要的是,马赫迪成功地将昔兰尼加地区的贝都因人置于社团的影响之下。赛努西教团给这些地区带来法律与秩序,遏制了盗匪的袭击行为,鼓励和平的贸易活动,在极不乐观的环境中推进农业这

一相当文明的经济活动。通过这种做法，赛努西教团的商业与政治活动鼓励了该地区的教育发展与定居生活，带来的变化与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其他地区行政管理的结果有相似之处。

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赛努西教团的领导人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接触次数寥寥无几。只是在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意识到英国占领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后，最高波尔特才开始显示出对班加西省与赛努西亚的未来忧虑。奥斯曼帝国与赛努西官员在 1886 至 1865 年间有 5 次高层交流。双方讨论的内容都没有公开，无人知晓，但这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对赛努西教团事务的高度关注。

49

1895 年，赛义德·穆罕默德·马赫迪·赛努西将扎维亚转移到班加西南部 600 英里的库夫拉(Kufra)，其原因是奥斯曼帝国要扩大在利比亚的影响范围，坚持要帝国的省政府控制昔兰尼加，损坏了赛努西教团及其分支机构的权威。此外，奥斯曼帝国对扎维亚强征税收也起了推动作用。就在赛努西教团转移到库夫拉以前的 1882 至 1884 年、1888 至1891 年以及 1891 至 1894 年，奥斯曼政府派出武装力量对忠诚于赛努西的贝都因人强行征税。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赛努西教团免税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还有个别证据显示，凭借奥斯曼政府的权威，赛努西可以有效地向贝都因人收税。[5]

移居库夫拉使得马赫迪更接近于苏丹与萨赫勒(Sahel)，他在这里可以有效监督、管理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在马赫迪看来，这些传教士代表了向撒哈拉及其南部地区殖民扩张的英国与法国的利益。1899 年，赛努西教团担心英国召集赛努西亚周边的地方部落势力从苏丹地区袭击自己，其活动中心所在地又向南转移到现在乍得境内的库鲁(Quru)。1902 年，赛努西军队被法国指挥下的乍得军队第一次击败，他们放弃了库鲁，返回到库夫拉。此时，赛努西亚的力量已处于逐渐衰落之中。1906 年，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有超过 60 个扎维亚，但是教团本身的运行并不理想，据说至少有一半分支机构名存实亡。

1902 年，马赫迪·赛努西死去，继承者是其外甥赛义德·艾哈迈德·

谢里夫(Sayyid Ahmad al-Sharif)。他的领导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2－1912年),在撒哈拉地区反对法国的殖民扩张活动,但没有成功;第二阶段(1912－1918年),指挥昔兰尼加的贝都因人反抗意大利与英国;第三阶段(1918－1933年),1918年,致使其德·艾哈迈德·谢里夫被流放异地,1933年死于沙特阿拉伯。谢里夫缺乏其叔父的组织能力与策略技巧。由于欧洲殖民力量挑战赛努西教团的在非洲中北部的影响,致使其走向衰败。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意大利在1932年占领昔兰尼加后,作为一个宗教、政治或社会组织的赛努西教团在法国或者意大利殖民领土上已经不见存在。 50

外国的图谋与行动

在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利比亚期间,美国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外交与商业关系。唯一的特例就是前美国国会议员、新闻记者米歇尔·维德尔在1870至1876年间在的黎波里担任美国领事。当时,领事馆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外交的美差,每年的薪金为3 000美元,外加上800美元的零花钱。1870年9月,当维德尔到达的黎波里时,没有一个美国居民愿意在这里定居,美国商人更没有这种想法。领事的正式职责也就是传达华盛顿的指示,以及在每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与新奥尔良战役纪念日时将美国国旗高高升起就完事大吉了。1873年,美国国务院请求维德尔重新担任此职,后者坦言,其实早在1835年后他的岗位都可有可无了,可以随时撤销。

维德尔领事不愿意在的黎波里享受美好时光。再次得到任命后,他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但争议颇多的计划,导致三年后被召回国。他坚持要求美国在昔兰尼加海岸建立一个煤站,参与"基督教徒的殖民化行为"。这是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构建与英国类似的全球殖民网络、电报线路系统以及煤站,增加美国海军的力量。但到1873年,维德尔的利比亚海军基地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因为他厌恶奴隶贸易,并在的黎波里不合规则地关心美国外交官的处境。不过,维德尔提出的、充满争议的计划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的黎波 51

里，并行使主权，但这一事实既没有改变利比亚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的合法地位，也没有改变1805年美国与卡拉曼尼王朝签订条约中享有的权利。围绕着这些问题，维德尔认为获取一个煤站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美国派遣一支快速军舰到的黎波里，命令帕夏按照1805年条约的要求给美国舰队官方的礼遇。如果帕夏拒绝这样做，维德尔将用武力夺取梦想中的港口。

1875年8月，维德尔与一个到访的奥斯曼帝国海军中队士兵发生小冲突，最终民事法庭判决维德尔败诉。维德尔电报请求美国国务院提供保护，他声称遭恐吓，家庭受到侵犯，认为奥斯曼帝国对自己充满敌意是因为他反对奴隶贸易。美国国务院支持维德尔，在不到两周之内就派两艘军舰兵临的黎波里海港。其中一艘军舰名为“国会号”(Congress)，与70年前曾封锁过此港口的一艘军舰同名。维德尔利用“国会号”警告帕夏，必须按照1805年条约的相关规定，在的黎波里港口向军舰举行欢迎仪式。要求起初被帕夏拒绝，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在最高波尔特的施压下，帕夏只得身着制服访问美国领事馆，表达歉意。维德尔欣喜若狂，认为这是美国的辉煌胜利，但事实证明，他的胜利是喜忧参半的。不久后，在最高波尔特的坚持下，维德尔被美国政府召回。

1876年10月，新领事秉持着国务卿汉密尔顿·菲斯(Hamilton Fish)的明确指示到利比亚上任。他拆除美国在昔兰尼加的海军基地，公开支持解放奴隶。此后，美国在的黎波里的领事馆恢复了昔日状态，直到1882年美国国会撤销此职。至此，始于1786年的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与思迪·哈吉·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加之间的伦敦会谈以失败而告终，长达一个世纪的美国—利比亚关系暂告结束。

52

20年后，国际领土组织，也叫“犹太人领土组织”在利比亚活跃起来。这是该组织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建立家园而进行的活动。领土主义者建议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去一些未开发的、犹太人占多数的地区生活，甚至建立自己的国家。与领土主义者观点形成对立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独

立的犹太人国家，才能最终解决现代犹太人问题。

1906 至 1916 年，犹太领土组织的活跃分子纳胡姆·斯劳兹访问了北非的古代犹太社区，为犹太移民寻找落脚点。1906 年，他来到的黎波里、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与奈富塞山(Jebel al-Nefousa)。1908 年，他穿越昔兰尼加的绿山(Jebel al-Akhdar)。1909 年，他再次访问的黎波里。

斯劳兹最终得出结论是：犹太人在利比亚殖民的前景并不看好，遂放弃了犹太人在这里建国的想法。他在 1908 年访问利比亚的基础上，写成了《北非之旅》(*Travel in North Africa*)一书。他在著作中解释了国际领土组织放弃昔兰尼加的原因：

> 经过在高原上一周的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了班加西，对这个新国家的求知欲，以及各种科学发现的好奇心丰富了我的学识。殖民昔兰尼加的计划似乎没有前途。水资源缺乏已经让国际领土组织成员灰心丧气，这在古代时期可以通过补给的方式解决，只要投入巨大的花费，付出艰辛的努力，是可以达到的。但政治事务不可避免会随着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当我们进入昔兰尼加内地之时，青年土耳其党已经颁布了宪法。[6]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

53

20 世纪初，困扰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的问题也在利比亚出现了。然而利比亚并不是帝国最具影响的省份，利比亚及其统治精英更倾向于关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急于立刻平息动乱。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利比亚度过了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该省份是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的最后据点，利比亚商人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保持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再者，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经常将北非各省份看做是“撒哈拉的西伯利亚”，这里是流放令他讨厌的政治敌手的监狱，或者被贬官员到帝国边陲任职之所。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个意

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利比亚精英接受了来自中央政府有识之士的知识启蒙。对于利比亚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其他省份的居民来说，土耳其化的政策、学校中不使用阿拉伯语以及宗教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利比亚也出现了具有独立倾向的民族主义者。一些欧洲人尽管知道赛努西教团不满奥斯曼帝国政策，更不满法国入侵乍得，但他们还是将民族主义者产生不满的根源与奥斯曼帝国的管理联系起来。赛努西教团主张打击法国，而奥斯曼帝国政府为赢得支持倾向于满足法国的胃口，警惕意大利对北非的觊觎。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一度通过开罗大使馆同意大利政府洽谈，要求后者遏制法国的影响。意大利为讨好赛努西教团，送给后者一大卡车武器，遏制法国在昔兰尼加南部与乍得的活动。这些武器后来都成为赛努西教团抵抗意大利入侵的武器[7]。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赛努西领导人在处理意大利关系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但这并不是独立运动的根源。

与此类似的是，人们怀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柏柏尔人，伊巴迪教派(Ibadi Sect)的领导人苏莱曼·巴鲁尼，也是 1908 年后奥斯曼帝国重新召开议会的代表，具有让伊巴迪省西部山区实现独立的野心。巴鲁尼一度因为参与颠覆帝国政府活动而遭关押。他似乎早已预见到，作为具有宗教、政治主权的奥斯曼帝国省份之一的伊巴迪省发动独立运动的后果。

1908 年，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土耳其军官发动起义，反对苏丹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的精英大多数是政治改革家，许多人都到欧洲留过学，深受欧洲思想的熏陶，对奥斯曼帝国苏丹政治加以批评。他们的政治宗旨是恢复 1876 年被苏丹暂停的《宪法》。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帝国其他省份，如利比亚，都欢迎青年土耳其党呼吁的美好前景与新时代。他们希望青年土耳其党宣布的平等精神与原则将结束土耳其人的统治地位，推进各省份的自治取向。

改革

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利比亚约 360 年期间，包括阿拉曼丽王朝在内，

利比亚社会与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总督在第二次占领利比亚期间执行的一系列政策,使该地区确立社会秩序、重新成立行政机构、增加教育机会。田园主义的农业主导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昔日长途贸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民众生活也从勉强维持生计向有所积蓄的局面转变。然而,这些现象并不总是显现出来。利比亚社会经济变革的政治后果,将在奥斯曼帝国动员民众反对意大利入侵,捍卫利比亚省主权的活动中表现出来。

奥斯曼帝国精英除了坦齐马特期间在利比亚进行改革以外,还于19世纪后半期对这里加强中央集权。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其表现就是在欧洲列强疯狂地瓜分非洲时,最高波尔特却能保持昔兰尼加、费赞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领土完整。而这一点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帝国统治利比亚也有不成功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在利比亚民众中构建一种共有认同,或者说是国家统一的情感。其结果是,20世纪具有部落认同、地方认同,偶尔还有区域认同的昔兰尼加、费赞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民众主导着利比亚的政治图景。由于难以培养一种大范围的国家认同感,其重要后果先是在利比亚人挑战意大利殖民占领中有所表现,后在利比亚构建一个功能齐备、独立民族国家进程中显现出来。

56

第三章　意大利殖民时代 (1911－1943)

如果说1935年前法西斯国家的国际交往中充满了暴力与谋杀，那么承袭自由主义思想的意大利法西斯帝国在利比亚所执行的绥靖政策将是残酷无情的。

波斯沃斯(R. J. B. Bosworth)：《墨索里尼的意大利》(*Missolini's Italy*，2006)

对于利比亚人来说，他们接触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就是一个专制独裁、刚愎自用的(意大利)政府，该政府表面上政治宽容，实际上习惯于征服并驱逐他们。

德克·范德瓦勒(Dirk Vandewalle)：《现代利比亚史》(*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2006)

如果没有我的祖父(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他们(利比亚人)还处于戴长头巾，骑骆驼的落后时代。

阿莱桑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2006)

(利比亚反对意大利的占领)是一种抵抗行为，为现代独

立的利比亚提供难以估量的战斗标识、民族英雄与“烈士”，民众长时间“反殖民主义斗争”所争取的诸多胜利，也给自己带来了神秘的威望。

约翰·怀特(John Wright)：《利比亚：现代史》(*Libya: A Modern History*，1982)

57

1911年9月末，意大利宣布向利比亚最高波尔特宣战，同年10月，夺取的黎波里。1911年11月，罗马宣布吞并北非省，拉开了控制利比亚的战争序幕。意大利最终付出了20多年的代价才征服利比亚。就意大利来说，长时间征服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其战争成本远远超出预期收益。而对利比亚人来说，意大利的占领更是一个大灾难。意大利对征服地区执行了焦土策略、集中营幽闭、故意饿死人、大规模处决等接近种族灭绝的殖民政策，给利比亚民众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错位的乐观主义

意大利是最后一个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欧洲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期，意大利城市国家才统一起来。意大利没有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的运气，错过了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最佳时机。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利比亚是非洲大陆没有被欧洲人占领的最后几块领土之一。其地理位置靠近意大利，成为后者殖民政策的主要目标。意大利将自己看做是罗马帝国传统的继承人。实际上意大利统一只不过才50多年，当时并不是一个大国。

意大利的梦想是通过构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帝国恢复罗马昔日的辉煌。许多意大利人相信，将意大利主权运用到曾经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是历史赋予的权力与义务。1879年，意大利开始向埃塞俄比亚渗透，但1896年意大利军队在阿杜瓦(Adowa)遭遇决定性的失败，其扩张势头被重创。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挽回阿杜瓦失败的面子，意大利将注意力转向利比亚，民族主义者将这里描述为“应许之地”。仅仅在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的几个月以前，意大利记者多

58 梅尼科·图买提访问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利比亚。他站在装有家庭设备的大轮船的甲板上,提出了利比亚作为意大利殖民地的设想:

> 的黎波里、霍姆斯、米苏拉塔(Misurate)与班加西、德尔纳和邦巴(Bomba)的公路得以修筑与保护,秩序井然的港口充斥着大量满载着非洲人的财富与意大利工业产品的船只。电气铁路网从的黎波里出发通向曼斯拉塔的各个大农场,延伸至法萨托(Fassato)和严弗里恩(Yefren)的矿区。从这里出发的铁路支线一条延伸到古达梅斯,另一条延伸到穆尔祖克。
>
> 在南方,连接厄立特里亚和地中海的意大利、的黎波里塔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的铁路工程正在向前推进。英法意三国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两大海域,面积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当地人口迅速增加,而阿拉伯人却在减少……在赞祖儿、哈里安(Gharian)、曼斯拉塔和德尔纳地区,意大利人的别墅周围环绕着漂亮的棕榈树,美丽的妇女在整个夏夜翩翩起舞,莱普提斯遗迹附近弥漫着茉莉花香。[1]

除了历史权利与民族荣誉问题外,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海外扩张是解决国内棘手问题的最好出路。20世纪初,刚刚统一的意大利政府仍面临着城邦间相互猜忌与地区冲突的难题。意大利领导人将对外战争看做是转移国内矛盾、团结民众力量、增加对祖国自豪感的渠道与解决方式。海外扩张也能成为检验意大利武装部队作战技能与武器效果的方式。与整个欧洲地区相比,意大利男子军事训练的比率较低。1913年,意大利仅为25%的男子提供军事训练班,而德国是74%,法国是87%。问题之一是缺乏武器装备的购买渠道;二是在意大利广阔的领土上存在着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按照历史学家波斯沃斯的说法:"在每一个欧洲官邸和阅兵场上,人们都臆断意大利不会发动战争。"[2]

还有部分意大利人认为,利比亚的殖民化为解决意大利乡村地区

59 移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家园。1910年,意大利仅向美国移民就超过了

65 万人。1913 年是移民高峰年,意大利人向欧洲、南美或者美国移民超过 86 万。然而,由于长途跋涉、费用昂贵,意大利人移民到南美地区的民众生活变得更为困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口稀疏的利比亚却紧靠意大利。意大利国内的新闻报道描述这里有舒适的气候,令人羡慕的沿海地貌。意大利南部等地存在所谓的"土地问题",即 19 世纪初,没有土地的农民与租种耕地的佃农向大地主施加压力,要求拥有土地以及政治上的否决权。这些都与移民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希望本国农民通过到对岸的利比亚殖民定居,缓解国内土地改革所带来的棘手难题。

罗马银行是意大利实施移民战略的一个重要机构。20 世纪初,该机构成为利比亚购买土地、贸易投资,为意大利雇用劳动力的重要媒介。罗马银行于 1880 年成立于梵蒂冈,得到意大利的支持,在利比亚主要城镇都有分支机构。它们开工厂与作坊,控制意大利与利比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对利比亚的相关事实进行夸张式的宣传。

利比亚在意大利看来是自己的"应许之地",利比亚境内某些地区土地肥沃丰产的神秘感与距离感,给意大利增添了无限的诱惑。恩里科·科拉迪尼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宣传员,也是未来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部长。他在 1911 年,也就是意大利入侵前的几个月访问利比亚。为了使意大利公众确信昔兰尼加的绿山(Jabal al-Akhdar)地区农业具有无穷潜力,他发表了一篇具有误导性质的文章,阐述该地区的自然富足。而国际领土组织早在三年前就认为,该地区不适合欧洲移民大规模的定居。而他则暗示利比亚迫切需要意大利的劳动力和先进技术,未来的利比亚将成为一个繁荣富庶的移民殖民地:

> 我们骑在马背上,陶醉在幸福感弥散的自然氛围中,走过长满大麦与小麦的广阔田野——即使在我的家乡托斯卡纳地区(Tuscany),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我们从没看到过如此令人惊叹的土地。地面是红色的,没有石头,就像粉状的烟草一样美好。我骑马在这个原野上逛了几个小时,下马后进入山谷与凹地。

60

> 我又向上走，穿过平原，从一些遗迹可以看出这里昔日繁荣的迹象。到处都可以看到枝繁叶茂的橄榄树，红岩石上的罗马井仍在汩汩出水。[3]

为了推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意大利需要廉价的原材料与市场。基于以上有限原始资料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许多意大利人认为，利比亚的殖民化将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解决这些难题，并使罗马控制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径。利比亚的农业实际上很落后，工业生产能力更是有限，国内许多地区都没有人居住，但知道这一情况的意大利人并不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封闭利比亚，造成国外对利比亚信息获取不畅，不经意地成为鼓励意大利入侵利比亚的重要理由之一。奥斯曼帝国官员担心外国探险家与旅游家深入利比亚，成为西方占领利比亚的第一步，因此阻止西方民众，特别是意大利人在利比亚进行的勘察测量或者旅游活动。其结果是，除了国际领土组织早期的一些调查资料外，人们找不到任何与利比亚相关的、可信的最新资料。

意大利政府以奥斯曼帝国对在利比亚的意大利专家态度不友好、充满敌意作为宣战的借口。借口中所谓的“敌意”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想象中的。1911 年 9 月 26 日，意大利政府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奥斯曼帝国在 24 小时之内同意意大利占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意大利总理乔瓦尼·乔利提决心要吞并利比亚的整个领土，拒绝放弃关于这一行动的任何忠告。意大利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感兴趣，迫不及待地想与奥斯曼帝国为此一战，用既成事实答复奥地利、德国这些希望和平解决冲突的斡旋者。1911 年 9 月 29 日，意大利在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 4 天之后便宣战。由于过于自负，意大利很明显缺乏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预备，两个三流大国之间的战争进程事实上迅速陷入一种军事僵局。到 1912 年，意大利入侵军队渐渐陷入困境，标志着双方持久冲突的开始。

61

尽管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 1912 年 6 月后最

高波尔特由于外交孤立,将精力集中在巴尔干地区,削弱了对利比亚抵抗意大利军队的支持力度。1912 年 7 月,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政府展开协商谈判。1912 年 10 月 18 日,也就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双方在瑞士的路易斯安那签署和平协定。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放弃对北非省的主权。然而,苏丹确实曾经向北非臣民发表宣言,授予这里完全彻底的自治地位。与此同时,苏丹保留了任命代理人的权力,负责维护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并同意撤出奥斯曼帝国的全体军事与民用人员。而 1911 年 11 月 5 日,意大利则重新确认吞并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但这一事实直到 1924 年同盟国与土耳其签署和平协定后,才被国际法重新承认。利比亚是处于自治还是主权属于意大利,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令人信服的合法性,利比亚的地位显得反常。1912 年的和平协定的内容有缺陷、模棱两可,对利比亚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其结果就是当地人一直将苏丹看做是自己的精神领袖与政治领导人。

早期的抵抗与合作

1911 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紧随其后发生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军官想复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活力,组织抵抗意大利在1911 至1912 年的占领行为。青年土耳其党运动将捍卫奥斯曼帝国省份看做是一种道德义务与政治必需,并通过埃及、突尼斯向利比亚境内的抵抗力量输送金钱、武器,提供援助。他们还鼓励整个帝国的奥斯曼官员聚集到利比亚,击退意大利侵略者。

62

1911 年末,奥斯曼军官中被称为“特殊机构”的一个重要组织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利比亚。“特殊机构”是一个泛伊斯兰的秘密情报机构,主要目标是挫败最高波尔特认为的帝国的重要威胁——欧洲的入侵与地方的独立运动。青年土耳其党军官在控制了抵抗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后,其热情与兴趣又转向捍卫帝国领土,支持那些忠诚于泛伊斯兰主义与奥斯曼主义的利比亚人。结果早期的奥斯曼帝国抵抗行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的支持。1912 年 10 月后,利比亚与意大利的和平

协定被废除,利比亚军队继续反对意大利的统治。

在此过程中,意大利残忍地对待利比亚俘虏,这些都预示着将要有事情发生。1911 年 10 月,几百个反对意大利占领的利比亚家族被关押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特雷米蒂岛上,这里与世隔绝,条件极为恶劣。由于没有躲避风雨的场所,加上食物供应短缺,到 1912 年 6 月,关押者死亡了三分之二,大多数是孩子与老人。

1912 年的和平协定签署后,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暂时停止敌对状态,重建外交关系。然而,利比亚境内的战争并没有结束。由于只有极少数的奥斯曼军官留下来,在 1912 至 1915 年,仅仅是利比亚贵族与部族在对抗意大利人。昔兰尼加的早期抵抗运动表现得最为激烈。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领导下的赛努西教团成为反对意大利的核心军事组织,奥斯曼帝国军队一直为他们供应武器装备,直到离开利比亚。1913 年,赛义德·艾哈迈德成立赛努西国家,并对意大利入侵者宣布"吉哈德"(Jihad,圣战)。

利比亚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早期抵抗运动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地形较为开阔,并且缺乏有组织的领导力量。苏莱曼·巴鲁尼既是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伊巴迪柏柏尔人的领导,也是 1908 年后奥斯曼帝国议会的代表。他想组织柏柏尔人进行抵抗,但失败了。1913 年,奥斯曼帝国军队从费赞地区撤退。法国匆忙去填补这里的权力真空,与意大利发生利益碰撞。为了挫败法国的入侵,意大利进攻地方部族失败了。失败原因是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地方的抵抗运动;二是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分散了兵力。到 1914 年 8 月,意大利军队似乎已经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与费赞。到年末,地方部族军队向北推进,将其驱赶出费赞。此后,随着意军遭遇一系列的失败,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情形不断恶化。

1915 年 4 月,意大利在布哈迪堡(Qasr Bu Hadi)战役中遭受利比亚人重创。这次战役由拉马丹·苏韦赫利领导。意大利人一直把他看做盟友,而他领导的军队却进攻意军,战争结果是意大利军队死亡超过 500 人,战利品包括几千只来复枪与几百万的弹药军火。布哈迪堡战

役以嘎尔达比阿(Gardabiyya)著称,该战役暂时结束了意大利控制利比亚内地的假象。此后,意大利人被迫从内陆撤退到沿海地区。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在利比亚的控制范围包括的黎波里,的黎波里塔尼亚与班加西的胡姆(al-Khum)、达纳(Danah),以及昔兰尼加的图卜鲁格。

利比亚境内抵抗意大利入侵的力量与奥斯曼帝国合作关系的不同,导致抵抗行动采取许多形式。虔诚的利比亚穆斯林一般把意大利的殖民政策看做是对伊斯兰教的进攻,回应的方式是宣布圣战。从此意义上来讲,宗教热情而不是欧洲类型的民族主义成为利比亚人抵抗意大利入侵的激励因素,特别是昔兰尼加地区的民众尤为如此。奥马尔·穆赫塔尔(1862－1931)一直是利比亚抵抗意大利占领的主导角色。他出身于米尼法(Minifa)部族,先后在贾祖尔、乔拉布卜(Giarabub)的赛努西学校接受教育。

1915至1918年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的影响再次加强。虽然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些省份撤出,但仍在鼓励当地的利比亚军队抵抗意大利人。最高波尔特大力支持利比亚的抵抗运动,提供援助的费用如此之大,曾经使奥斯曼帝国政府财政几乎难以负担,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面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强国,采取措施巩固利比亚精英对这个已经虚弱无力的帝国及其泛伊斯兰主义基本原则的忠诚。伊斯兰教后来成为整合利比亚人反对意大利入侵最具说服力、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基础。 64

就在意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协约国集团的一员时,奥斯曼帝国及其奥地利、德国盟友,希望利用在利比亚少得可怜的军队发动叛乱,抵抗英法意在北非的军事存在。奥斯曼帝国反对欧洲列强占领利比亚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揭示了倡导泛伊斯兰主义忠诚在利比亚的重要意义。而这些省份的领导人则更对巩固地方权威感兴趣,而不是培养对奥斯曼帝国的普遍忠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利比亚的领导人大都放弃了重新并入奥斯曼帝国或者伊斯兰政治联盟的

想法。

并不是所有利比亚人都对意大利殖民入侵采取抵抗的方式,其他方式包括移民、协商、适应与合作。不同阶级与派别因地区之间、地区内部不同反应而有所不同。不过抵抗是利比亚人对待意大利入侵的主要方式。而在 1911 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以前,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地方力量已经与意大利展开合作,如以的黎波里市长哈苏纳·卡拉曼利为代表的商人阶层。势力庞大的穆斯林商人家族如蒙塔塞尔(Muntasir)家族经常与罗马银行合作。犹太商人如哈尔法斯(Halfuns)家族则支持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文化与经济利益,后来帮助意大利军队占领该城。哈苏纳·卡拉曼利支持意大利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野心,而蒙塔塞尔家族则为了保持家族的财富及其在该地区的影响。犹太商人也是因为与意大利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才在占领期间一直与入侵者保持着合作。总而言之,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促使许多的黎波里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其他地区的利比亚商人顺应意大利的占领行为,并与之合作。在利比亚内陆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部族领导人也在合作与抵抗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想在一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维持自己的现状、权力与地位[4]。利比亚作家巴什尔·哈斯米后来在一个令人伤心地小故事中描述了在犹太人的帮助下,利比亚难民从意大利军营中逃脱的情形,准确地捕捉了各方之间复杂的关系。

65

昔兰尼加的部分城市精英,特别是那些靠近海岸地区的人也与意大利合作。而在内陆地区,经过赛努西教团几十年的教育与动员,满怀反对殖民主义心态的昔兰尼加部族精英团结在一起,自发组织军队发动武装抵抗运动。诸如奥马尔·穆赫塔尔这类出生于部族下层的高级领导人拒绝放弃武装,反对赛努西教团领导层与意大利合作的倾向,并在昔兰尼加地区发动社会革命。而在费赞地区,部族与农民对意大利占领的反应持相同的态度。大多数部族反对意大利人,将他们视为对部族独立的威胁。但是也有少数部族由于长期的内部争斗,站在入侵者的一边。费赞农民大都与世隔绝,生活贫困,难以从事大范围的政治活动。

新生的政治运动

意大利突如其来地向沿海地区撤退,随后集中精力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鼓励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新生的政治活动。1912年后,部族酋长与贵族精英成立了许多地方政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12年后,苏莱曼·巴鲁尼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成立的地方政府;1915年后拉马丹·苏韦赫利在米苏拉塔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成立的地方政府;1915年后,苏法·马哈穆迪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成立的地方政府;1916至1926年,哈里法·扎维在费赞成立的地方政府。尽管这些地方政府持续时间较短,但突出强调了1910至1920年困扰利比亚10年的派系冲突及其最终解决方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被权力角逐与财力之争放大开来,导致贵族与部族酋长之间的敌对态势,削弱了抵抗意大利的合作力量。

66

1912年和平协定签署前夕,奥斯曼帝国议会的黎波里塔尼亚议员苏莱曼·巴鲁尼与法拉哈特·扎维组织的黎波里塔尼亚贵族与酋长召开会议,讨论共同的应对之策。与会者分成两派:一派赞同与意大利人谈判,而以巴鲁尼为首的反对派则坚决要求抵抗。看到两派妥协无望,巴鲁尼领导的一派于1913年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成立了一个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成与意大利谈判的派别也没有与意大利当局达成妥协,最后还是加入了抵抗派。1913年3月,意大利军队在阿萨巴(Al-Asabah)战役中击败的黎波里塔尼亚政府,巴鲁尼与抵抗派的其他领导人被迫流亡异乡。后来巴鲁尼在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回到利比亚,再次加入抵抗运动。

拉马丹·苏韦赫利在1911年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初期,是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杰出的民族主义者与领导人。他参与了土耳其—意大利战争。不过,在1912年签署和平协定后,他与意大利有过短暂的合作,随后在布哈迪堡战役中倒戈打击意军。与许多利比亚精英一样,拉马丹的兴趣很可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服务奥斯曼帝国事业。经过多年的拼搏,他将米苏拉塔构筑成奥斯曼军队的安全阀,也是一个自

治的政治区域。

1916 年,在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Idris al-Mahdi al-Sanusi)的领导下,赛努西教团与意大利举行公开谈判,英国为调解人。谈判结果达成两个协议:即 1916 年 4 月的《祖瓦提纳协议》和 1917 年 4 月的《阿克拉马协议》。这些协议承认意大利拥有利比亚沿海地区的主权,赛努西教团拥有利比亚内陆地区的主权,允许自由贸易,免除赛努西与扎维亚的土地税。最重要的是,这些协议授予昔兰尼加民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当时意大利政府正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自由主义原则作出回应。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依赖于意大利财政支持的自治持续的时间较短,随后上台的法西斯政权开始了残暴的迫害政策。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团与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拉马丹·苏韦赫利之间冷嘲热讽,关系较为冷淡。随后于 1916 年在拜尼沃利德(Bani Walid)附近发生冲突,拉马丹的军队与到苏尔特(Sirte)收税的赛努西军队交火。事情本身并不重要,但当时双方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对付意大利的入侵,这些不快使得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军队的有效合作变得难上加难。

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国防委员会成立于两次大战期间,这是一个由利比亚流亡人员组成的团体,其宗旨是反对意大利的统治。1922 年,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赛努西的的黎波里塔尼亚代表团成员巴什尔·萨达威担任该组织领导人。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国防委员会只不过是当时在埃及、海湾地区、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突尼斯成立的众多移民组织之一。

的黎波里共和国(1918 — 1922)

1918 年秋,的黎波里共和国成立,它是阿拉伯世界创建的第一个共和国政府。[5] 该政府的成立受到两件事情的强烈影响:一是意大利在 1917 年 4 月签署的协议中授予赛努西亚地方自治地位;二是 1918 年 1 月,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布支持民族自决。新成立机构的名称在政府组成以前才取得一致意见,反映了共和国内部成员的态度以及

建立者在推选政府首脑一事上的多种意见。由此,在 24 人组成的顾问组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 4 人委员会,担任统治责任。4 人委员会成员包括拉马丹·苏韦赫利、苏莱曼·巴鲁尼、泰尔胡奈(Tarhuna)的艾哈迈德·穆拉易得和瓦尔法拉(Warfalla)的阿卜杜·纳比·比海尔(Abd al-Nabi Bilkhayr)。

的黎波里共和国成立后,的黎波里塔尼亚宣布独立。随后其领导层的努力方向就是在巴黎和会上请求大国承认其合法性,但没有得到大国的支持。在 1918 年 10 月奥斯曼帝国签署停战协定以前,也就是在 1915 年 4 月的《伦敦协定》中,欧洲列强已经将利比亚主权许诺给意大利。意大利同意面见的黎波里共和国代表,因为罗马希望双方协商签署一个协议,该协议与 1916 至 1917 年意大利与赛努西教团签署的条约相类似。1919 年 4 月,协商正式开始,但双方一开始就陷入相互误解之中。的黎波里塔尼亚认为自己与意大利地位对等,就此意义而言,两个独立的政府可能进行协商。而意大利官员则将与共和国领导人会谈看做是在利比亚构建新政府体系的前奏,希望通过地方酋长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

然而,双方的基本误解从来没有得以消除,持续进行的谈判为 1919 年 4 月意大利与的黎波里共和国签署《卡拉特扎图纳协议》(Qalat al-Zaytuna Agreement)奠定基础。1919 年 6 月,双方颁布了《基本法》。1919 年 10 月,意大利与的黎波里共和国签署了协议,《基本法》的实施范围延伸到昔兰尼加。就当时来说,《基本法》作为一种较开明的文本规定,为意大利-利比亚公民地位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保障。该法承认所有居民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有投票表决权,免于服兵役,其税收权力归属地方选举的议会。法律规定意大利总督可以在 10 人委员会提名的基础上任命地方行政职位,但 10 人委员会中有 8 人必须是由议会选举的利比亚人。在英国的干预下,意大利人被迫与昔兰尼加的赛努西教团合作。这里的议会共召开了七次会议,直到 1923 年才被废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政府机构由于没有外部压力,采取了拖延战略,迟迟没有成立。1921 年 8 月,朱塞佩·

沃尔皮被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他废除了议会，对该地区居民执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委员会成员有权监管政府的行政任命，其权力几乎等同于的黎波里共和国的首脑。然而，意大利人既不承认的黎波里共和国，也不承认其管理的黎波里内地的权威和合法性。再者，共和国领导人之间更多的是竞争，较少的是合作。的黎波里塔尼亚贵族与酋长之间派系分裂严重，主要原因是多种力量在社会、经济层面博弈对抗，包括争夺土地、贪求行政职位、征缴税收、奥斯曼帝国经济援助导致的矛盾，以及个人间的不良竞争。例如，1919 年末，拉马丹·苏韦赫利与阿卜杜·纳比·比海尔之间发生争吵，前者拒绝认可后者家族成员在瓦尔法拉的行政职位。而阿卜杜·纳比·比海尔也不满意拉马丹对赛努西教团虎视眈眈的敌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给予他们的大量金钱上也解释不清，在对外贸易上则相互指摘。到 1912 年中期，拉马丹威胁使用武力对付他的对手，结果拉马丹被击败，于 1920 年 8 月被捕处死。

1920 年 10 月 25 日，意大利与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赛努西达成协议，也就是《拉贾马协议》，承认后者为昔兰尼加埃米尔的正式头衔。赛努西可以在阿吉阿达比亚(Ajadabiyyah)、奥吉拉(Aujila)、贾雷布卜(Giarabub)、贾卢与库夫拉成立自治政府，库夫拉为政府所在地。作为回报，伊德里斯同意将《基本法》运用到昔兰尼加，解除昔兰尼加军队，禁止向地方人口收缴除什一税外的其他税收。但在解散军队这一最重要的条件上从来没有作出妥协。

作为兑现《拉贾马协议》的部分条款，意大利答应给伊德里斯个人每月 6.3 万里拉的薪金，另外给赛努西家族其他成员每月 9.3 万里拉的生活费用。此外，意大利同意支付赛努西控制区域行政官员与警察的日常费用为 260 万里拉。部族谢赫与赛努西扎维亚的行政人员也享受薪金。后来事实证明，意大利试图贿赂赛努西精英提供合作的做法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到 1921 年末，意大利与赛努西教团的关系十分紧张。1922 年末，双方危机达到顶点。赛义德·伊德里斯意识到和平

解决问题已经不可能,意大利与赛努西教团不可能共享昔兰尼加。赛义德·伊德里斯本人被流放到埃及,赛努西教团其他好战成员继续发动打击意大利的游击战,尽管战果不佳,但其精神上对利比亚人的鼓舞意义则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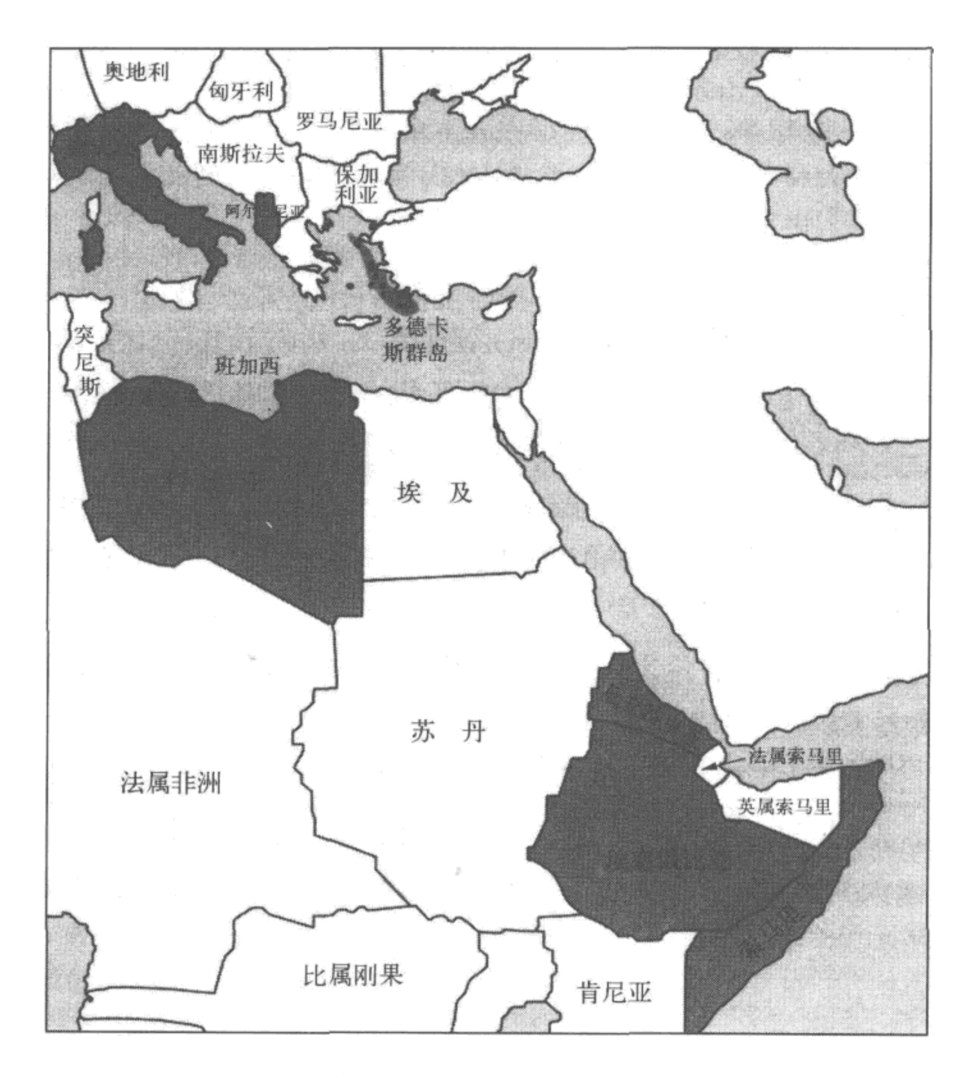
1920 年 11 月,也就是《拉贾马协议》签定后不久,的黎波里共和国的领导层呼吁在盖尔扬(Gharyan)举行会议,但由于内部分歧破坏了建立联合阵线的可能性,参会者决定任命一个穆斯林领导人来治理国家。盖尔扬会议还成立了一个国家改革联系委员会,并安排一名官方代表到罗马告知意大利新政府成立的情况。委员会的目标就是捍卫在《基本法》中所规定的阿拉伯人的权利,增进意大利人与阿拉伯人的理解,传播知识,从而让西方文明进入一个保存伊斯兰辉煌传统的国家。事实证明,《基本法》规定的选举活动从来没有进行,委员会所陈述的目标太大了。

由于缺少国际社会的支持,意大利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具进攻性,使的黎波里共和国四分五裂,领导层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削弱。到 1923 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巩固了国内的地位后,开始平定利比亚的内乱,的黎波里共和国遭镇压而失败。事后来看,的黎波里共和国精英们的主张太大。然而,共和国的产生标志着该地区政治发展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71

再次征服(1923 — 1932)

1922 年 10 月,也就是法西斯分子接管意大利前夕,墨索里尼政权拒绝 1911 年以来意大利与利比亚地方精英合作的自由主义实践。

意大利法西斯诉诸军队平息利比亚人的不满情绪。1923 年初,意大利开始着手对利比亚的重新征服。意大利军队以装备精良而得意忘形。到 1926 年,意大利军队有 2 万多人,而利比亚游击队仅限于昔兰尼加地区,人数不到 1 000,少得可怜。意大利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军队配备了国内最现代化的武器,包括飞机、炮兵部队,甚至毒气。1925 年 6 月,《日内瓦公约》签署生效,条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 72



地图5　意大利法西斯帝国

器或者化学武器。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早在1928年平息利比亚的内乱中就使用了毒气。

意大利法西斯占领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时间较长、难度很大、代价昂贵，但最终结果却很成功。到1924年末，意大利征服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人口居住中心、沿海与乡村地区。1928年初，赛努西教团的新任领导人向昔兰尼加的意大利指挥官屈服。由于费赞地区已经处于意大利的控制之下，1929年1月，意大利当局将的黎波里塔尼亚与昔兰尼加统一在一个总督的治理之下，该总督是最高指挥官皮埃特罗·巴多格利奥，首府设在的黎波里。

1929年春,昔兰尼加地区的抵抗运动出现了短暂的平静。然而到夏天,抵抗运动在埃塞俄比亚黑人奥马尔·穆赫塔尔的领导下再次兴起。昔兰尼加地区的赛努西教团成员采取游击战的方式对抗意大利军队,其特征是突袭、伏击、暗中破坏,这些手段较适合乡村地区民众的性格禀赋。意大利作出的应对措施是:孤立抵抗人士,阻止他们接近自己的民众。意大利人对待利比亚民众的做法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种族灭绝政策"。它们强调征服的后果与恐怖主义,男人、女人与小孩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且填塞水井,屠杀牲畜。由于意大利殖民档案至今仍处于密封之中,屠杀人数的准确数字还是个秘密。但大多数人估计,大约有11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利比亚东部。在以上人口中,至少有4万人死于疾病、虐待,或者饥饿。基于利比亚档案与口述历史,最新的估计数目是,处死的人多达7万。在意大利军队司令罗德福·格拉奇尼的命令下,意大利修建了一条从地中海的拜尔迪耶(Bardia)港口到加拉布卜(Jarabub)绿洲的、装有带刺铁丝网的四米厚的高墙,以阻止经埃及向昔兰尼加游击队提供援助。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波斯沃斯记录了意大利殖民政策的残酷性:

73

> 三个最残忍的事情分别是:1931年9月,阿拉伯领导人奥马尔·穆赫塔尔没有经过正规审理程序被捕处绞刑。轰炸圣城库夫拉与其他地区,包括居住着放牧者与农民的塔兹卜(Taizerbo)绿洲。意大利军队将关押在靠近海边的集中营的成百上千的人集中在一起施放毒气。由于缺乏照顾,几乎一半的被囚禁者——包括男人、女人与小孩——都死去。而法西斯的御用专家将这些事情恶毒地喻为"大清洗"。[6]

面对意大利的极端残忍行为,利比亚的抵抗运动仍在继续。直到1931年秋,积极活跃的、行动有效的游击队领导人穆赫塔尔被捕后处以绞刑才暂时结束。2万被囚禁的利比亚人亲眼见证了意大利人处决穆赫塔尔的恐怖过程,这也表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利比亚民族主义

者妥协的日子结束了。卡扎菲政权(1969 年上台到现在)深感到电影图像的神奇魅力,上台后利用穆赫塔尔的历史感召力,提供资金拍摄历史长片《大地雄狮》(*Lion of the Desert*)。该片描述了穆赫塔尔的生活,主演为安东尼·奎因。该影片强调了利比亚为了民族解放需要持续不断地斗争。1932 年 1 月 24 日,巴多格利奥统帅宣布昔兰尼加的叛乱已经被平息,长达 30 多年的战争正式结束。

74

意大利的殖民政策

朱塞佩·沃尔皮是一个金融家,其金融帝国的基础是其家乡威尼斯的电力能源部门。他还是巴尔干地区许多公司的创立者与负责人,为意大利政府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外交任务。他是第一个加入法西斯政党的大工业家与银行家,法西斯分子欢迎他成为自己的一员。1921 年 8 月,也就是法西斯进军罗马的一年前,他被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是军官出身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1925 年,沃尔皮离开的黎波里塔尼亚回国。于 1925 至 1928 年间担任墨索里尼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担任总督期间自始至终采取强硬政策,这与早期自由派政权较温和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首先,沃尔皮通过控制征服地区,打开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政治领域的僵局。其次,他提出了为殖民地成立共有土地的问题。沃尔皮强烈地感受到这两个领域的政策应该彼此配合完成。他认为仅仅凭借武力并不足以达到发展的目标,他相信最有效的战略就是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密切合作。

1913 年成立的土地办公室是为意大利殖民者提供利比亚土地的机构。他们最初假定利比亚的未开垦土地是私人财产。沃尔皮在 1922 年 7 月 18 日颁布的法令中撤销了未开垦土地是私有财产的假设,宣布所有未开垦的土地都是共有土地。另外他颁布法令,将在次年将所有的未开垦土地归还国家,反叛者与支持反叛者的土地将由国家没收。总的来说,这些法令导致意大利殖民者在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土地数量迅速增加(超过 10 倍)。但意大利人的资金并没有购买利比亚的特许土地,原因是意大利殖民者向利比亚的移民速度较

慢。1925 年 7 月,艾米利奥·德·波诺(Emilio de Bono)接替沃尔皮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1928 年,他颁布法令,向殖民者提供信贷与补贴,鼓励他们到利比亚定居。但移民人数远远低于意大利官方的预期。 75

在沃尔皮任职期间,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是由各自总督统治的领地,首府分别在班加西与的黎波里。1929 年,两个总督双重管理模式变成一个总督的统治模式,首府在的黎波里。这两块领地后来融入利比亚殖民地,首府仍在的黎波里。此后,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费赞(现在指的是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接受一个大总督的军事治理。1937 年,这一职位被新任领事所替代。总领事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由清一色的意大利人组成。1939 年 1 月 9 日,意大利殖民地并入宗主国,被认为是意大利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利比亚的殖民化与伊塔洛·巴尔博元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从 1934 年以来一直是意大利总督。1940 年,巴尔博乘坐的飞机被图卜鲁克地区意大利防空炮兵部队误认为敌机而击落,他本人死于非命。巴尔博是一名著名飞行员,此前接替了巴多格利奥的总督职务。他在其出生地,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拉的时候,就极为热心地支持法西斯主义。1922 年 10 月,他是法西斯到罗马夺取政权的组织者。由于其前任做了大量工作,巴尔博成为总督后迎来了殖民地发展的机会,原因是他任职期间赛努西教团的抵抗运动遭到破坏。在接下来的 20 多年里,利比亚第一次处于和平状态,人们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20 世纪 30 年代初,意大利国内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鼓励了对利比亚的殖民。最重要的是,贸易逆差的加剧,货币里拉的坚挺,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失业问题,促使意大利向外移民人数的增加。

巴尔博任总督期间遇到的另一幸运事情是,墨索里尼对建设利比亚殖民地付出多少代价不感兴趣,而更关注这一行动是否能使他增加威望。一个高度殖民化的利比亚将是意大利称雄地中海,建立北非帝国的一张强有力的王牌。利比亚因为强调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与重新定居项目,似乎为经济大萧条与失业严重的这个麻烦多多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最后,利比亚的殖民化也反映了意大利人在本国 76

利益趋动下向北非输出人口的梦想。

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曾在1911年因抗议意大利入侵利比亚而被捕入狱,后来于1926年、1937年与1942年三次访问利比亚殖民地。特别是他的1937年视察利比亚公共工程之行,等于表面赞同巴尔博担任三年总督职位。巴尔博不是墨索里尼的特殊朋友。1934年,墨索里尼担心他以空间探险员的荣誉身份挑战自己的威信,将巴尔博赶出了利比亚。这一切表明,墨索里尼访问利比亚并不是对巴尔博事业的赞誉,而是剥夺后者在殖民地开展更大的、更令人满意的公共项目——从突尼斯边境到埃及边远地区的沿海高速公路工程。意大利人坚持认为,修建该公路是为了促进旅游业的繁盛。然而现代观察家指出,其真正价值在于其军事战略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路成为许多国家入侵北非的必经之路。1940年、1941年、1942年,满载着意大利人或者意大利-德国军队的车辆通过这条公路驶入埃及。1940至1943年,英国军队顺着此路进入利比亚。意大利的御用宣传员以此路作为意大利的殖民是造福于利比亚的现代化项目的证明。但他们没有指出,该项目是千万利比亚劳工辛勤劳作的产物。

墨索里尼在1937年访问利比亚期间接受了"伊斯兰之剑"的称号(这是在佛罗伦萨临时捏造的称号)。后者从来没有实现自己"伊斯兰教保护者"的愿望,墨索里尼在同年再次访问期间确实将利比亚列入意大利的帝国战略思维之中。利比亚作者阿里·艾勒米斯特拉提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墨索里尼访问利比亚的小故事,作者以充满丰富的联想与情感回忆往事。他在"墨索里尼铁爪摘录"一节中,讲述了自由斗士法拉斯被迫以制造马鞍装饰物谋生的故事。当意大利当局迫使他为墨索里尼制作马鞍时,他报复性地将一枚尖锐的铁钉放置在马鞍的背后,后来墨索里尼臀部被刺伤,痛苦万分。几个小时后,法拉斯被投入监狱:

77

> 法拉斯没有担心自己的命运是被沉入海底还是被判处绞刑……法拉斯对自己的报复行动很满意,因为就在入狱被讯问期间,他紧紧抱着父亲的马鞍,亲吻着上面的血迹。[7]

巴尔博包揽了利比亚行政、财政、立法、军事与政治事务等所有权威部门与职位。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国家权力跨越地中海，两个沿海省份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融入了宗主国意大利的范畴，而费赞地区则被授予殖民省份的地位。利比亚被称为“第四海岸”，是意大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三个是半岛的第勒尼安海岸、亚得里亚海岸与伊奥尼亚海岸。以上海岸将地中海包围起来，使其成为意大利的真正的“内湖”。在此期间，利比亚被确定为意大利殖民地，以尊重法律著称的欧洲人第一次以名词术语的形式对之加以详细叙述。

如果将巴尔博的时代浓缩为一瞬间，那就是在 1938 年 10 月，所谓的“2 万”殖民主义者(实际上是 10 万)被大规模的船队运送到利比亚。该计划要求从 1938 年开始每年安置 2 万殖民者，连续 5 年。其长期目标是到 1950 年，利比亚领土上的意大利殖民者人数达到 50 万。然而，巴尔博领导的第二次移民只有 1 万人。1938 年，移民规模是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公开的辉煌成就。移民的游行示威以及狂欢活动在意大利国内引起一片批评之声。利比亚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不欢迎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巴格达以及其他地区引发了暴力性的游行示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尔博构想的利比亚未来辉煌蓝图逐渐暗淡起来。随着北非战役变幻无常地延伸到昔兰尼加，许多意大利殖民者最终撤离利比亚。到 1941 年末，留在利比亚的殖民者仅有8 426人。1942 年，战火蔓延到巴尔博大农场，留在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又削减了一半。随着战争的结束，意大利政府给殖民地分拨的补助金也停止了，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居民安置计划被搁置下来。

78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对利比亚的开发并不成功，也没有这种能力捍卫其成果。1940 年 12 月到 1941 年 2 月，驻扎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被英军击败，被俘人数达 13 万，而英军仅损失 550 人。1943 年 2 月，北非战役(1940－1943 年)结束。1943 年 1 月 23 日，英国第八军占领了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未设防的首都的黎波里。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怀特恰如其分地说，在英国统治下，利比亚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 到1943年,英国统治下的利比亚意大利人的命运已经很明显,他们的利益将附属于利比亚本地人。早在1942年1月,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在英国下议院发表声明,保证昔兰尼加的赛努西亚将会无条件地再次处于意大利的统治之下。尽管英国对的黎波里塔尼亚没有类似的承诺,但意大利人还有少许理由认为,英国人将对他们的战绩与地位表示同情与支持,如果不把意大利看做是一个殖民地开拓者,至少还是一个殖民主义者。[8]

战争结束后,英国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控制了费赞。利比亚被两个殖民大国分割似乎预示着前景并不乐观,但出乎预料的事件是,1951年12月,利比亚获得独立地位。

犹太社区

在法西斯统治下,规模较小但具有高度爱国心的利比亚犹太社区却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崇高地位。巴尔博是一个亲犹太分子,他在1937年公开声明,他的三个最要好的朋友是犹太人;他认为当地犹太人是其在利比亚推进现代化构想中的天然盟友,立法规定礼拜天禁止店铺营业,但不顾犹太人的宗教敏感性,强制他们在星期六开业。1938年,法律正式得以实施,规定利比亚犹太人地位高于穆斯林,而前者以前被认为是低等民族。与此同时,巴尔博尽最大的努力回避执行意大利法西斯与纳粹德国排犹法案中的相关规定。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利比亚犹太人的境况相对来说并不糟糕。

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关系度过了一段较愉快的时期,特别是在一些小城镇与乡村地区,二者安居乐业,似乎真正地和平相处。然而,1945年11月4日星期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的黎波里爆发的反犹太暴乱。[9]暴乱的直接原因还不很清楚,英国官员经过调查认为,争斗始于一个犹太人与一个穆斯林之间的口角,是两个年轻人在礼拜日晚上偶发的争吵。而犹太社区的报道却是,在许多不同犹太社区同时爆发暴乱,暗示事前经过策划与协调。

反犹暴乱的规模与强度日益扩大，包括劫掠商铺、纵火行凶、肉体攻击。在的黎波里，居住在犹太社区之外的犹太人大多数遭到袭击，而犹太老社区的犹太人则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1945 年 11 月 5 日，英国对暴乱作出应对，宣布戒严，派出一些警察在街上巡逻，但不能制止暴徒的行为。实际上，英国政府在 11 月 6 日晚才作出决定，即坚决有效地采取措施制止暴乱的蔓延。在此期间，仅在的黎波里，就有 38 个犹太人与 1 个穆斯林遇害。暴乱从的黎波里蔓延到其他城市，暴徒不断地进攻边远地区的犹太人。乡村地区犹太人死亡总数达到 100 人。此外，大量财产被付之一炬，或者被劫掠殆尽。

80

1945 年的反犹暴乱是利比亚国内犹太人—穆斯林关系的转折点，也是犹太人与利比亚国家本身关系的分水岭。这次暴乱是对利比亚犹太人安全感的沉重打击，即使没有破坏利比亚犹太人在利比亚的居住的意愿，也是对这种意识的重大挑战。这次政治大变动过去 3 年后的 1948 年 5 月，以色列就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出现在中东大地。1945 年暴乱是 1948 年后利比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利比亚犹太人最终可能像北非国家的犹太人一样毅然决然地向以色列移民。如果没有反犹暴乱发生，这种移民速度肯定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而不至于速度如此之快。

意大利占领的影响

一旦意大利政府镇压了利比亚的抵抗运动，它将面对着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为殖民利比亚而制定一整套野心勃勃的计划。意大利官员发现，吸引私人资本投入殖民地农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些确实想投资的企业家发现，殖民地居民及其家庭是一种沉重的财政负担，除非政府提供诱人的额外补贴才有投资的吸引力。意大利的移民本身也有问题，他们一般更喜欢追随亲戚到美国或南美，不愿在北非地区创造新生活。再者，意大利移民并不是优秀的殖民地开拓者，因为即使是那些具有乡村背景的人也很少有管理农场的经验，他们更乐意在城市定居。针对以上问题，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始终如一地使用同样的解决之

道——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因此,利比亚的殖民化几乎没有解决意大利迫在眉睫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而利比亚人却面临着在本国内被沦为二等公民的前景。

81 在意大利统治利比亚的30多年里,给后者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包括宽阔畅达的道路、风景如画的农庄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但没有培养出由一批有技术、有知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的现代人构成的公民社会。意大利的殖民政策留给利比亚一群未接受过教育、处于利比亚主流经济之外、对社会秩序破坏性极强的民众。意大利政府也不鼓励利比亚民众参与政治并构建政治制度。与此相反,政府积极打击真正的政治参与活动。例如,意大利法西斯在昔兰尼加政策的目标是破坏赛努西教团的力量,废除传统的部族集会,削弱现任领导人的威信。通过这样做,意大利人有效地改变了昔日部落联盟与新兴阶级构成的微妙经济平衡。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引发了利比亚的政治骚乱。1911年,意大利占领利比亚更加速了冲突的蔓延,这些对利比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后果。正如礼萨·安德逊后来指出的,政治骚乱的独特性在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参与者的个性,随后强烈影响了利比亚在现代阿拉伯与伊斯兰认同中对国家定位的基本构想。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利比亚一直忠诚于泛伊斯兰主义的诉求,而不是求助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一部分利比亚精英想以世俗化、共和国的理由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成立政治组织。由于内部争斗导致两败俱伤,他们的努力也注定以失败而告终,似乎命中注定地要再次求助于宗教意义上的领导集团,继续在昔兰尼加与意大利的统治作斗争。从广义上来说,利比亚在此期间最普遍的政治认同是忠诚于奥斯曼帝国;从狭隘意义上说,是对利比亚的爱国心,这些都来自反对阿拉伯民族的象征符号与附属物的伊斯兰教。意大利殖民时代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此后的利比亚与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忠诚紧密联系在一起[10]。

82 意大利的教育政策主要体现在1928年7月政府颁布的法令,它有

效地限制了利比亚人接受初级教育以及学习传统艺术与手工艺技术的机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式教育与经济隔离制度。利比亚小孩像鹦鹉学舌似的阅读句子,如"我们乐意接受意大利政府",或者"墨索里尼一家非常喜欢小孩,甚至喜欢阿拉伯小孩"。意大利政府的御用文人想通过以下方式证明其制度的合法性:即利比亚人既可以申请成为"特殊公民",也可以到意大利中学申请职位。但他们没有提及接受这些特殊权益是否意味着支持法西斯政权的政策,而这是大多数利比亚人深恶痛绝的事情。

衡量意大利教育政策的后果,可以从1951年独立后利比亚提供的信息得出结论,不过这些信息可能被夸大了;即当时意大利的大学仅毕业了5人,而开罗爱资哈尔伊斯兰大学毕业生为10人。当时利比亚人没有资格担任中小学校长,也没有非伊斯兰领域的职业,或者更没有训练有术的农业专家。培训师资的短缺迫使英国从埃及以及其他地区招募教师,这些教师都没有君主制传统与价值观念,为推翻君主制政权的1969年革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利比亚的文化与文学复兴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其前景本来很有希望,但在1911年后被意大利人扼杀。意大利入侵以前,利比亚有16家期刊定期出版。意大利入侵后,这些期刊被法西斯政权迅速封停。在利比亚著名作家艾哈迈德·法格赫看来,意大利法西斯在利比亚的30年统治可以被描述为"肉体与文化灭绝的种族主义战争"。利比亚境内的大多数报纸与杂志在出版第一期后就消失了[11]。布赖恩·麦凯伦在一本富有创新精神的利比亚殖民文学中,阐述了意大利对待利比亚文化的基本特点:

> 尽管他们的土地是宗主国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是现代意大利政治、经济制度的延续——但与西方文化相比,他们的文化被认为是野蛮与落后的[12]。

1950年,利比亚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再次回到意大利占领初期

的状况。按照某数据表显示,土著居民人口从1907年的140万降到1912年的120万,1933年为82.5万人。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部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游牧民向周边国家移民寻求避难。人口大规模下降的事实表明,那些认为意大利统治利比亚是善意的说法充其量是一种误导。意大利人在镇压利比亚的过程中不但付出了金钱与生命,而且在利比亚以及广泛的伊斯兰世界声名扫地。善意地说,这就是意大利殖民利比亚的结果。



第四章　为独立而斗争(1943－1951)

84

独立前的利比亚名称仅仅是地理学上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利比亚民众更喜欢被称之为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昔兰尼加人与费赞人,而不是地理学上确认的国家名称。

马吉德·哈杜里(Majid Khadduri),《现代利比亚》(*Modern Libya*, 1963)

如果利比亚存在不和谐现象,那么造成这种事实的大多数因素来自外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影响利比亚独立的诸因素中,国际社会的分歧远远大于这个国家内部的不团结。

约翰·怀特(John Wright):《利比亚》(*Libya*,1969)

我认为,相关文本的条款已经规定的很明确:即联合国专员帮助利比亚民众制定他们的《宪法》,建立他们的独立政府。

联合国专员艾德里安·佩尔特(Adrian Pelt,1950)

除了伊朗或其他有争议的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关注的热点外,利比亚在战后一段时期一直处于东西方冲突的中心舞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许多年。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Ronald Bruce St John):《利比亚与美国》(*Liby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2)

利比亚是从欧洲殖民统治体系中获得独立的第一个非洲国家,也是在联合国大会支持下成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利比亚是大国对抗角逐的舞台。其生存高度依赖大国的支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在此过程中,四大强国(法、英、苏联与美国)决定让利比亚独立,这既是“冷战”的迫切要求,也是时代的产物。

85

解放与占领

1943 年 5 月,轴心国在突尼斯投降,英国政府成立军事行政当局管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1943 年 1 月,驻乍得的自由法国军队占领了费赞,成立法国军事行政当局管理费赞。英国占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 1942 年 1 月 8 日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在国会下议院宣布,赛努西亚不会再让意大利主导;以上两件事说明,英国已经对前意大利殖民地作出了安排。赛努西教团长期抵抗意大利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结盟,构成了利比亚阿拉伯军队的核心;尽管其力量弱小,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利比亚阿拉伯军队由 5 个营组成,佩戴赛努西标志性符号,即一块黑布上镶嵌着一弯白色新月与星星。1942 年的《艾登声明》的全部含义在当时并不清楚,但是他的话语表明,大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利比亚领土可能有不同的安排[1]。

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赛努西及其追随者对艾登的声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并没有保证昔兰尼加会在战后实现独立。当时他的意思很清楚,赛努西领导人反对意大利人或者苏联人战后在昔兰尼加扮演的某种角色,倾向于让这些省份独立自主,与英国政府缔结亲密盟友。当赛义德·伊德里斯迫切要求英国官员作出让利比亚完全独立的表述时,得到的答复是:在战争没有结束以前不可以作出任

86

何承诺。不过他还得到一句安慰性的话：到那时，一定会给利比亚自由。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1907年海牙会议的约束，该会议禁止对维持现状的殖民地进行军事占领，直到国际机构对被占领领土的未来作出决定。英国军队将在“关心与维持秩序”的情势下，继续管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政治精英公开声明并不厌憎意大利的统治，甚至更担心苏联的占领。他们与赛义德·伊德里斯在某些方面有共同感，不过并不接受后者的全部计划。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领导人批评《艾登声明》理由有二：一是英国没有保证的黎波里塔尼亚与昔兰尼加不会再次落入意大利之手；二是声明提及赛努西，英国优先承认赛努西教团在整个利比亚的领导地位。由于没有像昔兰尼加那样得到英国的保证，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民众因担心本地区的独立前景而变得忐忑不安。他们认为利比亚是一个国家，没有理由划分为不同的省份。1943年8月，的黎波里居民向英国当局提交请愿书，倾诉委屈与不满，要求雇用更多的地方官员，为穆斯林孩子提供小学教育。

在南方，法国管理下的费赞地区成立了一个由法国军事当局、赛义夫·纳斯拉家族，以及费赞地区官员组成的混合管理当局。法国从一开始就打算永久控制该省份，将他们在赤道与南非的殖民地连接起来，作为缓冲区域保护法国殖民地免受外部的影响与渗透。法国军事管理当局滞留在费赞地区一直到1951年利比亚独立。

战时讨论

87

1941年8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华盛顿宣布了《大西洋宪章》，内容之一涉及美国处理利比亚的意图与构想。美国在《宪章》中作出保证，尊重民族自决权，在保持全球经济公平发展的基础上取得进步。在世界新秩序中，大国将推动商业活动向全球自由拓展，加速原材料的运转，但不会违背相关国家民众的意愿，随意变更领土。从1942年开始，罗斯福总统与其他非洲国家官员按照惯例将履行《大西洋宪章》作为全球性的义务。因此，利比亚以及

其他地区的受殖民主体将这一时机看做是满足自己自治与独立的迫切要求与愿望的有利时机。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大西洋宪章》所包含的想法使那些满怀热情的殖民地精英感到非常失望[2]。

1943 年 8 月,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的一份《备忘录》中,为利比亚未来规划了 4 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成立国际托管机构,治理作为北非广阔区域一部分的利比亚。早在 1942 年 9 月 26 日,已经有一专门小组提出了这个方案,在随后的 8 个月里对此方案修改了多次。该方案是将利比亚置于国际社会的托管之下,治理委员会包括英国、法国与埃及。方案认为,从安全的视角来说,随着各大国空军力量迅速增长,哪一个国家控制利比亚并不重要。英国意识到除了不把利比亚交给与英国为敌的国家外,自己在利比亚并没有太大的战略利益。不过,英国很早就看出昔兰尼加的重要地位。美国对利比亚重要战略地位的认知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种方案就是 1943 年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其构想是瓜分利比亚,昔兰尼加归属埃及,的黎波里塔尼亚归属突尼斯。该建议一提出就遭到反对,理由是埃及政府糟糕的管理能力不应该治理昔兰尼加,而将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大利人归入突尼斯,会打乱法国与意大利在突尼斯的微妙平衡。第三种方案是将利比亚交还给意大利,但支持这一方案的国家几乎没有。但相关协议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妨碍意大利向利比亚移民,或者意大利人应该在利比亚享受平等的待遇。最后的方案是在利比亚成立犹太人避难所,包括在昔兰尼加成立犹太国家,在意大利人退出的乡村与农场等地安置犹太难民。该方案的障碍是利比亚可耕地有限。此外,美国国务院也承认,劝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接受犹太居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随着利比亚人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备忘录》承认任何收留犹太人居民的企图都有可能使阿拉伯与犹太人冲突升级,不会给犹太难民问题带来实质性的解决。

1944 年春,英国参谋长提出了另两个解决方案,其中之一就是瓜分利比亚。按照英国的构想,昔兰尼加将成为埃及统治下的自治公国,联合国将为其提供足够的军事保障,包括为班加西地区提供空海军装

备。的黎波里塔尼亚归还给作出非军事化保证的意大利,英国则留下贝尼托城堡(Castel Benito)作空军基地以及军队中转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一份备忘录中向罗斯福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处理利比亚的首选计划是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置于国际机构的托管之下,后者由一个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对联合国负责。他又补充说,不排除成立一个自治的赛努西埃米尔国家。如果英国不同意的话,赫尔向罗斯福提出一个可行性但并不是最理想的建议,即顺应英国的建议,将昔兰尼加作为一个自治的赛努西埃米尔国家,置于埃及(或者可能是英国)的托管之下。的黎波里塔尼亚置于国际托管机构的控制之下,由意大利代行职能。

89

1945 年 12 月,各国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苏联要求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问题更为复杂化。苏联认为,英国与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因此,他们肯定会考虑苏联在北非地区的利益。当后来斯大林对英国似乎并不准备将的黎波里塔尼亚让给苏联一事提出质疑时,英国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机智地作出回应:该问题并不是托管就能解决的,而是避免英国政府参与北非地区的大国博弈。

杜鲁门总统(1945 年 4 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接任总统)在一本关于 1945 年波茨坦会议指示书中表明,如果有国家提出建议的话,美国将支持三种解决方案中的任何一种。美国政策上出现了大转变,支持利比亚主权交付意大利,由非军事状态下的意大利治理。在讨论利比亚归属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上,美国支持按照历史归属将利比亚划分为几个部分,交给不同的国家:昔兰尼加成立自治的赛努西埃米尔国,由英国或埃及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由意大利行使主权。以上建议失败后,杜鲁门政府又支持以下方案:即将利比亚分为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前者成立一个由英国或埃及托管的自治的赛努西埃米尔国,后者处于国际托管机构的管理之下,由意大利代行职权。1945 年的杜鲁门支持多种解决方案,这一方面证明美国对利比亚战略地位的重新考量;另一方面也证明美国意识到利比亚港口与机场的战略地位,以及控制地中海中部的重要意义。

波茨坦会议末期，大国在如何处理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逐渐靠近。英国赞同将利比亚主权与领土置于四大国的控制之下。苏联则赞同三国管理利比亚。美国看起来似乎愿意追随英国的主张。每一方都提及国际托管方式，但欧洲国家的主张实际上还是老一套，即大国的委任统治。苏联的理想是挑选的黎波里塔尼亚作为看管其战后地中海军事基地的代理人；但英国对此则完全不能接受，这和欧洲国家的新领导人被炮弹炸死一样，是共产主义在欧洲复兴的警示。在犹太人定居问题上，丘吉尔也坦率地指出，欧洲犹太人对于在利比亚定居没有一点热情。4 个月以后，也就是前一章提及的 1945 年 11 月，穆斯林对犹太少数派进行暴力袭击，打碎了国际社会在利比亚成立犹太避难所的最后希望。

大国僵局

在 1945 年波茨坦会议的基础上，外交部长委员会从 1945 年到 1948 年召开了一系列耗时长，费精力，但又没有任何成果的会议。外交部长委员会与联合国共同解决利比亚问题，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国际社会解决利比亚问题最有希望的新解决方案，但事实上则是新瓶装旧酒，反映了四大国之间的矛盾与混乱的国际秩序。关于意大利殖民地的安排，外交部长委员会在讨论中会偶尔尝试性地提出通过妥协或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讨论更多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两极特征。

1945 年 9 月，外交部长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会议，美国对利比亚的政策已经被大国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所否决。美国决策者从来没有将意大利的殖民地当做一个重要问题，除非涉及美国的安全战略。欧洲国家享有处理利比亚的优先权，不过，意大利即使在欧洲也不享有优先权。负责欧洲事务的美国官员担心未来苏联会在地中海担当重要角色，因此推荐意大利的殖民地包括利比亚，应该以托管制度的方式归还给意大利。另一方面，负责近东与非洲事务的美国官员则倾向于让联合国以国际托管的方式随心所欲地控制这些地区。

1945年9月中旬,美国国务卿伯恩斯提出了一个解决利比亚的计划,即将前意大利所有领土委托给联合国托管,10年后成立一个统一的利比亚并实现独立。伯恩斯在与苏联同级官员的私下会见中,强调了《大西洋宪章》中规定的相关条款,认为阿拉伯人希望盟国尊重二战期间宣布的民族自决的声明。他强调了成立联合国托管机构将向世界表明,大国并不想剥夺他们的胜利果实。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但苏联继续索取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管理权。

就在外交部长委员会在伦敦从容不迫地讨论利比亚解决方案之时,1945年9月2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美国国务院对殖民地问题的内部争论。赖斯顿认为,对利比亚问题的争议涉及大国关系的博弈和欧洲格局的重组。他认为,非洲殖民地的争论是欧洲主导权之争,其实质问题是关注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基本发展特点[3]。后来证明,赖斯顿的专栏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解决利比亚问题的普遍参照标准。对于分析学家来说,讨论意大利殖民地的处理问题是盟国决心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试验品。从此观点来看,通向国际托管之路的主要障碍不是恢复意大利对利比亚的统治问题,而是西方国家担心苏联卷入北非事务问题。

1947年2月10日,意大利正式签署了《和平协定》,《协定》要求意大利取消其前非洲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利比亚与索马里的所有权利与头衔,让令人尊重的英国人、法国人执掌军事行政权力。《协定》的附件六规定,关于意大利前殖民地的未来处置将由美国、英国、苏联与法国共同决定。四大国必须在《协定》开始生效(即1947年9月15日)的一年之内达成和解方案。以上构想失败以后,美英苏法四大国把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在此期间,外交部长委员会仍被授权,可以利用调查委员会继续研究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92

地区与国内的政治冲突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赛义德·伊德里斯一直居留在埃及。只要昔兰尼加地区处于英国的军事管理之下,他就不会回到这里

居住。外国管理利比亚的现实结束后,人们都相信伊德里斯将被委托管理利比亚的职责。但在他看来,只要英国军事当局在行使治理职能,他就不想承担这一责任。1945 年 6 月,就在外交部长委员会开始认真讨论这些事情以前,他的支持者给开罗的英国国务大臣致函,阐述了昔兰尼加在赛义德·伊德里斯领导下成立独立政府的构想。1946 年 7 月,昔兰尼加的部族首领发表声明,要求英国承认赛义德·伊德里斯为赛努西埃米尔,并在昔兰尼加地区成立一个独立的宪政政府。1947 年 11 月,赛义德·伊德里斯接受以上提议,永久居住在昔兰尼加。他十分忧虑利比亚不断发展的政治宗派主义的力量,如奥马尔·穆赫塔尔俱乐部成员,民族阵线的旧贵族精英,以及部族领导人。1947 年 12 月,他解散所有的政治组织,赞同成立一个类似于国民议会的新联合阵线。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战争的结束引发了政治活动的兴起。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政治精英长期受到意大利的压制,后者禁止的黎波里塔尼亚成立政治团体。现在,这些政治团体利用这次机会成立了许多政党组织,包括民族主义政党、联合民族阵线与自由民族联盟。这些省份在过去一直存在着派系分歧,缺乏有组织的领导集团,家族与派系忠诚在这些政治组织的产生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也就是说,除了赛努西埃米尔以及与《宪法》有关的问题,实际上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所有政党都反映了 1918 至 1922 年主张统一与独立基本原则的共和国的历史经验。这些政治组织的具体要求包括成立一个由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组成的、具有阿盟成员国地位的、完全独立统一的利比亚。

法国希望管理下的费赞能与自己的非洲殖民地合并,与阿尔及利亚南部一起管理。他们转移费赞、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贸易方向,鼓励与阿尔及利亚建立某种联系。当费赞地方领导人流露出成立一个自治政权的意愿时,法国当局加强了对费赞政治力量的控制。1946 年末,在法国行政当局的统治下,费赞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反法社团。法国后来发现了社团的存在,并于 1947 年逮捕了一些成员。然而,这些组织的反法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1947年初,利比亚仍然被分割为三个地区,包括昔兰尼加地区新生的埃米尔国家,由各种具有城市文化特征的族群构成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法国控制下的费赞绿洲。尽管外交部长委员会提出了各种建议,但当时还没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统一的利比亚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在非洲大陆。大英帝国继续与昔兰尼加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对监管的黎波里塔尼亚则不感兴趣,对把法国赶出费赞地区也不抱多大希望。美国对非洲地区的托管没有兴趣,筹划了一个具有一些意识形态倾向,但没有得到实际支持的集体委任统治计划。法国似乎下定决心要控制费赞地区,让意大利恢复统治的黎波里塔尼亚。苏联希望利用殖民地达到双重目的:一是提高自己在欧洲讨价还价的地位;二是支持意大利恢复在前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增加意大利全体选民对现政府的支持。

94

1948年,提前进行的意大利大选严重影响了利比亚事务,因为美国及其盟国担心大部分投票人会因为殖民地问题改变自己的立场。苏联初期极力影响意大利民众的投票权,并在1948年2月中旬宣布支持意大利对前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地位。美国与英国的决策者采用了更为谨慎的方法,将决策一直延续到大选之后。最后,意大利大选结束了,罗马的加斯贝利—斯福礼(Gasperi-Sforza)政权表明自己能够在外部援助下抵制共产主义的挑战。华盛顿吸取的教训就是,没有必要接受意大利对前殖民地委任统治权的要求。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国一直从战略意义上考量利比亚问题,但1948年的意大利危机促使英美联手制定防御计划。意大利大选后,美国的国务院与英法外交部门作出以下保证:即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不对殖民地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美国国务院后来告知美国代表团,在利比亚问题上一定要与法国与英国协调立场。

在此期间,利比亚一直是英美在东地中海地区战略利益博弈的关键。1948年1月,英国长期担任副部长级的官员奥拉姆·萨金特先生认为,昔兰尼加尽管缺乏资源,但是是非洲地区最好的"航空母舰"。1947年,美国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迈拉哈军事基地,也就是惠勒

斯基地已大体修复,呈现一片新景象。到1948年初,美国在昔兰尼加问题上一直完全服从英国的利益。1948年夏,美国在迈拉哈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1948年的欧洲危机成为大英帝国与美国战略利益相互缠结在一起的催化剂[4]。

95 1948年初,外交部长委员会按照意大利《和平协定》规定的条款,派遣一调查委员会深入利比亚国内查看基本情况,弄清楚民众的意愿。委员会成员由四大强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收集事实,但不能在领土的最终安置问题上提出建议。1948年3月6日,委员会到达利比亚。在各地的具体逗留日期是:的黎波里塔尼亚40天,昔兰尼加25天,费赞地区10天。当调查委员会访问昔兰尼加时,国民大会向它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昔兰尼加完全、立刻实现独立,承认伊德里斯埃米尔为昔兰尼加宪政国家的国王。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国民大会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认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可以与昔兰尼加联合,接受赛努西家族的治理。否则,昔兰尼加可以保持自己的彻底独立地位。在委员会访问费赞期间,反法团体公开指责法国的统治,要求费赞、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合并,处于赛努西教团的领导之下。而在委员会离开之后,法国殖民当局将反法团体的一名成员穆罕默德·本·乌斯曼·赛义德逮捕,并投入监狱达6个月之久。

由于利益冲突的牵制,调查委员会成员最终仅在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认识到,利比亚民众实际上在摆脱外国统治,实现自由这一点上是没有异议的。委员会成员承认,人们没有回归意大利殖民统治的热情。但报告也慎重地提出,利比亚明显缺乏行使国家独立职责的能力。调查委员会考虑到利比亚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是:利比亚并不准备独立。这一说法引起了利比亚民众的激愤[5]。

1948年9月13日,外交部长委员会在巴黎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政策立场发生了惊人地改变,他们建议将利比亚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按照苏联的构想,托管方的管理将由托管委员会负

96 责,后者由顾问委员会提供指导。苏联提出的计划几乎是1945年9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伯恩斯方案的翻版，文字也几乎不差分毫。美英法三国以苏联计划不合实际为由拒绝了该方案，将意大利承担的利比亚职责移交给联合国。至此，外交部长委员会正式解散，完成其神圣的历史使命。

美国的战略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宣布，东地中海与中东地区成为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华盛顿意识到阿拉伯—以色列的关系将在美国战略目标中扮演重要角色，遂提出一系列建议引导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首先，承认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稳定对美国的安全是重要的。其次，得出的结论是：得到该地区阿拉伯民众的好感与尊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必须让这些民众远离苏联。第三，应该调解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居之间的分歧，至少让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在反对苏联方面采取一致立场。战后整个时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国与美国的紧密合作，这种关系应该继续下去以实现二者的核心利益目标。

上述对美国在东地中海与中东地区安全利益的评估表明其有以下战略需要：第一，华盛顿必须剥夺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国家在该地区的战略据点；第二，美国必须通过经济与社会援助，如果可行的话包括军事援助，推进与培养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第三，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开发该地区的石油资源；第四，美国必须在有战争威胁时，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军事力量进入战略要地。

为了满足这四大战略需要，1947 年 8 月 28 日，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一系列的空军基地。东部是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宰赫兰(Dhahran)基地，西部是位于的黎波里附近的惠勒斯基地。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强调了惠勒斯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它不仅为美国在利比亚继续保存军事基地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而且还为联合国处理意大利殖民地提供了解决之道。同一份文件还反复重申了英国政策对于美国在利比亚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意义。然而，文件并没有提及英国在昔兰尼加的军事基地。不过，美国国务院的早期《备忘录》

中曾提及相关信息，当时华盛顿认为英国在利比亚的该基地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

随着利比亚独立脚步的临近，美国的战略利益并没有多大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也是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英国的防御潜力还不足以应付像苏联那样强大的竞争对手所引起的地区威胁。华盛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本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行动很可能是决定性的。美国加入了英法与土耳其建议成立的中东司令部，其努力的重点是将希腊、土耳其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一系列美国控制下的战略空中基地。华盛顿甚至考虑将利比亚拉入北约，理由是通过多边安置很容易地达到防御的需要。然而，由于该想法不切实际而被迅速抛弃[6]。

98

联合国的决定

后来事实证明，利比亚问题从外交部长委员会移交给联合国大会对利比亚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联合国大会没有一票否决的特权，58个成员国在平等基础上对重大问题投票表决，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生效。联合国对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能不容易被国际环境的变化所影响，但在这种场景中，利比亚问题可能面对各国基于不同利益提出的不同要求。除了小组会议讨论为例外情况外，全体同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所有问题都是公开讨论。将利比亚问题移交联合国执行，使参与各方都有一个较大的、能够有机会申辩自己情况的讲坛[7]。

美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首先强调应该将公民利益作为决定利比亚未来至高无上的因素，其次应该考虑的因素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局势。按照美国的意思，利比亚公民似乎已经发展到自治与独立的地步，然而也不应该忽视该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密关系。而埃及代表团则认为利比亚已经做好立即独立的准备。其他国家代表团质疑利比亚是否为走出如此决定性的一步做好准备。当长期讨论没有产生具体后果时，一个小委员会成立了，它们经过研究、讨论，并提出了一个与利比亚民众意愿相反的观点。

美国直到1949年才同意联合国对利比亚的托管地位，其主要原因是担心这一措施将威胁华盛顿使用惠勒斯空军基地的计划。在联合国委任统治制度下，托管国家的管理者不可能允许美国在利比亚拥有军事基地，除了战略托管制度的特殊情况，如美国托管前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领土。然而战略托管制度将会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是其成员国苏联的否决。不论对利比亚实施任何形式的联合国托管制度，美国都不可能在捍卫和安排利比亚这块自由世界中起到重要作用[8]。

99

联合国小组委员会成立后，英国与意大利外交部长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就是著名的《贝文—斯福礼计划》(Bevin-Sforza Plan)。该计划建议英国托管昔兰尼加，意大利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托管费赞，10年期限结束后，利比亚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认可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该建议尽管承认利比亚渴望独立的雄心，但是也捍卫了，至少是临时捍卫了美英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法国、英国与美国都支持《贝文—斯福礼计划》，但遭到阿拉伯国家、亚洲其他国家以及苏联集团的反对，理由是它忽视了利比亚民众实现国家独立的渴望。《利比亚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这一宣言宣布不到6周，美国代表团就表示支持《贝文—斯福礼计划》，并为之辩护，理由是为利比亚独立与统一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事实上，美国支持该计划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而不是对利比亚民众利益的认同。《贝文—斯福礼计划》引起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利比亚其他地区民众的强烈抗议。1949年5月，该计划被联合国大会否决，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托管建议遭否决，关于利比亚独立的协议似乎成为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美英代表团宣布赞同利比亚独立，但他们认为利比亚仍然比较落后，建议应该有三到五年的预备期，为独立做好基础准备工作。苏联拥护殖民地的解放事业，要求立即独立，外国军队撤出利比亚，清除外国军事基地。阿拉伯与亚洲国家代表，以及意大利，都站在苏联一边主张利比亚立刻独立。1949年11月21日，经过激烈讨论，联合国大会最后以少数国家投否决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同意利比亚在不迟于1952年1月1日前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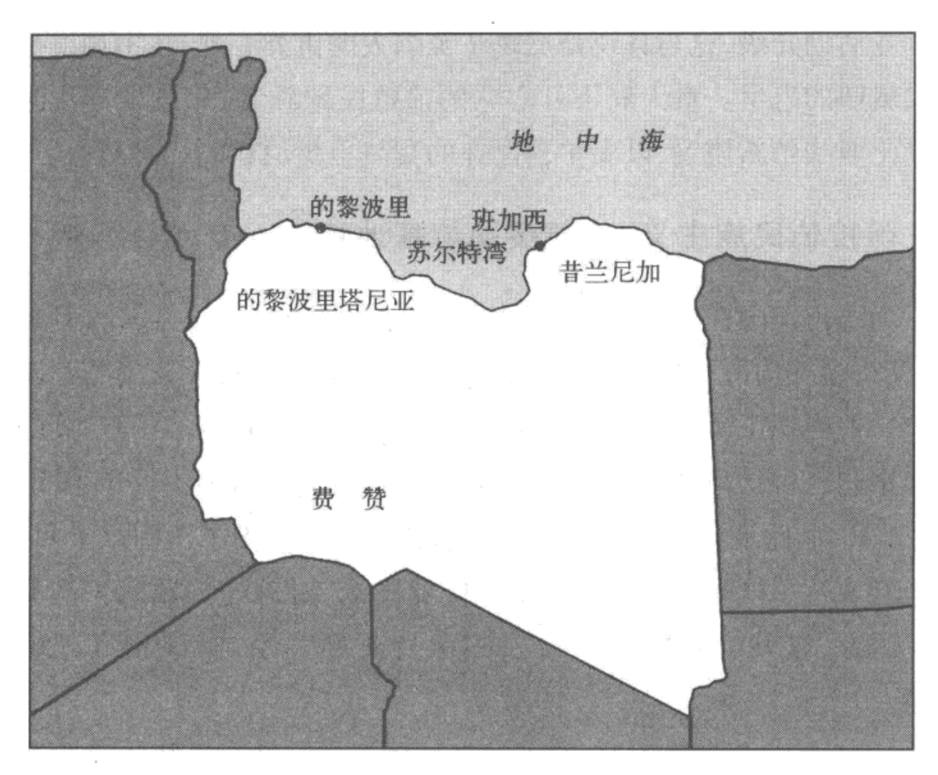
100

1949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任命联合国副秘书长艾德里安·皮特为联合国处理利比亚事务特派专员,其任务就是帮助利比亚民众草拟《宪法》,建立独立国家。大会同意成立10人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埃及、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英国与美国,以及被艾德里安·皮特任命的4个利比亚领导人,其任务是帮助特派专员完成其使命。10人委员会成员中的埃及与巴基斯坦成员后来对行政与《宪法》问题表达了不同意见。埃及代表团坚持利比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而美国代表团则认为联邦制是利比亚政府的最佳选择,最后听从了美国代表团的意见。

1950年7月,联合国专员皮特邀请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各出7个人,由21个利比亚政治精英组成预备委员会,讨论临时国民大会的选择与组成方式。随后成立的所谓21人委员会作出决定:国民大会成员应该来自三个省,各省派出20名成员,由省长指派。由于利比亚三分之二人口居住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黎波里塔尼亚代表要求按照人口比例组成一个真正民主的委员会,但没有得到支持。由于昔兰尼加与费赞赞同成立一个联邦制政府,因此委员会的第一个决定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利比亚国家的未来形式。按照委员会成立后通过的决议,1950年12月2日,利比亚成为一个接受昔兰尼加赛义德·伊德里斯国王统治的君主制联邦国家。

101

1951年10月7日,利比亚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共213条款。《宪法》宣布利比亚联合王国是一个世袭的君主制政权,并规定了联邦政府的构成方式。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塔尼亚为省,而不是国家,并强调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议会由参议院与代表议院组成,前者有24名成员,每省出8名代表。代表议院成员以二万分之一的比例从利比亚全体成年男性国民中选出。伊斯兰教为利比亚国教。由于难以确定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哪一个为国家首都,后来认定二者均为首都。这种安排的弊端随后表现得很明显:即办事不方便、行政费用昂贵,以及效率低下。随后,利比亚政府又改为班加西与的黎波里轮流担任首都职能,一开始是一年轮换一次,后来改为两年一换。



地图 6　独立的利比亚

102

令大多数观察家感到惊奇的是,苏联在 1949 年后一直远离利比亚问题。苏联一直满怀热情地参与外交部长委员会的讨论等事务,然而利比亚问题提交联合国后,苏联的兴趣消退了,莫斯科关心的是在北非建立军事基地的核心议题。如果苏联还像 1949 至 1951 年那样参与,联合国特派团完成任务会有一些困难。例如,苏联支持阿盟与埃及代表的要求,即统一的利比亚应该让的黎波里塔尼亚主导,这些观点很可能影响昔兰尼加与费赞民众的态度,为成立统一国家造成障碍。

另一方面,西方政府继续将利比亚看做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与全球战略联系起来。英国继续巩固与昔兰尼加的外交与政治关系,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而努力。法国担心利比亚独立可能鼓励北非其他地区的类似运动,导致该地区的动荡与不安。出于这一战略目标考量,法国希望保持并加强在费赞地区的地位,放慢阿拉伯民族主义向西蔓延的步伐。美国即使支持利比亚实现独立,但也在独立以前抓紧时机巩固在惠勒斯军事基地的战略地位。美国外交官担心共产主义在

利比亚活动升级，这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人的仇外心理，还不如说是对现实威胁的恐惧。意大利不甘心它的前殖民地独立，焦急地等待时机与利比亚缔结新协议，以保护自己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经济利益。

阿拉伯民族主义、外部援助与基地特权

103

为防止美国在利比亚的意图被曲解，1950 年 5 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向的黎波里驻美国领事馆的电报中总结了美国的利比亚政策。他强调了美国在利比亚的两个核心目标：第一，美国与英国联合起来想获得该地区军事基地的特权。第二，美国希望不迟于 1952 年 1 月 1 日，利比亚成立一个具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为了达到以上目标，艾奇逊表达了以下愿望：希望与利比亚民众、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保持友好关系，实现相互理解与尊重。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美国越来越意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股潜在的力量威胁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阿拉伯民族主义尽管被政治投机分子与阿盟所利用，但在北非地区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意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是该地区未来的主要力量。再者，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反法倾向，而美国与法国的政策具有相似性，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经常反对美国。加之美国并不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实现其目标，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利比亚与北非其他地区所长期塑造的友善形象迅速消失了。

由于对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美国经常不恰当地认为这些人从事的政治活动是共产主义向中东地区的渗透。在接下来的 20 年间，华盛顿对利比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是既嫉妒，又愤恨，担心这些运动会鼓励并方便共产主义的传播。由于没有先见之明，美国的这些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美国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特别是支持不受北非国家欢迎的法国的政策，实际上，为其一直希望遏制的共产主义力量进入北非打开了方便之门。

104 正如1950年5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概括的，美国政府的核心目标导致其在10年前就采取了三个重要的、相互联系的决定：第一，华盛顿承认，要在本地区实现战略地位的最优化，必须与英国的政策协调一致。第二，很明显，利比亚要想维持其独立地位必须赢得美国的持续支持。第三，美国决策者也意识到，在利比亚独立以前协商军事基地协议是明智的事情，因为独立既可以增强利比亚政府的谈判地位，也可以鼓励政府反对派的勇气。

美国虽然想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但不愿意付出，即不以经济援助换取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事实证明，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美国人深深意识到，利比亚仅有的财富就是其战略地位，美国不得不对利比亚经济作出一些贡献，以换取基地使用权。美国一些官员坚决主张使用基地不应该与财政援助联系起来，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新生国家敲诈美国，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导致援助水平发生波动的情势下，它还是双方产生摩擦的根源。

华盛顿的政策一直想与伦敦的政策协调一致，但这种做法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战后初期，英美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协调体系一直运行良好。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决策者开始质疑英国在该地区投入的长期战略资源与能力。据证实，1950年12月，美国国务院部分官员举行了讨论中东政策的高层秘密会议。会议针对英国既缺乏人力，也缺乏资源来捍卫该地区的利益，也没有保护沙特阿拉伯油田与宰赫兰军事基地的计划，认为，美国依赖英国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是异想天开，因为后者的力量太过弱小，没有保护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稳妥基础。

105 1951年年中，法国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使用摩洛哥的5个空军基地。与此同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协议也有了结果，美国使用宰赫兰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又延长了5年。美国在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与罗得岛的基地也处于建设之中。1951年12月，美国证实已经从利比亚政府那里获得惠勒斯军事基地以及其设施的使用权。这件事在利比亚正式独立以前已经发布正式声明。与利比亚的协议条款包括美国

向利比亚每年支付100万美元，共20年。此外，美国还向利比亚支付公正合理的土地使用费。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布独立，首先得到美国的承认，美国派驻利比亚的领事馆也升格为公使馆。

利益冲突

处理意大利战后殖民地问题经历了既漫长又激烈的过程，在利比亚问题上更是如此。在大国作出各种决定的过程中，许多目标与利益一直处于危机博弈之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利比亚军事与战略地位的考量。美国与英国计划将利比亚作为一个西方国家在北非地区的军事基地，尽量不让利比亚滑入苏联的轨道。法国政府担心有关利比亚的任何决定都会在阿尔及利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引发殖民地社会秩序的动荡。苏联则渴望进入地中海。其他要考虑的事情是，英国鉴于意大利的威信，坚决不让意大利再次统治赛努西亚；阿拉伯人关心利比亚境内穆斯林人口的未来地位问题。当然，随着有关各方对话的深入，利益考量的重点也有所变化。利比亚民众更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这一长串与利益、目标相关的影响因素，绝不是处理利比亚问题所衍生出的正负面问题。

106

《贝文—斯福礼计划》要求英国管理昔兰尼加，意大利统治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治理费赞，期限是10年。该计划遭到否决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利比亚问题的态度出现了转折。1949年9月，在各种托管建议行不通的情况下，有关各方都情愿或不情愿地先后宣布支持利比亚独立的构想。1949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与会各方发现赛义德·伊德里斯已经声称昔兰尼加独立，这一说法在1949年6月的国民大会上曾经提出过。英国首席行政官员立即作出回应，承认埃米尔是昔兰尼加政府首脑，并同意昔兰尼加自治的愿望。赛义德·伊德里斯知道的黎波里塔尼亚可能会认为这种单方面决定是一种威胁，指示昔兰尼加国民大会发电报，确信自己正在致力于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统一大业。的黎波里塔尼亚国民议会迅速作出回应，派遣代表团到昔兰尼加向埃米尔致以贺意，要求支持两姊妹省份的统一。1950年，法

国政府随之效仿,在费赞地区成立过渡政府,选举代表议会。

对于美国来说,意大利的殖民地问题从来都是无足轻重,但是由于苏联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浓厚兴趣,使得利比亚的安置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战后初期,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潜在战略地位被过分夸大,四大强国冲突性的政策取向成为利比亚获取独立与统一的最强大支持。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调整立场,极力保证该地区的安全以及自己的利益。美国的短期利益是租用的黎波里附近的惠勒斯军事基地,作为美国联系欧洲占领军的供应链。长期利益是维护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优势。华盛顿认为,惠勒斯军事基地是美国从利比亚到沙特阿拉伯弧形战略基地的必要组成部分。

美国一直将这些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其在利比亚政策的基本目标都以一纸协议的形式得以实现,从而服务并支持美国的核心利益。尽管美国理解利比亚民众的感情与独立意愿,但这种做法近乎放弃了1941 年 8 月《大西洋宪章》所呼吁的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

107

利比亚各政治团体反对意大利托管,支持利比亚独立,但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亚与费赞地区对独立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三个地区民众都将利益核心集中在地方和省级层面。大多数利比亚民众的认同核心仍然是家族、部族或者宗教,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是广大伊斯兰共同体。如果说在奥斯曼帝国第一次统治时期以及意大利殖民治理时期,利比亚人的这种感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些省份作为认同核心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民族主义者支持利比亚统一的意识形态激情,难以成为利比亚独立后推进社会、经济与政治目标的精神资源。此外,以色列建国后,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被阿拉伯民族主义新生力量所吸引,后者在未来的 10 年中日益发展壮大,在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0 年 10 月,一名记者安·迪尔登感受到了各种意识形态对利比亚造成的分裂性影响:

> 利比亚人被两个帝国主义撕裂了——西方帝国主义提供物资援助换取军事基地;中东的阿拉伯人提供伊斯兰孤立主义这种情

> 感上的满足，其代价是利比亚成为支持埃及扩张主义的工具。毫无疑问，在 1950 年，东方的思想压过了西方的物质。[9]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对君主制治理下利比亚独立的一种令人畏惧的挑战力量。

一旦利比亚问题提交到联合国，这就要求最迟至 1952 年 1 月，利比亚成为一个具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但随后的转型期并不一帆风顺。最终，利比亚成立了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并于 1950 年 11 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国民大会授权成立一个联邦制的政府，君主为政府首脑，任命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赛努西为利比亚国王。宪法委员会由制宪国民大会组成，然后草拟宪法。1951 年 10 月，宪法得以正式通过。1951 年 12 月 24 日，伊德里斯一世宣布利比亚联合王国是一个具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利比亚成为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第一个非洲国家，也是由联合国大会支持成立的唯一国家。

108



第五章　利比亚联合王国（1951－1969）

刚刚独立的利比亚存在着低层次的国家意识或者国家认同。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Ronald Bruce St John)：《卡扎菲的世界布局》(*Quddafi's World Design*, 1987)

简而言之，对于构成民族主义者一代的思想家与活动家来说，如果不在统一的、具有主权的阿拉伯国家里努力召集一批幼稚的人，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是一个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概念。

阿迪德·达维萨(Adeed Dawisha)：《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 2003)

我们不能担负起失去利比亚的代价。

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57年

我能够看到君主制开始衰败。腐化堕落现象极为普遍，严重到破坏20世纪60年代利比亚宪政统治的支柱，腐蚀了

公务人员的正直诚实品格。

穆斯塔法·艾哈迈德·本·哈利姆(Mustafa Ahmed Ben-Halim):《利比亚》(*Libya*, 1998)

利比亚联合王国是在各种复杂力量的利益博弈与内外压力的驱动下,通过签订协议、讨价还价以及折中妥协等方式的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但让大多数观察家惊奇的是,利比亚联合王国竟然持续了18年。从1951到1969年,11位首相,40多届内阁粉墨登场,出乎预料地抵抗与应付了王国面对的内外困局。在此期间,利比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给地中海中部局势带来了持续的动荡不安。

110

社会经济遗产

刚刚独立时,利比亚经济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全国约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由于降雨量少、土壤贫瘠、破坏力极强的沙漠风、较原始的耕作方法以及偶尔的蝗灾,致使农业的回报率很低。农业部门的不景气引发了利比亚国内对农业欠发展或者是过度发展的讨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是过度发展,因为这种气候下长期遭侵蚀风化后的贫瘠土地被过度使用,现在不可能出现农业奇迹。[1]工业部门的潜力与发展前景甚至比农业部门更渺茫。利比亚缺乏原材料、资本、训练有素的高技能劳动力,以及工业成功发展所必需的一系列因素,如电力等能源资源。在利比亚独立初期,国家经济收入主要依赖出口蓖麻籽、细茎针草(造纸原料),在二战战场垃圾中寻找废金属,以及友好国家以及国际机构提供的外援。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利比亚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引发了额外的问题。1942年,意大利银行关闭了在利比亚的所有分行,直到1951年才重新开放。在英国军事当局管理期间,英国巴克莱银行是利比亚唯一的营业银行,但其功能有限,主要发挥军事行政当局中央银行的作用。由于其他银行被关闭,贷款与存款业务被取消,商业系统陷入瘫痪状态。再者,二战时期,利比亚境内被埋了大量的地雷,估计多达1 200

万枚。这些地雷在战后的一段时期不仅限制了农业发展，而且污染空气和土地，甚至妨碍交通运输。在英国统治期间，利比亚进口量多于出口量，贸易逆差一直在继续，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利比亚独立时没有国债，其原因是独立前几年美、英、法的慷慨施舍，弥补了贸易逆差。

111

利比亚的劳动力资源在质量与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人口不到100万，出生率较高，估计每年达到4%。但由于条件简陋，医疗服务落后，死亡率较高，人口增长率不到1%。利比亚独立时90%的人口是文盲，主要原因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以及职业培训机构的缺失，人口素质亟待提高。意大利占领利比亚期间，教育机构主要接受意大利儿童。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学校被关闭。英国军事当局后来开办了81所小学，招收了大约3万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学生来自的黎波里。与此同时，英国相继开办了三所中学、两所师资培训中心，以及一所为政府培训雇员的机构。然而，联合国在1950年估计，实际接受教育的学生不到学龄期人数的20%。[2]

政权的宫廷制度

1951年，利比亚联合王国通过宪法，成立以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赛努西及其男性亲属为基础的世袭君主制国家。伊德里斯家族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是北非地区显赫的家族。但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宪政君主制规范下成立的利比亚政府太弱小，太贫穷，其国内外政策取向与选择显得缺乏对外交往经验。其结果是，伊德里斯政权大多数时间都在平衡西方国家的利益，后者支持利比亚经济发展，压制日益增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声。

112

1952年，议会选举在利比亚独立时代以一种不祥的预兆拉开了序幕。尽管议会选举的细节还不清楚，但选举很可能被政府操纵，以保证击败主张放弃联邦制，赞成集权制国家的国民议会党(National Congress Party)。这种权力主体的变换可能使权力核心从昔兰尼加转移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前者是赛努西教团的基地，有支持伊德里斯国王

的利益集团，可能限制了他对政治共同体的感知；后者三分之二人口则更具有城市背景。不管确切与否，国民议会党坚持认为选举存在欺诈行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发生暴乱。随着社会秩序的动荡，暴乱迅速向起义演化，许多国民议会党的领导人被政府逮捕，党魁被驱逐出境[3]。1952 年，利比亚选举危机被政府弹压下去。但最不幸的后果是这一行为破坏了君主制政府的合法性，政府反对派就像民主议会制度一样浮现出来。这一事件的更深入、持久影响就是，自从 1952 年到现在，利比亚从来没有举行过多党选举活动。

随着国民议会党被解散，利比亚国内的所有政党或被禁止，或公开声称为反对党，要求政府下台。此后，利比亚政治大体上成为家族、部落与宗教力量角逐的舞台，族属与派系构成的关系网成为政治博弈有组织的结构单元。君主制政权委任官员不依赖于意识形态忠诚，或者治国能力的大小授予职位，而是将权力委托给有权势的地方家族，通过政治联姻巩固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由于部落元素构成政治领导地位的核心层面，许多利比亚人确切地得出结论：即一小撮家族控制并决定利比亚联合王国的命运。历史学家约翰·怀特准确地捕捉了利比亚发展中的专制制度本质：

113

> 在当时，利比亚民众整体来说还没有理由信任独立后的新政府，也没有机会来理解他们的政策。尽管利比亚独立是在联合国悉心安排下，通过一个令人满意的、安定的宪政协议完成的，但利比亚王国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一个由一群家族、部落与商业利益集团进行温和专制管理的寡头政治。[4]

由于地方贵族与部落领导人对中央政府贡献较少，在利比亚民众看来，他们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家族地位、财富以及宗教虔诚的象征意义。考虑到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利比亚行政单元的边界事实上就是部落范围的界限。这种治理体系免于受到来自基层部落的挑战，由于民众的无知，以及被动消极、遵纪守法、听从天命的宿命论思想的渗透，

他们难以对传统的惯例与制度提出质疑。有限的政治参与水平仅停留在地方层面上,妨碍了中央政府对那些大量且急需的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顺利完成。

在王室高层,伊德里斯国王统治利比亚的方式被称为"政权的宫廷制度"[5]。该制度的依赖基础既有宗教力量又有世俗力量。作为赛努西运动的首领,赛义德·伊德里斯对宗教合法性具有强烈的诉求。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的地位与摩洛哥阿拉维君主,约旦哈希姆国王有相似之处。他的世俗力量主要依赖于部落的支持,后者的命运与君主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权威的运行主要由地方贵族与部落领导人发挥作用,他们成为国家首脑与部落派系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

在昔兰尼加,赛努西统治集团通过控制下的宗教学校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国王因其魅力个性而受到普遍尊重,民族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都把接受君主制作为独立的必要条件。在费赞地区,地方部落并不是赛努西教团的成员,但这些人同意费赞作为地方机构忠诚于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部落也是如此。在整个利比亚,老一代人对伊德里斯国王的忠诚度明显强于年轻一代,这在未来的10年日益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114

从理论上来说,君主立宪政体的国王作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首脑"与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他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一切责任享有豁免权",有权颁布法令,任命与撤销所有的高级官员,与议会一起行使立法权,组建由国王提名任命官员的政府体系。总理的挑选必须充分考虑地区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内阁成员的任命也要反映部落力量平衡。从理论与实践上来说,国王是国家事务最高级的裁决者,没有人或者政府可以挑战他的权威。

然而,这种专制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国王专权的现象很不明显。伊德里斯国王很少对国家重大决策发表声明,也不对国家事务作公开的评论。他宁可居住在班加西与的黎波里的城外,对政治压力与阴谋诡计持超然的态度。他一般不参与政治冲突,有效地采用宫廷权力制度与官职任免制度将权力集中在其个顾问,也就是所谓的王室迪万的

手中，自己从来不亲自参与政治决策。

1951 年，为保证国家统一，利比亚联合王国在讨价还价与妥协的基础上成立了联邦制国家，等于暂时掩盖了矛盾而不是解决了问题。随着联邦制的缺陷日益明显，1962 至 1963 年，利比亚放弃联邦制，建立集权制国家。1962 年 12 月，省级行政官员附属于联邦政府。1963 年 4 月，联邦政府的省级行政职位遭废除，权力统一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在地方层面，10 个行政区划替换了原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 3 个省份。为了反映向集权制国家的转变，利比亚联合王国被重新命名为“利比亚王国”。

115

在此前的 12 年里，统治利比亚有 4 个政府，包括两个国家和 3 个省首府。这里有 15 位联邦部长，平均每个省份有 8 名，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省雇用的公务员人数比联邦政府的还多，联邦政府与省政府，3 个省政府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各方政策经常发生冲突，政府机构经常重复设置。

利比亚向集权制国家的转换似乎标志着国家治理绩效的巨大改观，臃肿的官僚系统得以简化，从而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削减了行政费用。虽然这些措施不可能彻底消除政府存在的全部问题，但至少减少了行政官僚机构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集权制度创造了中央集权国家必要的国家机器，增加了国王与王室迪万的权力。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1963 年后，一小撮人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继续对所有事情作出重要的决定，政府公务员的挑选与提拔大都依赖于这些人的出身背景，以及与王室的联系。

联盟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就是产生了阿拉伯与中东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它们为在北非与中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下，是中东体系的设计者。中东体系认为，北非地区从地理条件来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显得很脆弱，希望阿拉伯国家与美国联合起来，保证该地区的安全。而阿拉伯体系认为，北非地区不是

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地缘扩张区,而是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区,安全因素是应该考虑的重点。这与西方的观点截然不同。从这一视角出发,北非与中东的国家应该利用统一的历史、文化、语言与宗教,构建自己的体系,对抗外部的威胁。阿拉伯体系认为,其主要威胁不是苏联,而是以色列。 116

伊德里斯国王采取与中东体系适应并合作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引起争议,限制了他参与阿拉伯体系的主动性。在独立后的前10年,利比亚君主制政权大体与西方保持一致,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传统、最保守的国家。利比亚考虑到自身自然资源缺乏,其经济严重依赖外部援助,以及美英军事基地所产生的收入,这决定了它的外交取向。

1953年7月29日,英国与利比亚签署了长达20年的《友好联盟协定》,前者享有治外法权与司法审判管辖权,但需为利比亚提供财政援助和军事训练。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9月9日,美国与利比亚签署《友好与相互支持协定》,有效期至1970年12月24日。按照该《协定》规定,美国可以租借的黎波里城外的惠勒斯军事基地,条件是给予利比亚经济、技术与军事援助。亨利·塞拉诺·维拉德是利比亚独立时美国驻利比亚的部长级官员,是美国高级外交官,后来他强调了惠勒斯军事基地自始至终在美国—利比亚关系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 从我们第一眼看到惠勒斯基地,到最后离开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对外国领土上这块面积很小的基地下了巨大的赌注。惠勒斯军事基地成为美国驻利比亚公使馆全体人员一直提心吊胆,也是与利比亚政府讨价还价的最重要话题。[6]

到1959年末,美国已经向利比亚提供了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成为世界上人均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

117 基地协议签署以后,接下来的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与美国在利比亚的地位似乎充满矛盾与荒谬。利比亚君主制政权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想通过该学说构建反共产主义联盟。然而,利比亚官方

对华盛顿的欢迎程度却没有对伦敦的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赛努西教团与英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利比亚与阿拉伯世界的公众并不对美国充满敌意,却对英国成见颇深。美国在之后 10 年里没有充分利用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利比亚享有的特权地位。

法国政府想与英美一样,与利比亚政府协商签署类似的基地协议,但是利比亚邻国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情迅速挫败了其想法。1954 年末,利比亚总理穆斯塔法·艾哈迈德·本·哈利姆(Mustafa Ahmed Ben Halim)允许埃及通过利比亚向独立战争刚刚开始的阿尔及利亚提供船只。与此同时,利比亚议会也向法国政府施压,要求法国撤离其驻塞卜哈(Sebha)南部、加特(Ghat)与古达米斯地区的约 400 名士兵。这些军队对于法国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设防地点可以有效截获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进行援助的人员与物质。利比亚政府对法国在费赞南部的作用也非常警觉,利比亚时任首相哈利姆在其《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并提出双方谈判的基础是法国撤军:

> 法国的解密档案表明,法国实际上既想吞并整个费赞地区,也想占有加特与古达米斯的绿洲。这是法国政策的最突出特点:即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态度。这就是我(哈利姆)为什么认为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将法国军队赶出费赞,没有割让利比亚一寸土地。[7]

1955 年 8 月,《法国—利比亚协议》正式签署,《协议》规定法国军队最迟在 1956 年末从费赞地区撤军;作为回报,利比亚向法国提供空军与地面部队的中转便利;利比亚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边界作出稍微修改,法国向利比亚许诺大约 100 万美元的发展援助资金。双方在其他方面的也存在争议,包括利比亚偶尔对阿尔及利亚的流放人员表现出同情,法国在撒哈拉沙漠进行核试验。1957 年,法属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发生边境战争。第二年故伎重演。1958 年,法国—利比亚委员会成立,其任务是调查将来发生的违约事件。直到 1962 年阿尔及利亚赢得独立后,利比亚与法国关系才逐渐改善。

118

1956 年 10 月,意大利与利比亚签署双边协定,确认意大利将公共财产移交给利比亚。此外意大利向利比亚提供 770 万美元援助,条件是意大利在利比亚有商业贸易权利。此外,该协定还要求意大利花费约 370 万美元,在 1960 年前完成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建设计划。该交易的后果是,意大利殖民者不管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这块土地,都完全可以成为这里的主人。他们可以自由地将土地卖给利比亚人,转换成资本。到 1961 年 10 月末,定居工程中三分之二的意大利人已经将土地卖给利比亚人。到 1964 年,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仅存 120 户意大利殖民者家庭。

与英国、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君主制统治时期,利比亚与苏联几乎没有商业交往与外交沟通的机会。从 1951 年独立以来,苏联一直不同意利比亚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两国在 1955 年才建立外交关系,这也为利比亚被接受为联合国成员国铺平了道路。一同加入联合国的还有另外 15 个国家。保守的利比亚人一直对苏联大使馆心怀不满,哈利姆首相对新任苏联大使表明自己的立场:这里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者。尽管当时利比亚经济有困难,但拒绝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1958 年,据传苏联许诺将为利比亚提供 2 800 万美元的援助,但没有兑现。与此巧合的是,美国当时向利比亚提供了相当于苏联两倍的援助。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援助增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或者看到了利比亚充满希望的石油开发前景。但更准确的原因是,美国为了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巩固中东地区的亲西方政权。

119

随着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利比亚对美英基地获取收入的依赖逐渐减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利比亚依赖西方的批评之声日益增多,苏联与利比亚的交往在未来 10 年里逐渐频繁起来。苏联开始派代表参与的黎波里的年度商品贸易会。1963 年,两国签署双边贸易协议。1961 年、1968 年,利比亚议会代表团两次访问苏联。1966 年,苏联高级代表团访问利比亚。

依赖西方

独立之初的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享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光,不久,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利比亚逐渐卷入阿拉伯世界日益高涨的“政治化”运动之中。诸如利比亚邻国的反殖民斗争、巴勒斯坦冲突等事件，使苏联重新对中东地区恢复兴趣。该地区日益加剧的纳赛尔主义、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反君主制运动，对利比亚保守的、传统的君主制政权极为不利。利比亚联合王国的财政依靠英美国家租借其军事基地的收入，构建了一种受西方支持的政策，消耗了其有限的反殖民主义形象标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利比亚独立时所依赖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力量开始从内外两个层面挑战君主制政权的合法性，前者是国内的反政府组织，而后者则是泛阿拉伯运动。在此过程中，外国人租用基地及援助问题不断地暴露君主制政权外交政策的一贯弱点，即决策受他人左右的脆弱性。

尽管伊德里斯国王财政上依赖西方，但从来就不是许多观察家所认为的那种亲西方人士。然而，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与西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的基础，不是屈服于西方的思想、传统与政策，而是认为西方国家的存在是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最佳选择。君主制政权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局势，尽可能地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与政体结构对利比亚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强调在地区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不结盟立场，如不参与非洲统一组织，不加入联合国。

利比亚官方支持非洲统一大业。利比亚代表团参加了 1961 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和 1963 年的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自称是非洲的中立主义者。利比亚与非洲邻国一起口头谴责并抵制南非白人政权，但在实践中支持非洲团结的力量并不大。利比亚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商业与外交联系也很有限。利比亚刚开始并不积极支持马格里布统一，但 20 世纪 60 年代有了支持的动力。利比亚认为马格里布统一可能成为遏制马什里克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并派一观察员参加 1958 年阿拉伯马格里布统一会议，随后断言马格里布地区能够统一。君主制政权后来重申了支持非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立场。1967 年，的黎波里成立长期协商委员会，草拟地区经济发展计划。

利比亚君主制政权附属于西方的表现为，严重依赖英美军事基地

的财政收入与政治援助。很明显,君主制政权与西方亲密关系是对军事基地收入的倚重,一旦石油出口使利比亚财政收入增加,不再依赖基地收入,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就会逐渐疏远。1964 年,班加西发生暴力抗议事件后,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当阿拉伯军队与以色列发生战争时,英美保证不使用利比亚军事基地打击阿拉伯国家。利比亚也要求英美重新考虑这些基地的前途与地位。美国作出回应,原则上接受了从惠勒斯基地撤退的要求。英国的反应更为激烈,1966 年就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撤出了大部分军队,1970 年 3 月从昔兰尼加地区撤出了所有的军队。

12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石油开发将利比亚从依赖西方的尴尬中解放出来,但其又陷入另一个困境。为了开发这些新发现的自然资源,利比亚需要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以保证西方石油公司能够提供必要的技术人员与开采技术。石油公司下游产业的重要性早在 1957 年就显现出来,当时外国石油公司对利比亚的投资为 4 340 万美元,而 1957 至 1958 年外国援助资金仅 3 832 万美元。简而言之,石油使公众的兴趣集中在利比亚如何从西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时二者关系并没有中断。然而,由于君主制政权不信任苏联及其盟友,而为了开发自然资源就必须从西方国家获取财政与技术援助,这使利比亚与西方走得更近。

石油的影响

利比亚的石油勘探始于 1955 年,但商业上的可行性油田勘探是在 1959 年。当时美国勘探者断言,昔兰尼加地区的阿马勒(Amal)和载腾(Zeiten)两个地区有石油。随后几十年,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与收入快速增长。但对产油国来说,当时石油价格较低,也没有修改税收收入的依据。利比亚与大多数产油国一样,认为石油价格过低且不公正。当时利比亚继续接受以体积为取向,反对以价格为取向的政策。利比亚这样做是担心与石油公司在标价上对抗可能减慢石油工业发展的动力。

122

1967 年的“六月战争”关闭了苏伊士运河，这一做法的智慧日益受到挑战。作为回应，西方石油公司迅速扩大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使其成为中东地区石油输出量最大的国家。利比亚的石油运送到欧洲，可以不经海湾绕过好望角，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运输费用。尽管当时利比亚石油储量远低于沙特阿拉伯，但到 1969 年，利比亚的石油日产量已经与沙特阿拉伯旗鼓相当。

1955 年，利比亚颁布了《石油法案》，鼓励国际石油公司参与利比亚石油工业的开发。《石油法案》的创新特征就是将特许权授予那些迫切需要参与利比亚石油开发的公司。对单个产油国来说，这一政策更具灵活性与变通性。利比亚因为靠近欧洲市场，到 1968 年，利比亚将 137 个特许权授予 39 个欧洲公司。此时，利比亚石油日产量已经达 260 万桶。

1962 年，利比亚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刚成立了两年的欧佩克其职责是协调、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利比亚只是选择性地执行欧佩克政策，拒绝那些有碍利比亚与西方石油公司关系的条款。利比亚特别支持以下规定：即原则上提高产油国的石油提炼能力，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在石油工业运转中采取统一协调政策，协调石油储量的保护、生产与开发的关系。

从 1962 年至 1967 年的 5 年里，利比亚政府的石油出口收入从 4 000万美元增加到 6.25 亿美元，增长近 15 倍。在其第一艘油船驶出的 8 年后，利比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原油输出国，这一增长比例在世界工业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此过程中，利比亚经济从停滞到爆发式增长；从资本赤字国变成资本盈余国；从援助接受国变成援助输出国。由于利比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在特定条件下显得非比寻常。

123

石油收入的增长不仅使利比亚政府财政充盈，而且唤醒了利比亚民众，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伊德里斯政权的保守性上。这些变化的深度与广度体现在利比亚人均收入从 1951 年的 35 美元增加到 1967 年的 1 000 美元。但人均收入可能是误导，实际上财富从来就没

有按人头平均分配。到 1967 年,利比亚大多数人仍在为生存而奋斗。也就是说,20 世纪 60 年代民众对革命的期望在增长,因为他们希望新发现的石油财富会大范围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

伴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经济条件的改善,社会流动性加大,民众的要求增多。特别是年轻人,尽管对新的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仍含糊不清,但具有政治与精神上的渴求。君主制政权尝试对这些需要作出回应,但不能够理解以及适应他们,如,难以满足利比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要求。面对革命期望的日益增长,君主制政权与北非邻国签署了一些较务实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协议,但难以满足纳赛尔总统呼吁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浪漫魅力。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利比亚人口增加,特别是年轻人增多,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城市民众的诉求更为强烈。他们甚至认为,伊德里斯国王的内外政策具有宗教的狭隘视野,即使不堕落腐败,也应该被换掉。

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也给有关机构与个人利用石油收入谋取提升与致富提供了机会。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有影响的部落领导人,特别是昔兰尼加地区势力强大的家族、王室迪万成员与赛努西家族成员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与行政官僚机构。他们利用职权大肆行贿受贿,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利比亚精英所构建与维持的政治体系,将庞大的民众群体的作用弱化为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他们受挫感逐渐增加,被疏离于政治系统之外。　124

社会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现实问题让民众感到痛苦与愤懑,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利比亚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如哈利法·塔卡巴里(Khalifa Takbali)、阿卜杜拉·埃勒格威利(Abdullah Algwiri)与卡麦勒·马赫格尔(Kamel el-Mahgor)笔下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的疏离感、焦虑情绪以及反叛个性的典型特点。哈利法·塔卡巴里的小说《尊严》(*Dignity*),描写了一个利比亚工人公然反抗 3 个美国石油工人,抗议他们提出的侮辱性要求。阿卜杜拉·埃勒格威利的小说《石油与年代》(*The Oil and the Date*),以讲述者的身份叙述了如下故事:主人公在庄稼收获季节竟找不到帮工的农民,因为昔日的农场帮手现在都到城

里寻找较好的工作。故事的结尾是,主人公的哥哥决定卖掉他所属的农场份额,加入城市化的潮流。卡麦勒·马赫格尔的小说《哭喊》(*Crying*),叙述了一个男孩因学校附近地区以及家乡的住所被强制拆迁而哭喊。20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1967年"六月战争"中阿拉伯人被击败前夕,利比亚作家艾哈迈德·法格赫(Ahmed Fagih)的文学作品弥散着不满与悲观情绪:

> 利比亚发现石油所伴随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带来的痛苦的后果,产生诸多负面现象。以上这些,作者不可能视而不见。面对新生的现代化、文化同化,应该利用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唤醒民众抵制西方商业与消费社会价值观的入侵。
>
> 民众中日益流行着以下观点,即认为新财富应该是所有民众的共同财富。但现在这些财富却被权势集团所控制,他们与民众的渴望与抱负格格不入。……利比亚工人遭受着石油公司的残酷剥削,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基地仍像往常一样忙碌。所有这些造成的痛苦情愫在60年代的利比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8]。

125

国家认同

利比亚独立时民众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的水平较低。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倾向大都处于潜伏状态,而赛努西教团的角色也主要是宗教意义上的。赛努西教团武装抵抗意大利的统治,将自己改造成一种政治运动,但是意大利与利比亚之间的斗争,并没有促进民众的国家统一意识与感知[9],从而在酝酿独立的利比亚存在着如下争论:构建一个统一的利比亚,或者将这一领土分割成两到三个政治实体,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政权。

尽管昔兰尼加、费赞与的黎波里塔尼亚统一到一个独立的利比亚联合王国的实体之下,但是它难以构筑一种像其邻国阿尔及利亚那样

的、为独立而战的、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感。1951 年后的大多数利比亚人都认为,自己是昔兰尼加人或是费赞人,或是的黎波里塔尼亚人,而不是利比亚人。利比亚国家宣布独立时,正好是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崛起的、北非国家日益高涨的反殖民运动激情高涨之时。君主制政权准确地预见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抗性意识形态,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并试图遏制与规范利比亚王国力量的增长与影响。另一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利比亚联邦制政权只不过是外国力量强加给利比亚的人造国家。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与政治自由画等号。

从地缘位置、政治差距来说,利比亚新国家的各个构成部分都大不相同,缺乏统一的历史感。从地理位置来说,利比亚分为三个行政区,反映了三块领土都有障碍物隔离开来。苏尔特湾与苏尔特大沙漠将昔兰尼加与的黎波里塔尼亚分开,增强了利比亚两个最大省份之间的政治上的划分意义。独立前的昔兰尼加的交往方向主要是东边的埃及以及马什里克地区。反之,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活动方向主要是其西部马格里布的三个北非国家。费赞地区人口稀疏,其注意力主要是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以及靠近撒哈拉的非洲国家。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昔兰尼加民众反对意大利统治,尽管后者付出巨大的人力与物质资源。而的黎波里塔尼亚人尽管也有些许抵抗的姿态,但大多数人持不抵抗的态度,也不积极合作。

126

在独立的第一个 10 年,利比亚君主制政权努力促进国家共同体的内聚力,利用共同经历的历史情感,促进新生国家机构的运转。假如省级之间存在着竞争与敌意,那么早期的努力是没有结果的。20 世纪 60 年代,观察家一再强调利比亚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的局限性。1967 年的“六月战争”引发了公众一片反对之声,此后君主制政权在这一点上加大了宣传力度,强调了利比亚认同深深扎根于利比亚独立前的历史。作为回应,国家意识的情感开始在伊德里斯政权的领导下变得高涨起来,但并不足以使君主制政权变得强大,反而使发源于东边的泛阿拉伯主义日益充满活力。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伊斯兰主义与奥斯曼民族主义是阿拉伯政治团结的主要因素。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民族主义销声匿迹。而两件事情使伊斯兰主义遭受了羞辱性的打击:一是土耳其改革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世俗化政策;二是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大城市里出现。随着处于萌芽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到摆脱欧洲控制、获得政治独立上,阿拉伯统一的模糊构想与支持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以及购买土地的活动交织在一起。

127

利比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并不是没有典型先例。许多利比亚人由于难以制止意大利入侵,被流放到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他们在流放地进行了反意大利的宣传,不过效果并不佳。一旦盟军解放了利比亚,民族主义的表达就浮现出来。1944 年 10 月,民族主义者领导上千人走过的黎波里大街,撕下街道上的意大利标记,换上了阿拉伯语的标语。1945 年,的黎波里的游行示威活动成为日常惯例,犹太社区成为聚众攻击的目标。

1947 年,巴勒斯坦问题向分治方向发展。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国。这两件事情再次在利比亚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引发示威游行。利比亚人以及阿拉伯民众由于难以直接表达对巴勒斯坦局势的愤怒,于是经常向当地犹太人倾泻自己的愤怒,实际上这些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没有或者很少有关系。利比亚犹太人的困境在于:犹太社区相对较小,而英国政府在 1949 年承认以色列以前,英国军事行政当局拒绝犹太人有移民的权利[10]。

伊德里斯政权作为保守的、传统的君主制政权,偶尔也会强调利比亚—阿拉伯人的兄弟友谊与团结精神。但其政策除非在极大压力下,一般仅限于口头承诺。伊德里斯国王一直阻挠利比亚加入阿盟,直到 1953 年才成为其成员国。利比亚政府一直不给中东的阿拉伯事业提供明确的支持。1956 年苏伊士危机期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政府违背 1953 年的《英国—利比亚协定》,准备利用利比

亚军事基地进攻埃及。当利比亚提出抗议时,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这件事情。然而,破坏性后果已经产生了。君主制政权只好答应不使用这些基地向利比亚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弹药,这一事实挫伤了民族主义者,他们痛恨君主制政权的亲西方政策。 128

1957年,利比亚与突尼斯签署友好合作协定,标志着大马格里布统一运动已经开始实际行动。签约双方都为之欢呼雀跃,成为双边合作的理想模式。与利比亚一样,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将该条约看做是抗衡埃及在北非地区影响的潜在力量。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批评家看来,该协议只不过是签约国协调亲西方政策的工具。这些争议当时突出强调了一个核心议题,就是瓜分阿拉伯世界,因为一些阿拉伯人认为马格里布统一是在北非大背景下进行的。而另外一些人则将之看做是大阿拉伯地区与非洲地区统一的先兆。

一旦石油收入让利比亚经济运行起来,利比亚人就渴望变革,寻求一个既能解释又能满足其渴求的、内容广泛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可以为困惑该地区的政治分歧提供答案,也可以为那些与他们联系密切,但又难以绕开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之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益扩大的利比亚教育体系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悲哀的是,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君主制政权只好要求埃及提供教师与课本。到20世纪50年代末,成百上千的埃及人到利比亚从事教师职业。他们开设的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教学模式。他们热衷的事业是传播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意志。1958年,利比亚教育部长被迫与黎巴嫩教师签定聘任合同,以抵消埃及人的影响。利比亚采纳埃及的行政管理结构与司法模式,埃及的报纸与开罗"阿拉伯之声"的广播使埃及的文化传遍利比亚。大部分利比亚的年轻人在埃及学习,更加深了埃及对利比亚的影响。在利比亚,纳赛尔的画像几乎像国王的画像一样被张贴在大街小巷。

君主制政权完全误读了民众情绪的深度与广度,低估了民众对意识形态的需求。相反,它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善民众物质需求与生活条件。事实证明,一个仅仅偶尔能满足民众需要的、新生的利比亚民族主 129

义，不能够克服部落的、各省与宗教忠诚，以及泛阿拉伯主义的负面影响。

1964年1月，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同时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支持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峰会，抗议以色列将约旦河水改道，灌溉内格夫沙漠。1964年2月，纳赛尔要求利比亚将外国人的军事基地赶出本土，理由是它们威胁埃及与阿拉伯事业，支持以色列。随后，利比亚国内的示威活动频繁起来。与此同时，开罗电台错误地断言，1956年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曾利用利比亚的基地来打击埃及。1965年，利比亚国内又发生示威游行，原因是利比亚与同以色列建交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利比亚撤回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以示抗议，但仍属于与其交往的少数阿拉伯国家之一。

历史发展表明，1967年对利比亚君主制政权来说是关键的一年，由于它既对1967年"六月战争"反应虚弱，又对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持激烈批评态度，这些成为1969年发生颠覆君主制政权政变的催化剂。当时埃及政府正对自己军队被势不可挡的英美军队彻底击败而反应激烈，利比亚的英美基地势必成为抨击目标。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利比亚民众对战争的反应具有范围广、时间长、充满暴力的特点，特别是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地区尤为突出。利比亚政府向美国威胁要关闭惠勒斯军事基地，并加入了沙特阿拉伯与海湾国家发起的暂停石油生产的运动。尽管作出了以上尝试性的举措，但利比亚首相侯赛因·马奇克由于恢复对西方的石油供应而被迫辞职。面对激烈的批评之声，利比亚政府在阿以冲突中并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以帮助阿拉伯兄弟。

面对尖锐的批评之声，君主制政权向阿拉伯诸国作出了一些妥协与让步，但还是设法维持其中立不结盟的原则。在1967年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峰会上，利比亚与其他产油国同意补偿埃及、约旦在1967年"六月战争"中的损失，但拒绝了如切断对西方的石油供应等苛刻条件。此后，君主制政权继续将自己作为阿拉伯事业的支持者，但没有在阿拉伯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更激进好战的角色，特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表

现得较消极被动。

透视君主制政权

利比亚独立之时,既没有一个综合全面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多元化的民众,也没有将昔兰尼加的部落人口、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城市居民,以及费赞地区的游牧民统一起来的共同传统,更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人员或者能够掌握现代政府管理艺术的、有知识的政治精英。利比亚存在一个完全依赖于外国经济援助的赤字经济体系。20 世纪 60 年代,利比亚石油收入增加,达到了自 1951 年国家成立以来难以想象的地步。君主制政权的批评者忘记了利比亚前 10 年经济不景气的状态。按照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局势,利比亚独立时选择君主制作为治理国家的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利比亚建国时的经济基础较差。1951 年后,君主制政权的经济与社会取得了较大进步。特别是 1960 年后,石油收入为利比亚政府提供了启动民众社会福利、发展公共设施等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早在 1958 年,阿卜杜勒·马吉德·库巴尔政府就颁布法令,宣布 70%的石油收入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让整个社会从新发现的石油财富中获益。1960 年,利比亚成立发展委员会。1963 年,在利比亚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中,强调优先开发公共设施、农业与林业。但由于组织松散,该发展计划不久就遇到了困难。石油收入意想不到的剧增,意味着利比亚的财政支出比预期花费要多得多。利比亚政府随即增加了诸多雄心勃勃的新项目,仅仅 5 年之内就修建了 10 万套新房子,突破了已经失去凝聚力以及没有远见的初始计划。与此同时,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行贿受贿以及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都削弱了君主制政权力图推动利比亚经济与社会基础建设的力度。

历史的发展最终表明,专制主义政治体系与众不同的特征,使其在较大程度上孤立于社会系统之外。其第一个特征是,利比亚权力精英是由伊德里斯国王,一小部分宫廷随从人员组成的小集团,部长们频繁更换,说明构成人员的流动性大。第二个突出特征是,国王性格孤傲冷

漠,超然于世外。他喜欢居住在昔兰尼加,躲避政府日常琐事的压力。他沉溺于宗教与学术性事务的思考之中,将公共政策性事务交与其部长管理,最终导致政治的挫败感、贪污腐败盛行,以及危机重重。专制主义政治体系也缺乏生存能力,因为伊德里斯国王没有子嗣,继承问题使人感到沮丧。由于君主制政权的世袭性质,会引起王室成员兄弟阋墙,从而引发政治冲突。针对这种现象,国王早在 1954 年就颁布法令,继承人家族仅限于王族中的支系。哈桑·里达作为国王的外甥是继承人的最明显人选,但他才能平庸,毫无突出之处,并不受国王赏识。伊德里斯国王本身的表现也增加了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他在 1951 年后屡次要求退位,民众日益感到他超然物外、勉为其难的统治者形象。

利比亚君主制政权一直较为软弱,但竟然存在了近 18 年,其主要原因是利比亚碎裂化社会现实使然。利比亚精英将大多数政策性问题都落实在官方协议中,普通民众对这些政策都持不同意见。再者,由于民众没有被动员起来,政党遭禁止,利比亚缺乏以集体方式表达不同意见的可能。强迫与威胁总是潜在幕后。君主制政权短时间内能够控制权力资源,而一旦石油资源在经济中运行,就难以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利比亚经济的迅速变革促使利比亚社会结构剧烈变迁,而君主制政权不能够,也不愿意适应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的要求。

君主制政权的结束

1969 年 9 月 1 日,一些自称为自由军官组织的利比亚军官成功发动政变,推翻了君主制政权。此后利比亚国内外政策进行了激进的调整。领导这次政变的 20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并成立革命指挥委员会(GCC)。其成员与政变领导者刚开始都是秘密的,民众并不知道是谁。不久,革命政权发布了简短的声明,宣布上尉穆阿迈尔·卡扎菲被擢升为上校,并被任命为利比亚军队的总司令。此后,革命指挥委员会的行动一般都秘密进行。很明显,卡扎菲是这个国家的首脑。伊德里斯国王当时在希腊和土耳其治病,从此再也没有回利比亚,一直在埃及定居。1983 年 5 月 25 日,伊德里斯病逝于开罗,终年 94 岁。

第六章　九月革命(1969－1973)

133

九月革命在构想、筹划、组织与执行等方面都是在军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平民百姓组织,甚至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变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旧制度的僵化,而不是挑战者的精神活力以及支持的广泛性。

罗斯·福斯特(Ruth First):《利比亚:令人困惑的革命》(*Libya: The Elusive Revolution*, 1974)

军队是民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们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与统一原则,实际上没有任何新意。是相信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民众,鼓舞着军队成为革命的先锋,而军队用武力将这些原则强加给民众的敌人。

穆阿迈尔·卡扎菲,1969年9月

我反对将这次革命视为埃及人与俄罗斯人的胜利,更不认为苏联的影响将扩展到地中海西部,这些人真是杞人忧天。美国国务卿戴维·纽森(David D. Newson)与美国大使约瑟夫·帕尔默(Joseph Palmer)认为,应该给卡扎菲一个机会。以机智、和蔼著称的波士顿市民约瑟夫·帕尔默预言,卡扎菲

将是美国利益的天赋捍卫者。

帕特里克·希勒(Patrick Seale)和莫林·麦克威廉(Maureen McConville):《希尔顿任务》(*The Hilton Assignment*, 1973)

134

利比亚的自由军官组织有70名左右军官,大多数是陆军通讯兵。1969年9月1日,该组织推翻了利比亚君主制政权。由于革命是通过不流血的行动进行的,因此起初被称之为"白色革命",后来又以"九月革命"而著称。一旦夺取政权,自由军官的12名中央委员会成员立即成立革命指挥委员会,掌控利比亚的最高行政与立法权。与大多数传统社会的革命任务一样,革命指挥委员会优先考虑的第一件事,是在现有秩序下,革命政府的生存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穆阿迈尔·卡扎菲当时是军队的上尉,精心策划了这次"九月革命"。随后被提拔为上校,任命为利比亚军队总司令,不久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首脑,以及国家的实际领袖。相比之下,其他11名成员长期工作在他的阴影之下。关于他们的生平的相关信息少得可怜。直到1970年1月10日,他们的名字与图片才出现在官方公报上,这距离推翻君主制政权的时间已经有4个月了。[1]

此时,卡扎菲上校忙于巩固革命成果。从理论上说,革命指挥委员会的运行就像一个大学机构,重大问题的通过与制定政策必须在成员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而在实践操作中,卡扎菲通过个人魅力与雄辩口才将个人意志强加到国内外政策的实际执行中,利比亚内外政策明显具有其思想的印迹。革命政府的早期政策尤其反映了卡扎菲具有深厚的伊斯兰教背景,也表明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态度。他禁止民众消费酒水,关闭了教堂与夜间俱乐部,没收了外国人控制的银行,阿拉伯语被法定为官方交流的唯一语言。后来还关闭了美英军事基地,少数意大利居民被驱逐出境;国际石油公司大多数是美国的,如想继续运转,将面临着严厉的限制条件[2]。

年轻的革命者

卡扎菲出生于利比亚沙漠中部,苏尔特以南 50 英里阿布哈迪(Abou-Hadi)。出生时间很可能是 1943 年春天,但一些报道认为他出生在 1942 年。卡扎菲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贝都因人,没有对他的童年做任何记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敌人在利比亚群雄逐鹿。在此过程中,利比亚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卡扎菲一出生就经历了战争冲突与风云巨变时代的残酷考验,深深体会到帝国主义在利比亚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作为沙漠之子,卡扎菲的童年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成年后的个性与个人生活,甚至包括他治理国家所执行的方针政策。1988 年,卡扎菲出版了一本小故事集。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层窥探他的内心世界。书中有一章名为“乡村”的故事,丰富地展示了乡村生活给他带来的益处,并将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进行了比较:

> 城市生活意味着你要追求某些欲望以及一些没有必要或有必要的奢侈享受。当目睹社会病态席卷整个城市,只有通过立法才能遏制这些行为时,我们一点都不吃惊。我们不相信病态会结束,也不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因为城市生活就是这样,这些病态是不可避免的。城市生活让人头晕眼花、作呕反胃、神经错乱、不知所措,我担心会神智迷乱,害怕面对城市生活以及城市问题。
>
> 让这些都见鬼去吧,赶快离开这里。要享受快乐,就要到乡下农村居住,这里的体力劳动意味着即能满足生活需要,又能强身健体,此外还是一种快乐。这里的生活是社会交际的舞台,充满了人情味。家族与部族之间联系密切。这里既有稳定的秩序,也有充实的信仰。[3]

卡扎菲的家庭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部族家庭。他有 3 个姐姐,自己是家中独子。他的亲戚大都在读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很少有人完成

高中学业。由于正规学校大都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中心,卡扎菲早期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本地部族教师讲授的传统宗教课程。部族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当时民众熟知的宗教原则,强烈地影响了卡扎菲的整个人生。

卡扎菲在苏尔特地区接受小学教育,4 年就完成了 6 年的学业。随后在利比亚中南部的一个小市镇塞卜哈接受中学教育。他的学生时代是在一个遥远僻静,相对狭小的宗教中心度过的。事实证明,这种少年经历对他后来的政治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塞卜哈可以定期接触阿拉伯报纸与电台广播,特别是收听来自开罗的“阿拉伯之声”,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新鲜事物。卡扎菲在塞卜哈当学生期间,其大多数教师来自埃及,学校课本也是埃及提供的。这些都刺激卡扎菲对埃及革命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卡扎菲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包括分发推翻现政府的传单,组织未经政府授权的政治游行,利比亚当局勒令他本人与其家族在其高中毕业以前离开塞卜哈。关于卡扎菲被勒令退学的情况有多种说法,但人们共同承认的事实是,卡扎菲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分发了批评君主制的传单,并组织公众举行抗议活动。卡扎菲从这些政治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非暴力政治活动并不能有效地改变不民主的政权。

在卡扎菲的成长过程中,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与政治事件,包括 1948 年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被以色列击败;1952 年的埃及革命;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 年的埃及—叙利亚联合。这些事件对卡扎菲的世界观产生强烈影响。在此期间,他成为埃及总统纳赛尔革命政策的狂热崇拜者。埃及的反帝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主张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内改革,受到中东地区民众的广泛欢迎,民众对埃及的支持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卡扎菲与同时代其他人不同做法是,他决定将激情四溢的埃及革命带到传统的利比亚。

就在自由军官夺取利比亚政权不久,分析人士就敏锐地感觉到,“九月革命”与其埃及革命具有相似性。可以说,利比亚革命完全借鉴

了埃及革命的模式，自由军官运动与革命指挥委员会就是埃及影响的外在标识。“九月革命”的目标：自由、社会主义与统一，与1952年纳赛尔革命的提出的口号完全一样。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发布的政策，更突出显示了对埃及经验的过分依赖。利比亚宣布在大国有争议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反对国内外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革命指挥委员会声称自己一心想在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反对以色列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埃及革命与利比亚革命的政策相似性还表现在，1969年卡扎菲的演讲模仿了近20年前纳赛尔发动埃及革命时的讲话。由于与埃及革命相关联，利比亚革命政府的许多政策在阿拉伯世界并不受欢迎。革命初期时大多数批评人士认为，利比亚“九月革命”是不合时代的产物。 137

卡扎菲在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的沿海小镇完成其中学学业，比起以部族集市中心的塞卜哈来，这里更具世界性大都市的城市氛围。由于没有人推荐，他在转到另一所高中时遇到一些困难，最后进入米苏拉塔中学。卡扎菲在米苏拉塔学习期间也是其政治理论构建的关键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各种政治组织躁动不安，竞相争取支持的舞台。这些组织有：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穆斯林兄弟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卡扎菲拒绝加入这些组织，理由是他拒绝宗派主义。他担心这些组织身份会使其失去进入皇家军事学院的机会。他集中精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学习，博览群书，包括叙利亚政治理论家米歇尔·阿弗拉克的著作、孙中山的文集、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与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他还阅读了与纳赛尔、埃及革命、法国革命有关的很多书籍。

卡扎菲在米苏拉塔重新与孩童时代的朋友建立了联系。他从志同道合的学生中吸收了一批拥护自己政治思想的新人，这些人大都热衷伊斯兰教原则、阿拉伯统一、自由和社会平等。他经常与同学，也就是年轻的革命志士讨论改变利比亚社会的宏图伟业。卡扎菲认识到军队是能够推翻君主制政权的唯一力量。1963年，他报名加入班加西皇家军事学院，此前在利比亚大学历史系当学生。卡扎菲在米苏拉塔构建了自 138

己的关系网，许多人追随他进入军队，后来在革命政府中担任要职。

当时利比亚军队可以为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特别是类似于卡扎菲那些处于利比亚社会底层，但具有雄心抱负、才赋过人的年轻人提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极好机会。显而易见，军队也成了采取决定国家命运政治行动的潜在途径。由于君主制政权禁止政党存在，约束政治活动，卡扎菲认为军队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生涯，而是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的工具。在入军校的两年间，他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并精选了 12 名干将，组成中央委员会。

1965 年 8 月，卡扎菲从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在陆军通信部队当一名通信员。1966 年 4 月，他被派到英国接受军事培训。在随后的 9 个月里，他在比肯斯菲尔德高中(Beaconsfield)完成了英语培训，在波沃顿(Bovington)完成皇家空军中队信号教导员的课程，在海斯(Hythe)完成步兵信号教导员的课程。卡扎菲后来承认，波沃顿学习的机会是一次蓄意谋划的欺骗。他当时宣布自己是一名亲英人士，声明英国军队是利比亚宝贵的财富。卡扎菲在波沃顿学习期间，任信号课程的指导员认为，他成功地克服了初期的语言障碍，对语音程序知识的掌握很到位。再加上卡扎菲的业余主要兴趣是足球与阅读，指导员是这样描述他的："一个幽默、有趣味的军官，总是乐观向上，工作起来很努力，并且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据说卡扎菲在适应英国生活方式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并没有享受旅居国外的短暂时光。一些关于卡扎菲当时的稀有照片表明，他喜欢身着传统的利比亚长袍在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上散步。回到利比亚后，他在班加西附近的军队任职，继续组织以反政府军官组成的联系网，并在 1969 年 9 月 1 日，推翻了君主制政权。

就卡扎菲及其追随者的背景来说，很明显，革命政府并没有特殊之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 12 个成员以及自由军官都具有相同的背景、动机与世界观。他们的态度与信仰均反映在"九月革命"后所采取的政策与立场。大多数人都出生于贫困家庭，属于地位较低的部族，都加入利比亚军事学院接受教育，并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获得提升。他们的表达方式是由《古兰经》经文与《沙里亚》，以及伊斯兰的传统法典规范下的

139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话语构成，通过代表利比亚民众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鼓动，更增强了其革命意义。从此意义上说，"九月革命"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绿洲与内地部族反对在社会中据统治地位的主导部族与沿海精英家族的革命。

大国的结局

"九月革命"的发动时间与发动人员组成使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与美国着实大吃一惊。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由高级军官领导的政变很可能在政策上并不会作出多大变动，没有一个人预示到这些地位较低的年轻军官目标是进行一场广泛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革命。1965 至 1969 年美国任利比亚大使的戴维·纽森在政变前两个月回到华盛顿，担任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在外交事务的口述历史课题中对此作出自己的评论，并确信：

140

> 代理人(中央情报局)已经报告了一个名为"黑靴子"的、正在形成中的组织，该组织很可能围绕在一个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谢勒希(Abdul Aziz Shalhi)军官的周围。但如果说那个组织有夺权的意图，那可能被卡扎菲组织抢先行动，我们对后者一无所知。

就在"九月革命"开始后，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召集四大国(法国、英国、苏联与美国)的外交官前来面谈。此后，英美代表接近利比亚领导层的机会比法国与苏联代表的机会要多得多，因为革命指挥委员会想解决基地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 1969 年 9 月到 11 月，外交官很少有机会与卡扎菲面谈。

英国与美国错误地认为，自己可能继续维持在利比亚的经济与军事利益。然而不久就得出结论：要想获取在利比亚的最大利益，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外交层面承认革命政府。因此，英国政府拒绝了伊德里斯国王及其支持者呼吁军事干预，恢复君主制政权的请求。当时革命指挥委员会特别关心美国政府的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

对此极为谨慎,因为后者在利比亚独立后就承认君主制政权,并与之保持密切的关系。

美英在1970至1971年的外交信函中逐渐表现出对革命政府充满失望的情绪。然而,许多分析家和记者的主导思想还是认为,卡扎菲是在掌握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出现的恰当人物。如1971年9月30日,由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发起的“九月革命”两年来的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卡扎菲近乎是利比亚“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利比亚的“不稳定秩序将有可能接踵而至”。与上述观点相一致的是,美国在革命初的几个月,曾不止一次,可能有两次或更多次向利比亚政府提供一些反对派试图推翻革命政府的情报。[4]

141

“九月革命”发生之时也是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换届之时。1969年7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纽逊离任,接替他的约瑟夫·帕尔默直到同年年底才就职。戴维·麦克当时是一名资历较低的美国外交官,后来担任负责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助手(1990－1993);由于擅长阿拉伯语,暂时担任帕尔默大使的翻译官。他后来详细叙述了在的黎波里电台会见卡扎菲的情况。给麦克印象最深的是,卡扎菲才智聪颖,熟练地掌握阿拉伯语,说起来像电台播音员那样音质优美。他似乎完全回忆起昔日对话的内容。很明显,在麦克看来,卡扎菲就是革命指挥委员会中精英中的精英。然而,的黎波里的美国大使馆里以及华盛顿政府内部都在为谁将成为利比亚革命舵手激烈地讨论着。

1964年2月,君主制政权宣布不再与英国续签基地协议,而美国的基地协议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到期。然而,基地问题在利比亚国内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因此,发生以下事情就不足为怪了,那就是革命指挥委员会开始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提前结束协议。1969年10月16日,卡扎菲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清晰地阐明了革命政府的立场:

> 今天我们要求你们放弃梅拉哈(Mellaha)基地的立场已经足够鲜明。我们对上述基地以及其他基地的态度不再是模棱两可的。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在9月1日站起来了,不能再容忍外国人

与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我们的基地上,民众革命诉求的军队也不能容忍自己住在简陋的棚屋里,而让利比亚的领土存在帝国主义的基地。

基地的期限就像占领者的期限一样,基地的命运注定要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不接受外国人的基地,不接受外国人,不接受帝国主义者,不接受侵略者。对于朋友或敌人来说,这种鲜明的立场都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们都要将自己的土地从外国控制下,帝国主义者与外国力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5]

142

利比亚与英国协商得相对顺利,后者不久就作出了撤离的决定,1970年3月末,英军离开了阿丹姆(Al-Adem)基地。但与美国在惠勒斯军事基地的谈判就显得很漫长,因为美国一度要求严格按照1954年协议所规定的条款,将美军基地保留到1970年12月24日。美国为了避免将军事设施移到欧洲,甚至建议与利比亚一起使用惠勒斯基地。利比亚革命政府拒绝了该建议。1969年12月23日,美国人同意撤出基地。1970年6月11日,最后一批美国飞机离开惠勒斯基地后,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向华盛顿发电报:"飞机起飞了,别了惠勒斯!"英美军队离开利比亚的日子是2月28日,英国人撤离阿丹姆基地;6月11日,美国人告别惠勒斯基地,之后,这两天成为利比亚国家法定假日。每年的这一天,民众都要举行庆典以示纪念,卡扎菲一般都要进行有关民族主义精神的演讲。1970年10月7日,意大利人的财产被没收,意大利社区被赶出利比亚,这一天也成为国家法定节日。

卡扎菲刚开始时将基地谈判权交给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贾鲁德少校,后者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卡扎菲的副手。基地协议问题解决后,卡扎菲的工作重点转向其他问题,诸如与石油公司的谈判。美国大使馆渴望与卡扎菲培养积极的友好关系,希望与他谈论诸如技术转让等问题,但这些并不是卡扎菲急于提上日程的话题。美国人也没有接近卡扎菲的渠道。帕尔默大使在3年任职期间仅仅见过卡扎菲3次:即刚到任时;惠勒斯谈判初期和离任时。而他还是卡

143

扎非会见次数较多的大使。按照一般惯例，卡扎非仅在大使到任时会见一次。

与此同时，利比亚人继续向美国以及其他外交使团以不同的方式施加压力。革命后不久，他们就把班加西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医院(Seventh-Day Adventists Hospital)收归国有，没有给予任何补偿。与此有着同等遭遇的还有的黎波里的美国教堂。除了挤压美国等国的财产外，包括美国在利比亚油气工业的份额，利比亚政府还不断地批评美国的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那些不详的军事设施具有重要的暗示，并提出将领海延伸到200英里以外。此外，利比亚声称控制了整个苏尔特湾，这一说法后来遭到美国的军事挑战。

公平地说，当时美国的政策鼓励了利比亚的挑衅行为。例如，当利比亚寻求购买C-30运输飞机的准许权时，美国答应了订购要求，却不保证得到出口许可证。而在利比亚支付了飞机货款后，美国却禁止交付飞机，飞机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Marietta)机场停放了近30多年。

1972年，美国、英国、苏联等国都接到利比亚外交办公室的指示，要求将各国使馆工作人员减少到15人。在1969年9月，美国大使馆有85名工作人员。到1973年12月，已经减少到13人。此后，美国大使馆关闭了班加西领事馆最后一个哨站，撤退了全部海上安全部队，让利比亚政府负责大使馆的安全工作。这一决策的负面影响在7年后显现出来，当时美国大使馆被愤怒的暴徒袭击并毁坏，而当地警察部队袖手旁观，拒绝干预。1972年末，帕尔默大使退休离任而无人接替，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80年使馆关闭。

就在英国和美国与利比亚商讨关闭军事基地相关事宜时，他们的盟友法国正在考虑向利比亚革命政府销售先进的新式武器。法国政府在“九月革命”成功的6周之内，主动要求向利比亚政府出售100架超音速“幻影”战斗机。1970年1月，革命指挥委员会决定购买110架，而不是原定的100架，为期3年，总费用达3亿美元。这项交易还包括：法国同意在自己的基地为利比亚训练飞行员与技术人员。两国都

承认,这一协议是当时法国对外武器销售史上最高记录,是一次重大的经济与外交“政变”。在随后的10余年里,利比亚与法国关系比其他欧洲国家走得都近,主要是因为法国的中东政策较容易让阿拉伯国家接受。

苏联与伊德里斯政权的外交交往与商业交往极为有限,这也迅速增强了其在利比亚革命政府外交格局中的地位。1969年9月4日,苏联官方承认革命政府,并暗示乐意提供必要的援助。苏联的兴趣与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但是革命指挥委员会刚开始与苏联的交往范围仅限于商业领域,特别是武器购买。利比亚的早期政策声明中,都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与伊斯兰教、阿拉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无神论系统,完全不适合利比亚的基本国情。1970年7月,苏联第一批武器到达利比亚,并在“九月革命”一周年阅兵队伍中公开展出。此后的10年,革命指挥委员会一直从苏联购买军事设备,其中双方在1974至1975年间达成10亿美元的一揽子交易,这也是双方最大的武器交易协议。假如“冷战”时期存在着单极世界的逻辑结构,那么利比亚与苏联之间的友谊与其他诸多事件则加深了这种关系,卡扎菲与美国的关系却渐行渐远[6]。

145

石油的优先地位

革命指导委员会在革命的初期岁月专注于巩固权力,对国际石油公司与天然气企业采取安抚性的政策,许诺尊重现存协议。例如,1969年9月18日,利比亚总理马哈茂德·苏莱曼·马格拉比为消除外国油气企业的恐惧心理,强调碳氢政策不会有引人注目的变化。两周后,他建议利比亚原油价格应该以产油国的纳税收入为基础,明显低于实际价格。1969年10月6日,石油部长采取强硬立场,指控国际石油公司单方面不公正地设定原油标价,违反利比亚法律。他补充说,石油部门想扭转这种不合理局势。10天后,卡扎菲发出了国家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

> 众所周知，目前油价是不公平的，是为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的利益设定的。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成立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件事情。根据这种研究程序，我们的石油收入份额将经过专家研究再作决定。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当我们提出某些要求时，就要实现它。[7]

通过回顾以上情节，很明显可以看出革命指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决定削减石油生产，保证石油供应，通过油价的最大化，开发上下游产业，增加石油收入，利用石油收入实现国家经济的多元化。

自从 1959 年利比亚探明石油储量以来，国际石油公司一直享受着商业上的丰厚收入。但在 10 年后，这种蜜月意外地突然结束。1969 年 12 月，革命指挥委员会要求通过会谈实现提高石油价格的目标。利比亚人首先将目标对准独立石油公司，特别是西方石油公司，因为它们所主张的、以减少生产配额为基础的谈判战略是最站不住脚的，而这些配额是建立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相互比较基础之上的。当独立石油公司拒绝按照要求修改合同时，1970 年夏，革命指挥委员会要求将石油日产量减少 80 万桶以施加压力。埃索石油公司接到了禁止出口液化天然气的通知。利比亚将地方石油产品营销权收归国有，这增加了国内局势发展的不确定因素。革命指挥委员会在削减产量的同时，沙特阿拉伯也暂停通过叙利亚的管道输送石油。两件事情一起造成全球性的石油短缺，特别是在欧洲，后果极为严重。

1970 年 9 月 1 日，确切地说，是在自由军官夺取政权的一年后，西方石油公司同意将每桶石油价格提高 0.3 美元，其他石油公司随后效仿。这也是自 1960 年欧佩克成立以来，第一次提高石油价格。随后其他产油国采取相似行动，加入利比亚提高油价的行列。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强硬政策结束了石油生产者才有决定原油价格的长期神话。

利比亚《九月协议》后，1970 年欧佩克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利比亚领导层的意图，即要求提高油价与收入税比率，减少市场营销补贴，采取新制度应对特殊利润比率。

两个月以后，海湾国家与石油公司签订新协议，也就是《德黑兰协议》。内容包括了利比亚已经赢得的条款，立即提高价格，在5年里可以再次提价。海湾国家拒绝了“跳蛙原则”，同意不会单独谈判以谋取更好的条件。他们还同意不限制石油产量，为改善有益于自己财政的条款而努力。

147

《德黑兰协议》强烈批评了经过协商后提高油价水平的做法，拒绝集体谈判的原则，并谴责了限制石油产量的相关禁律。它的条款激怒了卡扎菲与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作为回应，革命指挥委员会立即与利比亚的石油生产商展开新一轮谈判，结束了自己在欧佩克里短期的领导角色。谈判的成果就是《的黎波里协议》，是利比亚与单个石油公司之间签署的一系列协议。该协议与《德黑兰协议》的结构有相似之处，利比亚在《的黎波里协议》中较成功地让石油公司承诺给他们合理的价格、收入税以及利润比率。石油公司为了弥补君主制政权时期定价偏低情况，同意在特许权期间给出口的每桶石油追加费用。油价提升再加上《的黎波里协议》中的追补性收入，利比亚仅在第一年的收入就增加了10亿美元。

革命指挥委员会在成功地修改了与石油公司的合同后，转而对后者增加控制力。1971年，利比亚将英国石油公司亨特萨里尔油田的分公司收归国有。1973年6月，亨特萨里尔油田实现国有化。一般来说，商业动机决定着利比亚的油气政策。反对英国石油公司是唯一的选择，因为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主要报复拥有英国石油公司48%股份的英国政府阻止伊朗夺取海湾三岛。1973年9月1日，利比亚宣布国内所有石油生产企业都实现国有化。一个月后，利比亚为回应1973年10月的阿以冲突，采取了部分石油禁运政策，致使油价飙升了两倍。1974年4月，欧佩克抵制行为结束，但油价仍居高不下。

与石油部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指挥委员会刚开始尽管有了一个以天然气为基础的工业化计划，但对天然气部门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1969年初，利比亚《石油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在实施较合理的保护措施的基础上，保证油气开发活动的正常进行，鼓励开采天

148

然气。该法授权政府可以自由选择开采方式,控制开采源头;天然气并不是用来"证明经济合理性"的目标,并且警示了过度开采天然气的不利后果。然而,除了埃索石油公司以外的所有的天然气田都被放弃,因为这些油井都被封堵起来。20 世纪 60 年代,埃索石油公司在卜雷加港(Marsa al-Brega)修建了一个液化天然气工厂。在随后的 25 年里,该工厂生产效益较好,不过经营范围仅限于天然气。革命指挥委员会企图将油价谈判的强硬立场照搬到天然气领域,但并不太成功,主要是因为与大买方意大利与西班牙在价格方面存在争议。

社会经济变迁

社会主义革命是 20 世纪大多数革命不可分割的部分,特别是北非与中东地区发生的革命更具有这一特点。利比亚也不例外。卡扎菲与他的战友在宣扬自由、社会主义与统一三位一体的逻辑模式后,将社会主义描述为解决人类经济问题的一种方式。革命指挥委员会不久就控制了石油与天然气工业,包括其他经济领域。这一突出的政策不仅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还有助于巩固并控制革命成果。早期的政策强调了利比亚社会主义的本土特色,认为是利比亚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很有必要的调整行为。卡扎菲的解释反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中东的实践,其起源与特征经常被规范在本土历史与地区惯常的语境之下。其最终结果就是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学说体系,反对实用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特性。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

149 革命指挥委员会在对付石油公司问题上成功地采取了对抗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假设殖民主义者与准殖民主义代理人对被殖民国家的剥削,大呼国际石油卡特尔与西方消费国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欺骗行为。不幸的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精英并没有准确地预见到,对石油公司挑衅性的处理方式会产生何种后果,将对利比亚国内其他领域的社会经济政策造成多大的损害。革命指挥委员会在惊喜于这种对抗式处理方式所产生的积极后果的同时,也将同样的管理手段运用到其

他领域,而这些领域并不适应这种对抗性的解决之道。革命指挥委员会没有吸取石油与天然气保护的教训,在几十年里,利比亚政府并不关心诸如水资源、牧场这些稀缺资源的管理与可持续发展。[8]

考虑到国内的反对力量,革命指挥委员会延迟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才执行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利比亚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强调社会福利,诸如增加住房,改善卫生保健。通过以上措施,革命政府获得了普遍的民众支持,这也是其明确的目标。革命政权对教育领域的支持相对较少,甚至是选择性的。教育本身并不是目标,相反,革命政府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支持新政府的人。[9]利比亚官方想改变现存的教育制度,对教学内容持谨慎态度,因为教育制度的选择与管理将对社会经济领域产生影响。卡扎菲决定采取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同的政策取向,认为输入以上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对其刚刚开始的人民民主产生潜在的威胁。

利比亚政府在引进社会主义的同时,向广大民众慷慨解囊,有意识地让民众分享石油财富,构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1969至1973年,利比亚政府在住房、医疗卫生以及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急速增加,政府主动让工人与消费者直接受益。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允许工人分享公司利润,社会上极度贫困人员可以免费从政府那里得到住房。农民可以获得从赛努西教团或者意大利农场主那里没收的土地,并可以低价购买农业用具以及牲畜,这些农业生产工具的购买价不足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1970年,利比亚政府为新建的住房提供补贴,特别是农村地区。这些补贴可以从政府控制51%股份的银行中提取[10]。

150

自由、民族主义与统一

“九月革命”后利比亚革命政府的对外政策比君主制政权时期更具挑衅性、广泛性与综合性。英美即使从利比亚境内的军事基地撤出,也仍然是卡扎菲津津乐道的批评对象。1972年6月11日,利比亚举行庆祝美国从惠勒斯基地撤军两周年纪念活动,卡扎菲的演讲主要是评

论阿拉伯人在西方国家控制下遭受的侮辱与不公正待遇,语调极其尖刻辛辣,以至于英美两国大使在庆祝会中间就悄悄地离开会场。利比亚领导人点名批评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巴勒斯坦问题也对利比亚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影响了革命政府对整个中东问题的解决,而且涉及外交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与非洲许多国家的关系。利比亚与英国关系由于许多问题的纠缠而变得较为复杂,除了昔日与伊德里斯政权的关系、军事基地问题,还包括卡扎菲要求英国归还君主制政权时期已付款但还没有交货的雷达系统的费用。这件事促使利比亚决定在1971年末收回保留英国银行的承诺,并将英国石油财产国有化。

151 革命指挥委员会关心殖民帝国主义问题,试图通过减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地中海,特别是马耳他地区的军事存在使地中海中立化。卡扎菲认为,英国军队利用马耳他为海军基地,间接受到北约的控制,这等于西方力量渗透并影响这些地区。1971年,利比亚参与北约军队地位问题的讨论,并向马耳他政府许诺大量的援助,以换取北约军队的减少或撤退。马耳他临时允许北约继续使用其军事基地,而最终协议却似乎是利比亚的胜利,因为其中一条规定,禁止使用基地打击阿拉伯国家。

卡扎菲在1972年6月11日,也就是美国从惠勒斯基地撤军纪念日上发表声明,支持世界上各种反政府力量,如菲律宾的穆斯林叛乱分子,北爱尔兰的共和军,美国的黑人军事武装。此外,他宣布在利比亚成立训练中心,为反以色列的游击队战士提供装备,自愿者可以向利比亚大使馆提出申请。1972年7月23日,卡扎菲成立了第一个纳赛尔自愿者中心。虽然革命政府后来对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作了低调处理,但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倡导并以各种方式对该运动提供支持。利比亚幕后支持这些解放运动的动机复杂、方式多样。利比亚人早期公开支持解放运动,象征着阿拉伯革命从防御走向进攻;支持诸如菲律宾穆斯林,等于表达一种伊斯兰团结精神。利比亚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提高了卡扎菲作为以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为标识的第三世

界领导人的国际地位。

卡扎菲认为,阿拉伯统一的关键就是,将包含阿拉伯民族的各大陆联合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在 1970 年 2 月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创造了一个阿拉伯政治统一的模式。他在 1972 年 7 月的演讲中认为,阿拉伯民族统一成一个阿拉伯国家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为此,他曾于 1970 年 11 月建议与埃及、叙利亚和苏丹建立联盟国家。1972 年 2 月,卡扎菲又建议与埃及合并。1974 年 1 月,卡扎菲建议与突尼斯合并,该想法第一次提出是在 1972 年 12 月。卡扎菲畅言无忌地表达对阿拉伯统一的渴望,但许多次与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的统一实践都以失败而告终。1973 年后,卡扎菲继续谈论阿拉伯统一问题,但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构想,而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11]。

君主制期间,利比亚国内已经浮现出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情绪的迹象。然而,是卡扎菲将这种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清晰地表达出来,服务的对象为阿拉伯民族。他的思想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变体,与自由、社会主义、统一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将“九月革命”的重大决策凝练成为一个系统、连贯的意识形态架构。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包含:阿拉伯民族的宏大构想;由于经过约 400 年的外国统治所产生的落后意识;对伊德里斯政权堕落腐化、压制民众的强烈厌恶情绪;几个世纪里,利比亚民众长期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有着强烈的被迫害情结。卡扎菲认为,阿拉伯人与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有权控制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情势下,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卡扎菲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以色列建国是阿拉伯民族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压迫史上最大的侮辱。

卡扎菲视自己为纳赛尔的继承人,并声称纳赛尔指定他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接班人。受纳赛尔鼓舞与启迪,卡扎菲试图模仿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初纳赛尔引人注目的理想主义行为,而不是 1967 年后更温和、具有丰富阅历,厌战情绪严重的纳赛尔的所作所为。二人都是在相同的意识形态下发展起来的,但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哲学因素却大不相同。利比亚的革命政府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较富有的

革命政府。它也是第一个将石油与泛阿拉伯主义两股力量结合起来的政府,这与近代的阿拉伯历史很不一样。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纳赛尔的基础是一个人口过剩、土地贫瘠的国家,这就限制了他的期望与实现自己理想的可能性,特别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制约。另一方面,利比亚人少国富,鼓励卡扎菲可以幻想那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利比亚领导人也受益于没有像纳赛尔与埃及人那样,在与以色列的 13 年冲突中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再者,纳赛尔长期处于阿拉伯世界最大、最玩世不恭的城市——开罗的影响之下,其思想日趋成熟与有水准,而卡扎菲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受到其贝都因出身的强烈影响,是一种纯粹的沙漠哲学。

153

民众革命

"九月革命"是在无组织、无秩序的市民团体的参与下完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革命指挥委员会控制着革命武装力量总的发展方向。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将级别提升了一级或更多级后,都保留了军衔。他们似乎经常身着制服,强调自己的军事附属关系与严守军纪的特征。革命指挥委员会承担了行政管理与立法的功能。他们不久发布了《官方公报》,颁发新法律并立即生效。最终,有少许平民百姓进入内阁为政府做事。但即使那样,革命指挥委员会还是保留了最高权威。它们位于金字塔的最高层,发布政策指令与立法,赢得军队的支持,监督政府的所有行为,保证政府行为与革命目标的始终如一。

革命指挥委员会确信自己代表利比亚民众,公开禁止民众向成立自治政党组织的方向上发展。革命指挥委员会禁止成立政党,这与君主制政权的做法一样。这些决策突出显示了利比亚革命在基本问题上的自相矛盾,在革命初期表现更是如此。然而,自由军官,特别是 12 名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感觉自己接近民众,更能真实反映他们的想法与希望。但他们并不信任民众,拒绝让他们指导与规范革命。"九月革命"的第一个法令就是,让军队在政治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得到革命指挥委员会领导层的认可。后来,卡扎菲在一本 1998 年出版的《逃

154

向地狱》(*Escape to Hell*)的小册子中表达了其早期的矛盾心态：

> 当民众自由行动时，我热爱民众的自由，没有比自由更好的主宰者。他们在历尽艰难困苦后，打破了自己的锁链，唱歌跳舞以示庆祝。然而，我是多么惧怕他们！我爱民众就像我爱我的父亲，但同样也惧怕他们。在贝都因社会里，由于缺乏政府权威，谁能阻止一位父亲惩罚自己任何一位孩子？真的，他们爱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惧怕他。同样地，我即热爱民众又惧怕民众，正如我既热爱父亲又惧怕父亲一样。[12]

革命指挥委员会为了巩固并掌控革命，采取行动削弱部族与地方力量与身份认同，增加政治动员力量，并任用支持革命目标的人进入领导层。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每一个行动都努力将传统的领导地位与前殖民力量联系起来。例如，1971 年 8 月 17 日，的黎波里成立特别军事法院，审判塞卜哈地区的传统部族领导人，指责他们与国外力量结成盟友，试图推翻革命政府。革命指挥委员会也将传统领导人与伊德里斯政权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1971 年末，利比亚成立特别民众法院，审判前政权官员，罪名是通敌叛国与贪污腐败。

革命指挥委员会为了败坏传统领导人的声望，通过重新构建长期行政规划与政治禁忌，任命新型地方领导层，削弱他们的影响。革命政府成立了超越部族界限的新式行政区域，将不同的部族合并到一个单一区域进行管理，这将有助于减少地区认同，以及相附随的社会经济力量。用年轻革命者替换传统领导人的做法并不奏效，因为他们大都缺乏作为一个成功的现代人的态度与背景。而公众迅速察觉到这些政治精英的缺点，拒绝承认他们的领导地位。这些新型领导者的不佳业绩反映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决策的失败，表明他们低估了传统领导人的权力基础，过分夸大了革命信息的感召力量。革命指挥委员会任命的现代管理者也不情愿将权威托付给民众，这也是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只要革命指挥委员会按照纳赛尔主义维持军队的主导地位，那么，民间

155

的、具有现代思想的领导人企图赢得民众支持，构建切实可行的行政机构，将面临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13]。

到1971年春，革命指挥委员会意识到地区政府的新制度并不能动员民众支持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将传统的利比亚社会改造成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社会主义国家。1971年6月11日，卡扎菲在现代管理体系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摧毁了它，宣布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这是一个模仿埃及同名组织的、官方的民众动员团体。革命指挥委员会牢牢地控制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卡扎菲任主席，其余成员组成"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领导机构"。刚开始，革命指挥委员会任命地区层次的宪法委员会，其成员担任地区委员会主席。后来，全体委员由地区或地方机构选举产生。然而，由于禁止进行意识形态以及与国家政策相关话题的讨论，大多数投票人都只支持自己的家族与派系参与政治。

从上述情况可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革命指挥委员会僵硬死板的控制方式扼杀了地方的主动性，遏制了地方领导层的创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也不能解决既能满足地方民众要求，又能反映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的问题。此外，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被现存的政治机构所削弱，后者认为威胁了其权威与责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失败的另外原因是，其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负面影响。

156

1973年4月15日，卡扎菲在五点计划的基础上发起了民众革命。第一，废除现有法律，替换为设计中的、灵活变动的革命法规；第二，清除革命的敌人；第三，行政革命，消除各种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第四，武装普通民众，捍卫革命；第五，发起文化革命净化国外思想，将纯正的道德精神与物质潜力结合起来。

为了完成民众革命，卡扎菲鼓励民众在全国范围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众委员会夺取权力。在民众革命的初期，由于指导原则与程序的缺失，致使民众难以确定如何选举民众委员会，以及在什么地方选举。结果，直接的民众选举仅限于特定区域的组织，也是最底层的政府组织，

即区域委员会选举推荐市镇与省级等高层代表。市镇机关与个别政府官僚机构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然而,革命指挥委员会考虑到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允许民众接管革命行政机构。

按照“九月革命”的初始设想,1973 年 4 月利比亚发起的民众革命有四个目标:第一,革命指挥委员会负责动员民众的力量,因为任命的具有现代思想的领导人,以及官方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都没有完成以上使命;第二,革命政府希望在成立有知识、有能力、忠诚于现政权的新兴社区中拥有领导地位,近一步削弱传统部族领导人的权力基础;第三,人们普遍认为,适当地赋予民众制定适应于革命时代规则与制度的权利,将会减少革命变迁过程中的立法与行政的障碍;第四,民众革命的目标在于,通过授予民众权威,以及选举与罢免各级别公共官员权利,以破坏传统的官僚机构,但革命指挥委员会、内阁成员以及安全部门人员不再罢免范围之内。最终的分析结果是,民众委员会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回应,并在革命指挥委员会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随着民众动员与参与水平日益提高,革命指挥委员会对革命的控制力度也日益增强了。

就其负面影响来说,发起民众革命反映了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偏执。民众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安全机构的附属物,其任务就是揭发对革命持批评观点的个人。与此相伴随的是,利比亚国内掀起一股逮捕风波,对象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复兴社会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有联系的利比亚人,这些人对现政权的政策有不满情绪。刚开始被逮捕者都是由秘密警察执行的。在某些情况下,新成立的民众委员会揭发个人对政府的不满行为。民众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对政权的发展目标产生负面影响,许多国家机构的管理功能受到干扰,从国有公司到农业发展项目都难以正常运行。民众委员会的活动偶尔还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在司法管辖权上产生冲突与争议。

第三世界理论

卡扎菲在 1973 年 4 月宣布民众革命的两个月后就发动了一场运

158

动，对“九月革命”进行理论支持与诠释，他称之为第三世界理论。为了寻求“第三条道路”，卡扎菲试图构建一条替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道路，他拒绝这两种竞争的体系，认为二者不适合利比亚。卡扎菲谴责了这两种垄断体系，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被资本家与公司拥有所有权的垄断，而共产主义则是国家垄断了所有权。此外，他认为苏联与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想在北非与中东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也谴责了苏联政权的无神论属性[14]。

卡扎菲的第三世界理论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和宗教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这两股力量是人类历史至高无上的驱动力。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文化与种族多元化的自然结果，既有必要，又是一种生产力。人们普遍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古代有着特别深厚的根基与辉煌的过去。由于阿拉伯民族是以神圣的、普世性的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卡扎菲认为自己有向世界传播第三世界理论的责任。卡扎菲坚持认为，他将成立一个从大西洋到海湾地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将大范围的穆斯林社区与广泛的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全球帝国主义的压力。

卡扎菲从来没有对其宗教观点进行过系统、全面地讨论或出版专著。他公开演讲的主题集中在伊斯兰教是宗教体系的核心，而《古兰经》则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上。他认为，伊斯兰教是真主对人类的最后言论，生活就是一无所有，因为伊斯兰教没有对这些原则进行阐述。对卡扎菲来说，真主的统一性是宗教的本质。因此，卡扎菲认为基督徒、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没有区别，只不过称之为耶稣、摩西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而已。由于只有一个宗教，就是伊斯兰教，所以所有的一神论者都是穆斯林。卡扎菲认为，伊斯兰教并不仅仅针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而且意味着信仰真主在所有宗教中都有体现。他把任何人认为信仰真主及其使者就是穆斯林这一观点，看做是“伊斯兰教的神圣构想”。

159

卡扎菲呼吁以《古兰经》为基础实现伊斯兰复兴，认为穆斯林已经偏离了真主与《古兰经》的启示，必须回归正道。在此过程中，他试图纠正在他看来与信仰背道而驰的当代伊斯兰践行。例如，他谴责那些对

《古兰经》的正统解释,认为是对真主的亵渎与犯罪。在他看来,《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每一个阿拉伯人都可阅读它,运用它,而不需要其他人帮助。他同样批评了《圣训》,也就是《穆罕默德言行录》,理由是《古兰经》是唯一真实的真主语言。

尽管不能过分夸大第三世界理论的最根本元素与清教徒式的赛努西教团之间的相同之处,但他认为,二者具有某些继承关系。例如,赛努西教团努力推进伊斯兰团结,接受《古兰经》与《训纳》为穆斯林生活的基础,贬低伊斯兰法各派别的作用。卡扎菲在革命初期的几年以相同的口吻强调了这些宗教的基本层面,部分是因为他们为革命政府构建合法性提供服务。当卡扎菲成功地控制并巩固了"九月革命"的成果后,他的治国之道如果说具有世俗化倾向的话,也逐渐具有改革者的风范。

卡扎菲在 1969 年 9 月 1 日军事政变之初就不断强调,利比亚所发生的一切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变,而是社会经济与政治革命。他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改变政权,或者说是用一个政府替换另一个政府。相反,他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不需要政府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卡扎菲及其知己早期强调,革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使他们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巩固新政权以及界定"九月革命"的性质。卡扎菲开始阐述第三世界理论也标志着该理论即将结束,正如对该理论的反对预示着该理论结束的先兆一样。1973 年后,在卡扎菲的领导下,利比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的国内外政策步入一条日益激进的外交路径。

160

第七章　革命在行动(1973－1986)

政府的工具性是人类群体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

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1975

人民管理权威政府是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众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本应该拥有政府。人民通过民众大会、民众委员会、企业联合会、工会、专业社团与总人民大会执行他们的权威。

人民政府成立时的声明,1977年3月

不要对以下事实持一点怀疑:即利比亚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利比亚政府是一个喜欢在国际事务中挑衅的麻烦制造者,不是一个跟权威作对的国家。在这里,统治者可以任意武断地制定并使用规则,变化莫测地侵犯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大多数西方人与利比亚人都希望确保这些领域有稳定的秩序。

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利比亚政治》(*Libyan Politics*, 1987)

国际社会应该像对待贱民那样对待卡扎菲。

罗纳德·里根,1986年1月

革命指挥委员会在革命初期的政策表现的充满活力,行为更具挑衅性,如让西方国家撤出军事基地、提高油价。更谨慎的动作是,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某些领域尝试性地推进改革。回头来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大使等行政官员在界定革命时遇到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很大程度上,年轻的革命者经常对革命的发展没有什么信心,仍然处在自我界定的过程之中。"九月革命"即给了他们经验与信心,也带给他们经济、政治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力量与动力。就在革命指挥委员会重新塑造利比亚社会之时,他们的外交政策也更具进攻性,公开挑战非洲、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现存秩序。 161

《绿皮书》

穆阿迈尔·卡扎菲在推翻君主制政权6年后,开始总结其意识形态的理论原则,出版了三本系列小册子,总页数不超过100页,总称为《绿皮书》。《绿皮书》的出版标志着卡扎菲的革命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一过程包括许多可以感知的不同阶段,但各阶段之间并不总是截然不同。第一阶段始于卡扎菲在塞卜哈和米苏拉塔的学生时代,属于探索与学习时期。第二阶段始于"九月革命"的早期岁月。由于卡扎菲青年时期深受埃及总统纳赛尔言行的影响,处事风格与理想追求具有纳赛尔主义的特色。第三阶段始于1973年4月,卡扎菲在厌倦了难以在利比亚引起共鸣的埃及革命意识形态后,发起了民众革命。在随后3年里,他通过阐述第三世界理论,对初生的政治结构进行实验,为革命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阶段始于1975年秋,卡扎菲出版了《绿皮书》的第一部分,以及同时在政治系统进行的较大范围变革。这一阶段由于1977年3月发布成立民众权威机构的《宣言》而达到高峰。 162

《绿皮书》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民主问题的解决之道——'民众的权威'",主要阐述了卡扎菲直接民主的理论基础以及在利比亚执行的、

以大会与委员会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的特征[1]。卡扎菲在第一部分指出,统治功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他认为,在政治选举活动中,候选人获得51%的选票,其结果就是产生一个"错误民主掩盖下的独裁政府",因为49%的选民将受到强加于身上的治理工具的统治。他不屑于西方的议会民主,视之为"对民众意志的扭曲",认为议会政府是对"民主问题解决方法的误导"。政党制度是"现代独裁政府的工具",因为它使"统治民众的那些具有共同观点与利益的人群成为一个整体"。他的观点变成一些革命性的口号:即"代表就是欺骗行为","任何代表都不能重复代替人民"。

卡扎菲解决代议民主尴尬困境的方式,就是推进直接民主,也就是在利比亚成立全国人民大会与人民委员会。他强调了民主就是"人民监督人民","没有全国各地的民众大会与民众委员会就没有民主"。卡扎菲概括了直接民主的制度,相对准确地阐述了将要执行中的政府结构与制度。然而,很明显,这些讨论很简洁,一个简单图表就能对此加以说明。《绿皮书》的早期版本在用简单图表清晰阐述直接民主方面做得并不够,因为该图表可能表达了不同团体组成多元化等级组织的基本结构。图表中的单元并没有图表说明或用文本进行详细解释,图表中各种各样的长方形、正方形与三角形之间的关联也没有阐述清楚。此外,革命指挥委员会的角色被忽视了,它对诸如如何分配财富、谁控制或使用暴力等政治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绿皮书》后来的版本提出了一个经过修订,能够更准确、更容易地理解直接民主的圆形图表,这也是整本书中唯一的图表。

163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得出的结论令人费解,似乎与他早期关于直接民主的言论自相矛盾。他的结论是:"从理论上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说,前者总是喜欢统治,也就是说,社会中的强者是统治者。"利比亚权力机构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对立,这一特点在随后几年的发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与卡扎菲雄辩言辞相反的是,利比亚政治体系较为集权化;政治与经济发展等重大决策均掌握在卡扎菲及其少数亲信手中,民众并不直接管理与利比亚政权生存攸关

的政治机构与经济部门。

《绿皮书》第二部分的标题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出路——社会主义”,首次出版时间是1978年[2]。卡扎菲在第一部分拒绝东西方政治体系,第二部分拒绝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结论是社会主义是经济秩序的最优化选择。他认为,挣工资者成为雇主的奴隶,解决之道就是废除工资制度,将人类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绿皮书》第一部分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是:“权力属于人民”;第二部分体现的经济思想总结起来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挣工资者”。卡扎菲认为,“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接受财富不均等现象。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卡扎菲进行了改变传统社会经济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平等、公平的社会。尽管《绿皮书》的视野宽阔,内容厚实,但整体来说,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提及。《绿皮书》第二部分暴露了卡扎菲经济思想过分的简单化和不足之处,使人联想起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实验。

164

《绿皮书》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第三世界理论的社会基础”,考察了第三世界理论的社会基础集中在家族、部族与国家层面[3]。这一部分出版于1979年,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无疑也是理论性最强的部分。大致来说,这一部分尝试性地考察个人,特别是妇女在伊斯兰社会中的角色。卡扎菲指出,家庭是最基础的社会单元,男人与女人只有承担起各自的天职,才能产生和谐的家庭生活。他要证明以下观点:即男人与女人都是平等的,诸如结婚与离婚等行为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卡扎菲虽然认为应该男女平等,但又认为由于存在以优越感与卑微感为特征的性别歧视,二者不应该做同样的事情。他说,由于男女生物意义上的不同,二者都有自己的角色,都不能放弃自然赋予他们的职责。如果说卡扎菲在《绿皮书》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政治观点,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经济观点,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提出一个较保守的社会价值观。

实践证明,《绿皮书》第一部分的影响最为持久深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比亚的政治制度经历了较少的重大变革。随后的30

年间，卡扎菲不断强调利比亚直接民主优越于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末，利比亚逐渐改变了《绿皮书》第二部分所概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战略，也就是利比亚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所执行的经济战略。21 世纪初，利比亚开始努力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广度与深度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而《绿皮书》的第三部分是最有争议的，由于其表现了卡扎菲思想的狭隘保守、自相矛盾的一面，提出了诸如在妇女、教育、少数族群、艺术与运动方面的一些保守的观点，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

165

直接民众当局

1975 年 8 月，革命指挥委员会内部对卡扎菲分配型经济方式进行激烈辩论，最后致使两名成员贝希尔·萨希尔·哈瓦迪和奥马尔·蒙西斯发动未遂政变。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有秩序的、专家治国的方式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未遂政变前夕，革命指挥委员会的 12 名成员中只有 5 名成员一直在革命政府中任职，并一直持续到 1996 年末。这 5 人是：卡扎菲、阿布·伯克尔·尤尼斯·贾比尔、韦迪·哈美迪、穆斯塔法·哈卢比和阿卜杜勒·萨拉姆·贾鲁德，他们构成革命政权的领导层。未遂政变是利比亚历史的分水岭。此后，卡扎菲开始追求一种“无国家社会”，将大量金钱用于购买武器与对外冒险活动。未遂政变还结束了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为政治机构的职能（1977 年 3 月被正式废除），破坏了学者决策表面虚饰的东西，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人集权统治的道路。

就在政变发生前夕，卡扎菲按照《绿皮书》第一部分的安排，于 1975 年 9 月进行了第四次政治改革。他不满意于人民委员会制度下民众参与的水平。新阶段设计的蓝图就是增加民众动员的能量水准。具体目标为：增进人民委员会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减少冲突与竞争的关系，竞争是二者关系的典型特征。

166

直接民主制度的底层保留了以下制度，即地区委员会全体委员由地区民众直接选举，并从地区委员会中选举地区基层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在此层面，最重大的变革就是，要求每一个基层人民委员会从其

全体成员中选举一个更小的人民委员会,对大会负有行政管理职能。政治权威委托给地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其成员从基层人民委员会中选举产生。每一个基层人民大会的主席必须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这一规定提高了后者的地位。在该制度的高层,卡扎菲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水平的代表实体,名为总人民大会(GPC),他自任该组织的秘书长,秘书长与其他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组成秘书处。

地区人民委员会和地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主席与副主席自动成为总人民大会的代表。总人民大会每年举行会议并安排会议日程,成为革命指挥委员会以及地区人民大会制定政策,安排计划与草拟,讨论、批准发展项目的主要场所。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工会与人民委员会成员有批准、执行国家政策与发展计划项目的职责。1976 年初,总人民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总秘书处向大会提交了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建议,包括 1976 年的行政预算,1976 至 1978 年的发展预算,请求大会审阅与授权。这一做法使大多数观察家感到震惊。

1977 年 3 月 2 日,卡扎菲宣布成立所谓的"人民权威政府",阐明了新政府的权利与结构。利比亚官方名称为"大利比亚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认定《古兰经》是社会的法律基础。卡扎菲宣布在"民众时代的黎明""成立人民权威政府"。民众国是卡扎菲创造的新词,用来描述以民众统治为标志的政治体系,但这种制度不允许政党及其代表存在。由于民众管理权威机构是这种新制度的基础,利比亚人通过以下机构行使自己的权威:如人民大会、人民委员会、企业联合会、工会、专业组织,以及总人民大会。

167

1975 至 1977 年,利比亚为了促进政治参与与民众动员力度,在慎重考虑各种限制因素的条件下进行了制度变革,以减少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与人民委员会之间的权力之争,给予总人民大会有限的政策审查与批准权。总人民大会的秘书处加强了革命性的控制,限制政治组织的成立与活动。工人被迫加入工会,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当人民大会与人民委员会的活动给国家制造混乱,或他们的建议与总秘书处不一致时,就要举行重新选举。

与此同时,卡扎菲政权推进政治改革与制度变革,以修正主义者对利比亚历史的解释,积极促进意识形态变迁。利比亚研究中心是卡扎菲政权建立的少数研究单位之一,成立于 1978 年,以研究利比亚人反对意大利占领的吉哈德而闻名。这些单位主要以"九月革命"为意识形态原则对利比亚历史进行重新诠释,并没有放弃利比亚史前与古代时期那些严肃学问的研究。然而,利比亚政权特别鼓励对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占领利比亚这段历史的研究,对赛努西教团的地位给予了适当的评价,特别强调了谢赫在抵抗意大利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关于该家族的负面信息也随处可见。

168

除了记录诸如奥马尔·穆赫塔尔等抵御外敌的英雄人物,叙述一些重大军事战争以外,许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奥斯曼帝国军官在抵御意大利占领时所做出的表率与鼓动作用。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还强调了的黎波里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护的黎波里塔尼亚民众利益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利比亚研究中心与类似研究机构出版的成果,都是由专业精深的历史学家所提供的,他们从官方的立场出发,以革命的视角对利比亚社会进行解释,认为利比亚社会是一个具有内聚力、民族主义者的、反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实体,忠诚于阿拉伯—穆斯林文化。

在此过程中,许多历史解释经常发生迅速而剧烈的变化。由于政权的兴趣与其支持的历史研究之间的联系较密切,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让人质疑历史研究的政治附属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种变动的政治气候中,想让学者满怀热忱地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他们仅限于进入利比亚图书馆的某些区域阅读资料,这比 10 年后开放领域要少得多。1984 年,一位美国培养的利比亚历史学家警告突尼斯读者,官方历史完全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目的服务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时,卡扎菲政权的意识形态架构可能已经得以巩固,个别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会发现,其利用价值已经结束,或被遗忘。

1978 年 9 月 1 日,卡扎菲呼吁恢复人民委员会制度,削除国有部门的官僚主义,以及私营部门的权威独裁现象。采取的措施是,上百家公司被新选举的人民委员会接管,这些委员会在成立之前要经过必要

的选举，使其饱怀革命激情，忠诚并取悦于卡扎菲。1979 年 2 月 3 日，总人民委员会或内阁被宣布重新改组，部长人数从 26 人减少到 19 人。随后几年，革命政权的显著特征就是：内阁不断重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阻止那些位高权重的个人挑战卡扎菲的权威。

169

1978 年 12 月，卡扎菲宣布辞去总人民大会秘书长职位，将政府职能与革命职能分离开来。他还正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绿皮书》中没有提及的一个新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行使职权抵制人民委员会与人民大会制度长期存在的懒散现象，不过这种抵制略显迟缓。自从 1976 年以来，卡扎菲一直强调减少旷工现象的必要意义。早在 1977 年 11 月，的黎波里的法塔赫大学成立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到 1978 年末，革命委员会的松散网络已经在全国建立起来，渗透到人民大会、人民委员会以及大学院系等部门。由于没有规定具体任务，它们执行的任务大都与意识形态层面有关，包括指导民众、捍卫革命，虽然开始没有承担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责，但随后这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

170

1979 年 3 月《宣言》发表后，利比亚政府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人民大会、学校、工厂、政府与军队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吸引一些自称"狂热分子"的人士加入其中，他们真正想成为革命的干将。人民委员会向总人民大会负责，行使行政职责。而革命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不一样，直接向革命领导人负责，主要责任是监督或推进整个利比亚社会的革命激情。从 1979 年开始，卡扎菲每年会见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一次，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协调办公室在此期间协调他们的活动。

革命委员会刚开始并没有正式权利，不久就被授权从事一些与反革命政权有关的逮捕活动，并成立革命法院，对革命政府的正义形象造成了消极影响。群众间举报案件的激增，给利比亚民众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后来在利比亚作家希沙姆·马塔尔的作品《人类国家》中有生动的表述。下面这段文字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位年轻的利比亚男孩描述自己在 1979 年目睹他朋友的父亲在国家篮球体育馆被处决并电视直播的场面。被处决者是被自己的邻居告发的，这对他的心灵造

成了巨大的影响。

> 处决乌斯塔赫·拉希德(Ustath Rashid)的电视直播画面除了使我不再相信"好人有好报"这一说法外,给我留下更持久的印象是,我是否能活到成年。那是一种让人非常恐慌的感觉,似乎某些人随时会拆我的台。乌斯塔赫·拉希德死后,我没有幻想我与爸爸或妈妈能够幸免国家篮球体育馆里那种疯狂火焰的毁灭性燃烧。[4]

与《绿皮书》指导原则以及人民权威机构成立宣言相矛盾的是,到171 1979年初,革命委员会主导了人民大会的活动,并有效地控制了总人民大会的活动议程。卡扎菲在1979年4月决定在武装军队中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又在1979年11月呼吁在警察队伍中成立该组织。1979年,革命委员会开始出版自己的周刊《绿色三月》(*al-Zahf al-Akhdar*)。1980年,又增加了《民众国》(*Jamahiriyya*)杂志。这些杂志成为政权宣传方针政策的喉舌、革命的脉搏。革命委员会还在国外积极活动,主要任务是对敌视利比亚革命政权的国家执行反革命战略,这一政策导致报复与暗杀活动频繁,利比亚与西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1980年10月,利比亚通讯社被革命委员会占领并接管。[5]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经过一段时间谨慎的实验,利比亚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绿皮书》第二部分界定了人类基本需要是住房、收入、交通工具,指责出租房屋与租赁车辆是侵犯了其他人的主要需求。1978年3月,总人民大会秘书处发布了《第四号决议》,制定了房屋再分配的严格指导原则,对房屋所有权作了规定:任何家庭都没有权利拥有一套以上住房,仅有下述少数情况例外,就是以出租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寡妇,或者至少有一个儿子超过18岁的家庭。利比亚各省成立执行该决议的委员会。到1978年7月,市政当局秘书

处的常务秘书宣布,已经接管并重新分配了政府部门与私人公司所拥有的住房与公寓。住房重新分配的第二阶段是接管私人拥有的住房,由于法律条款的限制以及复杂人际关系,这次接管花费了较长时间。住房重新分配政策受到租房者的欢迎,因为按照新规定,每月交纳的抵押金是以前租金的三分之一。此外,利比亚政府故意将房屋估价较低,又给购买者提供变相补贴,其结果是,新房的支付价格也就是实际价格的40%。

172

1978年秋,卡扎菲鼓励公有部门与私有部门自主管理,工人们匆忙间接管了大约200多个公司。从1979年开始,的黎波里西部贾法拉平原的大面积土地被重新分配,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1980至1981年。1980年5月,利比亚宣布,面值大于1第纳尔的所有货币都作废,给居民一周时间来兑换货币。由于设定了最大兑换数额为1 000第纳尔的限制,超过限制数量的所有存款均遭冻结。货币废止运动据称是一种率直的社会主义措施,以达到再分配财富的目的。小说家希沙姆·马塔尔在《人类国家》里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货币变革的影响,但他故事里叙述的事比实际发生时间早一年。

> 1979年,就在我被派往开罗后的几天,利比亚全民被限定在三天之内将流动资金储蓄到国家银行。革命政府重新设计了国家货币,民众得到答复是为了庆祝革命第十周年纪念日。当民众带着一袋袋硬币、一箱箱纸币或一卡车的钱来存储,得到的答复是,撤销私人银行后,他们每年储蓄量仅限于1 000第纳尔。这一政策对我的父母造成极坏的影响,他们每月的收入都超过这一数目。第二年,许多使用效率较高的私人存款账户被取消,我的父母看着他们的钱"像盐在水中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6]

最后,总人民大会在1981年初宣布,国家在本年末将接管所有的进口、出口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职能。未来进口仅限于10个国家的进口代理机构,进口范围从先进的油气技术到基本食品供给。革命政权为

了替换本地企业家,在全国成立国家超级市场。与此同时,革命政府取消了宗教捐赠的财产,有效地削弱了宗教领导人在利比亚拥有的有限经济权力。

如果社会主义被界定为财富与资源的再分配,那么,1969年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发生的一切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经济管理的目的与影响越来越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住房、资本与土地都被大规模地重新分配,或者正处于重新分配之中。私人企业实际上已经被消灭,成为中央控制下的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利比亚比其邻国更具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卡扎菲是否于1969年在利比亚建成社会主义还不能肯定,但到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主义特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很明显,在利比亚,说教与理论一般先行于实践。再者,革命政权日益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从而对国家的发展目标产生负面影响,有时社会动荡连续几周,使政治精英的决策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权力与财富的大范围重新分配,也对许多利比亚人的经济收入产生消极影响,反对革命政权的人与日俱增。在革命的第一个10年,迅速增长的石油收入使政府以慷慨赠送的方式进行财富分配,缓和了卡扎菲革命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支持革命政权的民众占据利比亚总人口的大多数。人均收入从1951年约35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2 200美元,10年后(1979年)为1万美元。住房重新分配对财产持有者是一件烦恼的事情,但随后的公平补偿以及安置个人家庭,也缓和了官方政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反对革命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势头日益迅猛,主要原因是油价下跌导致石油收入的锐减。这将意味着革命政府不再有多余的物质资源来换取民众的一致意见。与经济紧缩政策相比,卡扎菲与宗教势力斗争以及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更能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利比亚国内出现了大量的、报酬昂贵的并且社会上非常活跃的外国劳动力,这更激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人们对革命政权提出的诸如“合作者,非挣工资者”的口号进行讥讽。

174

利比亚国外的反对力量也在与日俱增。革命也制造了大量流落异乡的政敌，包括被剥夺权力的君主制精英，被卡扎菲抛弃的革命追随者，权力遭到严格限制的宗教领袖，以及反对“九月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普通民众。利比亚国外出现了大量有组织的反政府团体，最著名的有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该组织成立于 1981 年，领导者是穆罕默德·穆格哈伊夫。

1975 年后，利比亚革命政权转向激进社会主义，包括成立类似的司法系统来回避普通法院的职能，其后果是长期忽视了成文法典的执行，也不顾个人自由以及保护基本人权。革命法院的全体职员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不是经过正规培训的法官，他们不受《刑法》束缚。相反，革命法院系统经常不顾正常的法律保障，导致许多证据确凿但被滥用职权而误判的案件。1981 年 5 月，利比亚取消了专业人士从事法律业务的规定。革命委员会法院系统清除了最后一个约束力量。在随后的 7 年里，革命政权无视法律规则，司法系统被独断，压制民众自由，利比亚国内局势日益紧张。[7]

碳氢政策

1974 年，利比亚政府将当时对石油公司的让步协议转变成开发生产共享协议，油气管理规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协议第一阶段规定有 35 年的期限，其中 5 年用于资源勘探，30 年用于石油生产。协议要求石油利润将以 85∶15 的比例分成，海底石油开发将以 81∶19 的比例分成，利比亚政府获取较大的份额。为了鼓励石油勘探的时间与效率，他们规定勘探石油的最长期限是 5 年，如果到期没有石油，则合同自动作废。利比亚政府要求石油公司花费大约 5 亿美元用于勘探活动，后果自负；但他们开发出的所有原油份额将免交手续费、租赁费、矿区开采费、税收，以及国家索要的其他费用。西方石油公司是与利比亚签署此项合同的第一个石油公司。到 1978 年，埃克森(Exxon)、美孚(Mobil)、道达尔(Total)、埃尔夫阿奎坦(Elf Aquitaine)、巴拉斯颇里欧(Braspero)与阿格里普(Agrip)等石油公司，都与利比亚签署了类似

175

协议。

从1980年开始,利比亚颁布第二阶段协议的修改条款,反映了利比亚对石油储备枯竭的担心。1970年3月,利比亚成立的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公司一起在利比亚进行石油开发,但它们都没有足够能力开发新矿藏来补充国家日益减少的石油储藏量。除了惯性思维外,政治考量与商业利益也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初,利比亚追求一种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利比亚开始让东欧国家参与碳氢工业。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意识到东欧国家财力有限,遂反对卡扎菲的政治决策。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国家石油公司与匈牙利国家石油公司在第二阶段都得到一大片石油开采地块。随着利比亚与美国关系的恶化,致使美国石油生产者重新考虑在利比亚的投资战略。由此可见,利比亚政府决定扩大潜在石油投资国的渠道似乎是明智而审慎的。1981年11月,埃克森石油公司宣布从利比亚全部撤出。美孚石油公司与利比亚政府谈判了几个月,看到没有成功的迹象,也宣布在1983年1月撤出利比亚。

176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第二阶段按照开采区域的潜在矿藏资源的多少分享石油收益份额。高级别特许公司的分享份额是85∶15,利比亚占有较大份额;中等级别特许公司的分享份额为81∶19;前景不太好的地段的分享份额为75∶25。所有石油公司必须在第二阶段签署合同,预期在合同签署的前5年用于石油勘探活动的花费大约有10亿美元。两个阶段的最终结果是:共勘探了694口井,270口井成功地打出了石油;发现了约80亿桶的原油储量和4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新发现油田的石油储藏量可以使利比亚石油日产量增加25万桶。

1986年,美国命令所有美国石油公司撤出利比亚,并开始对利比亚革命政权进行全面的单边制裁。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恶化,利比亚采取措施巩固与欧洲公司的关系,购买了欧洲石油公司泰姆的大多数股份。该公司本部位于欧洲,以提炼石油为主。此外,利比亚政府还有800多个零售渠道,包括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与瑞士等国。从一

开始,利比亚碳氢政策的基本构想就是避免让国际大公司主导本国石油格局,以上政策再加上革命政府向欧洲市场进军的战略,使利比亚在美国石油公司撤出后,尽管石油产量没有增加,但仍能维持油价 10 年不下跌的基本目标。

1988 年,利比亚宣布第三阶段正式开始,增加了鼓励石油公司重返利比亚的激励条件,以促进石油资源的开发。按照开发地段的前景,协议的条款再次发生变动,提高了石油公司的收益份额。前景最好的地段的分成比例是 70∶30;较次地段的分成比例为 65∶35。勘探费用从未来的生产收益中扣除,但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并不同意在第三阶段与石油公司共同承担开发费用。第三阶段实行更宽松条款的原因是,油价下跌致使石油收入锐减,利比亚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正经历着严重的资金流转困难。1981 至 1986 年,利比亚年石油收入从 210 亿美元减少到 54 亿美元,迫使革命政权重新考量其宏观经济战略与传统意义上的慷慨馈赠式分配政策。为了应对美国制裁和大规模发展项目的费用,如米苏拉塔钢铁工厂与大人工河工程,利比亚不得不对经济发展计划作出必要的调整;巨大的国防与军事费用使利比亚经济雪上加霜。到 1995 年,25 家外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从事石油勘探。可以说,第三阶段成功地吸引了新的石油勘探公司,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勘探活动都没有什么收获。

177

对抗西方

华盛顿在经过一段尝试性地讨好利比亚新政府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行一种矛盾的政策。虽然美国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趋向恶化,但商业交往仍处于常态。在此期间,利比亚从苏联购买武器,成为苏联在阿拉伯地区最可靠的代理人,但购买武器数量太大,远远超出军队能够使用的数量。与此同时,利比亚与西方保持亲密的商业联系,将大量石油出售给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以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利比亚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选还是美国与欧洲,不愿到苏联留学。再者,卡扎菲一直公开声称自己与美国人民的友谊,甚至两国的官方关系

不断恶化时也是如此。

长期的政策分歧是美国及其盟友与利比亚关系恶化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是关键因素，因为利比亚支持巴勒斯坦人，对其整个中东和平进程解决方案以及其他地区的政策产生深刻影响。利比亚挑衅性地指责1978年《以色列一埃及和平协议》，领导阿拉伯人孤立埃及，致使利比亚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最后一批支持者也不复存在了。1980年1月，利比亚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斯兰会议上，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持温和态度，认为大会应该采取同样强硬政策反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美国的态度因此更加强硬起来。

随着利比亚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认同与靠近，其在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形象被近一步破坏。革命指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热衷于将支持恐怖主义作为有用且有效的策略，特别是在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尤其如此。1972年，慕尼黑发生大屠杀事件，11名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惨死。卡扎菲对在飞往的黎波里途中死亡的11名阿拉伯游击队员的尸体给予烈士的礼遇埋葬。甚至在1973年“十月战争”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势力得以壮大，地位得以提高，更证明了石油是比恐怖主义更有效的武器，但利比亚仍然继续支持与利用恐怖主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恐怖主义在孤立的情况下会更为弱小，并在1975年宣布，劫持飞机、轮船或火车并伴有人员死亡的，等于犯了死罪。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识到恐怖主义行为达不到预期目的，但利比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卡扎菲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使用武力，特别是恐怖主义问题上存在争议，最后致使二者长期反目。在1979年巴勒斯坦团结日上，卡扎菲呼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攻以色列，袭击支持以色列的苏伊士运河。后来，他又抨击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指责他们的政策是模仿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投降主义”的政策，出卖了巴勒斯坦人民。卡扎菲批评阿拉法特及其法塔赫的核心观点就是他们对西方的温和态度，而当时利比亚，可能还有伊拉克、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真正的抵抗主义者。此后，卡扎菲将

大量时间与注意力集中在区分革命暴力与恐怖主义。他继续支持革命暴力,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美国没有看到二者的区别,1979 年美国国务院将利比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

1979 年末,利比亚与美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当时利比亚的示威者洗劫了美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威廉姆·伊格尔顿当时负责美国驻利比亚事务,后担任美国驻叙利亚大使。他在回忆中指出,该事件具有"有计划的军事武装"的特点[8]。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海军部队撤走后,美国大使馆一直处于利比亚外交事务部的保护之下。然而,当美国大使馆遭受利比亚民众进攻时,竟然没有军队给予保护。相反,利比亚当局抱怨美国大使馆使用催泪瓦斯对付进攻的利比亚民众,使他们得了病。

1980 年 1 月初,利比亚支持的突击队袭击了突尼斯城镇加夫萨,利比亚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关系继续恶化。巴黎向该地区派遣了军用飞机与战舰,支持突尼斯政府;华盛顿也加速对突尼斯的军事援助项目。利比亚在发出新一轮进攻的信号后,法国撤回其大使,美国关闭其大使馆。到 1980 年夏,利比亚飞机在地中海拦截美国飞机,美国与利比亚关系出现了自 1804 年美国轰炸的黎波里以来最为紧张的时刻。

1981 年 1 月,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在外交、经济与军事层面对利比亚施加压力。卡扎菲被不公平也不准确地污蔑为苏联的傀儡,并被认为如果不被换掉,也应该接受管束。里根政府上台的一年之内,基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利比亚的商业与外交政策的措辞。美国政府以利比亚言语挑衅、行为不当为由,关闭了利比亚驻美国大使馆。利比亚人必须服从强制性的安全咨询意见。美国政府建议在利比亚的美国石油公司有秩序地减少美国员工的数目。在此过程中,里根政府逐渐认识到卡扎菲不是简单的多事客,而是敌人[9]。

18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与利比亚的商业与外交关系日益密切。1977 年,卡扎菲受邀到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苏联以不断提供军事技术援助作为报答利比亚支付的硬通货。利比亚接受了这些援助,但没有公布苏联确切的武器供应数量。这次援助数额巨大,并配备了

上千名苏联顾问。苏联主要想获得硬通货,并将利比亚视为本国石油资源枯竭后潜在的石油供给源。此外,利比亚一直批评西方,支持苏联在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

从利比亚方面来看,卡扎菲没有兑现在 1978 年以加入华沙条约威胁美国的诺言。然而不断谣传的黎波里与莫斯科可能签署一项长达 20 年的友好与合作协定,该协定同苏联与伊拉克、南也门与叙利亚签署的条约相似。1978 年,苏联同意在利比亚修建一个核电站与研究中心,具有 300 兆瓦的功率。到 1981 年,两国商讨在核项目上进一步扩大合作,包括修建一个 400 兆瓦的核电站。卡扎菲在 1981 年访问莫斯科期间,两国签署了许多技术与经济合作协议,涵盖领域包括油气、有色金属与灌溉工程。利比亚继续从苏联获得先进的武器。据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利比亚有 5.5 万人的军队,军人装备精良,配备的先进武器比率在世界上位于前列。

181

然而,苏联并没有得到永久使用利比亚港口或加油设施的优惠待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的目标就是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控制利比亚军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利比亚对苏联的政策反映了卡扎菲在世界大国角逐中维持中立的决心。这也突出说明了利比亚的民众主义、伊斯兰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观点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重大政策上对利比亚的看法与美国不同。许多分析人士承认卡扎菲的反西方行为,但认为他并没有美国所说的那样危险。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指出卡扎菲在乍得与乌干达的失败外交实例,并指出他与中东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关系的疏远。许多欧洲人认为,孤立卡扎菲是错误的举动,反而使他成为国际社会的榜样,也是里根总统拒绝接受的榜样。相反,这些欧洲观察家赞成与利比亚进行对话,保护西方经济利益,免于利比亚与苏联的关系越走越近。

里根总统并没有放弃遏制手段,继续向卡扎菲政权施压。1982 年 3 月,美国以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压制国内民众为由,宣布对利比亚实施石油禁运,要求美国销往利比亚的商品必须具有进出口许可证,但

食品、医药与医疗器械等除外。这一姿态标志着自1969年以来,美国一直追求的政经分离政策已经结束,但这一声明在当时并没有引发过多的讨论。华盛顿鼓励欧洲国家支持制裁利比亚的立场,但由于种种原因,后者都婉言谢绝。

1985年11月,美国禁止从利比亚进口所有石油产品。1985年12月,美国结束与利比亚的直接经济活动,冻结利比亚在美国的财产,要求工作在利比亚的美国人返回本国。1986年,里根总统的官方言辞更为严厉,将卡扎菲称之为"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贱民"。1986年春的"地中海事件"说明两国不可避免的走向武装冲突,开战理由是美国向利比亚声称的苏尔特湾主权发起挑战。就在苏尔特湾对抗不断升级时,西柏林发生了"拉贝莱迪厅爆炸事件"。1986年4月14日夜晚,美国战机攻击了班加西与的黎波里。里根总统称这里是利比亚恐怖主义活动与训练的大本营。美国飞机轰炸的目标是卡扎菲居住地阿齐齐亚军营。这种袭击方法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82

阿拉伯人的分裂

1972年2月,卡扎菲建议在1973年9月1日或之前利比亚与埃及实现合并。随着合并日期的临近,卡扎菲预感到埃及政府与埃及民众对两国合并还有另外的考量。因此,1973年6月,卡扎菲在事先未安排的情况下突访埃及。在访问期间,他批评了埃及的政策与社会现实,这也似乎宣告了两国合并难免失败的命运。埃及与利比亚确实同意在1973年8月成立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集团,含糊其辞地规定了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合并的原则。很明显,卡扎菲并不满意埃及的这种妥协措施,而是要求两国立即、彻底地实现政治层面的合并。

1973年"十月战争"进一步将利比亚孤立在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之外。战争的后果提高了萨达特政权在埃及国内的政治地位,加快了他调整与改革埃及国内外政策的速度,完全打乱了利比亚苛求的阿拉伯统一的政策诉求。埃及彻底调整其地区盟友格局,以德黑兰—利雅得—开罗为轴心替换了昔日的大马士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罗为

183 轴心的布局。在中东地区之外,美国与西欧替代苏联与第三世界成为埃及的盟友。

卡扎菲在马什里克碰壁,随后将注意力转向马格里布地区。1974年1月,利比亚与突尼斯宣布两国合并,成立伊斯兰阿拉伯共和国。这一做法符合当时卡扎菲的地区集团的构建模式,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其发生的时间,似乎表明是卡扎菲被埃及拒绝而进行的赌气之举。事实证明,利比亚的建议缺乏周密的计划,合并行为遭到邻国阿尔及利亚的强烈反对。其最后结果是,突尼斯经过再三考量,所谓的杰尔巴岛联合在不到一月就胎死腹中。谈判失败后,利比亚与突尼斯外交关系恶化。据说突尼斯的游击队在利比亚接受训练,并在1980年1月末跨越两国边界进攻突尼斯城镇加夫萨。突尼斯政府军镇压了叛军,并确信这次进攻即使不是利比亚组织的,也得到利比亚的支持。突尼斯召回了驻的黎波里大使,关闭了突尼斯的利比亚文化中心。

1973年"十月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利比亚在北非寻求盟友并不仅限于突尼斯。卡扎菲也企图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建立外交关系。1971至1972年,利比亚与摩洛哥断绝关系,原因是后者断言利比亚支持叛乱分子,计划推翻侯赛因国王的统治。利比亚与摩洛哥关系在"十月战争"后的一段时间有所改善,但1975年后因卡扎菲批评摩洛哥干预西撒哈拉事务,两国关系再次恶化。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的关系在杰尔巴岛联合破产后有一段不快。1975年后,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两国签署联合防御协定。根据《梅沙欧德泉协定》的条款,阿尔及利亚成为利比亚重要的地区盟友,也是北非地区的重要保护者[10]。1977年7月,埃及对昔兰尼加沙漠地区,也就是靠近埃及西部边界的利比亚军事设施进行规模有限的空中与地面打击。阿尔及利亚站在利比亚一边并派军队干预。作为回报,利比亚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支持阿尔及利亚对184 抗摩洛哥,并为西撒哈拉独立阵线提供军事援助。

此后,卡扎菲继续通过政治联合手段推行其实现阿拉伯统一的理念。例如,1980年利比亚与叙利亚的联合;1981年,利比亚与乍得的联合;1984年,利比亚与摩洛哥再次联合。然而,他的理念大都没人理

会。1976年,泛阿拉伯主义似乎让大多数国家感到疲惫不堪,失去了昔日魅力。1973年后,传统的阿拉伯竞争对手在“十月战争”前夕再次出现,阿拉伯联合已经名存实亡。最终,卡扎菲放弃阿拉伯统一的梦想,与阿拉伯世界断绝关系,转而积极投身于非洲统一运动。

第三个圈

与赛努西君主制政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政府在“九月革命”的第一个10年就深度参与非洲事务。卡扎菲从来没有正式采纳纳赛尔提出的“三个圈战略”,即将注意力集中于阿拉伯、非洲与伊斯兰世界。但非洲事实上成为利比亚对外政策的第三个圈。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非洲成为利比亚外交与宣传革命理念的舞台,最终成为卡扎菲革命政权收获外交胜利的地方,其成果令人震惊[11]。

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东,利比亚的非洲外交初始对象是穆斯林邻国,如喀麦隆、毛里塔尼亚与尼日尔。这些外交尝试的首要目标是削弱以色列在非洲的影响。卡扎菲认为,以色列出现在非洲无异于从背后削弱阿拉伯力量的“第五纵队”。次要目标包括反对西方的影响,清除外国人的基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支持非洲解放运动,宣传伊斯兰教,控制本地区资源。

为了遏制以色列的影响,革命指挥委员会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向后者提供经济援助,敦促他们与以色列断交。到1973年年中,马里、尼日尔、刚果与布隆迪都与以色列断交。与此同时,利比亚开始在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该组织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一直持中立态度。的黎波里鼓励成员国与以色列断绝关系,建议将非洲统一组织的所在地从埃塞俄比亚移到另一个更有利于非洲自由与统一的国家。

185

1973年“十月战争”前夕,利比亚巧妙地利用非洲国家关心石油禁运与油价上升问题向非洲国家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放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中立态度,摆脱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到1973年末,与以色列断交的国家又增加了20多个,许多国家第一次与利比亚建立外交关

系。到1974年初,利比亚大体上完成其在非洲的最佳目标,减少了以色列的影响,填补了以色列留下的影响真空。

与此同时,利比亚通过清理西方国家军事力量,逐渐改变非洲温和国家对利比亚政策的反对态度,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量。利比亚援助非洲解放运动,支持那些激进的、反西方国家的政府,并多次指责由南非少数白人控制的政权。利比亚还向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国家的解放运动提供军事援助。1973年,利比亚取消了到南非的航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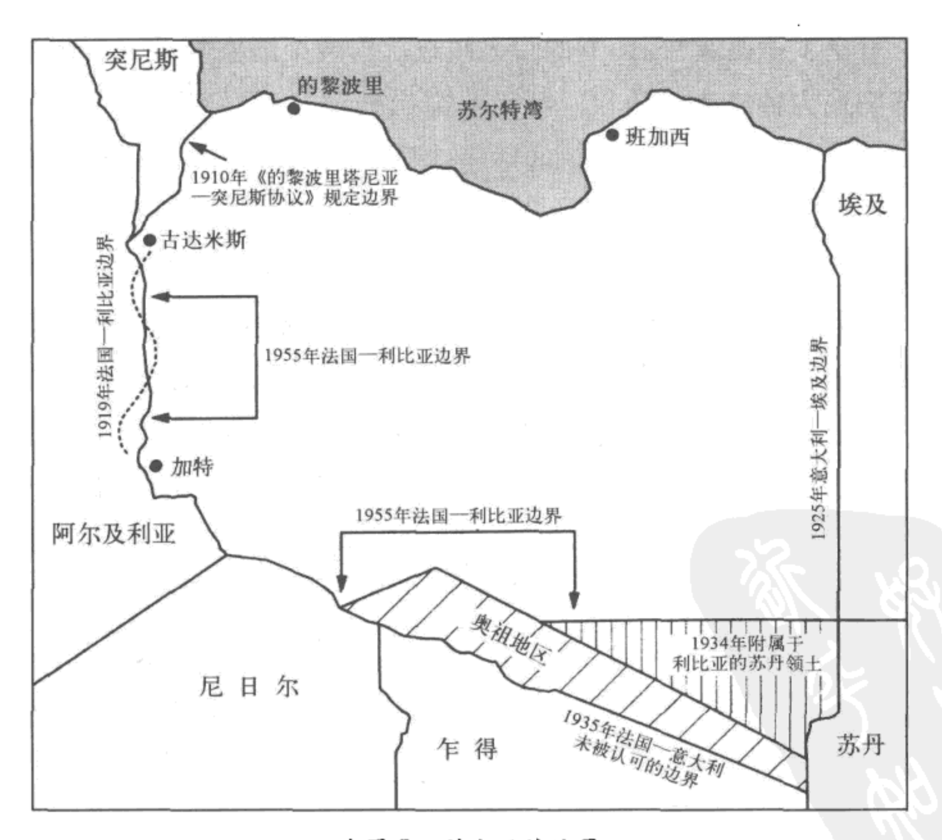
利比亚非洲外交政策的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色彩,革命政府与相关组织从宗教层面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1970年,卡扎菲成立吉哈德基金会,增强利比亚武装力量,支持阿拉伯民族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1973年3月,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第四次会议在班加西举行。吉哈德基金会鼓吹的核心目标就是向伊斯兰解放运动和伊斯兰战争协会提供援助,实现非洲解放。此外,成立于1973年的伊斯兰召唤协会成为宣传伊斯兰信仰,从事颠覆活动的组织。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该协会就在非洲成立了132个宗教中心。利比亚提供贷款,促进伊斯兰文化与阿拉伯语言的传播。利比亚每年用于推动伊斯兰事业的费用并不多,但很明显,都是具有政治导向的经济援助。

卡扎菲重视非洲的做法很快就有了胜利的回报。1972年初,卡扎菲与乌干达总统阿明会谈,之后乌干达将几百名以色列顾问驱逐出国,并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在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第一次对抗期间,利比亚在1972年9月派空运部队成功地进行了干预行动,以证明自己支持乌干达反对殖民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9个月后,卡扎菲在惠勒斯基地收回年度纪念仪式上向阿明总统致敬,赞扬他将乌干达从一个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卫星国改变成一个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殖民主义的非洲国家的先锋。

1968年12月,埃及、利比亚和苏丹签署三方协定,不久,三国又成立了阿拉伯革命阵线。但之后利比亚与苏丹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显露出来,双边关系迅速恶化。1972年9月,苏丹迫使利比亚向乌干达运送武器装备的5架飞机降落在喀土穆的飞机场,扣押了飞机上满载的武

器设备。卡扎菲将乌干达的阿明视为非洲地区的伊斯兰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但是贾法尔·努迈里的苏丹政府却持不同观点,它支持被驱逐的乌干达前总统米尔顿·奥博特。努迈里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协议,苏丹长达17年的内战结束了。卡扎菲拒绝承认非穆斯林领导下的南苏丹。随后几年,外交危机的阴云一直笼罩并影响着利比亚与苏丹的关系。

利比亚与乍得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两国关系经过一段磕磕碰碰后,于1972年4月恢复了1971年因乍得指责利比亚援助叛军而中断的关系。作为对利比亚友好的回报,利比亚政府停止支持乍得反政府组织,并许诺提供经济援助。11月,乍得与以色列断绝关系。1972年12月,乍得政府与利比亚政府签署友好协定。此时,利比亚调派军队到奥祖地区,利比亚军队在昔日法国破旧不堪的堡垒面前举起了利比亚的国旗。1975年8月,利比亚吞并奥祖地区,奥祖成为利比亚穆尔祖克(Murzuq)省的一部分。



地图7　利比亚的边界

188 卡扎菲占领奥祖地区并不是因为沙漠中的边界争议，实际上关系到利比亚支持乍得国内的阿拉伯穆斯林政治家，以及非阿拉伯人的土布人(Toubou)盟友，反对控制恩贾梅纳(N'Djamana)地区政府的基督教徒与黑非洲的守旧派。利比亚占领奥祖地区提出了一个令非洲统一组织相当关切的问题，那就是该组织第二条款规定的长期不变的原则：即继承欧洲国家延续下来的殖民边界。奥祖地区只不过是一个荒凉的沙海，山峦起伏的贫瘠高原。尽管该地区是一块相对来说没有任何价值的沙漠，然而，非洲领导人担心这次边界的重新调整，会对整个非洲的疆界重构开设了一个先例，并促发无数的边界争议与冲突。

国外影响的减少

随后几十年，利比亚以反对以色列为标识的非洲外交核心，逐渐转向反对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相关问题。卡扎菲政权最得意的抨击目标就是罗得西亚[①]与南非的白人政权。这两个国家与以色列都被卡扎菲归属为种族主义政权。利比亚突出强调这种联系，是为 1975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对有争议的话题，即犹太复国主义等于种族隔离制度创造条件。在这次大会上，28 个国家投赞成票，12 个国家投弃权票，仅有 5 个国家投反对票。利比亚还继续利用非洲统一组织作为平台，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作为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利比亚在 1978 年 2 月成为其军事委员会的新成员，掌控非洲解放运动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安全。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利比亚在非洲的影响逐渐衰落，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在乌干达与中非共和国。189 1978 年，利比亚派军队到乌干达平叛由乌干达流亡政敌与坦桑尼亚军队组成的混合军，结果以失败告终。1979 年 9 月，中非共和国自称皇帝的让·贝德尔·博卡萨被驱逐，流落到的黎波里向利比亚寻求援助。卡扎菲盲目接受诸如阿明、博卡萨等

① 罗得西亚是原非洲中南部一广阔地区，分为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译者注

臭名昭著之流，对利比亚产生了较坏的影响，但这与其非洲的政策相一致。就绝大多数情况来说，卡扎菲政权的处世之道是，只要该政府支持伊斯兰教，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就不在乎其领导人的个性与禀赋或政策是否得体。

到 1980 年末，加蓬、冈比亚、加纳、塞内加尔等 9 个国家或者驱逐了利比亚外交官，关闭利比亚大使馆，或者与利比亚断绝了外交关系。许多非洲政府特别关心利比亚以政治、宗教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以及对外援助为基点的外交政策特点。一些非洲国家对的黎波里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外交工具而感到愤怒，而另外一些拥有庞大的穆斯林社区，或者穆斯林与基督徒各自为政的国家则抱怨卡扎菲强调宗教认同，使原本脆弱的国家认同趋于分裂。这些国家普遍关心的另一件事就是，利比亚不断招募伊斯兰军队，给他们带来了潜在的不安全感。非洲国家最后抱怨的是，有充分理由表明，利比亚援助承诺与实际兑现的差距日益扩大。

"乍得事件"凸显了利比亚在非洲大陆日益受到孤立。1980 年 6 月，利比亚与乍得两个邻国签署友好协定，利比亚支持乍得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合法化。但这也为 1980 年 12 月，利比亚支持全国团结过渡政府(Gouvernement'd Union Nationale Transitoire, GUNT)干预"乍得事件"提供了合法依据。1981 年 1 月 6 日，利比亚与乍得在的黎波里签署的协议夭折了，这一令人沮丧的事情却引起整个非洲的欢呼。5 天后，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呼吁利比亚从乍得撤军。同月末，该组织谴责了卡扎菲构想中的统一行为，并第一次公开谴责了利比亚。非洲统一组织随后采取更灵活委婉的策略，通过决议感谢利比亚为乍得国内和平作出的贡献，但呼吁成立一支泛非维和部队替换驻扎在乍得的利比亚军队。 190

20 世纪 80 年代，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许多国家担心，利比亚会利用控制乍得的有利条件增强自己在萨赫勒、靠近大西洋的撒哈拉沙漠西部以及西部非洲的影响，并袭击或侵扰苏丹。大约就在乍得与利比亚合并期间，加纳、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等国加入冈比亚和塞内

加尔的行列,证实利比亚干预他们国家内政。卡扎菲有成立萨赫勒伊斯兰共和国的模糊构想,对如何实现成立伊斯兰军团计划也十分关切。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更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惧怕心理。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卡扎菲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构想似乎朦胧地向邻国保证,将破坏他们政府的稳定。

1981 年 11 月,卡扎菲突然意外地从乍得撤军,其原因有二:一是努力削减政治与军事上的损失;二是争取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候选人的资格。从乍得撤军虽然减少了利比亚在乍得的影响,但也极大地提高了利比亚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地位。1982 年 1 月,的黎波里支持加纳的罗林斯(Jerry Rawlings)成功地发动政变。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利比亚以优惠条件向加纳新政府提供石油。坦桑尼亚与利比亚的关系也改善了,因为坦桑尼亚要求西撒哈拉独立阵线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得到利比亚的支持。1981 年 2 月,利比亚宣布将拉各斯的大使馆改为人民局(People Bureau)后,尼日利亚驱逐利比亚外交官。利比亚与扎伊尔的关系也结束了,原因是后者与以色列恢复了外交接触。

1982 至 1983 年,利比亚面临着重要的问题是,想在的黎波里召开的由卡扎菲担任大会主席的非洲统一组织第 9 次多边会议以失败告终。反对力量是持温和态度的非洲领导人,他们不想参加一次似乎用来证明利比亚的非洲政策英明、正确的高级别会议。在这些反对声音中,大多数国家都不想与利比亚交往,另外一些国家则是迫于欧洲国家或美国政府的压力,或二者兼而有之。此外,西撒哈拉战争问题也是成员国之间分歧较大的主题,他们主要在是否接受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合法席位一事上争论不休,这也是这些国家反对利比亚主办此次峰会的重要因素。的黎波里两次召开会议都遭到失败,非洲统一组织专门小组建议将会议举办地转往亚的斯亚贝巴。1983 年 6 月,在埃塞俄比亚国家首脑担任大会主席的情况下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会议,卡扎菲作为客串嘉宾的角色出现在会场,但迅速离开。其原因:一是主席国地位被剥夺;二是西撒哈拉独立阵线被拒绝参加会议。卡扎菲是非洲统

一组织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剥夺主席国地位的非洲领导人，这一富有戏剧性的事实说明卡扎菲的影响有限，以及事与愿违的现实。

1976年，卡扎菲的苏丹盟友尝试着推翻努迈里政权，遭到失败。在1983年初，得到利比亚支持的苏丹政府反对派发动未遂政变。由于考虑不周，政变阴谋不久就被发现，苏丹军队迅速围捕喀土穆的利比亚代理人，埃及也在动员其预备役军队支持努迈里政权。美国调派装有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的空军部队到该地区支援盟友。当问及利比亚给苏丹带来什么威胁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挑衅性地回答说："至少就目前来说，卡扎菲支持附属于他的力量。"[12]尽管危机迅速得以平息，但美国的挑衅反应也使埃及和苏丹局促不安，他们意识到，如果不想招致非洲与阿拉伯国家的愤怒而制裁利比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局限于利比亚的革命行为

从1969年"九月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10年，利比亚社会经历了财富与资源的彻底重新分配。私人企业被取消，取而代之为政府集中控制的经济体系。革命的作用与政府的功能出现脱节。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政府作出的保证是，只要革命政权存在，如果需要的话，社会经济与政治革命就会继续下去。 192

反之，利比亚革命性外交政策深深地影响了利比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但没有重组这种关系。君主制外交政策的影响范围主要局限于地区层面，革命指挥委员会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则主要在广泛的阿拉伯世界及其以外地区。卡扎菲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与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进行妥协是不可能的，阿拉伯民族统一是阿拉伯民族胜利的理想路径。除了巴勒斯坦问题外，卡扎菲还向非洲许多国家提供经济与政治支持，援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世界开始了激进的石油政策，利比亚向相关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然而，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石油收入骤降，财政收入锐减，严重限制了其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在此过程中，利比亚

人口规模的小，地缘政治与军事力量的有限，与卡扎菲的勃勃野心完全不成比例。其结果是，利比亚国家资源还不足以完成卡扎菲不断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标。更让卡扎菲伤心的是，他发现自己的《绿皮书》中所概括的社会、经济原则在国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卡扎菲极度绝望地寻求施展自己抱负的广阔舞台，但发现其范围仅限于利比亚。



第八章 巩固与改革(1986－1998)

193

历史应该表明，如果有各种模式的话，我们也要将之破坏。如果有束缚利比亚民众的羁绊的话，我要积极加入打碎锁链的行动中，直到利比亚民众获取自由。

穆阿迈尔·卡扎菲，1987年11月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利比亚破坏泛美航空公司103号、102号航班，导致几百人丧失生命；(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以下事实，即利比亚政府没有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其对上述恐怖主义行为负责作出合作的回应。

联合国安理会731号决议，1992年1月

穆阿迈尔·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

纳尔逊·曼德拉，1999年6月

747飞机(泛美103航班)的前部侧卧在苏格兰的土地上，这是恐怖主义的鲜明典型特征。

阿伦·格尔森(Allan Gerson)、杰瑞·阿德勒(Jerry Adler)：《恐怖的代价》(*The Price of Terror*)，2001

从1986年4月美国进攻利比亚，到1999年4月利比亚决定移交泛美航空103航班爆炸嫌疑犯，其间几十年，利比亚民众遭受了长时间苦难的煎熬。1986年后，美国逐渐加紧对利比亚一揽子双边制裁。1992年，联合国对利比亚强制实施国际制裁。随着利比亚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国内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国内外反卡扎菲政权的力量日益增加。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扎菲政权难以逃脱随后的政治骚乱。有文章预测，由于西方新闻媒体的施压，卡扎菲政权离崩溃已经不远了。

194

革命内部的革命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利比亚的社会主义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这也表示卡扎菲的关注点恢复到以实行一揽子改革为内容的更开放的政治制度，这被称为"绿色改革"。1987年2月，总人民大会的代表批评革命政权的经济政策，利比亚卷入乍得内部事务，以及革命委员会满怀热情的激进政策等。3月，卡扎菲宣布了许多经济与政治改革，他将这些自由化措施描述为"革命内部的革命"。1987年5月，他呼吁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进行改革，包括撤销进口替代政策，采取现代管理方式。卡扎菲后来呼吁私营部门与日益增强的自由化力量发挥作用。卡扎菲还改进自管的形式，鼓励成立合作社，合作者或者提供资金，或者提供劳动力。到1988年8月，大约140个公司被移交给自管委员会[1]。

1988年3月，卡扎菲成立了民众动员与革命领导部，通过规劝而不是暴力的手段向民众灌输思想。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缩小，又回到其早期规定的范围。两个月后，利比亚革命法院的权力也受到限制。1988年3月，卡扎菲亲自干预并破坏了突尼斯边境的哨所，宣布所有利比亚人都可以自由到突尼斯旅行。就在同年末，大约100万利比亚人在政府的慷慨资助下访问突尼斯。1988年9月，卡扎菲呼吁政府停止控制贸易活动，废除国家对进出口的垄断。就在利比亚解除反对零售业的强制令后，城市的市场与露天剧场重新开放。石油部门与重工业部门虽不适用新的私有化措施，但是卡扎菲确实呼吁国有企业提高效率。

195

卡扎非社会经济与政治实验的实际结果往往与革命政权的意图明显不同。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复杂联系,促使革命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得更为温和、适度。国家管理的超级市场普遍存在着货源短缺现象,再加上贪污腐败、无组织的分配体系,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利比亚的非官方组织与个人都经常参与黑市交易。在黑市,你可以以高价买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黑市交易缓减了普通老百姓面临的货物供应紧张的局面。1985 年,利比亚政府将大量外国工人驱逐出境,这一决定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农业与服务业部门近乎停顿。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随着油价的下跌,石油收入的骤降,革命政权支持以过度浪费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分配性经济制度的能力受到限制。

利比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日益孤立,更加剧了对经济的影响。1980 年,美国关闭的黎波里大使馆。1982 年,又暂停美国公民到利比亚旅游,并禁止进口利比亚的石油。非洲冒险的失败与整个非洲地区外交努力的受挫,使利比亚遭受沉重打击。1986 年 4 月,美国轰炸班加西与的黎波里,利比亚与美国的对抗达到顶峰。随后,美国对利比亚实施经济制裁,冻结利比亚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并命令利比亚的美国石油公司停止作业。当时,美国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石油工业唱主角,美国的撤走,将威胁利比亚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196

卡扎非擅长解读舆论与民意,意识到国内的不满情绪已经接近底线。他的应对措施是,对 1969 年革命以来一直主张的社会主义政策进行温和纠正与适度调整。1986 年 4 月,美国对利比亚的狂轰滥炸推动了卡扎非政策“大转变”。美国本来想通过军事打击破坏利比亚政府的稳定,但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而巩固了卡扎非政权。一方面,美国的空袭引起国内对卡扎非的同情,而国际社会的示威游行与抗议浪潮比国内的规模与强度都要大。另一方面,空袭使革命委员会里的少数激进分子活跃起来,他们更具攻击性,极力平息不同声音。一年后,卡扎非将委员会里激进分子的嚣张活动,形容为操之过急与权力饥渴。

美国空袭没有受到利比亚军队的任何报复,使后者声誉大跌且丧失信心。美国想依靠这种方式迫使利比亚政权有所变化,这也鼓励卡

扎菲实施废除正式军事领导机构的想法，而代之以模糊的名称——民兵组织，这一想法是在 1977 至 1978 年首次提出的。美国“十字军”打击利比亚，使流落在国外的反利比亚政敌尴尬窘迫，削弱了他们的号召力以及有限的打击能力。这些小组织在内部争权夺利、心怀不满的情势下，经常关心自己是否被忽略不计，成为美国实施外交政策的棋子。卡扎菲抓住时机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继续反对现存国际秩序。

更糟的是，空袭的影响与后果完全被里根政府所误读，他认为这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胜利。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 2000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档案显示，卡扎菲政权对美国空袭迅速作出反应，利比亚的报复活动持续 4 年之久。利比亚的报复行为包括：在贝鲁特处决了两名犯有绑架诱拐罪的英国人与一名美国人；袭击美国驻苏丹大使馆雇员；利比亚导弹袭击美国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Lampedusa)上的大型军事设施。1987 年 9 月，为利比亚服务的阿布·尼达尔劫持了泛美航空公司的 73 号航班，致使许多美国人死亡。1988 年 4 月，日本赤军与尼达尔组织签署合同，轰炸了尼泊尔、意大利的联合服务组织，杀死一名美国人。后来证明，1988 年 12 月泛美 103 航班在苏格兰坠毁、1989 年 9 月 UTA772 航班在尼泊尔遭轰炸事件都受到利比亚官员的支持。在此期间，利比亚官方试图招募芝加哥的街头犯罪团伙，用肩射武器袭击美国航班。这一行动被美国政府及时发现而制止。这些活动，很可能还有其他行为，都与里根政府所宣传的受到欢迎的神话，即空袭结束了利比亚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说法自相矛盾[2]。

197

民众时代的人权绿色大宪章

卡扎菲实施人权的最新举措就是，1988 年 6 月 12 日，总人民大会通过《民众时代的人权绿色大宪章》。《宪章》的 27 个条款包括个人目标、个人权利与享受权利的保证等各种内容，为利比亚日益明显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趋势打开了道路。《宪章》的基础是卡扎菲早期的讲话与官方声明，保证利比亚人有自由成立团体和工作的权利，尊重个人自

由。《宪章》限制了死刑的范围,并指出,政权的未来目标就是完全废除死刑。《宪章》禁止对违法人员进行侮辱性惩罚,不虐待囚犯,并声称保证每一个利比亚公民都享有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就在利比亚吹嘘自己是世界上人均武器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时,《宪章》呼吁结束军备竞赛。《宪章》还呼吁禁止生化武器与核武器的开发,但不久,利比亚就开始生化武器研发项目,一直持续了20年。[3]

198

《绿色大宪章》提出之际,也是卡扎菲公开质疑革命委员会与安全机构的角色与责任的时刻。卡扎菲公开批评法律规则的失败,承认滥用职权,一夜之间似乎成为坚持合法性、自由与人权的先锋人物。然而,支持者拥护《宪章》,批评者则认为,《宪章》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与国内法赋予利比亚民众基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相关规定。《宪章》第11条规定,私人财产是“神圣的,受保护的”;但又在没有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指出“公共利益”可以侵害私有财产。《宪章》第25条要求,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必须誓死捍卫自己的国家。《宪章》第26条要求,所有利比亚人都承担责任,这是《宪章》的“基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政府认定什么是叛国罪又引进了一个界定模糊的灰色领域。《宪章》第27条公开支持将《绿皮书》作为解放世界的指南,实际上导致卡扎菲及其政权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

1989年春,利比亚开始执行《绿色大宪章》的相关规定。1989年3月,总人民大会颁布了关于解除宗教与政治活动、实现民众自由的法令,呼吁通过立法,成立独立的司法部门。后来,总人民大会将这一呼吁延伸到增强人民法院的权利,扩大法律职责范围。1989年5月,利比亚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条约》,以及关于民事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利比亚恢复法律规则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90年。然而,人权组织指出,利比亚在保护民众基本权利与自由方面仍没有多大改观。相反,在后《宪章》时代,利比亚政府对待宗教与政治方面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199

总之,颁布《民众时代人权绿色大宪章》的最真实目的就是,卡扎菲企图将许多原则从理论上规范化,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将之付诸实践。

《宪章》的实质内容在《绿皮书》中有所显示,《宪章》的一些规定还不如昔日公告声明的原则具有进步性。1988 年后,利比亚民众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如果说,利比亚民众在人民大会上有自由表达的权利,那就大错特错了。利比亚民众实际上并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空间。利比亚民众也没有自由罢工的权利,因为从理论上说,利比亚人民是工厂的主人。利比亚人民也没有组织政治反对派的机会,因为从理论上说,利比亚人民可以在人民大会制度下自由表达不同意见。

与新近强调人权相联系,利比亚在 1989 年宣布成立卡扎菲人权奖金,奖励那些在“解放斗争”最前线的第三世界的人物、组织或运动。利比亚为此在瑞士设立了 1 000 万美元的资助资金,第一位获得者就是正在囚禁中的南非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他获得了 25 万美元。随后获奖者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以及那些反对以色列占领、参与巴勒斯坦起义中的孩童。1996 年,利比亚将该奖授予全美伊斯兰联盟(Nation of Islam)领导人路易斯·法拉罕。该组织成立于 1930 年,基地在芝加哥。美国财政部在经过长期讨论后,拒绝卡扎菲解除制裁的要求以及恢复两国政治、经济联系的要求。法拉罕亲临利比亚接受了该奖项,但被迫婉言谢绝了 25 万美元的奖金。美国不允许全美伊斯兰联盟接受利比亚的 10 亿美元的捐助。

1988 年 8 月,卡扎菲在革命委员会年度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这些委员,指责他们搞政治暗杀。他控告“某些人”已经渗透到革命委员会,认为肉体清洗政策已经偏离了革命委员会的主旨。他补充说:“恐怖主义如果崛起的话,那也是民众的恐怖主义,而不是个人或委员会的恐怖主义。”他发言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因为卡扎菲在两个月前宣称,《人权绿色大宪章》保证民众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并谴责了暴力。

200

一个月后,卡扎菲在“九月革命”19 周年纪念日上,宣布了废除国家正规军与警察的计划,取而代之以新成立的民兵组织。他认为,事实证明,传统的军队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他敦促总人民大会将现有军队改造成民众国卫队。卡扎菲的宣言似乎是其以前一直要求成立与正规军并列的人民军这一说法的延续。但还不清楚这一

说法是否会改变。他指出，一些军官的权威在民兵之上。利比亚还需要一些兵种。卡扎菲宣布义务兵役期从两年缩短为一年，并强调任何人都不得免除服兵役。

1991 至 1992 年，卡扎菲建议将全国分为 1 500 个自治公社。每个公社都是大国家中的小国家，拥有行政、立法与预算权力。各公社成立 13 人组成的小内阁，各小内阁出两名成员组成国家内阁，至于国家的确切作用没有明确阐述。而且，卡扎菲也没有详细说明这 3 000 多人构成的新内阁如何有效运行，具体有什么功能。由于每一个公社对自己的国防等事宜负责，因此一些观察家认为，卡扎菲的想法实际很简单，就是为了再一次将军队碎片化，减少未来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1994 年 9 月 1 日，利比亚宣布成立由军官与学生组成的清洗与净化委员会(cleansing and purification committees)。他们的目标就是清洗反革命分子，阻止民众委员会成员聚敛过多的财富，造成权力膨胀。所有利比亚人都必须向清洗与净化委员会定期报告财产数量与财产来源。1996 年春，清洗与净化委员会再次活跃起来，打击投机倒把，铲除贪污腐败行为。在一个政府控制国家经济至少 70%的国度里，清洗与净化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骚扰商人，关闭私人企业。从理论上说，利比亚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但这些人并不能给自己商品自由定价。政府要求每一个店主张贴一张官方列出的价格名单，出售价格不能超过标价的 10%。但从实际情况看，一些商人都想使出售价超出官方定价 10%。清洗与净化委员会活动一直持续到 1997 年中期，其结果是很多人被捕，上百人被罚款，许多商店闭门思过，直到调整价格。1998 年 10 月初，卡扎菲再次要求店主将价格压缩到官方指定的价格限制之内，否则将再次动用令人生畏的清洗与净化委员会。

201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987 年 12 月 24 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指控利比亚在拉巴特(Rabta)附近修建工厂。美国官员怀疑利比亚在这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这些指控相联系，文章一再提及利比亚在与

乍得的战争中使用毒气,而利比亚与伊朗的贸易就包括生化武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标志着一场旷日持久、日益严重的外交危机即将开始。这场危机植根于里根政府相信:利比亚政府正在以建造化学生产设备为借口,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华盛顿一向反对生化武器的扩散,下定决心阻止利比亚的新计划[4]。

利比亚迅速作出反应,否认拉巴特设备是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准备。与此同时,利比亚官方谴责了1986年1月美国的经济禁运,但对诸如禁止向利比亚销售医药设施的描述是不准确的。1986年1月7日,里根总统发布了12543号令的B部分,特别规定美国禁运名单中不包括"一些关于解除人类痛苦,如食品、捐赠衣服以及以治疗为目的的医药供应"。里根政府认为,利比亚的指控是故意曲解美国的政策,为随后的辩解——即修建拉巴特设施是为了制造药品——找借口。美国的禁运使利比亚别无选择。

1988年9月,美国宣布利比亚已接近拥有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主任指控卡扎菲正在修建世界上最大的生化武器工厂。到1988年末,美国与以色列官员声称,利比亚在拉巴特修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生产化学武器的制造中心。1988年12月末,里根总统向利比亚施压,声明美国将考虑对利比亚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打击。鉴于1986年4月的袭击事件,利比亚对待该声明的态度极为严肃。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美国于1989年1月在利比亚东北部击落了两架利比亚飞机,原因是后者以"怀有敌意的方式"靠近前者。利比亚官员指责是美国有预谋的行为,声称两架飞机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装备。

面对美国的指责,利比亚在不同的场合以各种方式作出回应,包括双边外交接触、国际组织与各种媒体的解释性报道。他们声称,拉巴特在建的高技术设备只不过是为了生产药品,以减轻病人的病患;化学工业制造是一种合法活动。利比亚没有销毁本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没有承认错误,而是向美国发起挑战。我们知道,1925年的国际公约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气以及细菌战。1972年的

国际条约也禁止开发、生产与储备细菌与毒化武器,并要求销毁已有设备。利比亚基于以上规定,指控美国帮助以色列获取生化武器与核武器。

美国在公开指责利比亚之时,还向那些被疑为卷入修建拉巴特设施的国际合作公司与政府悄悄施加外交压力。大量证据已经证明,联邦德国公司参与了该项目,但其一再否认此事。如果事实成立的话,这种行为可能被提起公诉。1989 年初,由于一份报告的公布,联邦德国的官方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该报告承认许多联邦德国公司,特别是 Imhausen-Imhausen 卷入拉巴特生化武器项目的修建。作为应对措施,波恩加强出口管制,对违反规定者加重惩罚力度。该措施受到美国的欢迎。

1990 年初,关于拉巴特武器制造活动的最新报告公之于世。美国再次利用《纽约时报》揭露了以下事实:即利比亚已经制造了少量芥子毒气,并向大规模生产的目标迈进。该报告还暗示,利比亚还生产了少量沙林神经毒气。新上台的乔治·布什总统与里根政府的立场相同,要求国际社会尽全力阻止利比亚的所作所为。此外,美国警告,拉巴特制造的生化武器的"间接危险"就是落入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手中。因此,美国不排除对拉巴特军事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990 年 3 月,美国人透露,他们已经从意大利外交官口中得知,拉巴特化学武器生产基地发生火灾。不久,利比亚官方媒体证实了火灾的真实性,指控美国、以色列与德国应对这一行为负责。其他利比亚人则将火灾归罪于恐怖分子,至少有一个政府反对派组织声明对此事负责。尽管随后的报道表明整个事件都是一场恶作剧,但拉巴特大火临时分散了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生化武器问题的注意力。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1990 年末,美国再次指控利比亚在拉巴特制造毒气,并在泰尔胡奈附近修建第二个生化武器制造基地。

204

1993 年 2 月,美国情报资料披露,利比亚在泰尔胡奈有一个地下化学武器制造工厂。该工厂以水利工程项目作掩饰,实际上储存毒气。随后的争论仍在持续。但一个重大的事实就是,当 1993 年 1 月联合国

秘书长要求利比亚在禁止开发、制造、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武器条约上签字时，遭到后者的拒绝。1996 年 2 月，美国再次指控利比亚以生产化学武器的形式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活动。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泰尔胡奈工厂预计完成时间为 1997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武器制造工厂之一。利比亚再次否认自己的生化武器制造活动，认为泰尔胡奈生产的设备是为土地灌溉系统所用。

2004 年初，利比亚单方面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以及运送系统，利比亚大规模化学武器制造活动最终浮出水面。按照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说法，利比亚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大量芥子毒气，拥有生产神经毒气等生化武器的能力。在国际组织的监督下，利比亚销毁了储存的化学武器。此外，利比亚还有 3 000 枚能够装载化学武器的炸弹壳体，但利比亚缺乏远程导弹和超越本土的化学武器运送系统。

205

洛克比空难

1988 年 12 月 21 日，泛美航空公司的 103 航班在飞经苏格兰洛克比上空时发生爆炸，259 名旅客与 11 名地面工作人员一起遇难。9 个月后，UTA772 航班在尼日尔爆炸，179 名乘客遇难。1991 年 11 月 14 日，美国与英国提起公诉，指控两名利比亚人为泛美 103 航班爆炸的嫌疑人。1991 年 11 月 27 日，法国、英国与美国签署三方宣言，要求利比亚交出犯罪嫌疑犯。在利比亚拒绝遵从的情况下，1992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748 号决议，对利比亚进行强制性地有限制裁。1993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883 号决议，适当地冻结利比亚的海外资产，强化制裁行为[5]。

此后几年，利比亚的外交政策一直由与制裁相关的问题所主导。华盛顿一再敦促全球抵制利比亚石油，这一建议遭到其欧洲盟友以及许多非洲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利比亚从“海湾危机”导致的油价上升中获益匪浅。卡扎菲边缘性地参与海湾事务，使他可以腾出手来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1995 年 4 月，联合国放松对利比亚航班的禁令，允许利比亚穆斯林在每年去麦加朝圣时

可以经过埃及领空。6 个月后,利比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允许其将约 100 万的非洲工人遣送回国。据说这一要求提出的原因是因为利比亚经济的贫困状况。但不可否认,联合国实施的强制性制裁无疑对利比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利比亚的这一做法也受到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驱动,想利用外国工人作为迫使联合国解除贸易禁运的筹码。1997 年 2 月,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要求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理由是利比亚已经采取积极措施,决心解决洛克比空难问题。

206

到 1997 年末,由于非洲领导人带头反对,联合国制裁逐渐松动。1997 年 10 月,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访问利比亚,感谢卡扎菲在其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时的鼎力支持。尽管曼德拉为避免违反联合国制裁规定乘汽车完成了他的利比亚之行,但在访问期间要求解除制裁,并指出洛克比案件应该由国际特别法庭审理。这一观点得到非洲统一组织和阿盟的支持。在此期间,冈比亚、利比里亚、坦桑尼亚与乌干达总统也到的黎波里访问。曼德拉后来在 1998 年 3 月克林顿访问南非期间公开表明了自己与利比亚的关系。

1998 年 8 月,利比亚接受英美建议,即在荷兰的海牙以苏格兰法律审判两位利比亚嫌疑犯。两个月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利比亚的提议,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强加给与利比亚有染的公司与国民的单方面制裁。投票以 80 票赞成,2 票反对(美国与以色列),17 票弃权的方式通过,实际上大多数人持赞成态度。在此期间,包括乍得、冈比亚、尼日利亚和苏丹等非洲代表团,违反联合国禁令继续访问的黎波里。1999 年 4 月 5 日,经过埃及、沙特阿拉伯、南非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紧张的外交斡旋后,利比亚最终移交了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犯。利比亚遣送嫌疑犯后,联合国暂停了对利比亚的制裁,允许空运并恢复对利比亚销售工业设施。美国经过对利比亚的长时间考察,但制裁却没有解除,并在同年末宣布继续实行双边制裁,理由是利比亚的危机仍没有解决。

卡扎菲经过多年的抵制,最后不得不移交了洛克比空难嫌疑犯以

207

及答应相关条件，在此背后隐藏着诸多原因：第一，到 1988 年，卡扎菲控制了国内政治局势，但面临着国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问题。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不再担心移交两嫌疑犯后国内政治秩序出现混乱，对自己产生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利比亚在绝望之余需要开放经济，吸引外资。一个似是而非的动机是，卡扎菲既热衷于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人物，也厌倦了长期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境遇。从战略角度来说，卡扎菲想在非洲以及其他地区重构联盟政治，以防利比亚未来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备受孤立。此外，利比亚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层面拥有了与非洲大国改善关系的更多机会，可以在该地区追求长期的目标。

与欧洲的关系

1986 年后，欧洲国家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有某些相似性，即特别关心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的问题。同时，欧洲也更关心美国的一系列制裁对自己与利比亚商业贸易的影响。欧洲各国政府关心商业交往，在与利比亚交往中持更谨慎的方式，交往更倾向于外交层面。

就在"九月革命"之初，法国与利比亚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法国是为利比亚革命政府供应武器的主要国家。两国关系之后恶化，原因是卡扎菲一再批评法国热衷于向中东冲突各方销售武器。随着利比亚与埃及之间的冷嘲热讽，卡扎菲特别批评了法国向埃及政府出售武器。此时，利比亚对萨赫勒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实施了咄咄逼人的挑衅政策，在法国看来，这是其传统意义上的势力范围，这才是两国分歧的根源。

208

利比亚放弃长达几十年对乍得的武装干涉并撤军回国，并与法国关系一度有所改善。1990 年 4 月，在卡扎菲的帮助下，利比亚暗中支持的恐怖组织将囚禁长达两年的 3 名欧洲人质释放，这一有争议的行为使卡扎菲赢得了法国的信任。该组织是法塔赫革命委员会，也叫阿布尼达尔组织，表面上从事人道主义活动，实际上接受卡扎菲的秘密指导。人质释放后，法国将 1986 年以来扣押的 3 架幻影战斗机送还利比亚。巴解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解释说，利比亚帮助欧洲国家释放人质的真正意图是，想表明利比亚已经控制了诸如尼达尔等激进组织，

与美国恢复关系。

法国后来支持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多边制裁,继续调查UTA772航班的失事内情。1997年5月初,法国调查人员要求巴黎法院指控卡扎菲妹夫等5人参与炸机事件,并缺席审判。法国官员认为,利比亚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为了报复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调派军队抵制利比亚入侵乍得一事。法国指控的证据包括,爆炸前一年利比亚代理人就如何打击法国的秘密计划文件。此外,刚果目击者也证实,利比亚私人侦探向他的一位朋友付钱,调查UTA772航班上出现装有炸弹的手提箱的情况。人们猜测,携带炸弹者可能在中转站下飞机,但实际上并不允许这样做。结果飞机在尼日尔上空爆炸,致大量乘客死亡。

利比亚与德国的关系如同与法国关系一样,双方长期在打官司。当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时,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声称,无线电截听的情报显示,西柏林拉贝莱迪厅爆炸中死亡3人,伤229人,是利比亚与恐怖主义有染的"铁证"。然而,事实证明,舒尔茨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了。11年后,参与爆炸的相关嫌疑人都归了案,并在德国公开受审。正如拉贝莱迪厅案件诉讼记录所提供的信息表明,利比亚似乎满足于与德国的目前关系,两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的商业利益,其特点就是交往处于较低水平,但属于正常状态。

209

1984年4月,利比亚驻伦敦大使馆门前出现示威游行,一伦敦警官伊冯·弗莱彻(Yvonne Fletcher)死于骚乱。英国当局认为,杀死该警官的子弹来自大使馆内部。因此,英国命令关闭利比亚大使馆并断绝两国关系。1985年3月,英国与利比亚代表在罗马公开谈判,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努力。然而,由于卡扎菲一再向窝藏政敌的欧洲国家发出报复的威胁,两国关系几乎没有什么进展。1996年4月初,美国从英国的基地打击利比亚。英国在伦敦审判时,发现利比亚对英国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负有一定的责任,遂禁止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飞行英国。作为报复,利比亚也禁止英国飞机使用本国的领空。这一做法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因为自从1986年夏以来,英国一直没有飞向利比亚的飞机。

在随后的10年里,英国与利比亚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995年中期,英国国防部长表达了对利比亚拥有或发展弹道导弹能力的担心,导弹目标对准塞浦路斯与直布罗陀的英国军事设施。他没有明确提及利比亚,但在补充说明里提及:在未来的5至10年,欧洲的大片地域将成为邻近国家导弹攻击最脆弱的地方。6个月后,英国政府驱逐了沙特阿拉伯驻英大使馆中利比亚利益部门的首脑,理由是他们作为服务卡扎菲政权的政敌在从事间谍与恫吓威胁活动。英国外交部坚决认为,驱逐活动与前几个月利比亚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杂货店被刺事件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利比亚外交官被逐事件在利比亚官方新闻媒体JANA的头版头条刊出,后者是一个负责监视利比亚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

210

由于利比亚没收意大利人的财产,并驱逐了大约2万多名意大利常住民,利比亚与意大利的双边关系恶化。但随后在1975年,利比亚答应对1970年没收的意大利人财产给予补偿,并达成暂时性协议,双方关系才有所改善。到1978年10月,卡扎菲的言谈中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意大利是帝国主义国家。随后的10年,意大利成为利比亚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也是主张与利比亚对话的最积极的欧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意大利人在利比亚的侨民中占据大多数。据估计,大约有57个意大利公司在利比亚从事经营活动。尽管双方的商业联系如此引人注目,但这并没有阻止卡扎菲在1989年10月向意大利提出赔偿要求。也就是自1911至1943年意大利占领利比亚期间杀死、伤害或流放数千利比亚民众的赔偿金。这一要求在随后几年被屡次提起。

1992年4月,意大利加入欧洲集团举行的、庆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活动。美国要求扩大对利比亚的制裁范围,包括完全石油禁运,而意大利对此则并不热心。意大利石油公司坚持要到利比亚进行油气开发,并签署生产合同。就在利比亚将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犯交付爱尔兰审判的次日,意大利外交部长作为与利比亚恢复关系的急先锋,急不可待地飞往利比亚,会见卡扎菲。意大利公司也急于和ENI油气组织扩大商业交往。1999年7月,双方达成了55亿美元的天然

气项目。1999 年 12 月,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飞往利比亚,进行了两天的访问,这也是 8 年来到访利比亚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他的到访加强了双方的经济联系,这种关系在贸易禁运期间有所放慢,但从来没有停止。

1985 年 10 月,卡扎菲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利比亚这次出行的目的包括核反应堆转化为军用;额外的军事供应;增加苏联对利比亚石油的购买量,签署两国友好与合作协定。苏联官方新闻机构描述双方会谈是在友好与相互理解的氛围中进行的。但卡扎菲在莫斯科收获的成果比预期目标要少得多。苏联同意帮助利比亚修建核反应堆,但并不认可用于军事目的。至于武器供应,苏联要求购买前要预先支付估计 70 亿美元的货轮。期间,利比亚与南斯拉夫也达成石油贸易协定,但南斯拉夫的购买量并没有满足利比亚的预期,也就是苏联日常购买石油的两倍。最后,利苏双方签署了一个包括经济、科学、技术和贸易合作的条约,时间一直持续到 2000 年。5 个月后,卡扎菲排除了苏联在利比亚建立基地的可能性,苏联也将签署友好协定的计划搁置起来。

211

1986 年 4 月,美国打击利比亚,两国僵持的关系更为紧张。苏联谴责了美国的袭击,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仅仅向利比亚许诺帮助其重建国防能力。当卡扎菲再一次以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对美国相威胁时,莫斯科给出的答复是,绝对不支持。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位利比亚高级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但发现苏联并不想兑现出售武器的诺言,拒绝履行原议的相互协防协定,强调要区别对待利比亚支持革命与恐怖主义给全世界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麻烦。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苏联与卡扎菲政权的距离渐行渐远。双方签署的多边协定往往成为武器交易的附属品。在此期间,利比亚与苏联关系受到戈尔巴乔夫总统发起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强烈影响,这一改革最终导致苏联垮台。1991 年,当苏联改革派政敌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发动政变时,利比亚是认同共产主义强硬派的国家。卡扎菲急于承认政变领导人导致的苏联崩溃,双方关系迅速冷淡。

21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停止从利比亚进口石油。利比亚仍欠俄罗斯大约40亿美元的债务,大多数是早期的武器销售款项。整个20世纪90年代,卡扎菲政权拖延支付债务,因为这些引人注目的债务可以保护利比亚免于联合国的制裁。一个急需要钱的俄罗斯担心利比亚没有支付其债务的能力,遂在1994年对联合国安理会限制利比亚出口石油决议行使了否决权。由于俄罗斯的反对,安理会通过了一个温和版的决议,即禁止向利比亚出口与石油相关的设备,但并不包括销售石油与天然气。

在非洲的状况

如何削除以色列在非洲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利比亚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事情。1986年8月,喀麦隆是继扎伊尔、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之后,第四个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的国家。以色列还在加蓬、加纳、肯尼亚和多哥积极活动,以获取权益。美国积极支持以色列与非洲国家恢复外交关系,作为削弱卡扎菲政权宏大目标的组成部分。法国的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并不对以色列提供帮助,原因是担心以色列在非洲作用的提升,将促使非洲人反对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为了增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利比亚严重依赖贸易与经济援助这种熟知的工具。利比亚的援助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与尼日利亚签署经济与技术协议;在贝宁和上沃尔特成立合资公司;给马里100万美元的支票;以优惠价格向布基纳法索和加纳销售石油。大规模宣传利比亚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常伴随着前者的援助承诺。然而,因为利比亚一直口惠而实不至,将援助承诺兑现也是一件难事。这种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尤其是如此,当时油价下跌对利比亚拓展援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213

利比亚在非洲其他地区继续依靠外交或非外交手段,重新赢得昔日在非洲的影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许多政府,包括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加纳、乌干达等,在1983至1987年以海运的方式接受利比亚大量武器与军事装备。与此同时,利比亚招募伊斯兰军团的势头有增

无减,提供兵员的主要国家有布基纳法索、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加纳、马里、尼日利亚和苏丹。到1987年初,伊斯兰军团包括上千非洲人,仅从苏丹招募的成员就多达2 500人。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疑虑与日俱增,那就是伊斯兰军团的规模是否要继续扩大,包括成立国际革命军队。

1985年,苏丹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替换了努迈里政府,并寻求与埃塞俄比亚、利比亚、苏联改善关系。1985年5月,卡扎菲没有预先安排,临时决定到喀土穆访问。访问期间,他呼吁统一,批评了多党民主,暗示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将会遭受与前苏丹总统努迈里相同的命运。尽管苏丹政府与利比亚的关系深入发展,但仍然抵制利比亚的政治统一,厌弃卡扎菲与埃及的公开敌对。喀土穆一的黎波里轴心使两国与邻国关系更为复杂化,苏丹也发现自己越来越卷入利比亚与美国日益升级的危机之中。1985年末,美国国务院减少驻喀土穆大使馆工作人员,并警告美国人不要到苏丹旅游,因为利比亚大使馆会暗中迫害美国人。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在驳斥了美国指控后,悄悄地将许多利比亚使节驱逐出境。1986年4月,美国军用机轰炸班加西与的黎波里,苏丹政治家与民众谴责这次空袭是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阿拉伯兄弟国家主权的非法打击[6]。

1986年5月,沙迪克·马赫迪(Sadiq al-Mahdi)担任苏丹总理,卡扎菲再次在对方未邀请的情况下访问喀土穆,并要求两国政治统一,破坏埃及与美国的关系。尽管访问使沙里迪政府很尴尬,并震惊了苏丹邻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喀土穆在未来3年里越来越依靠利比亚的军事援助。1989年6月,沙迪克政府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激进伊斯兰倾向的军政府,他们对苏丹内乱持强硬的态度。政治上的镇压疏远了苏丹传统意义上的支持者,包括利比亚对现政权的支持。卡扎菲呼吁释放沙迪克,强烈批评伊斯兰激进分子混淆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疏远了苏丹非穆斯林社区。然而,利比亚继续向苏丹提供武器与石油供应。1990年3月,喀土穆与的黎波里签署《联合宪章》,规定两国军事力量与安全部队协调一致,共同努力传播阿拉

214

伯语言与文化。1991 年 5 月,苏丹采纳了利比亚人民委员会类型的政治制度。

然而,卡扎菲批评苏丹的伊斯兰教政治化倾象,但接受苏丹国内对非阿拉伯人进行阿拉伯化的做法。此时,卡扎菲的政策与 70 年前出版的《绿皮书》第三部分中的思想一致:

> 为了从家族、部族、国家和人性的团结、凝聚力、统一、亲密无间与热爱中产生益处、恩惠、价值和思想,因此对人类社会来说,家族、部族、国家与世界保持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事情。[7]

利比亚增加了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军事力量,这里是乍得政府军与叛乱政敌的战场,当地村民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避难所,不过卡扎菲想长期影响乍得事务的结果是不成功的。鉴于乍得的内战持续升级,1987 年 2 月,非洲统一组织呼吁乍得和利比亚以及相关利益方,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几周后,非洲领导人在开罗召开会议,谴责外国军队干预乍得内政。1987 年 3 月,乍得军队在杜姆(Doum)涸谷给利比亚军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事件是战争的转折点,它使利比亚在这里难以立足。不久,利比亚军队从奥祖北部地区撤军。

215

1988 年 10 月 3 日,乍得与利比亚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同意将奥祖地区的边境争议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1994 年 2 月,法庭作出了有利于乍得的判决,乍得与利比亚签署《合作备忘录》,利比亚将奥祖地区归还乍得。利比亚对乍得外交政策的失败,使卡扎菲对苏丹的兴趣也减弱了。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丹支持军方伊斯兰改革派,利比亚与苏丹关系紧张起来。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利比亚在苏丹的政治作用呈现递减趋势。

与此同时,利比亚继续卷入非洲动荡不安的局势之中。1987 年 4 月肯尼亚、1988 年 8 月贝宁、1989 年 5 月布隆迪、1990 年 3 月埃塞俄比亚相继驱逐了利比亚的外交使节,指控他们做了与利比亚外交不相

称的活动。在埃塞俄比亚,两名利比亚外交官牵涉亚的斯亚贝巴希尔顿饭店的爆炸阴谋。1988年11月,利比亚与布基纳法索、加纳与乌干达举行会谈,以增强双方的政治联系。随后,利比亚与布基纳法索、马里、卢旺达、桑给巴尔、津巴布韦签署贸易协定。据相关报道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利比亚不断卷入邻国内政事务,如马里、尼日利亚和卢旺达,致使利比亚与许多国家的关系都处于紧张态势。

卡扎菲政权、萨赫勒地区和撒哈拉以南国家在随后几年困难重重。许多非洲国家,特别是法属非洲国家,由于经济成就不佳、贪污腐败行为的破坏性影响以及政治发展迟滞,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衰败。全球制裁、油价低迷、经济衰退,再加上卡扎菲政权的反对者非常活跃,利比亚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

216

对马格里布的诉求

就在向非洲各国寻求支持、发出威胁或劝诱哄骗之时,利比亚开始与北非邻国改善关系。1984年8月,利比亚与摩洛哥签署《乌季达协定》,同意成立联盟国家,双方都保留自己的主权。两国都指望通过这次联盟收获经济利益;但由于双方经常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严重,其长远前景并不像预想中那样美好。因此,发生以下事情就不足为怪了:即1986年8月,摩洛哥宣布《协定》无效。

利比亚为了在北非地区寻求盟友,目标锁定了阿尔及利亚,两国早在1986年11月就开始了统一会谈。1987年6月,卡扎菲在阿尔及尔的国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呼吁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实现统一。1987年,卡扎菲的夙敌哈比卜布尔吉巴政府被推翻。1988年2月,突尼斯新政府与利比亚恢复友好关系,双方并签署了许多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协议,包括清除两国民间交往的障碍,扫除了利比亚、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三方在签署天然气管道协议上的阻力。1988年5月,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然而,这次和好并没有利比亚的直接参与,但却鼓舞了早在年前就开始了的大马格里布会谈。1988年12月中旬,利比亚与突尼斯启动两国一体化的许多实质性措施,包括自由跨

界贸易、近海开发石油与天然气、联通两国输电网络。两国成立了执行委员会,以保证双方在合作、整合与统一进程中的决策能顺利实施。

1989 年 2 月 17 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成立了一个新实体机构,即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目的是促进北非地区的经济合作。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北非统一协定第一次将所有马格里布国家包括在内,目的是不至于在其他联盟组织的竞争中被削弱。一份官方公报宣布了新组织的诞生,并描述新组织是“通向阿拉伯统一的基础阶段”,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并准备巩固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1992 年,欧共体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关税。成员国在欧共体内部发生变革的激励下认为,新成立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要想生存就必须效仿欧共体。欧共体对马格里布出口市场,特别是农产品、丝织业、轻工业商品产生直接威胁。此外,从马格里布向欧洲输出劳工的速度也放慢了,欧洲人到北非旅游的人数也逐渐下降。

卡扎菲似乎有意要引起世人争议。利比亚热衷于马格里布整合,特别热心于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活动,这成为成员国循环往复讨论的主题。一段时期,卡扎菲建议乍得、尼日尔、马里、苏丹应该加入该组织;但在另一时期又认为,应该动员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资源继续同以色列作斗争。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早期强调的一些问题继续困扰着新组织。卡扎菲两次延迟了第二次峰会的召开日期,声称这是预先安排的事情。就在会议召开之前,卡扎菲像他拒绝成为利比亚总统一样,公开宣布将拒绝担任 6 个月的轮值主席职位。卡扎菲的立场出乎许多观察家的意料,使他们回忆起 1982 至 1983 年间卡扎菲陷入非洲统一组织的一场危机的情景,当时卡扎菲咄咄逼人地要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随着时间的流逝,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员国达成了许多经济与政治协议。然而,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与突尼斯政府发现,与利比亚维持正常的、合乎规则的交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利比亚邻国对卡扎菲在国内支持激进派表达了关切。此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与突尼斯的边界被多次关闭。阿拉伯马格里

布联盟也反对利比亚卷入埃及在北非的事务。1992 年 4 月 15 日,联合国对利比亚施行制裁,突显了利比亚在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孤立境况,利比亚经济与政治整合的尝试受到严重挫折。

国际法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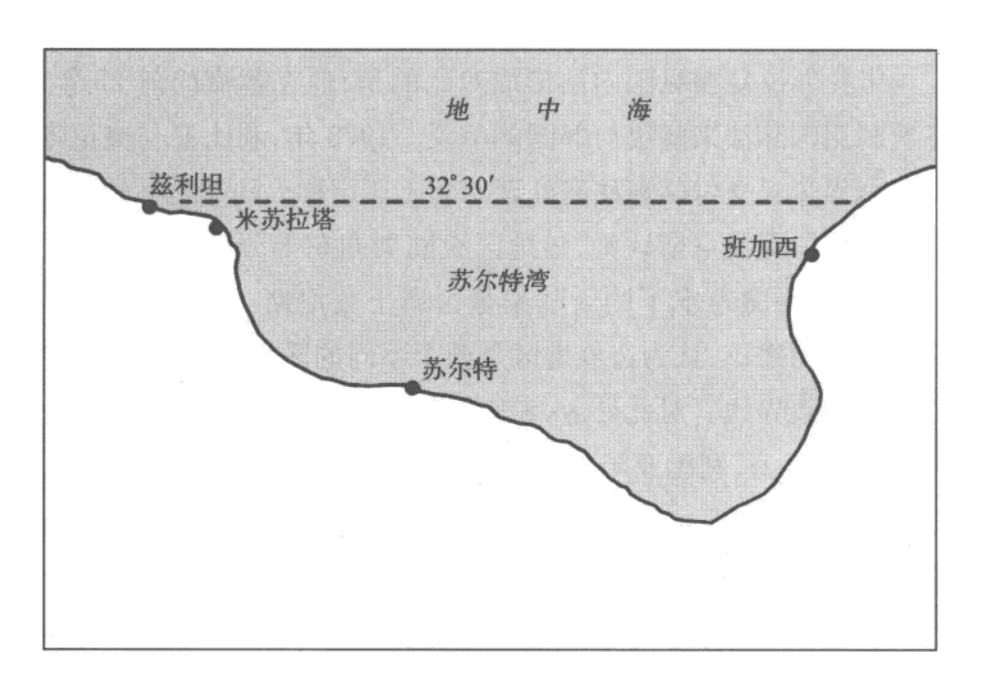
与卡扎非反复操纵国内法形成对比的是,他在革命的前 25 年间,有三次利用国际法来解决与邻国的争议。1978 年,利比亚与突尼斯将大陆架划界争议交付国际法庭处理。利比亚声称大陆架是其领土北部陆地的延伸。而突尼斯认为,该地区大陆架向东部分是延伸部分。问题的焦点是,隐藏在水下的大陆架是否属于突尼斯。1982 年,国际法庭拒绝双方的建议,认为边界地区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并建议在两个区域划定各自边界线。对此处理,利比亚与突尼斯都欣然接受。

1976 年 5 月,利比亚与马耳他要求国际法庭对双方大陆架的边界划分作出判决。国际法院按照特殊协议的条款,要求决定该案件可适用的法律原则,以及确定这些原则如何运用到大陆架争端中去。然而,边界线划定工作实际上应该由冲突方协商解决。1985 年 6 月,国际法庭依据特殊协议提出了一个判决意见,这是与争端无关的意大利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国际法庭拒绝利比亚的主要观点,支持马耳他的建议。国际法庭通过这件事发现,用国际法处理国际案件应该按照惯例,任何划界工作都应该反映公正的原则。国际法庭相应地开始着手协调工作,调整了由于考虑不周全而可能产生的边界纠纷,并让利比亚与马耳他完成其他划界工作。

219

1989 年 8 月,利比亚与乍得签署《和平协议》,该协议要求双方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所有权问题。但事实证明,协商解决是不可能的事情。1990 年 8 月,两国将争端提交国际法庭。利比亚认为与乍得根本就不存在边界问题,要求法庭作出判决。而乍得的观点是,与利比亚公认的边界已经存在几十年,仅仅是让法庭确认划界的过程。1994 年 2 月,国际法庭对此案作出判决:利比亚与乍得的边界线在 1955 年 8 月法国与托管利比亚的英国之间签署的《睦邻友好协定》中

已经作出明确规定。该《协定》指出，两国边界线在1919年后出版的地图集中所标示的界限为乍得和利比亚的边界。由于国际法庭拒绝利比亚提出的南部边界线划分要求，很明显，乍得在此次案件中为胜利一方。



地图8 苏尔特湾封闭线

220 与成功运用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的情况不同的是，利比亚发现自己争取苏尔特湾主权没有法律基础。该地区也叫锡德拉湾（Sidra Gulf），是利比亚地中海沿岸的大海湾。1973年10月9日，利比亚宣布享有苏尔特湾水域的主权，并向联合国发送了一个普通照会宣布这一主权。照会描述苏尔特湾是一个内陆水域，三面都由利比亚领土包围，处于领海范围之内，是利比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利比亚应该完全享有对此海湾的主权。照会还挑衅性地指出，未经利比亚的允许，其他国家公私船只不得进入此海域[8]。

由于苏尔特湾几乎占有地中海3%的海域，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都立即对利比亚的主张提出抗议。大多数抗议都是基于以下理由：即利比亚将公海转变为内陆水域，是滥用国际公法的非法行为。1974年

后,美国通过抗议与直接行动的方式定期对利比亚发出挑战。1977 至 1980 年,美国在苏尔特湾附近进行演习不少于 10 次。1981 年 8 月,美国战斗机在利比亚近海岸 60 英里处击落了两架利比亚飞机。第二次事件发生在 1986 年 3 月,美国海军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就到利比亚近海进行了 4 次演习。当苏尔特湾附近的利比亚炮兵连续发射地对空导弹时,美国飞机立即作出反应,打击了利比亚导弹部队,将 4 艘利比亚巡逻艇炸沉海底。在 1981 至 1986 年间,美国以维护国际公海与国际水域自由航行为由,表明打击利比亚行为的合法性。

挑战利比亚对苏尔特湾主权的不仅仅是美国,法国、英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土耳其、苏联等国,都对利比亚宣布关闭苏尔特湾表示抗议。意大利从一开始就发出强烈抗议,并一再表示在国际法庭参与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诉讼之前,强烈保留干预的权利。马耳他也迅速拒绝了利比亚占有苏尔特湾主权的说法,强调了对该问题的保留意见。直到 12 年后,也就是 1986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该地区的局部冲突时,马耳他才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阿盟谴责了美国在 1981 年和 1986 年对利比亚诉诸武力,但拒绝支持利比亚的苏尔特湾主权说法,认为美国有权以和平的方式挑战利比亚。

221

反政府力量的增加

卡扎菲政权的反对力量大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成长起来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它们的领导者是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兰解放党。1984 年 5 月,与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有联系的一个组织企图袭击卡扎菲住所,计划被挫败。据说 1985 年春,利比亚发生了两次暗杀未遂的阴谋;1986 年 9 月,利比亚当局宣布几个月前发现了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26 人被逮捕。1986 年 10 月,真主党 7 个成员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谋杀革命委员会成员,理由是他们阻止私人贸易活动。1987 年 2 月,真主党与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两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 9 名成员被公开处以极刑,理由是参与两次暗杀行动,包括暗杀苏联在利比亚的军人,犯了蓄意破坏与谋反的罪行。被指控的 6 人为普通民众,在班加西公开

处以绞刑;其余3人是士兵,在兵营被行刑队执行死刑。1989年3月,卡扎菲打击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力量,认为激进的宗教运动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统一、社会主义与进步的攻击。

222

1989年初,利比亚安全部队袭击了班加西的清真寺,关闭了公开批评卡扎菲宗教观点的教学机构。这一时期整个利比亚都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的黎波里的许多清真寺都遭到突然查抄。班加西、的黎波里等地的抗议群众公开谴责了利比亚恶化的经济形势、毕业生难就业,以及卡扎菲对宗教领导人与机构的攻击。民众产生不满的另一原因是:政府强征青年入伍。1987年初,利比亚被乍得军给以致命的一击,成千上万人死于此役。利比亚国外的反对活动也在日益增加。1987年1月,许多流落在外的反对组织,包括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利比亚国民斗争运动、利比亚全国民主阵线和利比亚全国组织在开罗举行会议,成立反对卡扎菲政权的联合工作组。

卡扎菲对待日益增强的反对力量的方式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重点强调后者。1988年3月,他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包括与政权相对立的前同僚盟友。利比亚的电视直播了卡扎菲用推土机撞破关押政治犯的佛纳杰(Furnaj)监狱,并声称利比亚监狱没有政治犯。卡扎菲声称自己一直被民众的愤怒呼声所折磨,意识到囚禁惩罚是徒劳之举。几天后,卡扎菲到移民办公室,宣布撕毁了由于政治原因禁止离开利比亚的人员名单。1988年6月,卡扎菲人权倡议小组的巅峰力作就是发布《人权绿色大宪章》。

1990年3月,总人民大会拒绝政府减少公共开支,相反要求降低税收、提供廉价住房、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卡扎菲谴责了政府的贪污腐败。卡扎菲的地位在随后的会议上被提升到最高领导人,有权推翻他不满意的任何决策。大会休会期间,卡扎菲采取新措施重新要求

223

控制总人民大会,大规模的替换总人民大会成员。民众认为,这一行动是利比亚强硬派的胜利。

到20世纪90年代初,反政权力量变得组织有序,其主张更为直白坦率。利比亚军队中偶尔也出现伊斯兰激进分子与对政权不满分子的

联盟,对卡扎菲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1993 年 10 月,与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有联系的利比亚部分军队主力在米苏拉塔地区发动叛乱。一些装备精良的军队也乘机作乱。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地方军队还不足以平息叛乱,但卡扎菲政权调派空军轰炸叛军,使之很快屈服。1995 年 9 月,军队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在班加西地区同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随后,1996 至 1997 年发生的政变阴谋也表明,伊斯兰激进分子与军队的联盟关系。

与此同时,民众普遍反对卡扎菲政权,且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1996 年 7 月,一群足球流氓展开了对卡扎菲史无前例的公开批评,随后演变成政治示威游行。他们聚集在的黎波里足球场反复地喊叫着反对卡扎菲执政的口号。该骚乱的导火线是因为足球比赛中的一方是卡扎菲的某个儿子资助的,这一联系使人们怀疑裁判员作出有利于卡扎菲儿子支持的球队的判决。足球粉丝举行抗议,闯入球场袭击裁判员,负责维护安全秩序的军官向人群开火,约 50 人死于非命。

利比亚反对派又增加了新的力量,那就是 1993 年成立的利比亚烈士运动。另一个更神秘的组织,即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首次出现在 1995 年。一些资料显示,该组织早在 1991 年初就已经成立。两组织成功地招募了一些从阿富汗反苏战场上退下来的利比亚老兵。他们回到利比亚后看到经济萧条,对前途不抱希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 2003 年指明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是一个外国恐怖组织,理由是它反对美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反对力量还包括昔兰尼加等地各种部族派系;国外活动着的各种意识形态运动组织。尽管流落在外的利比亚反政府组织在数量上日益增加,但缺乏凝聚力与整合力。

很明显,在卡扎菲政权执政的 30 年间,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然而,由于利比亚内部派系繁多,极度碎片化,卡扎菲政权必须解决如何赢得尽可能多的力量支持政权的问题,特别是赢得年轻人的支持,他们人数众多,生活并不富裕。卡扎菲超凡魅力的领导地位以及分配型经济政策,成功地为利比亚民众提供必要的商品与服务,这些因素使政

224

权赢得了相对较高的支持率。再者，利比亚领导人继续在武装部队、总人民委员会体系以及革命委员会三个机构之间玩弄平衡，构成了卡扎菲政权的核心支持力量。卡扎菲利用这些相互独立平行但又相互关联的机构，以及与部族联盟千丝万缕的联系，主导了利比亚的政治系统。



第九章 利比亚的复兴

全世界正在转而采纳利比亚的政治制度，谈论第三条道路、第三理论、民众社会主义、民众安全与民众领导地位。他们都说，民众应该参与领导层，不能逃避让民众参与领导层的事实。从克林顿到布莱尔这些重量级人物、资本主义的精英，都承认这一事实。

穆阿迈尔·卡扎菲，2001 年 6 月

走到巴塞罗那的尽头，你会说欧洲与非洲是由海洋隔离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是的，当这个过程被取消后，我敢肯定，我们是两个分离的个体，不是一个实体。然而，当你谈论欧洲—地中海合作时，你将我包括到欧洲区域。你让我的利比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穆阿迈尔·卡扎菲，2006 年 11 月

如果非洲成功地实现统一，那将对非洲人和世界都有益处，与现在欧洲联合具有相似之处……我想非洲地区大国与世界应该帮助非洲实现统一，推动它们成立非洲合众国，因为这将意味着稳定、和平与安全。这将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和平

大有益处。

穆阿迈尔·卡扎菲,2007年5月

226 1998年8月,也就是泛美航空公司103班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10年后,利比亚接受美英的建议,即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两名利比亚嫌疑犯阿卜杜勒·巴塞特·阿里·穆罕默德·迈格拉希和阿明·哈里发·费希迈。1999年4月,利比亚将嫌疑犯移交给联合国关押,联合国安理会则取消了自从1992年以来的多边制裁。美国的做法有所不同,缓减但并没有取消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利比亚的双边制裁。1999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表明立场,只要利比亚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将解除对利比亚的多边制裁[1]。在随后的几年里,利比亚经历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革新。作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利比亚成功地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建立商业与外交关系。就国内来说,利比亚继续从高度社会主义国家缓慢地向西方式国家过渡,自由市场体系下的民众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只是利比亚国内的政治领域还缺乏意义深长的变革。

走出非洲

取消多边制裁后,卡扎菲在非洲发起一系列的新尝试,目的是结束利比亚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孤立境况。随着非洲国家首脑频繁到利比亚访问,以示尊重,卡扎菲也努力解决在刚果、非洲之角、塞拉利昂和苏丹的冲突,向公众展示了实现和平的意向。1999年4月,卡扎菲作为中间人,促使刚果总统洛朗·卡比拉与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维尼签署了《停火协议》。卡扎菲后来还在刚果主持了5国峰会。在此期间,他向乌干达派出了一支引起争议的维和部队。1999年6月,他受到南非的欢迎,成为曼德拉政府最后一位官方贵宾。在非洲之角,据说厄立特 227 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是在接受利比亚的和平计划的基础上结束了边界冲突。但事实证明,这次争端的最终解决之道,就如同刚果局势的前景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卡扎菲派遣特使到多哥参与塞拉利昂的和平谈判,

并会见苏丹政府与反对党领导人,为结束苏丹内战而努力。尽管这些外交尝试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但表明了利比亚领导人试图通过这些行为赢得非洲政府的同情与支持。当时联合国制裁利比亚的阴影在制裁取消后的一段时间,在非洲地区仍有影响。

自从"九月革命"以来,卡扎菲一直对非洲地区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外交尝试标志着利比亚外交政策从阿拉伯世界转向非洲大陆,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与以往实践共同产生的结果。按照利比亚资深外交官的说法,这种转换的根本原因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在利比亚与美英在洛克比空难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提供支持。当然,反对以色列也是利比亚政策转换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核心因素。再者,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已经成为陈词滥调,除了在演讲时能煽动民众麻痹的情愫外,其他场合则很少提及。前面提及的强调伊斯兰教因素也在日益削弱。那么利比亚新型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呢?卡扎菲一再声称,未来外交活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利比亚是非洲的一部分。

1999 年 7 月,非洲统一组织在阿尔及尔召开峰会,卡扎菲作为非洲国家长期失散的兄弟受到邀请。卡扎菲再次提出了非洲统一的蓝图,呼吁成立泛非议会推进政治统一,整合银行系统,加速执行非洲经济共同体协定。他邀请非洲领导人参加在利比亚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会议,时间与利比亚"九月革命"13 周年巧合。会议主题是重新修改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非洲统一组织的阿尔及尔峰会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

228

就在特别峰会在利比亚召开前夕,大多数非洲国家外交官采取极为谨慎的方式强调他们的领导人同意参加会议,主要是出于对利比亚革命老臣的尊重,他们支持解放运动的强硬立场有助于结束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很少有国家希望在会上采取具体的行动。卡扎菲在峰会召开之前呼吁成立非洲合众国,并提出召开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长会议。非洲国家首脑拒绝成立非洲合众国,不过他们在峰会接近尾声时呼吁建立强大的非洲统一组织,成立泛非议会、非洲货币联盟和非洲法庭。2000 年 4 月,卡扎菲在非洲–欧盟峰会上再次强调并

呼吁非洲统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卡扎菲极力推进非洲合众国想法之时，2000 年 9 月，利比亚国内上演了一场本地人暴力袭击非洲外来劳工的惊心动魄的大戏。人们不加区别地伤害与杀死来自布基纳法索、乍得、加纳、尼日尔与尼日利亚等国工人。这一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竞争与社会压力的驱动，但也反映了利比亚认同对象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家族、伊斯兰教、国家与部族[2]。就在卡扎菲忙于追求非洲领导者的地位之时，国内的利比亚人却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他们越来越关注本国的外国人，即大多数非洲移民对失业的影响。考虑到对非洲意识形态的承诺，以及引领萨赫勒—撒哈拉共同体（COMESSA）的需要，利比亚放松了对萨赫勒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入境签证上的限制。尽管骚乱败坏了利比亚在非洲的名声，但移民仍源源不断地涌向利比亚，利比亚也继续追求自己在非洲的战略目标。

利比亚在多边论坛上提出自己的外交计划，推进刚果、苏丹与非洲之角的和平进程，利比亚与非洲国家的合作领域逐渐扩大了。利比亚与尼日尔（1997 年）、厄立特里亚（1998 年）、塞内加尔和南非（1999 年）签署《合作协议》，内容涵盖教育、科学与文化。此外，1999 至 2000 年，利比亚将双边财政援助延伸到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象牙海岸、马里、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与此同时，卡扎菲继续干预非洲内部危机。2001 年 5 月，当一名反叛士兵发动政变失败后，卡扎菲调派利比亚军队支持中非共和国。2001 年 8 月，卡扎菲同意通过利比亚的泰姆石油公司，向津巴布韦提供油气等必需燃料。2001 年，利比亚向津巴布韦提供贷款，而早期的援助都是当礼品送给津巴布韦。但之后卡扎菲又取消了贷款，原因是他意识到国际社会对贷款一事怀有敌意，以及津巴布韦没有支付能力。利比亚还宣布在乍得、埃塞俄比亚、马里和坦桑尼亚成立合资企业。利比亚与乍得签署协议，成立提炼石油的合资公司。观察家认为，利比亚又回到了昔日控制非洲资源的老政策上。

2002 年 7 月，模仿欧盟成立的非洲联盟替代了成立 35 年之久的

非洲统一组织。卡扎菲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现得很出色，拒绝了对外援助的所有条件，公开与非盟主席、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作对，后者要求捐赠国应该将援助与投资给那些治理较好的国家。不过，卡扎菲后来还是听从了姆贝基的建议，后者则将利比亚提升为非洲发展新合作伙伴(NEPAD)的成员。该计划推进非洲国家民主与构建好政府，以换取发达国家的援助与投资。姆贝基总统也没有考虑卡扎菲一直坚持的成立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的想法。相反，非盟同意成立由成员国的普通百姓和军方小分队组成的备用军。

2005 年 7 月，利比亚允许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辆辆装满食物的卡车穿越本国领土，到达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生活[illegible]的达尔富尔[illegible]区，以及乍得的苏丹难民营。同时，利比亚外交部长拒绝非盟成员国[illegible]外的外国人出现在达尔富尔，理由是西方维和部队的部署行动将会[illegible]该地区局势发生“爆炸”。2004 年年中，非盟向达尔富尔地区派出观[illegible]团。2004 年 9 月，泛非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2005 年 2 月，联合国[illegible]书长安南呼吁欧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帮助达尔富尔结束人道主义[illegible]义危机。卡扎菲后来对此加以批评。卡扎菲长期坚守的信仰是非洲[illegible]非洲人的非洲，认为非盟应该介入此事，迎接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illegible]战。此后，利比亚主持了一系列没有任何收获的小型峰会，努力寻求[illegible]洲人对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之道，缓和乍得与苏丹之间的紧张局势。

2005 年 7 月，卡扎菲在庆祝非盟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之际，主持[illegible]非盟议会第五次日常会议。在一次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讲中，卡扎菲[illegible]次呼吁非洲统一，认为这是构建共同防御体系，成立共同货币区域的[illegible]要。就在全球呼吁解决非洲贫困问题时，卡扎菲则忠告非洲国家停[illegible]乞求施舍，认为八国组织免除债务并不会使非洲国家有美好未来。[illegible]盟领导人要求成员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时要结成统一阵线，敦促[illegible]界富国帮助非洲国家成功地摆脱贫穷。由于峰会上的旗帜强调了“[illegible]洲合众国是我们的希望”，卡扎菲也呼吁非洲国家发放统一护照，以[illegible]便非洲人在非洲大陆自由通行。两年后，卡扎菲呼吁将非盟改变成[illegible]个雏形中的联盟政府。

231

早在1988年2月,卡扎菲就在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这一行为使利比亚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构筑撒哈拉国家联盟,但受到利比亚北非邻国反对的失败尝试[3]。由于所在地位于的黎波里,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将贫困国家与富裕的产油国利比亚联系起来。布基纳法索、乍得、利比亚、马里、尼日尔和苏丹都是该组织的创始国。1999年,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加入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至2007年年中,该组织的成员国家已经扩大到25国,代表了非洲大陆一半的人口。1999年成立的萨赫勒—撒哈拉投资与贸易银行以实现非洲国家的整体发展为基础,以全面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为目标,主要作用是资助非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与发展项目。2001年,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观察员地位,并与联合国许多代理机构签署联系与合作协议。

为了扩大地区联系,利比亚在2005年6月加入了东南非共同市场。该组织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地区性经济共同体,其目的是通过贸易发展的方式促进地区整合。该组织有21个成员国家,地理位置从埃及一直延伸到纳米比亚。非盟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两个组织都承认东南非共同市场是非洲发展的手段,特别是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有效方式。

在非洲其他地区,利比亚的政策引发了成立新型泛撒哈拉政治联盟的可能性。2004年8月,毛里塔尼亚指责利比亚支持政府反对派发动未遂政变,目的是让马维·乌尔德·塔亚(Maaouiya Ould Taya)总统下台。2005年2月,在利比亚安排斡旋下,图阿雷格人[1]叛军归还了被当做人质的尼日利亚士兵,卷入此事的图阿雷格人被赦免。2005年4月,卡扎菲在费赞的欧拜里(Oubari)地区对图阿雷格人代表团发表演讲,声称利比亚是图阿雷格人的保护者,并将自己描述为"沙漠中的熊与鹰"。他继续讲道,在图阿雷格人流散到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布基纳

[1] 撒哈拉西部和中部的柏柏尔人,主要生活在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利比亚西部,传统上为游牧民。——译者注

法索、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之前，利比亚是图阿雷格人祖先的家园。因此，他们应该视利比亚为“基地和支持力量”，因为利比亚不允许任何人袭击他们。卡扎菲的话表面上模棱两可，一些人以此证明他有插手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事务的倾向；但也从另一层面，向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发出警告，遏制他们在该地区构建帝国的构想。两年后，卡扎菲谴责美国向非洲调派美国指挥部队(American command force)的计划，该部队也叫非洲司令部(Africom)。 232

卡扎菲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通过“雇佣”约 3 000 名图阿雷格人、土布(Tubu)人和撒哈拉人，扩大利比亚的军队规模。很明显，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卡扎菲制定该计划的目的是想通过向撒哈拉部族提供诱人的雇佣条件，鼓励他们放弃向导职业，那就是说，在这种变化无常之地成立一支由利比亚控制的、有潜力的雇佣军，自然关系到该地区社会秩序的有序治理[4]。

2006 年 7 月末，索马里指责利比亚向控制该国大部分的伊斯兰激进民兵组织提供武器。利比亚对此断然否认。2007 年 1 月，利比亚宣布计划投资 230 亿美元用于发展贝宁的农业、石油业以及旅游业。不到一周的时间，卡扎菲又在苏尔特召开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峰会，并宣布利比亚将给调派到索马里的非盟部队提供财政支持。2007 年初，在利比亚的安排下，中非共和国与两个叛乱组织签署和平协议。2007 年 4 月，利比亚调派军事观察员到乍得与苏丹之间的动荡地区，替换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幸的是，他们不能够阻止另外的武装冲突。然而，利比亚继续主持地区峰会，目标是调解邻国乍得与苏丹的分歧，斡旋索马里的冲突。

当提及非洲之时，后制裁时代的卡扎菲视过去历史为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利比亚早期外交主要集中于反以色列、反帝与反殖民主义，支持宏大的泛阿拉伯事业。卡扎菲的新思想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语调上少了意识形态因素，显得更为务实。与过去充满欺诈、分歧与争吵等政策相比，利比亚在非洲的新尝试等于作了以下承诺，即有助于该地区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不过，这还没有成为事实。 233

兼顾东西方国家

卡扎菲以放弃昔日对中东,特别是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为代价,重新将兴趣投向非洲。例如,2001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峰会在卢萨卡(Lusaka)召开。卡扎菲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主题集中在非洲问题,而不是老生常谈的巴勒斯坦起义等问题。利比亚领导人在其他场合偶尔会提及巴勒斯坦问题,不过,卡扎菲的发言已经不关心意识形态,不再谈论过去30年占据利比亚外交政策主导地位的话题。2004年初,卡扎菲告知那些在1948年逃离利比亚,1967年被迫离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要他们在1948年后没有占领巴勒斯坦家园,就有权利为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得到补偿。2004年10月中旬,原旅居利比亚的犹太人代表团访问利比亚,这是与以色列交往的重要开端。此后,对抗性的犹太组织在犹太人财产请求权问题上与利比亚人进行了复杂的协商,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与此同时,卡扎菲继续提出成立以色列巴勒斯坦混合国家,作为巴以冲突的解决之道。

2005年5月,卡扎菲在非盟第五次常务会议上,带有嘲讽意味地阐述了自己对中东的特殊定义:

> 殖民主义将亚洲分为中东、远东和近东,这与非洲没有任何关系。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任何人不要试图将北非与中东联系起来,因为这是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请原谅我的语言,但我通常认为中东是“肮脏的东方”。[5]

234

与以上言论相一致的行为是,卡扎菲不断发出要退出阿盟的威胁,不过并没有付诸实践。与此相反,他继续参加阿盟会议,将之作为劝诱哄骗、指责阿盟成员国的平台。随着时间的流逝,卡扎菲与阿拉伯世界对问题与政策的看法渐行渐远。卡扎菲感到灰心丧气,但其中最核心问题还是推进泛阿拉伯运动的发展。例如,卡扎菲拒绝参加2007年3月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阿拉伯峰会,他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特点是“不严

肃”,并将阿拉伯的共同行动视为“功能失常”。卡扎菲在萨达姆被判绞刑前夕,将这位伊拉克前领导人描述为战犯。而当萨达姆被绞死后,利比亚宣布了3天的哀悼日,取消公众在伊斯兰宰牲节的庆祝活动。后来,革命委员会成员宣布萨达姆与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一样,后者曾经领导利比亚民众抵抗意大利的占领。卡扎菲与阿拉伯邻国关系也不断紧张,当他将自己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舞台时,完全疏远阿拉伯世界也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卡扎菲在北非地区转而复活走向末路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89年,创办国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主要目标是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随着“洛克比空难”问题的行将解决,阿尔及利亚暴力的减少,撒哈拉问题的逐渐突破,1994年由于地区冲突导致瘫痪的地区组织似乎开始复活起来。1999年5月,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5个成员国同意在5年内举行第一次峰会。与此同时,利比亚代表对扩大马格里布联盟成员国范围颇感兴趣,很可能将新成立的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整合入该组织。

2000年中期,卡扎菲与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一再呼吁,尽可能快地召开1999年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召开的北非峰会。不幸的是,包括西撒哈拉冲突与阿尔及利亚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等重大事件,阻碍了这次有进步意义活动的顺利进行。2002年1月,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外交部长们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但他们在峰会举办地点上难以达成一致。深谙此事的观察家认为,如果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不能化解冲突的话,这一问题也难以解决。2005年5月,由于摩洛哥拒绝阿尔及利亚将撒哈拉问题列入峰会议事日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峰会再一次延迟。随后几年,由于有关各方政治分歧迟滞了经济与政治目标的整合进程,峰会召开的前景仍很渺茫。如2007年3月,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员国宣布,计划在2008年解除地区空运限制。

除了与传统意义上的周边国家扩大关系,利比亚还与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00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对利比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文化与信息合作

的相关协议。2002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利比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首脑第一次访问利比亚。期间,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利比亚油气部门向中国公司开放,中国公司到利比亚修建铁路网,合同金额达 4 000 万美元。2002 年中,朝鲜高级代表团访问利比亚,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促进两国投资规模。当时观察家猜测,访问还谈及核能销售问题。但在 2003 年末,利比亚宣布放弃非常规武器,而朝鲜对此加以谴责。昔日的猜想不攻自破,该问题也有了新的意味。

2006 年 7 月,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拜访卡扎菲,这也是菲律宾国家首脑第一次访问利比亚。她感谢利比亚长期在结束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邀请利比亚商人到菲律宾投资,迫切希望改善在利比亚工作的菲律宾人的合同条款与福利待遇。阿罗约总统签署了为利比亚培训护士的协议,认为建筑业、家具业、医疗卫生以及旅游业,是双方未来合作的四大领域。

利比亚的外交领域延伸到中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已经被利比亚忽视了近 20 多年。1977 年,卡扎菲承认古巴在抵抗帝国主义方面所做的努力,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利比亚,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亲密合作的新时代。卡扎菲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1979 至 1983 年新宝石运动后统治格拉纳达的莫里斯(Maurice)主教建立了亲密的双边关系。此外,卡扎菲邀请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的左派领导人与相关革命人士到利比亚学习,并接受准军事训练。[6]

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没有成为利比亚的主要外交阵地。但自 2001 年,利比亚又重新开始努力,向加勒比海三国许诺提供 20 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动要求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他们的香蕉,并立即提供 2 150 万美元的资金。利比亚尝试性付出的回报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国家总理访问利比亚。刚开始,安提瓜与圣基茨和尼维斯也加入访问行列,但后来没

有成行,原因是没有为出访做好足够的准备。加勒比国家高级官员访问利比亚以及利比亚为他们提供的援助,使美国官员与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领导人更关心利比亚外交政策在拉丁美洲的基本目标。2007年6月,卡扎菲向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提供贷款,前者在“冷战”时期是美国的敌人,后者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曾乘喷气式飞机到伊朗出访。以上行为引起美国对利比亚的重新关注。

与欧洲的关系

237

卡扎菲在强调与非洲、亚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建立联系的同时,转而扩大与欧洲大国已经存在的广泛联系。整个20世纪90年代,利比亚85%的出口对象、75%的进口是欧盟国家。仅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就吸收了利比亚出口的80%。利比亚进口对象主要是德国与意大利,但英国也是利比亚进口国家中的重要一员。欧盟被利比亚外交主动的姿态所鼓舞,1999年重新考虑让利比亚加入欧盟—地中海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世人皆知的“巴塞罗那进程”。这一地区实体创始于1995年《巴塞罗那宣言》,当时利比亚是欧盟—地中海会议的第一个观察员国家。

2004年4月,卡扎菲访问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这标志着欧盟已经原谅他过去的过分行为,卡扎菲重新成为国际社会一位值得信任的领导者。2004年10月,欧盟解除对利比亚的最后制裁,包括1986年始执行的武器禁运,原因是意大利希望给利比亚供应监视设备,帮助自己遏制北非的非法移民活动。除了解除监察设备的条款之外,欧盟与利比亚还在精神病院管理、社会思想更新等培训项目进行合作。

2005年6月,欧盟官员宣布,他们将与利比亚共同努力,阻止非法移民通过利比亚到达欧洲,这再一次表达了希望利比亚完全成为欧盟—地中海合作伙伴的构想。一个月后,欧盟委员会提供100万欧元支持利比亚遏制HIV/AIDS疾病。利比亚曾经指控5名匈牙利护士和一名巴勒斯坦医生故意对400名孩童注射HIV病毒,并作了有罪的判决。欧盟拒绝承认这是事实,敦促利比亚释放被拘留者。2007年7月,利比亚释放了这6人。然而,如何解决移民问题仍是双方面临的突

238

出难题。

早在2004年，利比亚就宣布有意加入欧盟－地中海合作伙伴关系。然而，几年过去了，呈递的正式申请还是没有得到批准。卡扎菲政权在此过程中并不愿表现的太积极，部分原因是，在他看来自己是非洲与欧洲之间进行斡旋的不二人选。利比亚认为，当该组织成员之一以色列仍在占据巴勒斯坦领土之时，他不会加入一个以构建“地中海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为目标的组织。以色列积极参与“巴塞罗那进程”，但文件条款并没有宣布所有成员国必须相互承认主权，只是含蓄地承认会员国存在的权利。利比亚在正式加入该组织后，将不得不与以色列在同一委员会与工作组工作，并准备进行对话与信息共享。此外，利比亚加入了所谓的“5＋5组织”，该组织成员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5个马格里布国家，以及法国、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5个欧洲国家。利比亚极力推进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对话，使自己在未来的地区整合中扮演先锋的角色。最后，利比亚因为能源出口没有关税限制，享受了与欧洲国家自由贸易的诸多好处。利比亚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致力于“巴塞罗那进程”，就不会从欧洲国家获取利益，而利比亚与叙利亚是欧盟计划在2010年创立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MEFTA)中缺少的环节[7]。

与利比亚关系最亲密的欧洲国家是意大利。意大利一直是利比亚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况且意大利是引领着利比亚回归国际社会的先锋。就在搭乘“洛克比空难”的两名嫌疑犯的飞机在荷兰着陆的一天后，意大利外交部长会见卡扎菲。同年末，意大利总理对利比亚进行两天的正式访问。此后，意大利与利比亚的外交与商务关系在昔日的交往背景上又增添了新内容。一方面，利比亚长期以来一直给意大利提供能源，份额占到25％。2004年10月，绿溪管道投入运行后，其份额增加到30％。多边制裁结束鼓励了双方在制裁期间放慢但从未停止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利比亚继续向意大利施压，要求意大利赔偿殖民统治时期对利比亚带来的伤害，这也是利比亚鼓励所有非洲国家向前殖民统治者索求赔偿总政策的一部分。卡扎菲政权要求意大利修

239

建一条从突尼斯到埃及的公路，作为历史上意大利殖民利比亚的赔偿。意大利同意对经研究具有可行性的项目出资援助，但不是修建公路。

2005 年，利比亚恢复了“复仇日”庆祝活动，10 月 7 日为纪念日。1911 年的这一天，意大利入侵利比亚。1970 年的这一天，利比亚将 2 万意大利居民没收财产后驱逐出境。2006 年 3 月，一伙暴徒袭击了班加西的意大利领事馆。卡扎菲向意大利政府发出警告，如果意大利继续拒绝为殖民统治时期谋杀的上千利比亚人支付赔偿，他不排除未来会发生抢夺意大利人财产、袭击意大利裔居民的事件。随着双方局势的持续紧张，2007 年 4 月，意大利法院作出判决，意大利殖民统治初期从昔兰尼掠夺到罗马的维纳斯雕像并不是意大利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应该归还利比亚。

2006 年 2 月末，意大利法官对 1978 年什叶派教职人员穆萨·萨德尔失踪一案作出最终判决，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利比亚卷入该案件。萨德尔是阿迈勒运动的创始人，在访问利比亚期间神秘失踪。什叶派领导人长期声称他在利比亚被监禁或杀死。利比亚否认此指控，坚持认为萨德尔很可能是在归国途中成为什叶派内部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同年初，意大利官员确定萨德尔离开利比亚后进入意大利境内。但几十年来，萨德尔到达意大利后的下落成为千古之谜。萨德尔家族和阿迈勒运动成员谴责了意大利法院的判决，指控这种做法仅仅是意大利安慰卡扎菲政权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240

利比亚非法移民潮流席卷南欧，特别是意大利，如何解决这些麻烦事成为双方持续讨论的主流话题。从 2004 年开始，在意大利的资助下，利比亚将来自意大利的移民遣回原籍，并为非法移民修建隔离营，培训警察，为边境管制供应必需物质。在利比亚领土上为寻求政治庇护人士修建营地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与欧洲人日益关心的人权问题有关系。2004 年 12 月，卡扎菲在受到挫折后失望地宣布，利比亚并不想成为“欧洲的海岸警卫队”。2005 年 7 月，意大利与利比亚海军完成了地中海合作演习，这是两国自 2002 年恢复联合军事演习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利比亚拒绝接受在欧洲移民问题上的全部责任。

利比亚担心欧洲影响下的移民政策将引起非洲伙伴的敌意，故敦促欧洲国家在减轻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困难上承担责任，而后者是移民流的主要原因[8]。

英国政府也迅速与利比亚重新建立商业与外交关系。一旦利比亚移交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犯，英国同意与利比亚全面恢复外交关系，不过附加条件是利比亚必须完全承担1984年谋杀伦敦警官伊冯·弗莱彻的责任。利比亚满足以上要求后，1999年7月，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英国驻利比亚新大使在同年末就职上任。2000年5月，英国官员在的黎波里举办了解除制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商业展销会。英国在美英利三方协商中发挥调解者的作用，其结果是：2003年12月，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4年3月，托尼·布莱尔访问利比亚，他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首相访问利比亚以来的第二位英国首相。两国领导人许诺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进行合作，随后在伦敦宣布，英国和利比亚在基地组织、北非相关恐怖组织的敏感情报上实现共享。2007年5月，即将离职的布莱尔首相到利比亚进行告别政坛之行。

241

1999年3月，法国巴黎法院缺席判处袭击UTA772客机的6名利比亚嫌疑犯终身监禁。然而，法院并没有追究卡扎菲个人在此案中的责任。法国商业集团利用司法诉讼软弱无力的机会，在利比亚全球恢复外交关系之际，努力到利比亚寻找商机。2001年后，法国与利比亚关系缓慢地向正常化方向迈进。2004年初，利比亚同意为UTA772客机袭击中遇难者家属增加赔偿金数额，以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1999年，利比亚同意支付3 300万美元。但在利比亚支付“洛克比空难”遇难者家属较高的赔偿金后，遇难者家属要求更多的赔偿。利比亚拒绝为UTA772客机遇袭负责，但2004年1月，出于人道主义的姿态，同意为170个遇难者补偿1.7亿美元。赔偿是通过卡扎菲慈善基金会完成的，该基金会主席是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赛义夫是卡扎菲的大儿子，第二个妻子所生，显而易见也是卡扎菲的继承人。

2004年11月，雅克·希拉克总统访问利比亚。两个月后，法国国

防部长在一份关于法国与利比亚军事合作的函件上签字。2005 年 5 月,法国与利比亚同意在塔朱拉(Tajura)核反应堆,医疗检查与工业制造放射性同位素项目上合作。2006 年 3 月,两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协议。2007 年 7 月,也就是 6 名被囚禁的医护人员被释放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会见卡扎菲,同意为利比亚修建一座核反应堆,为海水淡化工厂提供能源,解决未来几年利比亚淡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利比亚与德国也长期承受着司法诉讼的煎熬。司法诉讼焦点主要是西柏林拉贝莱迪厅炸弹袭击事件。经过 4 年的侦破,德国在 2001 年 11 月中旬发现了 4 名安置炸弹的嫌疑犯。这次爆炸造成 3 人死亡,229 人受伤。法官审理后认为,法庭已经确认利比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但是他也声明,并没有证据证实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个人与此事有染。利比亚不承认对袭击负有责任,但是在 2004 年 8 月中旬同意支付 3 500 万美元作为对袭击中 160 位非美国籍遇难人士的赔偿。这次赔偿支付还是通过卡扎菲慈善基金会完成的。美国律师积极奔走,为迪厅袭击中两名死亡的美国士兵和 169 名受伤的美国人寻求单独的赔偿。拉贝莱事件结束后,利比亚国内的德国商业集团迅速增加。德国当时是利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意大利。

2004 年 10 月,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访问利比亚,与卡扎菲会谈,并访问了化学石油武器巨头巴斯夫(BASF)的分公司温特沙尔公司。自 1958 年以来,温特沙尔公司就一直极为活跃,曾一度占有利比亚石油生产的约 10%,成为利比亚第三大石油制造商。在访问期间,卡扎菲抱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安放的地雷造成利比亚人伤亡惨重。当他提出赔偿要求时,德国领导人暗示,实现两国利益最佳的方式就是将历史与过去置之脑后。2005 年 5 月初,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邀请卡扎菲访问德国。2006 年 11 月,德国外交部长盛赞利比亚回归国际舞台,是北非国家的积极范例。

反恐战争

利比亚移交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犯后,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对利

243 比亚的外交政策。1999 年 11 月,美国负责近东与南亚事务的副国务卿,后来担任驻阿富汗大使的罗纳德·诺伊曼对利比亚的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卡扎菲政权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面对利比亚寻求变革的征兆,2000 年 2 月,美国白宫决定不再对利比亚参与联合国派往民主刚果共和国的维和部队提出质疑。这也是几十年来利比亚第一次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与利比亚展开公共外交的同时,1999 年年中,克林顿政府与利比亚进行秘密会谈,目标是保证利比亚服从联合国相关决议。但由于克林顿要准备 2000 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些双边谈判暂时停了下来。之后克林顿担心这些事情被公之于世,造成政治丑闻。

“9·11”事件的灾难性后果是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美国。卡扎菲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热心支持者,他谴责了恐怖袭击,对遇难者表达了同情。随后几个月,美英与利比亚的官员举行了几次会谈,希望在情报信息方面实现共享。2003 年 1 月,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强调了利比亚将在支持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中“尽我们的一份职责”,“交换基地网络情报”。2004 年 3 月,卡扎菲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利比亚之所以在反恐战争中同美国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白宫为打击目标的伊斯兰组织也威胁到了卡扎菲政权。1999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与利比亚第一次举行秘密会谈,利比亚意识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同意与美国在抵抗基地组织上进行合作。作为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长期打击目标,卡扎菲政权在“9·11”前夕已经将本·拉登的盟友,也就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信息与美国共享。作为回报,2003 年,小布什政府将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列入了美国认定
244 的外国恐怖组织的名单,理由是该组织也对美国造成威胁。利比亚最终在 2002 年 1 月发起网上通缉,悬赏 100 万美元奖励那些提供卡扎菲政权反对者信息的通风报信者,这些政敌与伊斯兰运动有密切关系。

2003 年 8 月,利比亚官方接受了在泛美航空公司 103 客机爆炸中

应负的责任,同意支付 27 亿美元给 270 名遇难者家属作为赔偿。随后,法国要求增加 UTA772 航班爆炸案遇难者家属赔偿金额。2003 年 9 月 12 日,联合国安理会解除了对利比亚的多边制裁。美国对此决议表示欢迎,但还要等到利比亚完全履行诺言后才解除制裁。美国官员详细表述了利比亚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包括改善糟糕的人权纪录,建立政权的民主制度,改变在非洲地区冲突中的破坏性角色,以及放弃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布什政府关心的所有事情中,只有追求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对利比亚施加制裁最初的逻辑依据与理由。

2003 年 3 月,一名利比亚代表与英国政府接触,开启了与英美的直接对话,目标是解除利比亚非传统武器项目。三方会谈在伦敦举行,像“洛克比事件”协商一样,双方主要围绕着赔偿问题展开了 9 个月的谈判。美国在证实利比亚确实想解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决定解除制裁。伦敦会谈是在极度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2003 年秋,有迹象表明,会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在 2003 年 10 月末接受采访中表达了利比亚想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想法,并表示利比亚不久将在这一点上向世人作出重要的承诺。2003 年 12 月 19 日,利比亚外交部长宣布,利比亚决定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完全停止国际社会禁止的武器研制[9]。

245

作为利比亚解除非传统武器研制的回应,美国采取措施解除了对卡扎菲政权的制裁,并扩大双边的商业与外交关系。2004 年 2 月 26 日,华盛顿解除了到利比亚旅游的禁令。两个月后,宣布减轻经济制裁。2004 年 4 月,美国宣布在利比亚加入 WTO 一事上不再投否决票。7 月,WTO 给利比亚开了绿灯,给予其协商成员国的地位。2004 年 9 月 20 日,布什总统解除了与利比亚的紧急状态,以及所有的制裁措施。2004 年 11 月中旬,白宫要求国会解除进出口银行不向利比亚贷款的禁令,并认为这些措施在方便美国人到利比亚投资方面极为必要。与这些措施相联系的是,2005 年 1 月末,利比亚政府将 15 个开发与生产分配协议中的 13 个项目赏赐给美国石油公司。2005 年 2 月,

美国解除了对利比亚外交官的旅游限制,允许他们在美国自由行走。随着两国交往范围的扩大,2005年夏,美国宣布了与的黎波里建立军事交往的计划。同年末,卡扎菲邀请布什访问利比亚。

与此同时,由于卡扎菲被指控在2004年资助了一场暗杀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本·阿卜杜拉齐兹·沙特(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Saud)的活动,利比亚仍然被美国国务院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2005年8月,面对变化莫测的局势,沙特声称已经宽恕了密谋的策划者。利比亚对美国缺乏诚意与实际行动而感到失望。2005年,利比亚政府从瑞士银行保管账户撤回给"洛克比空难"遇难者家属的5.4亿美元赔付资金。因为按照2003年的协议条款,先是利比亚为每个遇难者家属赔付400万美元,联合国解除制裁;再为每个遇难者家属赔付400万美元,美国解除双边制裁;最后给每个遇难者家属赔付200万美元,利比亚被清除出恐怖主义的黑名单。《洛克比协议》还规定了利比亚被清除出黑名单的最后期限,超过期限,最后的赔付资金将被收回。

尽管努力维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避免引起洛克比遇难者家属的敌视,但利比亚在支付最后一笔赔付资金的期限上一拖再拖。2005年2月,赔付期限又一次到期,利比亚再次延期,要求布什政府遵守相关条款。随着第三次支付时间表的一再延迟大规模款项的赔付,"洛克比空难"似乎已经在双边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因此美国对利比亚的撤资行为出奇地温和。曾几何时,双方的焦点聚集在贸易、投资与安全合作上。但后来,国会中支持"洛克比空难"遇难者家属的议员要求利比亚将赔偿费用的全部款项支付给遇难者家属,双边关系在取得富有意义的进步后又埋上阴影。2007年6月,美国众议院专款委员会通过修正案,阻止美国公司向利比亚投资,直到布什政府证实利比亚已经遵守向"洛克比空难"家属赔偿的相关协议规定。2007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吉恩·克瑞兹为未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而4名美国参议员宣布参议院将推迟任命,直到利比亚向"洛克比空难"者家属支付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赔偿为止。

经济改革

整个20世纪90年代,利比亚石油生产由于强行的经济制裁、需求下降,以及油田设施的老化等多种因素影响而摇摆不定。随着国内民众对经济相关问题的日益不满,卡扎菲政权意识到需要重振境况不佳的经济局势。然而,在国家面临着经济制裁的情势下,利比亚政府尽管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发动全面的改革。10年过去后,面对制裁的取消、石油需求的日益旺盛、全球油价的飙升,利比亚经济也开始作出积极的回应。以石油为基础的收入猛增,仅在1999至2003年间,就占了GDP的约50%,出口量的87%,政府收入的75%。

247

利比亚经济依赖于由国家主导的碳氢部门。2006年7月,世界银行将利比亚描述为世界产油国经济多元化程度最低的国家,碳氢部门占GDP总量的72%,政府收入的93%,出口收入的95%。碳氢部门吸纳了利比亚就业人口的3%。据估计,利比亚75%的雇佣人口在国营部门,私人投资份额较低,仅占GDP的2%。由于人口高增长率与低就业率,利比亚也面对着严重的失业问题[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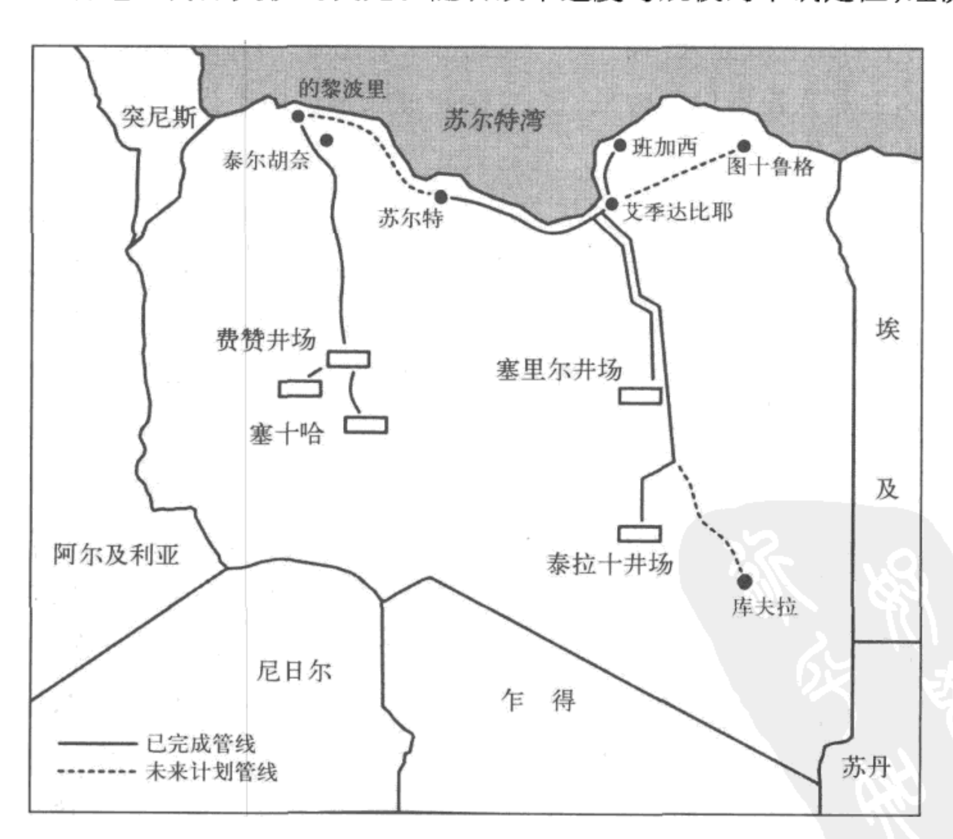
2001年9月,卡扎菲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以及石油资源使用低效率的现象。随后两年,利比亚政权推进经济自由化,核心内容是多元化、私有化与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为此,政府官员常用的口头禅是“透明度”与“合作关系”,这在过去是很陌生的语汇。卡扎菲对利比亚改革步伐缓慢并不满意。2003年6月,他向总人民大会发表演讲,要求启动经济政策的大规模改革。他宣布利比亚国营部门失败了,呼吁石油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展开大规模的私有化,并保证利比亚加入WTO。2003年10月,新任命的利比亚总理苏卡里·贾尼姆是一位私有化的支持者,宣布361家国营部门计划在2004年或者私有化或者清算下马。新政府还在货币继续贬值的情势下,统一了利比亚多层次的汇率,提高了利比亚公司的竞争力,从而吸引外国人的投资兴趣。就在利比亚宣布放弃非传统武器研制并提出解决方案时,美国开始减缓长期执行的双边制裁后,利比亚在2004年加快了私有化速度。2004年,外国人在

248

利比亚的直接投资达到40亿美元，是前一年的6倍。

2004年12月，利比亚总理在迪拜召开的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概述了利比亚以经济多元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他强调了议程中的改革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并突出认为，私有部门作用的日益增强并不意味着国营部门的地位会突然消失。相反，他认为国营部门与私营部门互为补充，在较长的时间内共存。然而，政府在实施削减津贴、解除进口关税等措施后不久就引发民众的示威游行，政府也很难对之进行平衡。2005年5月，利比亚政府将油价提高了30%，将居民每月500千瓦的消费用电价格涨了一倍，公众批评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形势逐渐恶化。

249 2005年7月，利比亚政府面对行将激烈的竞争格局，以及民众日益关心的设施简陋、工厂设备落后，安全隐患严重等问题，作出了解除3 500种进口商品关税的决定。随着改革进度与规模的不确定性，经济



地图9 大人工河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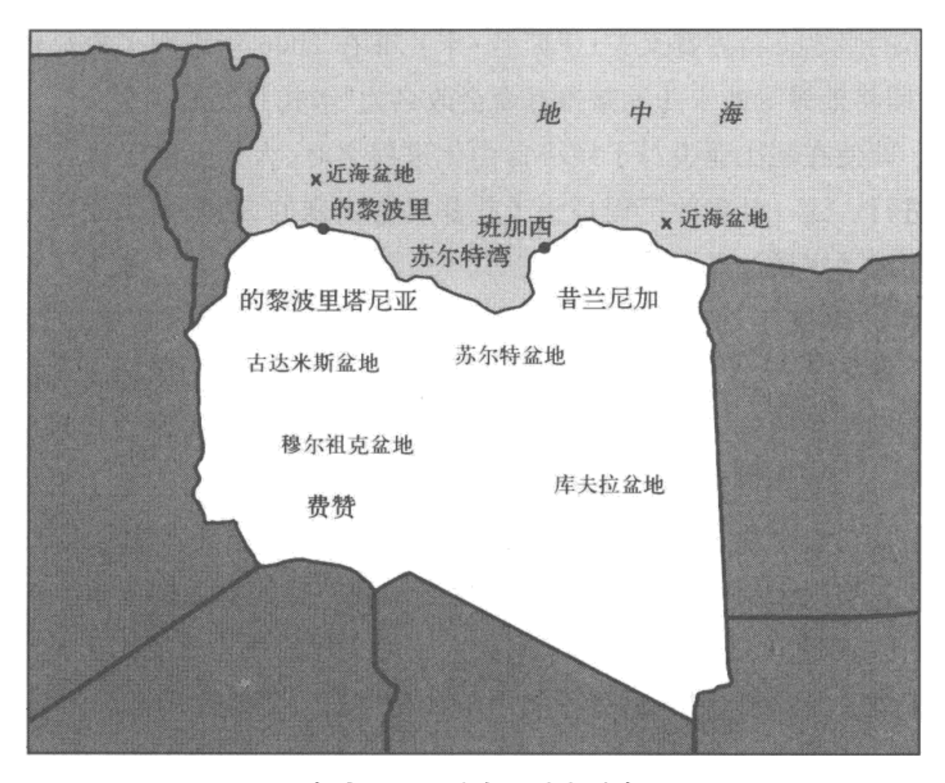
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在 2006 年采取了象征性措施，即将他领导的卡扎菲慈善基金会改名为“卡扎菲发展基金会”。

即使在利比亚投身于经济自由化进程之时，大人工河工程仍在继续进行。这一壮观的工程是由卡扎菲构想出来的，想把利比亚南部沙漠的地下水通过几百米长的管道引导到沿海农业项目区。大人工河工程始于 1983 年，初期构想在 5 年内完工。然而，工程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据估计，大人工河工程完成要 30 年时间，包括相关基础设施在内的预期花费估计多达 250 亿美元。由于利比亚国内居民消费用水与工业用水比预期增长得快，该项目的原定用途也逐步扩大。鉴于该项目的规模与复杂性，对此批评者大有人在。对项目持贬抑态度的人认为，工程花费太大，并且鼓励了需要靠政府长期补贴的农业的发展。随后的研究表明，对于市镇用水来说，大人工河工程的成本效能比起脱盐工程来说过于昂贵，尽管后者不能用于农业用途。其他批评者认为，该工程破坏了整个北非的地下水系统。而支持者则反唇相讥地认为，大人工河能提供利比亚 800 年的用水。

2006 年 3 月，利比亚内阁进行大重组，具有改革思想的贾尼姆被更易受控制的阿里·巴格达迪·马哈穆迪所替换。国家机构也进行了重组，能源部被撤除，贾尼姆被任命为国家石油公司的主席。人们普遍认为，内阁的剧变是传统保守派的胜利。在贾尼姆任总理时高调鼓吹的私有化项目但在非油气部门进展缓慢，几乎没有支持者。总理马哈穆迪虽然没有对前任的政策进行抨击，但是几乎不支持贾尼姆孜孜以求的经济改革。其结果是，碳氢部门以外的改革进程仍处于一种步调缓慢、态度不清的状态，其效率被人为的限制而大打折扣。

250

就在内阁重组前夕，卡扎菲的一系列发言使民众对改革政策的速度与方向一头雾水。2006 年 6 月，利比亚计划部鼓励跨国公司关注石油以外的部门，考虑向建筑、保健或旅游业投资。7 月，利比亚领导人又说想遏制外国人在经济中的作用，确保利比亚财富留在国内。一个月后，卡扎菲指责国家过分依赖油气收入、外国人和进口，警告利比亚人要自力更生，自己生产需要的物品。卡扎菲在纪念“九月革命”37 周



地图 10 石油与天然气储备

年庆祝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失业的利比亚人向非洲移民，并警告他们必须尽快行动，否则报酬丰厚的工作就被中国人和印度人抢跑了。利比亚政权随后逮捕了许多利比亚商人，理由是他们垄断了商业，违反了"民众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一新术语是利比亚官员提出的，强调经济自由化必须与《绿皮书》的原则相协调一致。很难对卡扎菲自相矛盾的言论，以及个别利比亚官员的行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一切使得潜在的投资客感到惴惴不安。

特殊的碳氢部门

与利比亚经济的其他部门改革表现出的不和谐、零散、难成体系形成对比的是，碳氢部门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效率极高。

利比亚原油产量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日产 370 万桶减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产 100 万桶。据估计，利比亚原油储量有 390 亿桶，在非洲属储量最大。利比亚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不迟于 2015 年，石油

日产量恢复到 300 万桶。2005 年，利比亚石油日产量超过了 160 万桶，2006 年日产量接近 180 万桶，预计到 2010 年的日产量是 200 万桶。但不迟于 2015 年，石油产量达到日产 300 万桶的目标还是很成问题的。再者，实现以上目标的日期是 2010 年、2012 年，还是 2015 年，这依赖于利比亚官方的决定。而实际上，不早于 2015 年实现目标则是最现实的[11]。

贾尼姆政府优先发展与扩大天然气生产，这对利比亚来说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目标。据估计，利比亚探明的天然气储量有 513 亿立方英尺，在非洲名列第三，而未探明的储量可能是这一数字的 3 倍。大规模的开发天然气资源，多数原因是利比亚国内的天然气消费量上升，同时也可增加出口。利比亚西部天然气工程的目的是，将地中海近海巴赫尔艾萨拉姆(Bahr Essalam)和阿尔及利亚附近的陆上瓦法(Wafa)气田的天然气输送到沿海迈利泰赫(Melitah)加工厂，这成为利比亚再次对开发天然气感兴趣的范例。在整个项目运行过程中，预期利比亚西部天然气工程将提供意大利能源需求总量的 30%。该项目的核心工程绿溪管道是一条连接利比亚与西西里岛的长达 322 英里的管道。2004 年 10 月，该管道投入使用。2005 年 8 月，巴赫尔艾萨拉姆天然气田始投入试生产。如果利比亚想实现油气生产的长期目标，那就有必要到 2010 年吸纳 300 亿美元的国外投资。

252

利比亚用来刺激国外企业投资碳氢部门的主要手段是，制定新一轮的勘探与生产份额协议，为在开放、竞争的投标环境中提供刺激因素。协议第一轮的第四阶段标志着利比亚商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现了总理贾尼姆所说的简化审批程序，国家石油公司将在更开放的环境中运行的许诺。选择中标赢家的第一因素以石油公司油气生产的比例为考量重点，比例越高，机会越大。第二个因素是合同签署时，公司向国家支付的红利。随后的竞标程序被重新界定，但大多数竞标过程都是以第一次为样板。新过程建立在预设标准的基础之上，与以前的制度比较来说，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变化，因为国家石油公司与投标竞争对手处于同等地位。而以前的投标过程缺乏透明度，其后果是

经常耽搁达成最终协议。

253 1974年后,协议倾向于让利比亚人参与碳氢工业。然而,利比亚还开发了一种双边模式以刺激基础设施的发展。2005年5月,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与壳牌石油公司宣布与利比亚签署协议,内容包括马卜雷加港液化天然气工厂的升级换代,以及苏尔特盆地5块区域的勘探与开发。2005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在协议的第一轮15个开发区域中赢得了9块区域。以前曾经签署的合同因制裁暂停,现在这些合同继续有效并付诸实施。2006年12月,意大利政府宣布埃尼集团[①]公司希望与利比亚恢复双方长期以来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包括修建液化天然气工厂。2007年5月,英国石油公司宣布了一个7年发展规划,内容涵盖勘探17口油井,天然气处理、运输与液化等各个层面。1月前,道氏化学公司宣布与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对拉斯拉努夫(Ras Lanuf)的石化企业进行升级换代。

国家石油公司鼓励执行生产份额协议,也就是著名的《开发生产份额协议》(Development 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DPSA),该《协议》要求几十年前外国石油公司使用后停止作业的相关油田恢复生产,并扩大产量。最后,该《协议》要求向公司提供劳务合同,开发那些被认为规模太小,但现在通过考察可以开发的未开发油田。按照以上两种情景,石油公司对在探明储量区域开发很感兴趣,因为可以避免钻探新油井所冒的巨大风险。

自始至终,利比亚碳氢政策的基础就是避免该领域被一两个或更多的大型国际石油公司所主导。对利比亚国家来说,这一政策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石油公司被迫撤出利比亚时,更证明了这一点。在《协议》的前三个阶段,以及围绕第四个阶段,大约来自10多个国家的20多家公司成功地来利比亚竞标。各公

254 司都获得了开发地块。从利比亚与诸多油气开发商协商并签署的协议

① ENI全称 Ente Nazionale Idrocarburi,简称"埃尼集团",意大利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国家燃料公司,意大利石油业最大公司,1953年组成,总部设在罗马。——译者注

可以看出，也恰当地表明，多元化是利比亚改革的核心目标。

社会状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卡扎菲镇压了军队与部族中的异己分子。此后，政权内部的反对派主要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卡扎菲指责伊斯兰激进分子是“疯狗”，并在三个方面遏制他们的影响：即削弱乌莱玛的宗教权威；批驳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严厉镇压伊斯兰反对派。为了增强政治合法性，建立自己无可置疑的权威，卡扎菲要求全国更严格地实行伊斯兰法。1994年2月，总人民大会要求，扩大伊斯兰法的适用范围，授予宗教领导人拥有发布宗教法令等新权利。

与此同时，利比亚政权开始通过发起反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驳斥伊斯兰激进主义权威。卡扎菲指出一条介于强硬的宗教反对派与对抗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普通民众选择的中间道路。他指挥安全部队严厉镇压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作为对以上政策的补充，1997年，总人民大会通过一系列措施，对窝藏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部族或个人实行集体惩罚。2000年4月，从约旦引渡而来的8名伊斯兰激进分子有3人被执行死刑。20世纪90年代，班加西成为反政府组织活动的中心。据报道，2008年8月，两名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被暗杀。此后，卡扎菲政权似乎大体上遏制了但并没有消除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12]。

在利比亚境外，众多反政府组织继续行动，但不能结成有效的联合阵线。2000年8月，6个反对组织，即利比亚变革运动、利比亚宪政组织、利比亚伊斯兰组织、利比亚国家组织、利比亚全国民主大会与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一起讨论联合战略。会谈后的联合声明含糊其辞地表明，意识形态的歧见与派系争端仍然是这些反政府组织一起活动的困扰因素。在会议召开之前，卡扎菲政权企图诱使流落在外的政敌返回家园，要求总人民大会成立委员会解决那些乐意回归利比亚的、流落在外的反对派面临的困难。2003年5月，也就是美国领导的联军占领伊拉克几周后，5个反政府组织，即利比亚国家联盟、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议会、利比亚塔马兹赫特代表大会、利比亚全国拯救阵线、利比

亚变革运动共同签署了反对现政府的协议。他们在协议中强调,齐心协力同卡扎菲政权作斗争是利比亚民众的责任。

2005年6月25至26日,利比亚政治反对派国际会议在伦敦召开大会,反政府组织企图再次联合起来。会议强调了宪政统治的合法性,要求将7个温和的、主流反对派组织联合起来,但并不要求每一个组织都这样做。除了其他组织外,穆斯林兄弟会由于拒绝组织者坚持的狭隘的会议原则而没有参加会议。会议最后发表《全国共识宣言》,要求回归宪政合法性,成立过渡政府,起诉卡扎菲政权中那些犯有非人道主义罪行的政府成员,会议呼吁卡扎菲引咎辞职。他们拒绝采取武力行动,并认为联合国应为恢复利比亚宪法负责。组织者在会议期间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与美国的距离,强调利比亚政治变迁不应该受外国的干预。当提及利比亚人权问题时,他们还批评了利比亚与美国的正常化关系,以及在人权实践中采取的双重标准。

多年来,各组织,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与美国国务院,都罗列了卡扎菲政权违反人权的一系列记录。详列的记录包括:非法逮捕、未经审讯而监禁、酷刑、无故消失、不公正审判以及死刑。2003年1月,当利比亚驻美国大使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年任期的主席时,批评利比亚令人失望的人权记录达到顶峰。2004年4月,大赦国际在距离第一次访问利比亚15年后,发布充满尖锐批评的报告,呼吁卡扎菲政权对报告中罗列的、关于利比亚人权存在重大问题的一些细节进行答复。

2005年5月,人权观察的结论是:利比亚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已经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对政治拘留犯滥用暴力,限制言论表达与结社的自由和关押政治犯。2006年1月,人权观察在一份名为:《言行之间的利比亚:迫切需要人权改革》的报告中,总结了利比亚的人权状况:

> 利比亚人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受到严重压制。个人不允许发表批评政府、批评民众国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以及国家领导人卡扎

> 菲的言论。凡是表达批评意见或者试图组织反政府团体的，将面临任意羁留以及经过不公正审判后的长期监禁的惩罚。尽管利比亚人权状况有所改善，但酷刑逼供仍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像监视器使得安全机构遍布各处，在很大程度上监视着民众的一举一动。[13]

2006 年 2 月，班加西发生暴力示威游行。事件的起因是丹麦出版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卡通片，从而引起了民众的争吵，这也反映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民众长期以来的失意、沮丧，以及不满情绪的爆发。示威者破坏了意大利领事馆，导致 11 人丧生，这是穆斯林世界抗议欧洲媒体出版先知漫画的一系列游行示威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破坏意大利领事馆是因为意大利政府的一名部长宣称要将穆罕默德的卡通形像印在圆领汗衫上，但是抗议者也喊出反对卡扎菲政权的口号。

257

2006 年 3 月，总人民大会成立人权办公室。一天后，利比亚政府宽恕了 132 名政治犯，包括被禁止的穆斯林兄弟会的 84 名成员。尽管利比亚国内出现了改革的迹象，但 2007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在每年一度的《人权实践报告》中，仍将利比亚描述为一个人权纪录较差的威权主义国家，卡扎菲与其内部一小部分人垄断了权力。利比亚出版的 4 份日报有 3 份得到信息部的资助，第四份由革命委员会控制。唯一可以吸引民众、与国有电视台相竞争的卫星电视台，勉强使死气沉沉的政治气候略显生机。

政治发展

此前卡扎菲将利比亚划分为 1 500 个公社，各公社都有预算、行政与立法权力。2000 年 3 月，卡扎菲废除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职能，将这些职责移交给由 23 个市镇委员会组成的总人民大会。政府的许多部门被废除，中央政府仅控制了诸如国防、安全、经济和金融、能源、对外事务、基础设施、社会安全和贸易等领域。能源部被撤销后，碳氢政策

258 的执行权交给国家石油公司。2000 年 10 月，公共安全部被替换，信息部被撤销，财政部被解散。2001 年 3 月，财政部的职责被新成立的经济与外交贸易部以及前财政部所承担。随后几年，其他部门也有所改变。2003 年 1 月和 3 月，卡扎菲重新任命了部长职位，任命苏卡里·贾尼姆为总人民大会的首脑。2006 年 3 月，贾尼姆被其副手所替代。

卡扎菲政权的长期特征就是部长的频繁调换，这是防止他们构建权力基础形成潜在的政治竞争者的最好方式。所以利比亚很难出现在国内政治环境中引领重大变革的人物。相反，他们强调权力平衡的相对稳定，以及卡扎菲在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多年来，利比亚政治体系的权力最高层总人民大会或内阁由一小部分人组成，这些人每隔几年就调换一次。据估计，利比亚在 1969 至 1999 年仅有 112 名内阁部长，这一数目并不大，但他们在位时间仅一到两年。这些部长大多数都是治国专家，与卡扎菲年岁相当。多年来，他们已经满足于在不同的岗位上随意轮换。这种治理制度使卡扎菲在袖珍政治中卓然世外，而其手下也难以获得太多的政治权利，在其职位上干得也不太爽快。最重要的是，它使得官员任期与权力地位完全依赖于卡扎菲的喜怒哀乐与突发奇想。[14]

2007 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退休，卡扎菲成为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首脑。尽管利比亚民众偶尔会对诸如官方贪污腐败、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不满，但大多数利比亚人从政治上普遍支持、同情卡扎菲，或者对政府派系、改革主义者与保守派的所作所为持怀疑态度。259 民众的不同声音仍是政权考量的因素，但随着卡扎菲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对反对派的接纳与妥协态度，政权的反对力量的影响日渐衰微，反卡扎菲力量没有机会在利比亚国内掀起有效的抵抗运动。卡扎菲通过诸多反政府组织与机构，包括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由政治掮客领导的不正式的补充力量，维持一种乱哄哄的感觉，从而显示他是能够平息不同声音的智慧领袖。

卡扎菲面对诸多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及自己作为国家首脑年岁并不太大的事实，40 年的执政历史已经表明他娴熟的政治治理技能，以

及继续执掌政权的必要性。利比亚现在还没有规范领导人与国家首脑继承制度的清晰准则。尽管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一再被认为是卡扎菲的可能继承人,但他本人一再否认,并声称自己对此职业毫无兴趣。然而,国内的进步力量却将赛义夫视做惩治贪污腐败、玩忽职守,以及摆脱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境况,重构利比亚的希望所在。无论如何,卡扎菲作为领袖魅力的独特品质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烟消云散。至于卡扎菲创造的制度与机构,将会为民众参与利比亚政治体系提供机会,成为表达民众意愿,并完成重要的分配与安全功能的工具。事实将会证明,这些制度将不会有大的变动,并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卡扎菲继承人的宝贵遗产。

卡扎菲的利比亚

1998 年后,卡扎菲对利比亚的指导原则、治国风格以及外交政策的内容进行了重大变动。卡扎菲转而努力结束利比亚商业与外交的孤立境况,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非洲大陆,忽视巴勒斯坦问题,并不断谴责中东的昔日盟友。他还扩大利比亚与欧盟以及欧洲大国的现存关系,并在亚洲等地发展新的外交关系。然而,随着“洛克比空难”问题的解决,联合国解除制裁,利比亚开始了重大的行动,那就是决定放弃非常规武器研制以及相关输送系统。卡扎菲通过以上行动,为同美国全面恢复商业与外交关系铺平道路。这一外交政策目标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也是利比亚回归国际社会的最后一步。

260

自从 1959 年利比亚石油的商业价值被发现以来,利比亚经济一直严重依赖碳氢部门。据预测,未来发展趋向将继续如此。据估计,2007 年利比亚石油储藏量将超过 390 亿桶,天然气储藏量有 510 亿立方英尺。2003 年后,利比亚经过协商颁布了一系列的开发生产份额协议,签署了许多双边协议,并确信随后几年储量水平会增加 3 倍。经过 30 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利比亚表现出租赁经济的典型特点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经济方式的特点就是国家收入严重依赖地租或者外来货币,而不是靠国内生产所创造出的收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利比亚尝试性地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租赁经济模式使之受到挫折。这种国家治理模式深深植根于君主制时期的分配性机制，卡扎菲政权为了赢得支持力量继承了这种分配方式。时间延续到21世纪初，利比亚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相似的情况再次限制了这种努力。最近的改革进程主要是加强全球经济联系，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对碳氢部门的投资。其他经济部门所取得进步也受到政策的不协调性、结构性问题，以及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制约瓶颈，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限制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其结果是，经济改革成为两种速度、两种路径的过程，卡扎菲政府优先发展碳氢部门，后者发展速度超越了经济结构中的其他部门。

经济改革无论保持什么样的速度与规模，民众并不期望有什么政治自由化的变革。卡扎菲执掌政权接近40年，利比亚人除了熟悉卡扎菲及其制度外，不知道其他领导人与治理方式。再者，利比亚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保守社会，相当大一部分人对现状很满意，他们已经接受了现政权那种介于有限的政治改革与相对高的生活水平之间的隐形的、折中的治理方式。鉴于政治改革可能削弱卡扎菲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他更可能通过变革巩固其在由他本人创造的政治制度中的显赫地位。可以预见，在此过程中，他可能继续重组国家的领导层，以平衡权力结构，阻止个人构建权力基础。至于未来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正式的、合适的机制来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后卡扎菲时代无论何时出现，但有一点可以预见，那就是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

261

文 献 导 读

262

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研究利比亚,特别是研究利比亚早期历史遇到的真正困难之一就是语言问题。我在 30 年前第一次访问利比亚,手头的英文书籍少得可怜,大多数都是关于利比亚技术领域或者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著作。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有所改观。然而,在某些特定领域的英文资料仍然较为缺乏。因此,应该强调的是,我提及的文章著作尽管以英文为主,但没有英文时,我会介绍法文和意大利文的。

关于利比亚原始资料内容最全面的书是 Ronald Bruce St Joh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ibya*, fourth edition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还值得推荐的书有: Richard I. Lawless, ed., Libya (Oxford: Clio Press, 1987)和 Mohamed A. Alawar, ed., *A Concise Bibliography of Northern Chad and Fezzan in Sourthern Libya* (Wisbech, Cambridgeshire: Arab Crescent Press, 1983)。

关于介绍北非早期历史的书,参见 Jamil M. Abun-Nasr, *A History a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Alasdair Drysdale and Gerald H. Blake,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Poliitical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Abdallah Laroui,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ive*

Essa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以及 Michel Le Gall and Kenneth Perkins,ed. , *The Maghrib in Questipn: Essays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要了解利比亚的古代时期,以下著作值得推荐：Olwen Brogan, 263 "Frirst and Second Century Settlement in the Tripolitanian Pre-Desert," *in Libya in History*, ed. Fawzi F. Gadallah (Benghazi：Uninversity of Libya, 1968), pp. 121 – 130； C. Daniels, The Garamantes of Southern Libya (Stoughton, WI：Oleander Press, 1970)；David N. Edwards, J. W. J. Hawthorne, John N. Dore, and David J. Mattingly, "The Garamants of Fezzan Revisited：Publishing the C. M. Daniels Archives," *Libyan Studies*, 16(1999), pp. 109 – 128； D. E. L. Haynes, *Antiquities of Tripolitania* (Tripoli：Antiquities Department of Tripolitania, 1955)；Mario Liverani, "The Garamentes：A Fresh Approach," *Libyan Studies*, 31 (2002), pp. 17 – 28； and David J. Mattingly, " Mapping Ancient Libya," *Libyan Studies*, 25(1994), pp. 1 – 5。

腓尼基、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等的古典时期(约公元前 1000 — 500)的英文文献数量较大。关于介绍腓尼基历史的著作可参考：Maria Eugenia Aubet, *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olitics*, *Colonies and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Anthony Strong, *The Phoenicians in History and Legend* (Bloomington. IN：AuthorHouse, 2002). 要想了解希腊、罗马和拜占庭历史的读者,建议从阅读以下著作开始：Antonino Divita, Ginette Divita-Evrard, and Lidiano Bacchielli, *Libya: The Lost Cities of the Roman Empire* (Cologne：Konemann, 1999)；Paul Lachlan MacKendrick, *The North Afrian Stones Speak*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and Sue Ravin, *Rome in Africa*, third edtion (London：Routledge, 1993). 其他一些值得推荐的资料有：J.

Liebare, "Some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in North Africa in Punic and Roman Times," *Museum Africum*, 2 (1973), pp. 24 – 40; Kenneth D. Matthews, Jr., *Cites in the Sand: Leptis Magana and Sabratha in Roman Af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7); and B. H. Warmington, *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 Conqu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这方面的法语著作值得参考的有: Marcel Benabou, *La résistance africaine á la romanisation* (Pairs: Francois Maspero, 1976), Jean-Marie Blas de Roblès, *Libya: grecque, romaine et byzantine* (Aix-en-provence: Edisud, 1999). Christian Courtois,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Aalen: Scientia, 1964; and Gilbert Charles- Picard, *La civilisation de L'Afrique romaine* (Paris: Librairie Plon, 1959)。

论述伊斯兰征服北非的最好英文著作是: Dhanun Taha, *The Muslim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North Africa and Spain* (London: Routledge, 1989). 同时还可参见: C. Edmund Bosworth, "Libya in Islamic History," *Journal of Libyan Studies*, 1, no. 2 (Winter 2000), pp. 6 – 16 and Abbas Hamdani,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Libya during the Fatimid Period," *in Libya in Histoty*, ed. Fawzi F. Gadallah (Benghazi: University of Libya, 1968), pp. 321 – 346. 关于穆瓦希德王朝的英文著作有: Roger Le Tourneau, *The Almohad Movement in North Africa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关于西班牙穆拉比德王朝的法语著作有: Vincent Lagardè, *Les Almoravides, le djihăd andalou (1106 – 1143)* (Paris: L'Harmattan, 1999). 有关柏柏尔王朝的著作参见: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retress, *The Berbers*, *Peoples of Africa* (Oxford: Blackwell, 1997); Michael Brett, "Ifriqiya as a Market for Saharan Trade from the Tenth to Twelfth Century AD," *Journal of African*

264

Studies, 10 (1969), pp. 347 - 364; and Ronald A. Messier, "Rethinking the Almoravids, Rethinking Ibn Khaldun,"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6, no. 1(2001). pp. 59 - 80. 要了解伊斯兰现代史的读者可以参见这些著作：Barrie Wharton, "Between Arab Brothers and Islamist Fo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slamist Movement in Libya," *Journal of Libyan Studies*, 4, no. 1 (Summer 2003), pp. 33 - 48; John P. Entelis, ed., *Islam,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George Joffe, "Qadhafi's Isla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Qadhafi's Libya, 1969 - 1994*, ed. Drik Vandewal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139 - 154; John Ruedy, ed.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关于奥斯曼帝国占领时期(1551 — 1911)的著作有：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 - 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Justin McCarthy, *The Ottoman Turk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to 1923* (London: Longman, 1997), 这本书是读者了解奥斯曼帝国文化、社会和统治秩序的最佳著作。要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可以参考这些著作：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rden Turkey*,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Lord Kinross, *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Morrow Quill, 1979); Roderic H. Davisi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 - 18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全面深入地描述卡拉曼利王朝(1711 — 1835)的相关著作和文章有：Kola Folayan, *Tripoli during the Reign of Yusuf Pasha Qaramanli* (Ile-Ife, Nigeria: University of Ife Press, 1979). Riffat Abou-EL-Haj,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Libya between the Sixteente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5, no. 2 (August 1983), pp. 305 - 319; Kola Folayan, "Tripoli and the War with the U. S. A., 1801 - 5," Journal of Africa History, 13, no. 2 (1972), pp. 261 - 270; L. J. Hume, "Preparations for Civil War in Tripoli in the 1820s: Ali Karamanli, Hassuna D'Ghies, and Jeremy Bentham," *Jounral of African History*, 21, no. 3 (1980), pp. 311 - 322; and C. R. Pennell, " Work on the Early Ottoman Period and Qaramanlis," *Libya Studies*, 20 (1989), pp. 215 - 219. Fawzi F. Gadallah. ed., *Libya in History* (Benghazi: University of Libya, 1968)。

研究卡拉曼勒王朝时期海盗的文献主要有: Seton Dearden, *A Nest of Corsair: The Fighting Karamanli of Tripoli* (London: John Murray, 1976); James A. Field, *Ameri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1776 - 188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Godfrey Fisher, *Barbary Legend: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 - 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Ray W. Irw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Barbary Powers, 1776 - 181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1); Louis B. Wright and Julia H. Macleod, *The First Americans in North Africa: William Eaton's Struggle for a Vigorous Policy against the Barbary Pirates, 1799 - 18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海盗的文学作品有: Richard B. Parker, *Uncle Sam in Barbary: A Diplomatic Histor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04) relates historical events to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 well-researched and meticulously written book. 最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Robert J. Allision, *The Cresent Obscu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World, 1776 - 18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Franklin Lambert, *The Babary Wars: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the Atlantic World* (New York: Hill & Wang, 2005); Joseph Wheelan, *Jefferson's War: America's First War on Terror, 1801 - 1805*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3); Richard Zacks, *The prirate Coast: Thomas Jefferson, the First Marines, and the Secret Mission of 1805* (New York: Hyperion, 2005). 有两本意大利学者编著的书对懂意大利语的读者很有帮助: Salvatore Bono, *Lumi e Corsair: Europa e Maghreb nel Settecentro* (Perugia: Morlacchi Editore, 2005) and Paolo Soave, *La Rivoluzione Americana nel Mediterraneo: Prove di Politica di Potenza e Declino delle Regenze Barbaresche* (1795 - 1816) (Milan: Dott. A. Giufre, 2004)。

266 关于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时期(1835—1911)的历史,读者可以参见这些著作: Anthony Joseph Cachia, *Libya under the Second Ottoman Occupation, 1835 - 1911* (Tripoli: Government Press, 1945).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 - 19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Ernest N. Bennett, *With the Turks in Tripoli* (London: Methuen, 1912); E. J. F. Joffe, "Trade & Migration between Malta & the Barbary States during the Second Ottoman Occupation of Libya (1835 - 1911)," *i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Libya*, ed. by M. M. Buru, S. M. Ghanem, and K. S. McLachlan (Wisbech, Chambridgesshir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2), pp. 1 - 32; C. R. Pennell, "Political Loyalty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Precolonial Libya,"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ed. E. G. H. Joffe and K. S. Mclachlan (Wisbech, Chambridgesshir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2), pp. 1 - 18. 可供参考的文章还包括有: Lisa Anderson, "Nineteenth Century Reform in Ottoman Lib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6, no. 3 (August 1984), pp. 325 - 348; James A. Field, Jr., "A Scheme in Regard to Cyrenaica,"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4, no. 3 (December 1957), pp. 445 - 468; Michel Le Gall, "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Sanusiyya: A Reapprai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1, no. 1 (February 1989), pp. 91 - 106; John Wright, "Murzuk and the Saharan Slave Trade in the 19th Century," *Libya Studies*, 29(1998), pp. 89 - 96。

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1830 - 193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4). 这本书里探讨了自1830年以来利比亚国家的特性和政治经济情况,着重强调了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对利比亚的冲击、撒哈拉沙漠贸易的衰退和欧洲金融资本的渗透等。他的著作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昔兰尼加的部族结构和利比亚对意大利殖民主义的应对。Ahmidia后来在*Forgotten Voices: Power and Agenc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by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中将以上分析进一步扩大延伸。

研究赛努西教团最全面的著作有: Knut S. Vikor, *Sufi and Scholar on the Desert Edge: Muhammad b. Ali al-Sanusi and his Brotherhoo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还值得推荐的著作有: Emrys L. Peters, *the Bedouin of Cyrenaica: Studies in Personal and Corporate Power* (Chambridge: Ch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是Jack Goody和Emanuel Max编辑的论文集。研究赛努西教团的传统研究成果还包括: E. E. Evans-Prichard, *The Sanusi of Cyrenac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and Nicola A. Ziadeh, Sanusiyah: *A Study of a Revivalist Movement in Islam* (Leiden: E. J. Brill, 1983)。

267

要想了解利比亚犹太人的苦难史,读者应该从以下著作读起: Renzo de Felice, *Jews in an Arab Land: Libya, 1835 - 197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两个最新研究成果值得推荐,即 Harvey E. Goldberg, *Jewish Life in Muslim Libya: Rivals and Relativ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and Rachel Simon, *Change within Traditon among Jewish Women in Libya* (Se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西蒙(Simon)的作品对自19世纪后半期到1967年的犹太妇女地位的转变进行了详细研究,这是阿拉伯国家里研究犹太妇女的开山之作。研究《塔木德》的学者和流动的小贩 Mordechai Hakohen (1856 - 1929) *The Book of Mordechai: A Study of the Jews of Libya* (Philadelphia, P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80). 记录了犹太人的社会生活,本书由 Harvey E. Goldberg 翻译。

有关意大利侵略利比亚的英文经典历史著作有: Claudio G. Segre, *Fourth Shore: The Italian Colonization of Liby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William C. Askew, *Eurpoe and Italy's Acquistion of Libya, 1911 - 191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2); Thomas Barclay, *Turco-Italian War and Its Problems* (London: Constable & Company, 1912); and Timothy W. Childs, *Italo-Turkish Diplomacy and the War over Libya, 1911 - 1912* (Leiden: E. J. Brill, 1990). 要想了解利比亚从奥斯曼帝国统治转向意大利统治的历史,可以参见: Lisa Anders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Libya, 1908 - 1922,"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 Rashid Khalidi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5 - 242; Lisa Anderson, "The Tripoli Repulic, 1918 - 1922,"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ed. E. G. H. Joffe and K. S. Mclachlan (Wisbech, Cambridgeshir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2), pp. 43 - 65; Habib Hesnawi, "Italian Imperial Policy towards Libya, 1870 - 1911,"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bya: Souces and Historiographies*, ed. Ann Baldinett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2003), pp. 49 - 62; and Rachel Simon, *Libya between Ottomanism and Nationalism: The Ottoman Involvement in Libya dutring the War with Italy* (1911 - 1919)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1987)。

关于意大利殖民主义的历史,可参见: Leonard Applet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Libya under Italian Rule," *Libyan Studies*, 10 (1979), pp. 29 - 33; David Atkinson, "the Politics of Geography and the Italian Occupation of Libya," *Libyan Studies*, 27(1996), pp. 71 - 84; Duncan Cumming, "Libya i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Libya in History*, ed. Fawzi F. Gadallah (Benghazi: University of Libya, 1968), pp. 383 - 392; Mohammed Taher Jerary, "The Libya Cultural Resistance to Italian Colonization: The Cosequences of Denying the Values of Other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bya: Souces and Historiographies*, ed. Ann Baldinett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2003), pp. 17 - 36; Brian L. McLaren, *Architeceture and Tourism in Italian Colonial Libya: An Ambivalent Modernism*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Enzo Santarelli ed. al., *Omar al-Mukhtar: The Italian Reconquest of Libya*, trans. John Gilbert (London: Darf Publishers, 1986); Claudio G. Segre, *Italo Balbo: A Fascist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lia Press, 1974); John Wright, "Mussolini, Libya and the 'Sword of Islam'," *Maghreb Review*, 12, no. 1 - 2 (January-Apirl 1987), pp. 29 - 33. 关于从利比亚的角度来探讨意大利侵略的著作,可以参见: Ahmed M. Ashiuraki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Libyan Struggle for Freedom* (Tripoli: General Publishing, Distributing & Adverting Company, 1976). 要想详细了解意大利的殖民政策,可参见: 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London: Longman, 1976) and R. J. B.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Life under the Dictatorship, 1915 -*

1945 (London: Penguin, 2005)。

关于利比亚从殖民形态向独立国家转变的历史,可参见: Scott L. Bills,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 - 194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drian Pelt, *Libya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Case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Benjamin Rivl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talian Colonies* (New York: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Annie Lacroix-Riz, *Les protectorates d'Afrique du Nord entre la France et Washington* (Pairs: Edtions L'Harmattan, 1988) and Martin Thomas, "Defending a Lost Cause? France and the Untied States Vision of Imperial Rual in French North Africa, 1945 - 1956," *Diplomatic History*, 26, no. 2 (Spring 2002), pp. 215 - 247.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利比亚即将独立和独立后的法美关系。还有一些值得推荐的文献有: Lisa Anderson, "'A Last Resort, an Expedient and an Experiment': Statehood and Sovereignty in Libya," *Journal of Libyan Studies*, 2, no. 2 (Winter 2001), pp. 14 - 25; Ann Dearden, "Independence for libya: The Political Problem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4, no. 4 (October 1950), pp. 395 - 409; C. Grove Haines, "The Problem of the Italian Colonie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1, no. 4 (October 1947), pp. 417 - 431; Benjamin Rivlin, "Unity and Nationalism in liby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3, no. 1(January 1949): 31 - 44; and 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ld War & Libyan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Libyan Studies*, 2, no. 2(Winter 2001), pp. 26 - 45。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本书在较长的时间里是利比亚通史的惟一英文版本。他在 1969 年将以上著作进行扩展,写成《利比亚》,主要内容是 20 世纪后的利比亚。他最近出了一本著作,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描述了 1900 年后的利比亚,但重点写的是 1969 年后利比亚的政治与经济。作为法文著作值得推荐的著作是: André Martel, La Libya, 1835 – 1990: *Essai de géopolitique histor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1)。

对于 1951 至 1969 年的利比亚王国历史,可参见: 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3),这本书着重描述了利比亚独立国家的形成过程。John Norman, *Labor and Politics in Libya and Arab Afric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65); Henry Serrano Villard, Libya: *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and Nicola A. Ziadeh, *The Modern History of Liby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这些都是经典读物。*The Life and Times of King Idris of Libya* by E. A. V. De Candole,这本书在 1990 年由 Mohamed Ben Ghalbon 出版,对君主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对于那些熟悉意大利语的读者, Massiniliano Cricco, *Il Petrolio dei Senussi: Stati Unitie Gran Bretagna in libia dall'indipendenza a Gheddafi (1947 – 1973)* (Florence: Edizioni Polistampa, 2002)对于了解外交事务非常有用。

关于君主制时代,下面的文献值得推荐: Mustafa Ahmed Bin Halim, *Libya: The Years of Hope* (London: AAS Media, 1998); Stephen Blackwell, "Saving the King: Anglo-American Strategy and British Counter-subversion Operations in Libya, 1953 – 59,"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9, no. 1 (January 2003), pp. 1 – 18; Ann Dearden, "Independence for Libya: The Political Problem,"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4, no. 4 (October 1950), pp. 395 – 409; Alison Pargeter, "Anglo-Libyan Relations and Suez Crisis,"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5, no. 2 (Summer 2000), pp. 41 – 58. Salaheddin

270

Hasan Sury, "A New System for a New State: The Libyan Experience in Statehood, 1951 - 1969"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byan: Sources and Historiographies*, ed. Anna Baldinett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2003), pp. 179 - 194; John Wright, "Libyan's Short Cut to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Libuan Studies, 2 no. 2(Winter 2001), pp. 77 - 88. 关于君主制政权最后岁月的著作，参见 William H. Lewis, "Libya: The end of Monarchy", Current History 58(January 1970), pp. 34 - 38, 50。

关于介绍现代利比亚的著作，可参见 Dirk Vandewalle, Libyan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Build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和 Mansour O. EI-Kikhia, Libya's Qaddafi: The Politics of Contradict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Vandewalle 的著作集中在卡扎菲政权的国内政治，而 EI-Kikhia 的著作则侧重于外交关系。Dirk Vandewalle ed., *Qadhafi's Libya, 1969 to 199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为最近出版的著作提供了历史背景，对一些问题提供了细节。

关于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英文传记有：Mirella Bianco, Gadafi: Voice from the Desert (London: Longman Group, 1975); David Blundy and Andrew Lycett, *Qaddafi and Libyan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7); George Tremlett, *Gadaffi: The Desert Mystic*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1993). Edmond Jouve 在 Mouammar Kadhafi: Dans le Berger des Syrtes (Paris: Flammarion, 1996)也是值得推荐的著作。

利比亚革命的意识形态有时指的是第三世界理论，介绍这一理论的三本小册子是卡扎菲的《绿皮书》。这三本书在 1975 年单独出版后，被收集在 Henry. M. Christman, ed. Qaddafi's Green Book: An Unauthorized Edition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Mohamed EI-Khawas, Qaddafi: His Ideolo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rattleboro, VT: Amana Books, 1986)详细地分析了第三世界理论，

Mahmoud Mustafa Ayoub, Islam and Third University Theory: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Mu'ammar al-Qadhafi (London: KPI Limited, 1987)将第三世界理论置于宗教的背景之下。对研究利比亚革命形成有帮助的著作是: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Ideology of Mu'ammar al-Qadhdhafi: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5, no. 4 (November 1983), pp. 471 – 490. Muammar Gaddafi with Edmond Jouve, *My Vision* (*London: John Blake, 2005*)对 1969 年后利比亚领导人意识形态历程进行了阐述,不过这些说法颇有争议。

关于"九月革命"的历史,Ruth First, *Libya: The Elusive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74)应当排在第一位。其他有助于研究利比亚早期革命的著作有 Jonathan Bearman, *Qadhafi's Libya* (London: Zed Books, 1986); John K. Cooley, *Libyan Sandstorm: The Complete Account of Qaddafi's Revolu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and Salah El Saadany, *Egypt and Libya from Inside, 1969 – 1976*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1994). Omar I. El Fathaly, Monte Palmer, and Richard Chacker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Bureaucracy in Libya*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77) and Omar I. El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ibya*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0)探究了利比亚革命的政治结构。Marius K. Deeb and Mary Jane Deeb, *Libya since the Revolution: Asp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2)提供了诸如妇女地位、教育和伊斯兰教等有用信息。Lillian Craig Harris, *Libya: Qa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6) and Martin Sicker, *The Making of a Pariah State: The Adventurist Politics of Muammar Qaddafi*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7)概括了利比亚历史,政治和社会。非常好的法文著作有 G. Albergoni et al., *La Libye nouvelle:*

Rupture et contnuité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75); Juliette Bessis, *La Libye contemporaine*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1986); and Moncef Djaziri, *Etat et Société en Libye*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1996)。

对于考察 1969 年后利比亚政治社会事件，最有价值的著作有 John Davis, *Libyan Politics: Tribe and Revolution* (London: I. B. Tauris, 1987)。作者将论述集中在 Zuwaya 部族，分析了新生革命政府时期它们的社会生活。Amal Obeidi, *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调查了卡扎菲上台后作为民众代表之一——大学生对革命政权的态度。Dirk Vandewalle, ed.,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New York: Palgrave, 2008)考察了当代利比亚的国内外政策。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Reforming the Economy, Not the Polity," *in North Africa: Politics, Region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ed. Yahia Zoubir and Haizam Amirah Fernande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53 - 70，探讨了利比亚最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

272

涉及当代利比亚经济史的著作有: J. A. Allen, Libya: *The Experience of Oil* (London: Croom Helm, 1981); Judith Gurney, *Liby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ank C. Waddams, *The Libyan oil Industry* (London: Croom Helm, 1980). 涉及利比亚经济的某些方面的有: J. A. Allan,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London: croom Helm, 1982); Bichara Khader and Bashir El-Wifati,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London: croom Helm, 1987); E. G. H. Joffe and K. S. Mclachla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Wisbech, Cambridgeshir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2); M. M. Buru, S. M. Ghanem and K. S. McLachl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Libya* (Wisbech, Cambridgeshir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2);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s Oil & Gas Industry: Blending Old and New,"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12, no. 2 (June 2007), pp. 239 - 254; Ronald Bruce St John,"The Liby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in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ed. Dirk Vandewalle (New York: Palgrave, 2008)。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and United States: Two Centuries of Str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全面考察了迄今为止利比亚与美国之间漫长而相互煎熬的关系。以下这本书从宽阔的视野分析了利比亚的外交政策,有价值却有点过时,即 Ronald Bruce St John, *Qaddafi's World Design: Libyan Foreign Policy, 1969 -1987* (London: Saqi Books, 1987). P. Edward Haley, *Qaddafi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9*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着重关注 1969 年以后利比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Mahmoud G. ElWarfally, *Imagery and Ideology in U. S. Policy toward Libya, 1969 - 1982*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8)从独特的视角出发论述了利比亚国家的所有领域。有趣的书还有: Brian L. Davis, *Qaddafi, terror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 S. Attack on Liby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0);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is not Iraq: Preemptive Strikes, WMD and Diplomac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58, no. 3 (Summer 2004), pp. 386 - 402;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n Foreign Policy" Orbis, 47, no. 3 (Summer 2003), pp. 463 - 477; Joseph T. Stanik, *El Dorado Canyon: Reagan's Undeclared War with Qaddafi*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273

关于利比亚长期参与非洲事务的著作,可参见: J. Millard Burr and Robert O. Collins, *Africa's Thirty Tears' War: Chad, Libya, and the Sudan, 1963 -1993*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Mary-

Jane Deeb, *Libya'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Af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1999); Bernard Lanne, *Tchad-Libye: La querelle des frontiers* (Paris: Karthala, 1982); Rene Lemarchand 的 *The Green and the Black: Qadhafi's Policis in Africa*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88); Rene Otayek, *La Politique Africaine de la Libye (1969 - 1985)* (Paris: Editions Karthala, 1986);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in Africa: looking Back, Moving Forward," *Journal of Libyan Studies*, 1, no. 1 (Summer 2000): 18 - 32;以及 John Wright 的 *Libya, Chad and the Central Sahara*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89)。

关于利比亚建筑史方面的知识,可参见: Ashil M. Barbar, *Islamic Architecyure in Libya* (Monticello, IL: Vance, 1979); Federico Cresti, "City and Territory in Libya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Sources and Research Document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bya: Sources and Historiographies*, ed. Anna Baldinett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L'Oriente, 2003), pp. 141 - 168; J. Martin Evans, "The Traditional House in the Oasis of Ghadames," Libyan Studies, 7 (1976), pp. 31 - 40; Nora Lafi and Denis Bocquet, "Local Elites and Italian Town-Planning Procedures in Early Colonial Tripoli, 1911 - 1912," *Journal of Libyan Studies*, 3, no. 1 (Summer 2002), pp. 59 - 68; Brian L. Mclaren,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 in Italian Colonial Libya: An Ambivalent Modern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6); 以及 J. B. Ward-Perkins, "Pre-Roman Element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Roman Tripolitania," *in Libya in History*, ed. Fawzi F. Gȧdallah (Benghazi: University of libya, 1968), pp. 101 - 116。

涉及利比亚艺术和手工艺的书,可参见: Tertia Barnett, "Rock-art, Landscape and Cultural Transition in the Wadi al-Ajal, Fazzan," *Libyan Studies*, 33 (2002), pp. 71 - 84; Monique Brandily, "Music

and Social Chang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ed. E. G. H. Joffe and K. S. McLachlan (Wisbech, Cambridgeshir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2), pp. 207 - 214; Philip Cianta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Libyan Ma'luf Musical Tradition," *Libyan Studies*, 34 (2003), pp. 137 - 146; A Pesco et. Al, Pre-historic Rock Art of the Libyan Sahara (Stoughton, WI: Oleander Press, 1974); Taher EI Amin EI Mughrabi, Ali Mustafa Ramadan, Ali Ammar Ei-Abani, *Shadows and Lights from Libyan Arab Republic* (Tripoli: Arabic House for Book, 1997); and H. M. Walda and S. Walker, "Ancient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Tripolitania and Cyrenacia," Libya Studies, 15 (1984) pp. 81 - 92。

274

利比亚英文文学著作较少,但正在增多,主要有: Ahmed Fagih, *Charles, Diana and me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2); Ahmed Fagih, Gazelles and Other Play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2); Ahmed Fagih, ed, *Libyan Stories: Twelve Short Stories from Libya*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2); Ahmed Fagih, Valley of Ashe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2); Ahmed Fagih, *Who's Afraid of Agatha Christie?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2); Ibrahim al-Koni, *The Bleeding of the Stone* (New York: Dial Press, 2002); Hisham Matar, *In the Country of Men* (New York: Dial Press, 2007); and Muammar Qaddafi, *Escape to Hell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and Montreal: Stanke, 1998)。

注　　释

第一章

1. 引自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The Berbers* (Oxford: Blackwell, 1997), p. 82。
2. Abdallah Laroui,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alph Manhei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7.

第二章

1. Richard B. Parker, *Uncle Sam in Barbary: A Diplomatic History*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p. 6.
2. C. R. Pennell, *Piracy and Diplomacy in Seventeenth-Century Nor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Thomas Baker, English Consul in Tripoli, 1677 – 1685* (Rutherford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Koal Folayan, *Tripoli during the Reign of Yusuf Pasa Qaramanli* (Ile-Ife, Nigeria: University of Ife Press, 1979). pp. 47 – 77.
4.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 – 198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70 – 76, 87 – 95, 104 – 113; Lisa Anderson, "Nineteenth-Century Reform in Ottoman Li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6, 3, August 1984, pp. 325 – 348.

5. Michel Le Gall, "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Sanusiyya: A Reapprais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1, 1, February 1989, pp. 91 – 106, esp. pp. 96 – 101.
6. Nahum Slouschz, *Travels in North Africa* (Philadelphia, P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27), quoted in John Wright, ed., *Travellers in Libya* (London: Silphium Book, 2005), p. 228.
7.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0.

第三章

1. Domenico Tumiati, *Nell' Africa Romana: Tripolitania* (Milan: Fratelli Treves, 1911), quoted in *Travellers in Libya*, ed. John Wright(London: Silphium Press, 2005), p. 236.
2. R. J. B.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Life under the Dictatoeship, 1915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6). p. 236.
3. Enrico Corradini, *L'Ora di Tripoli* (Milan: Fratelli Treves, 1911), quoted in *Travellers in Libya*, pp. 233 – 234.
4. Ali Abdullatif Ahmida, *Forgotten Voice: Power and Agenc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bya*, ed. Ahmed Fagih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pp. 31 – 34.
5. For additional detail, see Lisa S. Anderson, "The Tripoli Republic, 1918 – 1922," in *Social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ed. E. G. H. Joffe and K. S. Malachlan (Wisbech: Middel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1982), pp. 43 – 65.

6. Bosworth, *Mussolini's Italy*, p. 381.
7. Ali M. Almistrati, "An Extract from Mussolini's Nail", *Libyan Stories*, p. 30.
8. John Wright, "British and Italians in Libya in 1943", *Maghreb Review*, 15,1-2,1990, p. 32.
9. 关于 1945 年暴乱可参见：Harvey E. Goldberg, *Jewish Life in Muslim Libya: Rivals & Relativ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97-122。
10. Lisa Anders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Libya, 1908-1922," i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ed. Rashid Khalid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5-242.
11. Fagih, "Background Notes on Modern Libyan Literature," *Libyan Stories*, p. 2.
12. Brian L. Mclaren,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 in Italian Colonial Libya: An Ambivalent Modernism*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 41.

第四章

1. 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3), pp. 28-52.
2. Scott L. Bills, *The Libyan Aren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1945-1948* (Kent, OH: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
3. James Reston, "U. S. Chiefs Divided on Italy's Colonies," *The New York Times*, 2 September 1945.
4. W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Arab Nation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twar Imper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05, 300-302.

5. Khadduri, *Modern Libya*, pp. 120 – 124.
6.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and the United State: Two Centuries of Strife*(Philadei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pp. 57 – 59.
7. 关于联合国协商细节,参见: Adrian Pelt, *Liby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Case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Henry Serrano Villard, *Libya: 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33 – 34.
9. Ann Dearden, "Independence for Libya: The Political Problem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4, 4, October 1950, p. 408.

第五章

1. Benjamin Howard Higgin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Libya* (New York: United Nationa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me, 1953), p. 6.
2. Shukri Ghanem, "The Libyan Economy before Independenc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ed. E. G. H. Joffe and K. S. McLachlan(Wisbech, Cambridgeshire: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n Studies, 1982), pp. 141 – 159.
3. Khadduri, *Modern Libya*, pp. 217 – 220.
4.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9.
5. Hisham B. Sharabi,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Arab World*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5),pp. 48 – 50.
6. Henry Serrano Villard, *Libya: The New Arab Kingdom of North Afric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9.
7. Mustafa Ahmed Ben Halim, *Libya: The Year of Hope*(London: AAS Media Publishers, 1998),pp. 147 – 176 and 201 – 223, quote p. 149.

8. Fagih, "Background Note on Modern Libyan Literature," *Libyan Stories*, pp. 6 – 7.
9. Ronald Bruce St John, *Qaddafi's World Design: Libyan Foreign Policy, 1969 – 1987* (London: Saqi Books, 1987), pp. 16 – 17.
10. Renzo De Felice, *Jews in an Arab Land: Libyan, 1835 – 197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pp. 185 – 233.

第六章

1. 作者采访 David L. Mack 大使,华盛顿 DC 区,2005 年 11 月 16 日。
2. Ruth First, *Libya: The Elusive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m Books, 1974), pp. 119 – 124.
3. Mu'ammar al-Qaddafi, "The Village," in *Escape to Hell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Stanke, 1998), p. 50.
4. Patrick Seale and Maureen McConville, *The Hilton Assignment*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74), pp. 144 – 145, 152, 170 – 173.
5. Mu'ammar al-Qaddafi, "Address Delivered by Col. Mu'ammar al-Qaddafi in Tripoli on 4 Sha'ban1389 = 16 October 1969," in *The Libyan Revolution: A Sourcebook of Leg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I: 1 Setember 1969 – 30 August 1970*, eds. Meredith O. Ansell and Ibrahim Massaud al-Arif (Stoughton, WI: Oleander Press, 1972), p. 90.
6. St John, *Liby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07 – 108.
7. Mu'ammar al-Qaddafi, "Address Delivered by Col. Mu'ammar al-Qaddafi in Tripoli on 4 Sha'ban 1389 = 16 October 1969," p. 95.
8. John Anthony Allan, *Libya: The Experience of Oil* (London: Croom Helm, 1981), pp. 186 – 187.
9. Taoufik Monastiri, "Teaching the Revolution: Libyan Education since 1969," in *Qadhafi's Libya, 1969 – 1994*, ed. Dirk Vandewal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68 – 72.

10.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Build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2 - 73.
11. St John, *Qaddafi's World Design*, pp. 49 - 58.
12. Mu'ammar al-Qaddafi, "Escape to Hell," in *Escape to Hell and Other Stories*, pp. 63 - 64.
13. Omar I. EI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ibya*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0), pp. 71 - 116.
14. Mo'ammar el-Gadhafi, *I. Broad Lines of the Third Theory*; *II. The Aspects of the Third Theory*; *III. The Concept of Jihad*; *IV. The Divine Concept of Islam* (Tripoli: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md Culture, 1973).

第七章

1. 引自《绿皮书》第一部分,参见 Mu'ammar al-Qassafi, *The Green Book, Part 1: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The Authority of the People"* (London: Martin Brian&O'keefe, 1976)。
2. 引自《绿皮书》第二部分,参见:Mu'ammar al-Qassafi, *The Green Book, Part 2: The Solution of the Economic Problem-"Socialism"* (London: Martin Brian&O'keefe, 1978)。
3. 引自《绿皮书》第三部分,参见:Mu'ammar al-Qassafi, *The Green Book, Part 3: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Third Universal Theory* (Tripoli: Public Establishment for Publishing, Advertising, and Distribution, 1979)。
4. Hisham Matar, *In the Country of Men*, p. 235.
5. Hanspeter Matt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Qadhafi's Libya, 1969 - 1994*, ed. Dirk Vandewal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89 - 112.

6. Matar, *In the Country of Men*, p. 235.
7.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pp. 104 – 105.
8. Ambassador William L. Eagleton, interview with author, Taos, New Mexico, 31 May 2006.
9. St John, *Liby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06 – 119.
10. Mary-Jane Deeb, *Libya'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 Af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00 – 105. J. Millard Burr and Robert O. Collins, *Africa's Thirty Years War: Libya, Chad and the Sudan*, 1969 – 199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p. 82 – 98.
11. 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Libyan Debacle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Green and the Black: Qadhafi's Policies in Africa*, ed. Rene Lemarch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5 – 138.
12. George P. Schultz,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3), p. 677.

第八章

1. 关于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政治、经济自由化相关情况，参见：Dirk Vandewalle, "The Failure of Liberalization in the Jamahiriyya," in *Qadhafi's Libya, 1996 – 1994*, ed. Dirk Vandewal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203 – 222。
2. St John, *Liby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8 – 146.
3. Ann Elizabeth Mayer, "In Search of Sacred Law: The Meandering Course of Qadhafi's Legal Policy," in *Qadhafi's Libya, 1996 – 1994*, ed. Dirk Vandewal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123 – 131.
4. 关于利比亚早期化学武器的争议，参见：Thomas C. Wiegele, *The Clandestine Building of Libya's Chemical Weapons*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2),esp. pp. 12 – 15,113 – 136。

5. 关于"洛克比空难"的概述,参见: Khalil I. Matar and Robert W. Thabit, *Lockerbie and Liby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2004)。
6. Sam C. Nolutshungu, *Limits of Anarchy: Interven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ha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pp. 143 – 144.
7. Mu'ammar al-Qaddafi, *Part 3: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Third Universal Theory* (Tripoli: Public Establishment for Publishing, Advertising, and Distribution, 1979),p. 4.
8. 关于苏尔特湾争端的背景,参见: Joseph T. Stanik, *El Dorado Canyon: Reagan's Undeclared War with Qaddafi*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esp. pp. 26 – 65,120 – 142。

第九章

1. St John, *Liby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75 – 184.
2. Amal Obeidi, *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 (Richmond, Surrey: Curzon,2001),pp. 103 – 106,129 – 133.
3. Geogrge Joffe, "Libya's Saharan Destiny",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0, no. 3 – 4 (September-December 2005), pp. 613 – 614.
4. Jeremy Keenan, "Waging War on Terror: The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s 'New Imperialism' for Saharan People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0,no. 3 – 4, September-December 2005, pp. 641 – 642.
5. Muammar al-Qaddafi, "Statement by Brother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Fif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African Union," Sirte, Libya, 4

July 2005, p. 10, http: //www. sfrica-union. org, accessed 1 september 2005.

6. Pamela Chasek, "Revolution across the Sea: Libyan Forign Policy in Central America," in *Central America & the Middle Eas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rises*, ed. Damian J. Fernandez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0 - 176.
7. Haizam Amirah Fernandez, "Libya's Return: Between Change and Continuiy," *Real Instituto Elcano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y Estrategicos*, 1 June 2006, http: //www. realinstitutoelcano. org, accessed 23 October 2006.
8. Sara Hamood, "African Transit Migration through Libya to Europe: The Human Cos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Forced Migration and Refugee Studies, January 2006, http: // www. aucegypt. edu, accessed 25 June 2007.
9. Ronald Bruce St John, " 'Libya Is Not Iraq': Preemptive Syrikes, WMD and Diplomacy,"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8, no. 3, Summer 2004, pp. 396 - 402.
10. World Bank,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Country Economic Report," *Country Economic Report NO. 30295/LY*, July 2006, Internet edition, http: //www. worldbank, accessed 8 September 2006, p. i.
11.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n's Oil and Gas Industry: Blending Old and New,"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2, no. 2(June 2007), pp. 203 - 218.
12. Ray Takeyh, "Qadhafi's Libya and the Prospect of Islamic Succession,"*Middle East Policy*, vol. 7, no. 2, February 2000, pp. 154 - 164.
13. Human Right Watch, "Libyan, Words to Deeds: The Urgent

Need for Human Rights Reform," vol. 18, no. 1, January 2006, p. 2, http: //hrw. org, accesses 25 June 2007.

14. Alison Pargeter, "Libyan: Reforming the Impossibl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momy*, vol. 33, no. 108, June 2006, p. 224.

索　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

F

G

K

L

M

N

V

W

Y

Z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利比亚史
作者=作者:（英）圣约翰著
页数=263
SS号=12804251
出版日期=2011.01
出版社=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